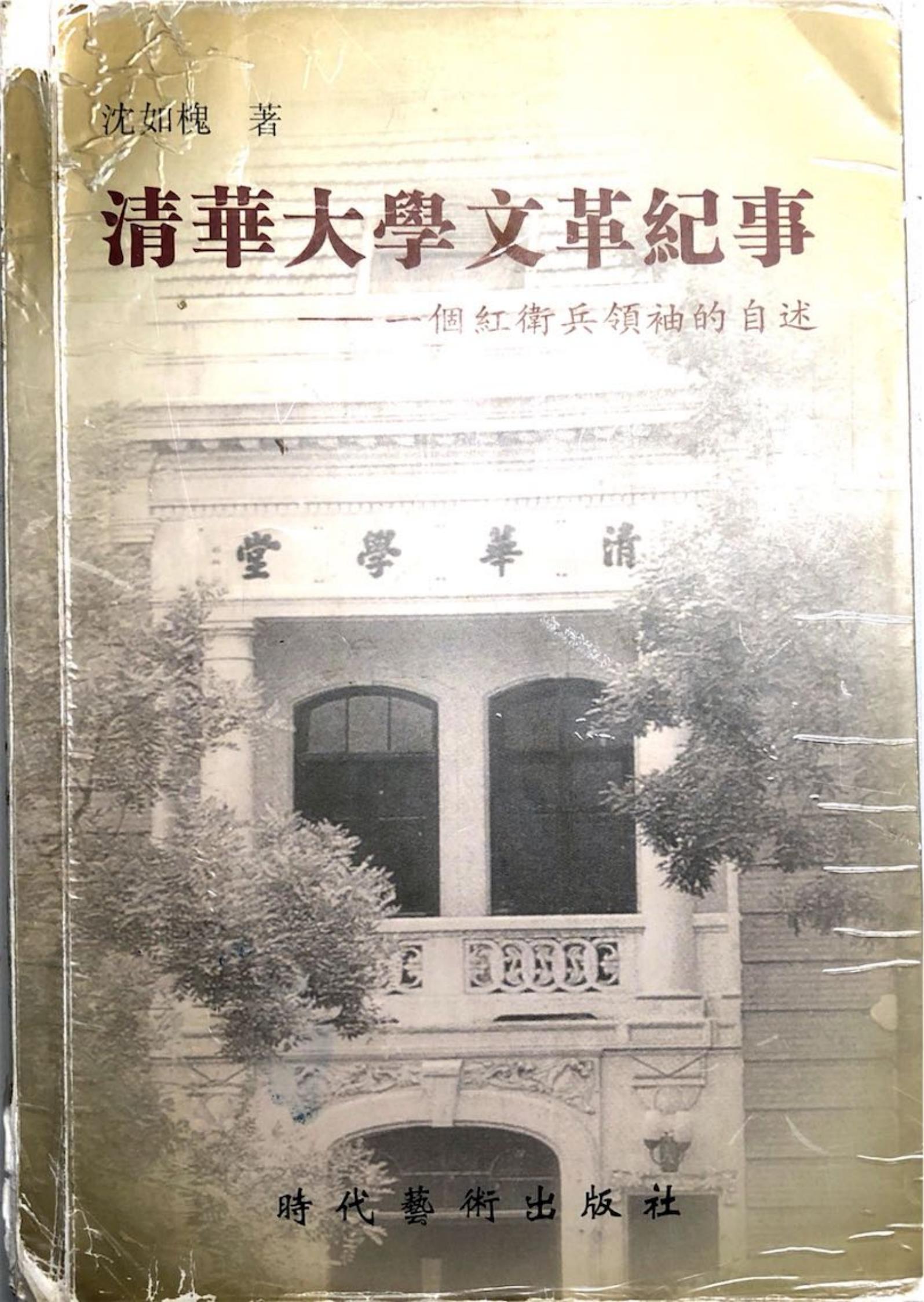


沈如槐 著

# 清華大學文革紀事

——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



清華學堂

時代藝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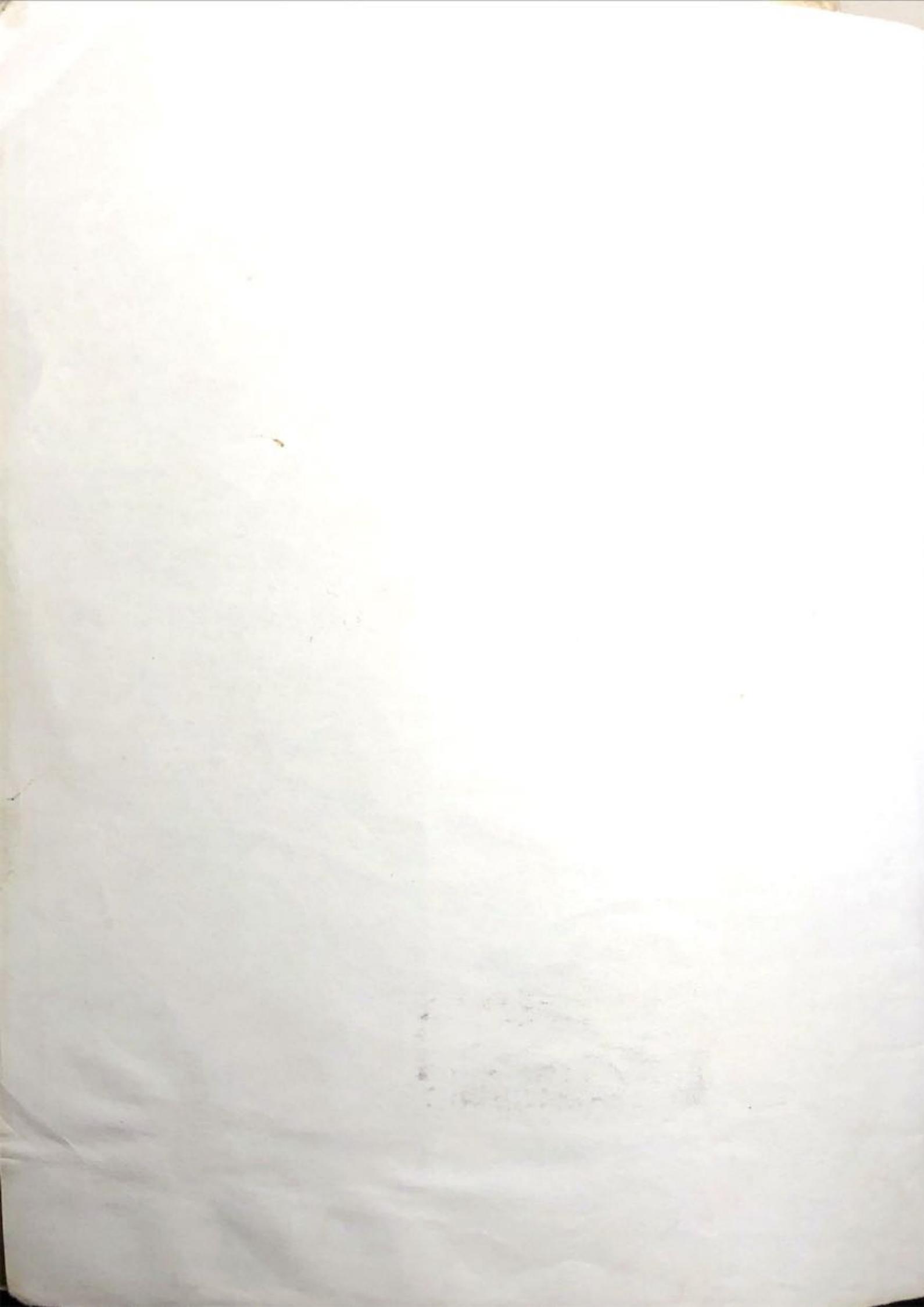


作者簡介：

沈如槐，江蘇興化人。1964年考入清華大學，就讀于工程力學數學系計算數學專業。

1970年初從清華大學畢業，分配到東北某廠勞動。

1975年初調北京，在電子工業部某研究所工作，長期從事計算機軟件的研究和開發、工業生產過程自動控制系統及管理信息系統的應用開發，也從事過科研管理工作，具有計算機軟件高級工程師職稱。



# 清華大學文革紀事

——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

沈如槐 著



時代藝術出版社



## 目 錄

### 第一章 天下大亂

狂飆驟起	5
力求理解	10
中間偏左	13
參加八八	19
紅衛戰士	24
戰鬥小組	26
清華大亂	32
南下串聯	34
康藏之旅	37

### 第二章 黨內有派

裂痕初現	47
縱隊成派	54
反擊逆流	59
二月整風	63
初露頭角	67
聯合聲明	69
黨員登記	74
蒯氏路線	75
無限上綱	78
政治綱領	81
反攻倒算	84
幹部抗爭	89
導火之索	94

### 第三章 勢不兩立

揭竿而起	100
一條主線	103
主持大局	105
爭奪喉舌	108
依靠群衆	112
兩張表格	115
平反黑幫	121
保鬥分明	124
集體亮相	126
兩小撮論	130
自力更生	133
良師益友	135
革籌小組	138
四項協議	143
徹底分裂	151
內外反應	162
組織狀況	170

### 第四章 思潮之爭

爭取主動	174
出爾反爾	178
啓用中幹	186
衝擊上幹	190
紅綫主導	197
揪劉火綫	202

自毀長城	207
四派思潮	219
愚蠢之舉	231
後臺風波	233
主動出擊	237
聯而不合	245
力保戰友	248

## 第五章 全面內戰

爭端再起	252
戰歌事件	258
革命到底	275
炮制六評	280
論戰實質	292
三大戰役	301
神聖同盟	302
要求軍管	304
鬥私批修	307
解放劉冰	311
批省無聯	314
整紅教聯	317
也不高明	320
倒謝運動	322
形勢逆轉	326
冤假錯案	329
荒誕故事	336

## 第六章 百日武鬥

特種部隊	340
一四武鬥	342
箭在弦上	345
初戰慘敗	349
四不方針	352
逃難遇難	356
護糧被害	359
戰略決策	361
五卅大戰	369
制造武器	379
冒險突圍	384
解救行動	387
咬牙堅持	392
文攻戰場	395
友邦驚詫	398
血染清華	403
同歸于盡	422
<b>參考資料</b>	<b>432</b>
<b>後記</b>	<b>435</b>

# 第一章 天下大亂

## 狂飆驟起

公元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午飯後，我們清華大學工程力學數學系 03 班的同學們照例回十三號樓宿捨休息。在樓梯口，一位同學告訴我：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了什麼？》，還廣播了《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說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等是“三家村”的黑幫分子，北京大學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他對我說：清華也要停課搞文化大革命了，我們班怎麼辦？我吃了一驚：文化大革命？停課？我說：“沒有學校通知，我們照常上課。”當時我是力 03 班的團支部書記。

下午，我們繼續去教室上課，但同學們已經心不在焉了。第二天我們還是去了教室，却没有老師來講課，實際上全校已經停課。大家不知所措，坐在教室裏議論紛紛。據說清華也有人貼了大字報，但說不清是哪個系的同學貼的，也不知道大字報的具體內容。同學們催我到系裏找領導問清楚下面幹什麼。我找到了班主任，他向我們傳達了校黨委的三條精神：各人可以按中央的方針和自己的理解寫大字報，緊跟中央，中央指到哪裏，就打到哪裏；矛頭指向黑線，對學校工作可以提意見；內外有別。

所謂內外有別，就是大字報不要到處亂貼，要貼到樓道內。外單位送來的大字報，一律送到圖書館閱覽室。確切地說，大字報不是“貼”的，而是“挂”的，是挂在圖書

館閱覽室裏臨時拉起來的一排排鐵絲上的。那些大字報主要是批判文化界、教育界的所謂“封資修”，說什麼的都有，我記得被點名批判最多的人是郭沫若先生。

很快，圖書館的閱覽室就不够用了，學校派人在西大操場東邊的三院和強齋之間的空地上豎起很多木樁，拉起一排排鐵絲，讓同學們挂大字報。

後來，大字報越來越多，同學們幹脆把大字報貼在教學樓的牆上。再後來，學校在大禮堂前面的草坪周圍搭起了一圈蘆葦席子，供同學們貼大字報。從此，大禮堂及其周圍的區域成爲清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中心。

最早把矛頭指向蔣南翔的是熱 002 班的同學，他們貼出了《蔣南翔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的大字報。蔣南翔是我們清華大學的黨委書記兼校長，同時也是我們國家的高教部部長。隨後，指責校黨委是黑幫、蔣南翔是修正主義分子的大字報逐漸多了起來。校黨委看到形勢不妙，便組織了一些幹部、教師和學生貼出許多大字報，力圖證明校黨委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對造反的學生進行了圍攻。學校裏形成了支持校黨委和反對校黨委的兩大陣營。很多人都用大字報表明自己的態度。據說支持校黨委的大字報和反對校黨委的大字報的比例是一萬對七百，占壓倒優勢。

但是，校黨委的做法適得其反。6月 4 日，自 93 班的同學貼出了《這些問題說明了什麼？》繼續反對蔣南翔和校黨委，因爲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在大字報上簽了名，所以格外引人注目。這幾位同學原來是黨支部組織的一個批判“三家村”的七人小組，曾經在校刊《新清華》上發表過批判文章，沒想到現在大火燒到了黨委身上。七人小組在 6 月 2 號就寫好了大字報，他們拿着稿子到《解放軍報》社

請求幫助，一位叫宋瓊的負責人接待了他們，并把他們留在《解放軍報》社，修改稿件，上綱上線，搞了一個夜晚，打出了小樣，準備見報。但上級未批準見報，這才貼到清華園。

校黨委再次組織人馬進行圍攻。有些人喊出了“保衛校黨委”、“保衛蔣南翔”、“反對蔣南翔就是反對校黨委、反對校黨委就是反對黨中央”等口號。整個學校圍繞着蔣南翔、校黨委究竟姓“馬”（馬列主義）還是姓“修”（修正主義）的問題展開了大辯論。

當時，我的觀點很明確：校黨委姓“馬”，校黨委就是黨在學校的代表，祇能保衛，不能反對。因為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救星，對我個人來說，更是如此。

我出身于蘇北裏下河地區興化縣的一個貧農家庭，我的童年是一個苦難的童年。解放前，父母租種了地主的幾畝田，全家過着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生活。父親給資本家做過伙夫，母親給人家當過保姆。49年，我的家鄉獲得解放，黨和政府領導農民搞土改，我們家也分了幾畝田。但那一年蘇北發大水，興化是蘇北裏下河地區的鍋底窪，受災最重，鄉親們紛紛外出逃荒。父親搖了一條小船帶着母親、哥哥和我去上海，當時哥哥七歲，我才四歲。開始的時候，父親挑個擔子賣糖粥，母親帶着我拾荒（就是撿垃圾），哥哥留在船上看家。過了不久，父親的糖粥賣不下去，祇好出去打短工，母親拾荒也撿不到什麼東西，祇好帶我去要飯。有時候，父親找不到工作，母親要不到飯，全家祇好挨餓。這時候，母親通常到附近的小菜場去撿菜幫子和魚頭魚尾，拿回來煮了充饑。小菜場經常有人劃“長魚”，“長魚”就是鱠魚，賣魚的人用一根骨針，把鱠魚劃成一

條條的，賣給客人，剩下的魚頭和魚刺倒在盆裏。母親就把鱈魚的魚頭和魚刺撿回來煮了吃。我嫌魚頭魚刺扎人，寧可挨餓，也不肯吃，哥哥聽話，吃了不少，結果那些魚骨頭卡在哥哥的胃裏、腸子裏，疼得他在船上打滾。父母無錢求治，祇有眼睜睜地看着我可憐的哥哥疼死在小船上。哥哥一死，傷心的父母就帶着我離開上海回到了家鄉。

解放初期，黨和政府及時領導了互助組運動，幫助貧苦農民進行生產自救，對於大多數剛剛分到土地而無任何生產資料的貧苦農民而言，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互助組和合作化運動對恢復農業生產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我的父母自然是互助組和合作化運動的積極分子，我們家的生活得到了穩定，日子一天天好起來。雖然還是很窮，但黨和政府年年搞救濟，我們家總是能得到各種各樣的救濟，錢、糧，還有衣物。

1952 年，我們村裏辦了小學，我上了學。從上學的那天起，我就一直享受着免費教育，直到大學畢業。在清華，我是班上最窮的學生之一，除享受最高的助學金外，上課用的書本，床上的被褥，冬天的棉衣，夏天的襯衫都是學校發的。

從一個農村的苦孩子到高等學府的大學生，從少先隊員，共青團員，到預備黨員，我始終在黨的培養下成長。黨在我身上打上了深深的階級烙印。沒有黨，就沒有我的一切。這不是口號，而是最簡單不過的事實。因此，我擁護黨、熱愛黨，是完全發自內心的。在清華，像我這樣的同學有很多很多。

在肯定了校黨委姓“馬”的同時，我對蔣南翔持保留態度，我說不知道蔣南翔姓什麼。我覺得蔣南翔姓“馬”還

是姓“修”，應該由黨中央說了算，我們無從判斷，因為我們既不了解他的歷史，也不了解他的現狀。我還說，即使蔣南翔真的“修”掉了，清華黨的組織也還是健康的。我們不應該將黨的組織與個人混為一談，我們保的是黨委這個整體，而不是其中的某一個人。

我們年級的黨支部並沒有給我們布置參與辯論的任務，可我是班上的團支部書記，又是黨小組長，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在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上表明自己的態度，而不應該采取消極回避的態度，于是我把我們班的另外兩位黨員召集起來，陳述我“校黨委姓馬，蔣南翔不知姓什麼”的觀點。這兩位黨員一位是系學生會副主席，一位是系學生會女工部長，他們兩人都非常同意我的看法，這樣我們三個人聯名寫了大字報，挂到了三院北面的鐵絲上。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寫的第一張大字報。

6月5日，以劉濤為代表的七名高幹子女貼出了《清華黨委應採取積極態度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雖然他們祇是要求校黨委站到運動的前列，但他們的語氣却是居高臨下的、命令式的。在我們的心目中，黨委從來都是至高無上的，有誰敢于對黨委發號施令？一批高幹子女帶頭反對校黨委，使我們班大多數同學預感到清華黨委可能要垮臺。

6月7日，北大學生楊濤到清華煽風點火，校黨委組織了黨團骨幹分子與楊濤在大禮堂進行辯論，圍攻楊濤，會後強行將他押送回北大。校黨委的這種做法引起了很多同學的不滿，紛紛寫大字報批評校黨委。

6月9日，張際春在高教部宣布：蔣南翔是黑幫，已被停職反省。消息傳到清華，清華立刻大亂，有人說，“蔣家

王朝，頃刻瓦解”。不過，清華的師生員工始終認為，清華黨委不是被群衆運動衝垮的，而是被高教部搞垮的。有人說，蔣南翔不是被揪出來的，而是被拋出來的。事實上，如果不是張際春在高教部宣布蔣南翔停職反省的話，清華黨委及其龐大的黨團幹部和政治工作體系是衝不垮的。其實，在文化革命中，絕大多數單位的領導班子和黨團組織都不是被群衆運動衝垮的，而是被上級領導特別是中央文革搞垮的。

這一階段在清華文革史上稱為“反蔣”時期。這個時期，反蔣的是造反派，保蔣的是保守派。我雖然不保蔣南翔，但是保校黨委，基本上是保守派。

### 力求理解

6月9日，北京新市委派出以葉林為組長的513人的龐大工作組進清華，罷免學校黨委及各級幹部的官，由工作組代理行使校黨委職權，領導清華文化大革命；這就是後來人們常說的“一派、二罷”。

工作組在各系組建了文化革命委員會並指定了各系的文化革命委員，那些反蔣積極的幹部子弟自然成了工作組的依靠對象，成為各系的文化革命委員。我們班由一位高幹子女負責，團支部、班委會停止工作，我也“靠邊站”了。

所有因反對校黨委而受圍攻、受壓制的同學得到了解放，他們立刻把怨氣發到各級幹部身上，他們把幹部揪到臺上鬥爭，給幹部戴上高帽子游街，并強迫他們勞動改造。毛主席幾十年前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描述的貧下中農鬥爭土豪劣紳的種種情況，重新出現在我們面前。

不過這次不是在窮鄉僻壤，而是在首都的高等學府。

從六月九日工作組進校到六月二十三日這段時間，在清華文革史上是所謂“鬥黑幫”時期。後來《紅旗》雜志調查員對這個時期的清華有個形象的描述，叫做“游街一大串，鬥爭會一大片，勞改一大隊”。

這個時期，我和我們班的同學基本上處于觀望狀態。但我本人生性好動，對運動非常關心，認真閱讀報刊文章，到處看大字報，我力求理解發生在我們身邊的這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從内心講，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基本上是贊同的。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65年學校黨委組織《九評》學習，開展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的教育，要求每個人聯系自己的實際情況，批判成名成家思想，滅資興無，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九評》學習給我的教育最深，我就是在《九評》學習後入黨的。我擁護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的教育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作為一個青年學生，我覺得應該自覺響應黨的號召，積極投身到這場偉大的革命中去，經風雨，見世面，爭取做一個合格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另外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當時我就讀于清華大學工程力學數學系計算數學專業，我們這個專業是理科數學專業，有幾門課程是我們一個班單獨上課，這幾門課程本身就比較難懂，而任課老師講課時常常是抽象概念一大堆，公式推導滿黑板，許多同學跟不上，有些同學幹脆就聽不懂；老師布置的作業又多又難，有些題，全班沒有一個人能做出來；期中、期末考試不及格的比較多。還有的老師在課堂上過多介紹數學家的生平和趣聞軼事，班上同學們意見

很大，說他宣傳成名成家思想。66年2月份的時候，我們團支部和班委會根據同學們的要求，多次組織全班開會，提出了許多意見，要求系裏改進，有些同學甚至提出了“教育革命”的口號。年級黨支部和系裏都很重視我們班的情況，到我們班上開座談會，分別找了許多同學徵求意見。後來這件事反映到蔣南翔校長那裏，蔣校長基本肯定了我們班的意見，但是他要求我們不要再提“教育革命”的口號，說“革命”兩個字的含義太大太重，提“教育改革”比較恰當。

文化大革命從文化和教育戰線入手，引起了我和我們班上許多同學的共鳴。按照最初的宣傳，我們理解，文化大革命，就是思想文化戰線的革命，當然也包括教育戰線的革命，沒有想到後來竟演變成了涉及一切領域的政治大革命。

我在努力想：清華修在哪裏？“黑幫”黑在哪裏？所謂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體現在什麼地方？外校同學到清華參觀時問得最多的也是這些問題。當時我祇認識到兩點：

一是清華鼓勵我們成為“雙肩挑”的知識分子，強調“聽話出活”，其結果是引導我們成為祇管奮力劃船，不管前進方向的政治庸人，容易盲目地跟着野心家走上修正主義道路；

二是清華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學習、生活、體育、文娛等條件，使我們生活在象牙塔裏，脫離了中國的工農群衆，忘記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逐漸變成了修正主義苗子。

可是，說清華黨委也像北大那樣，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全校幹部從上到下都是“黑幫分子”，連許多教

師和政治輔導員也成了“黑幫爪牙”，昔日的師長，居然都是黑幫分子和保皇派，我是無論如何也想不通的，我心目中原有的政治坐標一下子全都坍塌了。

在我的記憶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兩位政治課的青年教師，因為他們曾經在全校大會上發言批駁過反對校黨委的學生，所以“民憤”較大，一開始就受到衝擊，有人把他們關在圖書館一樓的辦公室裏，強迫他們寫檢查，天黑了，也不讓他們回家。辦公室外擠滿了看熱鬧的人，不時還有“老實交代”之類的呵斥之聲。

一些學生們拉着各級幹部戴高帽子游街。我們系有位一年級的團幹部叫孫秀，她是從農村來的同學，非常質樸，就因為她是學校樹立的優秀團幹部的典型，居然也被一些同學揪鬥游街。也許是兔死狐悲吧，看到孫秀挨鬥，我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覺。

我確信，我們搞文化大革命，我們要反修防修，但決不是針對大多數幹部、教師的。我們反修防修的概念不都是這些幹部、教師灌輸給我們的嗎？不正是他們教我們科學社會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正是他們教我們滅資興無、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他們是黨的教育工作者，無論他們有什麼錯誤，也不能與舊社會的土豪劣紳相提並論，決不能用土地革命時期農民揪鬥土豪劣紳那樣的辦法來對待我們學校的幹部、教師。

### 中間偏左

工作組進校後首先把清華所有幹部都趕“上樓”，要求幹部人人檢查，檢查過關後才能“下樓”，并要求幹部“層

層剥皮”，先揭發基層，後揭發黨委，一層一層往上追。工作組認為清華黨委是黑幫，自然對清華的幹部採取排斥一切的做法。

工作組進校後的第二步是恢復正常的秩序，試圖把亂揪亂鬥的學生們拉回課堂。工作組員下到班級，組織同學們學習文件和社論，提高思想認識。

但是部分同學不願再受束縛，照樣我行我素，常常利用晚上的時間揪鬥幹部。

工作組不同意學生們揪鬥幹部並將幹部戴高帽游街的做法。一些工作組組員批評那些搞戴高帽游街的學生覺悟太低，沒有政治頭腦，是一群烏合之衆。

不久，就有部分同學貼大字報反對工作組的清規戒律和條條框框，說“工作組不可信任”、“工作組大方向錯了”。

6月16日，工程化學系化92班學生蒯大富等人貼出《工作組往何處去？》的大字報，認為工作組壓制了群衆。

工作組和部分同學之間發生了尖銳的對立。

我們班比較聽話，工作組安排我們學習、討論，我們都照辦。我們一般都是晚上去看大字報，了解情況，既沒有人參加揪鬥黑幫，也沒有人反對工作組。

6月19日，王光美來到清華，在群衆面前公開亮相，說是“少奇同志讓我來看大字報”的。她表示願意參加清華的文化大革命，并成了清華工作組的成員。王光美的出現引起了全校的轟動，大家都很好奇，我們一聽到信兒就奔跑過去圍觀，為的是一睹國家主席夫人的風采。

清華學生當中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層出不窮。6月21日，蒯大富首先提出了要向工作組奪權的問題，他在大字報上的批語中寫道：“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

在校黨委手中，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中，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

在一片反對聲中，工作組不够冷靜，錯誤估計了形勢。他們認為清華右派學生正在向黨奪權，必須加以反擊，并且提出了“反蔣（南翔）必先反蒯（大富）”的口號。

6月24日，工作組召開全校辯論大會，並組織部分同學圍攻蒯大富。辯論中，擁護工作組一方的發言漏洞百出，十分被動。工作組組長葉林不由分說，自己走上講臺，指責蒯大富要向工作組奪權，是一種反動行為。他要求全校同學表態，要麼站在蒯大富一邊，要麼站在工作組一邊。工作組副組長周赤萍也跑上講臺說：“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

工作組的做法不僅沒有孤立蒯大富，相反却激起了廣大群衆的強烈反感，同學們紛紛貼大字報反對工作組。

我認為蒯大富寫的批語和大字報，祇是表明他對工作組的不同意見，雖然他說要從工作組手裏奪權，但祇是說說而已，並沒有什麼實際行動，不能以言治罪，算不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工作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勢壓人，亂扣帽子。所以，當晚我也貼了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不同意工作組將蒯大富打成反革命。這是我在文化革命中貼的第二張大字報。我們班一共30人，有26人貼了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足見工作組在6.24辯論會上的表現多麼拙劣、多麼不得人心。特別是周赤萍“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那句話，在學生中起了極大的負面作用。毛澤東思想是神聖的，你小小一個周赤萍怎能代表得了？

在這樣的形勢下，工作組開始向群衆傳達北京新市委第

一書記李雪峰以北大“6.18事件”為依據所做的6.23報告，報告認為“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高校存在右派學生向工作組奪權的暗流，要求工作組堅決頂住，并提出了“反對新市委，就是反對黨中央”的口號。

所謂北大“6.18事件”是指6月18日北大化學、生物等系學生趁工作組全體組員到教學區開會之際，在學生宿舍區自發組織鬥爭了40多位正和同學們一起學習的教師、幹部和兩名學生幹部。北大工作組及時制止了學生的行動。當夜，北大工作組給中央寫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簡報認為這次事件的發生“主要是有壞人搗亂，還很可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

6月19日，劉少奇以中央名義轉發了北大簡報，并加了批語：“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1]

毫無疑問，清華工作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製造了圍攻蒯大富的“6.24事件”，也正是工作組靠傳達李雪峰6.23講話才扭轉了被動局面，平息了群衆反對工作組的浪潮。從此，清華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進入了長達20天的“反蒯”時期。在“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新市委、就是反對黨中央”、“無限信賴工作組”等口號下，工作組把鬥爭的主要矛頭對準了學生群衆。

清華的運動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薄一波副總理兩次來清華看大字報，第一次碰見了蒯大富并與他進行過辯論，第二次說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

中央文革小組派王力、關鋒到蒯大富的宿舍與他進行過長談。

工作組够狠，抓反革命毫不留情，將 700 多名學生打成反革命。

蒯大富够硬，反工作組絕不投降，甚至以絕食表示抗議。

蒯大富絕食抗議時，我覺得很稀罕，和我們班幾個同學跑到蒯大富的宿捨去看他。看他的人還不少，一撥又一撥。他不厭其煩地向每個來訪者解釋他的觀點。

雖然我們都表態擁護工作組，但是我們心中並沒有轉過彎來。我想，前一段在幹部和教師中揪出了那麼多黑幫，現在怎麼一下子又從學生中揪出這麼多反革命？好端端的清華園，怎麼變成了階級敵人的黑窩子？我想不通，覺得工作組的做法有問題。

即使從今天的眼光看來，我仍然認為工作組的做法是有問題的。第一，工作組奪了校黨委的權，一下子罷免全校 500 多名幹部的官，這是不相信清華黨的組織；第二，工作組幾天之內又將反對工作組的 700 多名學生打成反革命，這是不相信清華廣大群衆。毛主席說：“我們應當相信群衆，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工作組既不相信群衆，又不相信黨，其結局就可想而知了。

向高校派工作組本意是加強黨的領導，但這恰恰是以否定黨的領導為前提的。工作組代理行使校黨委職權，使清華原有的黨組織和政治工作體系一下子陷于癱瘓，却從根本上否定了解放後十七年黨在清華的領導。這樣就助長了學生的造反精神，出現了部分學生亂揪、亂鬥幹部的局面。而工作組用生硬的辦法限制學生的造反行為，又造成了學生的不滿與反抗。工作組不能客觀估計學生的不滿情緒并加以正確引導，反而認為這是右派學生向黨奪權，從而對

這些學生進行圍攻和鬥爭。

從根本上說，工作組的做法也是一種極“左”，首先，他們錯誤地估計階級鬥爭的形勢，誇大階級敵人的力量，一有風吹草動，就說階級敵人向黨進攻；其次，遇到不同意見，或者反對意見，就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

如果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把王光美的清華經驗，推廣到全國，無論是對於幹部，還是對於群衆，對於廣大的知識分子，那肯定也是一場災難，一場悲劇，其後果可能會比當年的反右鬥爭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們數力系 05 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劉泉，他曾貼大字報，要求罷免工作組組長葉林的官，也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平時派人對他實行監視，出外參加集體活動都由各班輪流派人陪同。有一次召開全校大會傳達一個什麼會議精神時，工作組派我陪着劉泉和大家一起參加會議。我與劉泉分別是各自班上的團支部書記，平時關係也不錯，他的父親是一位副省長，我根本不相信他是反革命，因此我們倆一邊聽傳達一邊說笑。為此，我遭到工作組的批評，他們說我立場不堅定，與反革命分子說說笑笑。還是因為這件事，團派後來竟給我戴上了“王光美的看守長”的桂冠，說我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

保工作組的是保守派，反工作組的是造反派，特別是那些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同學，是響當當的造反派。我不同意蒯大富等人向工作組奪權，也不同意工作組把蒯大富等人打成反革命，客觀地說是個中間派，而我則自認為是個中間偏左派。

## 參加八八

北京大學 7 月 23 日、25 日、26 日連續三天召開大會，辯論工作組的錯誤，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幾乎所有中央文革成員參加了辯論會。會上，陳伯達宣布北大“6.18 事件”是革命事件，并說工作組是一個阻礙文化大革命的障礙物，要搬掉這個障礙物。康生別有用心地說：“誰說工作組是黨中央、毛主席派來的？！這是不對的。工作組是新市委派來的，毛主席根本不知道！”

7 月 29 日北京市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正式宣布撤消工作組，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就派工作組問題做了檢查，并說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清華大學的工作組撤走之前，根據中央指示，經工作組組長葉林提議，各系文革主任聯席會議作為校文革臨時籌委會，簡稱“臨籌”，代替工作組領導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這樣，以劉濤為代表的幹部子弟組成的“臨籌”掌握了清華的大權。不過，“臨籌”一開始便遭到了許多同學的反對，他們說“臨籌”執行了“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

事實上，在北大的影響之下，從 7 月 27 日開始，清華也掀起了反對工作組的浪潮，一部分同學陸續貼出許多大字報，指出清華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而另一部分同學，特別是作為各系文革委員的幹部子弟則貼大字報認為工作組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反對工作組的同學與擁護工作組的同學形成了尖銳的對立，一場關於工作組大方向的激烈辯論在清華大學展開了。

7 月 29 日晚，王光美在清華辯論工作組的大會上再次

公開亮相，她說“清華運動缺點、錯誤、成績都有，這個問題，我有我的看法，現在不講，以後再講”，“光美同志是不是革命的，可以考驗嘛！”第二天她又到學生食堂參加勞動，為就餐的學生服務，贏得了清華師生員工的一片喝彩。她的講話和行動在同學們中間造成了很大影響，客觀上為工作組的辯論定了調子，暫時扭轉了對工作組不利的局面。

8月4日晚，周總理來到清華參加全校大會，并發表了重要講話。周總理告訴大家：黨中央常委、毛主席指定他來過問清華文化大革命運動，并對清華文革情況進行了六天的調查研究。周總理在會上用很大篇幅說明中央向高校派工作組是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宣布為蒯大富和劉泉等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學平反；要求大家支持“臨籌”的工作。針對清華同學中普遍存在的情緒對立、爭論不休、互相敵視、互相攻擊的狀況，總理再三強調：“把主要矛頭指向黑幫，同學互相爭論的情況應當結束。”總理所說的黑幫自然是指蔣南翔和清華黨委，他說：“清華在蔣南翔的統治下，成了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清華園。”[2]

但是，周總理的講話並沒有解決清華學生中尖銳的對立，學生中仍然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堅持辯論工作組的路線錯誤，另一種意見是立即打黑幫。群衆中有相當多的人對總理在8月4日講話中的“和稀泥”表示不滿，我也是其中之一。後來，有人貼了總理的大字報。

8月7日，根據周總理8月4日的講話精神，“臨籌”向全校師生員工提出建議：“團結起來，一致對敵，集中火力，把鬥爭鋒芒和主攻方向對準黑幫黑線”。這就是著名的“八七建議”。

8月8日，唐偉等人發起成立了“八八串聯會”。“八八串聯會”明確提出：反對“臨籌”的“八七建議”；堅決將工作組的路線錯誤辯論到底；堅決為革命造反精神徹底翻案”。顯然，“八八串聯會”的宗旨與周總理8月4日的講話精神背道而馳。後來，“八八串聯會”組織了幾次關於工作組錯誤的辯論會。

8月9日，在王光美的建議下，“臨籌”負責人成立了“八九串聯會”，也叫“盡快打黑幫串聯會”。他們的意思就是別再糾纏工作組的錯誤問題了，盡快打黑幫吧。8月14日，“盡快打黑幫串聯會”改名為“立即打黑幫串聯會”，并于15日鬥爭了黨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艾知生。

這樣群衆中的兩大派有了正式的名稱，支持“八八串聯會”的叫八八派，是少數派；支持“八九串聯會”的叫八九派，是多數派。

“串聯會”是清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創造。所謂“串聯會”，是具有相同觀點的人串聯起來的一種組織，是一個祇有鬆散聯系的政治派別。它有鮮明的政治旗幟，但沒有嚴密的組織形式。它的組織祇有通過開會才能得以體現。今天，你同意它的政治觀點，你就可以參加它組織的會議，成為串聯會的一員；明天，你也可以退出串聯會，而不需要任何人的認可，一切祇取决于你持有何種政治觀點。可以說，“八八串聯會”是清華文革史上最早出現的群衆政治組織。

“八八串聯會”的代表人物是唐偉、陳育延、朱德明和吳棟。唐偉，工化系“00字班”學生（清華大學的班級是以畢業的年份命名的，66年畢業的班級叫6字班，70年畢業的班級叫0字班，因學制改革，原本應于71年畢業的班

級改為 70 年畢業，但稱 00 字班，以示區別），烈士子弟；陳育延，數力系“00 字班”學生，幹部子弟，這兩位同學串聯到了一起，成立了一個《向日葵》小組，舉起了“八八串聯會”的大旗，成為批判工作組的領軍人物。我覺得他們真了不起，幾個普通的學生，敢于獨樹一幟，與高幹子弟的“臨籌”抗衡，而且他們居然不聽總理勸告，堅持自己的觀點，實在需要過人的膽略。因為這時既沒有公布《十六條》，又沒有發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群衆對工作組的問題和有關中央領導的責任還不像後來看得那麼嚴重。

8 月 8 號那天，我和我們班的幾個同學參加了“八八串聯會”的成立會議，後來，我們又積極參加了“八八串聯會”組織的批判工作組的各種辯論會，這樣，我們成了“八八串聯會”的成員。“八八串聯會”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參加的第一個群衆組織。據我了解，“八八串聯會”的基本群衆大都是像我們這樣的平民子弟。

客觀地說，我所接觸到的工作組組員們都是從各單位抽調來的基層幹部，有些幹部甚至是直接從“四清”工作隊來的，他們作風樸實，平易近人，很像我們過去的班主任和政治輔導員，和我們相處得很好。他們對我也很信任，7 月初，清華大學恢復黨團組織時，工作組又指定我繼續擔任班上的團支部書記。

既然如此，我為什麼還參加八八串聯會、堅持批判工作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很崇拜中央文革、相信中央文革。我認為中央文革首長的講話代表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我們應該緊緊跟着中央文革。中央文革首長在其他學校的講話狠狠批判了工作組，我們清華也應該批判工作組。我認

爲，清華工作組確實象中央文革指出的那樣打擊了群衆，壓制了革命，不批判工作組，就不能爲革命造反精神翻案，就不能順利進行“鬥、批、改”。

相比之下，我對周總理僅僅是敬重，而敬重之餘，還覺得周總理跟不上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總理的思想太保守、太右傾。

我很喜歡聽中央文革首長的講話，那些講話很鼓舞人心，聽起來很過癮，他們旗幟鮮明，慷慨激昂，堅決站在受壓制的群衆一邊，支持學生起來造反；而周總理的講話像溫吞水，他面面俱到，四平八穩，總是不停地檢查自己的錯誤，千方百計爲工作組開脫責任。

很多同學都聽出了總理和中央文革講話的調子不一樣，當總理在 8 月 4 日的大會上講話時，就有許多人寫條子給總理要求播放陳伯達、康生、江青的講話錄音。

據我所知，最早參加八八的人，大多數與我的情況類似。他們反對工作組與個人的境遇無關，主要是受中央文革的鼓動和影響。

最早的八八派有一個重要的特點，他們基本上由“根紅苗正，品學兼優”的人組成。在那個特殊時期，祇有“根紅苗正，品學兼優”的人才敢于站出來表明自己的觀點，對“臨籌”說“不”，否則有人就會“刨祖墳、揭老底”，利用家庭出身或缺點錯誤，將你搞臭。人們對“反蒯”時期工作組的這套手段仍然記憶猶新，心有餘悸。

最早的八八派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他們既沒有參加整人，也不是被工作組整得最厲害的人，沒有歷史包袱。

八八派以其“平民”特色區別于“貴族”（八九派）和“痞子”（蒯派）。因此，八八派在清華有最廣泛的群衆基

礎。

在工作組的指揮下參與過整人的文革成員搖身一變，成了“臨籌”的要員，掌握了清華各級大權。

而那些曾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後來自稱為“蒯派”的同學，並沒有真正得到平反和解放，他們還沒有形成一種重要的政治力量。據說蒯大富 8 月 3 日也開過一個什麼會議，但卻沒有什麼人理睬他們。

有人把這種情況稱之為：“左派不香、右派不臭”。

八八、八九相互對峙，“蒯派”待機而動。這就是清華八、九月份的政治形勢。

“八八串聯會”雖然提出了“為革命造反精神徹底翻案”的口號，却没有採取實際行動為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學翻案，特別沒有着重提出為蒯大富翻案。這就為後來蒯大富掌權後“否定八八”、“清除托派”種下了禍根。不過，我始終認為“八八串聯會”的提法符合當時大多數群衆的思想認識水平。當時清華大多數師生員工的共識是：蒯大富雖然不是反革命，但也不是什麼革命左派，不值得大張旗鼓、興師動衆地為他個人翻案。

## 紅衛戰士

衆所周知，“紅衛兵”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同學們在文化革命中的一大創造。早在 66 年 5 月 29 日，清華附中的一批幹部子弟在圓明園集會，成立了自發的戰鬥組織“紅衛兵”。66 年 6、7 月份，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先後寫了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大字報引用了毛主席的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

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在一次大會上，清華附中紅衛兵將他們的大字報和寫給毛主席的信交給江青，請她轉呈毛主席。8月1日，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復信，熱烈贊揚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從此“造反有理”的口號響徹神州大地，紅衛兵也成了革命的代名詞。

8月5日，劉濤等人成立了“自控系紅衛兵”，自任主任。這是清華大學最早出現的紅衛兵組織，可能也是全國高等院校成立的第一個紅衛兵組織。自控系紅衛兵最初祇不過是“臨籌”的“御林軍”，僅負責維持秩序而已，後來才演變為政治性的群衆組織。

8月19日，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後的第二天，八九派在自控系紅衛兵的基礎上，正式宣布成立清華大學紅衛兵。清華大學紅衛兵的領導機構叫做臨時總部，簡稱“臨總”。

從文化革命開始到清華大學紅衛兵成立，清華的政治舞臺上一直都是高幹子弟獨領風騷。我很敬佩這些幹部子弟，我認為他們家庭背景好，政治覺悟高，又能在運動中起帶頭作用，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當之無愧的接班人。

清華大學紅衛兵成立的時候，我是很羨慕的，非常想成為一名紅衛兵。我一直是一個政治上要求進步的學生，從少先隊員、共青團員、到共產黨員，哪一步都沒有落在後面。但是，清華大學紅衛兵祇吸收八九派中革命幹部子弟和革命軍人子弟，普通的工農子弟大都被排斥在外。後來人們干脆把他們稱之為“八九紅衛兵”。如果說參加八八，我祇是與八九派在政治觀點上有分歧的話，那麼現在，我對他們的組織路線也有了看法，我認為他們實行的是“左傾關門主義”。清華大學有那麼多的學生，大多數是普通老

百姓的子弟，高幹子弟畢竟是少數。革命事業接班人五項條件裏有這樣一條：他們必須是能够團結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包括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我們班 30 人，祇有一位幹部子弟，其餘大多數人都是平民子弟即普通的工農和職員子弟。可他們祇要這一個人，居然連我這樣的貧農子弟都加以排斥。我認為，就這一點而言，這些高幹子弟離革命事業接班人還有不小的距離。

為了對抗“八九紅衛兵”，八八派開始籌備建立自己的紅衛兵組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在數力系，我也算是一個八八派的活躍分子，因此積極地參與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籌備工作。後來，八八派在清華學堂召開了各系代表的聯席會議，討論決定了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若干重大事項。我代表數力系的八八派參加了會議，并推薦我們系裏最有名的造反派劉泉進入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領導機構。

8月22日，清華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宣告成立，我也成了一名紅衛兵戰士，戴上了紅袖章，心裏特別高興。

後來，據說毛主席不同意“毛澤東主義”的提法，清華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遂改名為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 戰鬥小組

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發表的時候，小道消息盛傳劉少奇、鄧小平地位下降了，同學們議論紛紛，我還不明其中的含義，將信將疑。

8月18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西邊，劉少奇站在天安門城樓東邊。清華的學生在城樓下邊的金水橋東側，我們可以看到劉少奇，却看不到毛主席。大批同學齊聲高喊：“劉主席，劉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在晚上的新聞節目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對此作了報道，但去掉了“劉主席，劉主席”，祇留下了“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班的一些北京同學對此特別敏感，他們說，在新聞報道中不提劉少奇，這就是劉少奇的地位降低的證據。

8月19日，唐偉和陳育延以《向日葵》為名貼出了轟動全校的大字報《王光美是清華園的第一號大扒手》。我的第一感覺是，對於國家主席夫人用“大扒手”這樣侮辱性字眼有些太過分了。

不料，賀鵬飛等七人緊接着貼出了《三問王光美同志》的大字報，雖然內容平平，但他們本是工作組依靠的高幹子女，現在一起向王光美發難，使人感覺到王光美已經甞甞子立，形影相吊了。

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劉濤貼出了《誓死跟着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的大字報，頗有大義滅親的味道。這份大字報墨迹未幹，賀鵬飛等人馬上貼大字報表示支持。據劉濤自己說，他們的大字報都是經過王任重看過的，甚至連貼大字報的先後次序都是王任重決定的。

8月22日，《向日葵》又貼出了《劉少奇同志7月29日講話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大字報，矛頭直指國家主席，給他扣上反毛澤東思想的大帽子，這在清華造成了更大的轟動。

隨後出現了不少主要針對劉少奇的大字報，也有其他中

央領導同志的。有人貼出《改組黨中央，擁護毛主席》的大字報。

當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紅旗》雜志十一期社論，社論裏說：“任何人，不管他職位多高，資格多老，‘聲望’多大，祇要他不按毛澤東思想辦事，反對毛澤東思想，就要對他的錯誤主張進行堅決的抵制，就要對他進行堅決的鬥爭，一直到罷他的官，撤他的職。”

當時流行一句時髦的口號叫做“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紅旗》社論無異于號召人們把劉少奇拉下馬。于是，清華貼出了大批責問、批判劉少奇和其他中央領導的大字報。我和班上大多數同學一樣，又一次陷入迷茫，實在搞不清文化革命到底要幹什麼，祇好先看看熱鬧。

8月22日總理再次來清華主持召開全校大會，會上葉林同志做了第二次檢查。

總理在大會上講了話，他說：“葉林基本上是認識到了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壓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壓制群衆運動，實行了白色恐怖，犯了方向的路線的錯誤。這句話是中央全會上批判的犯方向、路線錯誤的本質的東西。”

總理無疑已經注意到清華出現的許多關於中央領導的大字報，他說：“中央的問題，在中央全會上已經基本解決了”，“我歡迎你們給我貼大字報，一切問題，都必須是增強團結，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3]

最後，總理指示：當前的任務是學好、用好十六條，選舉建立清華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關，把全校的革命組織建立起來，就可以更有力地進行鬥批改的三大任務。

總理指示的用意十分明確，但他的講話並沒有起到應有



的作用，一部分人繼續貼中央領導的大字報。與此同時，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傳到清華，人們意識到劉少奇問題的嚴重性，開始炮打劉少奇。

北京大學也貼出了許多劉少奇和其他中央領導的大字報。陳伯達在北大說，給劉少奇提意見可以寫小字報或信帶給他本人。貼大字報，他看不見。此後，北大所有關於中央領導的大字報都貼到了內部館。

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和清華大學文革臨時籌委會借此機會，精心策劃了清華文革史上著名的“8.24事件”。

8月24日下午，清華大學紅衛兵秘密串聯的12院校紅衛兵在清華附中集合，賀鵬飛在動員時稱，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把矛頭指向黨中央、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紅衛兵要開進清華，採取革命行動，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抄錄大字報，撕毀大字報，記錄作者姓名，以便“秋後算賬”。

下午5時許，12院校紅衛兵2000餘人跑步進入清華園，強行占領大禮堂，衝散正在開會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隨即嚴密封鎖禮堂大字報區，實行戒嚴。與此同時，已被清華大學紅衛兵強行接管的廣播臺開始連續廣播《安民告示》和《最後通牒》，聲稱清華園內右派翻天，把矛頭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因此要採取聯合行動，堅決鎮壓，勒令那些貼中央首長大字報的人撕掉大字報，并交出大字報底稿和抄件。12院校紅衛兵派專人抄錄大字報內容及作者姓名，并將大字報一一拍照。他們還強行驅趕看大字報的群衆，搜查行人書包，沒收大字報抄件，最後撕毀了幾乎所有大字報。

下午6時，12院校紅衛兵砸爛了清華大學的標志性建

築二校門。

晚上，12 院校紅衛兵高呼“祇準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口號，舉行了“鎮壓右派”的示威游行，大搞所謂“紅色恐怖”。

值得一提的是，在“8.24 事件”中，清華大學紅衛兵除了打擊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還打擊了清華的幹部。晚上，他們強迫清華中上層幹部拆卸、搬運二校門的磚石；並對所謂“黑幫分子”進行了抄家；半夜，他們把大批中上層幹部從家中拉到階梯教室進行毒打，爾後將這些中上層幹部關押起來進行了長達兩周的折磨。

“8.24 事件”後，“臨籌”、“臨總”完全控制了清華的局面，9月16日，“臨籌”主持召開校文革代表會第二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了由各系選舉代表組成的校文革臨時主席團（簡稱“臨主”），由其領導清華運動、主持學校日常工作。“臨籌”、“臨總”、“臨主”統稱“三臨”，雖然名稱發生了變化，但他們是一脉相承，還是劉濤、賀鵬飛那一撥人。

“臨主”產生以後就開始鬥黑幫。

應當說，八九派選“臨主”、鬥黑幫，都是符合總理指示精神的，也得到清華大多數師生員工的認同。

八八派沒有聽總理的話，仍然揪住工作組不放，矛頭直指劉少奇。八八派之所以這樣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起了巨大的作用。

我對“三臨”打擊八八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尤其對他們用所謂“紅色恐怖”壓制別人的做法強烈不滿，並且特別厭惡他們的強權政治和高壓政策。我好打抱不平，“8.24 事件”的第二天，我就貼出大字報，公開反對八九派的行



爲，反對所謂的“紅色恐怖”。那個時候，大禮堂前的大字報差不多都被撕光了，我的大字報貼在那裏很醒目。

我開始更多地思考問題，更多地發表自己的見解。我認爲，國家大事和中央鬥爭離我們太遠，普通百姓和青年學生無從把握，無權置喙；但對於清華、對於自己身邊的事情，我們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觀察去判斷是非曲直。我應該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參加學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革命的大風大浪中鍛煉自己。基于這種想法，我把我們同宿捨的幾個同學組織起來，成立了以我爲首的戰鬥小組，名叫《千鈞棒》。“千鈞棒”取自毛主席的《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中的“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裏埃”。因爲我的屬相是猴，自命“金猴”，所以把戰鬥組命名爲《千鈞棒》。我認爲八九派的觀點不對，而八八派反駁八九派的大字報也往往抓不住要害，宛如隔靴搔癢。我要奮起千鈞棒，澄清萬裏埃。

八九派的主要觀點是：鬥、批、改是大方向，糾纏工作組的問題就是偏離大方向。爲了駁斥八九派，我們《千鈞棒》寫了《鬥、批、改決不是大方向》的大字報。這份大字報引經據典，在“方向”和“任務”的概念上咬文嚼字，力圖證明批判工作組的錯誤路線才是大方向，鬥、批、改祇不過是任務而已。這份大字報爲八八派堅持批判工作組的錯誤路線提供了所謂“理論根據”，使《千鈞棒》一舉成名。

總體說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領導軟弱無力，在與“三臨”的鬥爭中處處被動。

## 清華大亂

九月二十四日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宣告成立。

井岡山紅衛兵成立後不幾天，我在學校東區九號樓前的路上撿到一個筆記本，筆記本裏記錄了9月23日張春橋在中南海西門接見蒯大富的談話內容。我認識筆記本的主人，他是我校動農系的學生，不知何故參加了這次接見，還做了詳細記錄。後來，我找到了這位同學，向他了解了詳細情況並把筆記本還給了他。

從談話記錄中我得知：蒯大富是在張春橋的鼓動下才決心成立自己的紅衛兵組織的，蒯大富的井岡山紅衛兵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後來我才意識到，這是中央文革力圖改變清華政治力量的對比的重要一步。中央文革已經利用蒯大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打了勝仗，現在他們還要利用蒯大富向劉少奇發動新一輪進攻。

井岡山紅衛兵的成立，直接導致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分裂，“延安”、“遵義”、“紅旗”、“國際”等各種紅衛兵組織紛紛出現，清華大亂，“三臨”控制清華的局面不復存在，造反派開始主導清華文革運動方向。

唐偉與陳育延不滿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右傾”，從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中拉出一支隊伍，叫做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八八總部。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隨即改組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臨時總部。

在拉出八八總部之前，唐偉找我談了話，希望我們跟他們走。因為我們《千鈞棒》戰鬥組已經小有名氣了，拉住

我們可以壯大八八總部的實力。我們《千鈞棒》戰鬥組大多數人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領導無方、鬥爭不力深感失望，決定參加八八總部，但有一人對新的八八總部也不抱希望，幹脆參加了井岡山紅衛兵。

10月6日，中央文革在工人體育場召開大會，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江青指名讓蒯大富帶領10萬人宣誓，此舉不僅為蒯大富徹底平了反，也同時確立了蒯大富在造反派中的特殊地位，從此蒯大富成為中央文革的“鐵拳頭”。

蒯大富果然不負中央文革的期望，立刻把矛頭指向了王光美。10月9日晚上，他的井岡山紅衛兵和唐偉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八八總部採取聯合行動，組織了幾百人到城裏靜坐示威，向中央提出要求，讓王光美回清華做檢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早提出要王光美回清華做檢查的不是蒯大富，而是賀鵬飛。早在8月22日的大會發言時，賀鵬飛就當着總理的面猛烈抨擊工作組，并要求王光美回清華做檢查。

我和我們《千鈞棒》小組的人參加了10月9日的行動，因為我覺得工作組組長葉林已經做了兩次深刻的檢查，周總理都替他說了好話，而王光美是工作組的幕後指揮，她更應該對工作組的錯誤負責，更應該回清華做檢查。我們在城裏呆了一段時間，組織者就帶領我們撤離了，他們說：中央認為讓王光美到清華做檢查不合適，決定讓她做書面檢查。第二天，王光美將一份檢查交給了清華師生員工。

## 南下串聯

工作組的錯誤得到了清算，葉林、王光美做了檢查，被整的同學徹底翻了身，有些還成了響當當的左派，我認為八八串聯會的任務已經完成，清華的運動可以走上鬥批改的正常軌道了。此時適逢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所引發的全國性大串聯，清華的同學不甘落後，紛紛外出串聯，其中不少人步行串聯，一是想學習紅軍長徵精神，二是想了解中國農民的疾苦。我是在農村長大的，中國農村的那種苦日子我已經過得够夠的了，我不想也沒有必要再去過那種苦日子了。我想利用串聯的機會多多了解外地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情況，同時也好好看看祖國的大好河山。因此，我和《千鈞棒》小組的幾個同學商議後決定坐火車去大西南。

我們大概是 1966 年 10 月 14 日出發的，第一站到了西安，在那裏住了三天，那是大串聯時期免費吃飯的最後三天，我們跑了幾個學校，看了許多大字報。隨後我們又坐火車翻越秦嶺到了成都，住在成都體育學院。

在成都我們遇到了兩個人，一個是清華水利系的同學，井岡山紅衛兵戰士，另一個是北航紅旗的吳仙虎。原來這兩個人都是跑單幫的，看到我們有一支七、八個人的隊伍，就加入到我們的行列中來了。可是，這個吳仙虎非同小可，據說是北航紅旗的負責人之一，造反精神比我們都強，能說會道，喜歡出頭露面。他把我們一行命名為“清華北航南下串聯小分隊”，儼然以小分隊的領袖自居，打着我們清華的旗號到處活動。吳仙虎在我們的《千鈞棒》小組指手劃腳，我們小組也有幾個活躍分子喜歡聽他的話，跟在他後面跑。我雖然心有不滿，但也不便計較，祇好不參加他

們的活動，另外帶幾個同學到成都的各個學校去看大字報。我所關心的是這些學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怎麼樣，兩派到底在爭論什麼問題，哪一方更有道理。我們到四川大學看大字報時，還專門拜訪了川大 8.26 的一把手江海雲，聽她介紹川大 8.26 對形勢的看法。回來後我們經過一番討論，覺得川大 8.26 的觀點比較正確。

別看我們在清華並不是什麼貨真價實的造反派，可是到了外地，我們都是以響當當的造反派自居，都是支持當地的造反派的。

在成都我們參加過兩次大的行動。第一次是成都造反派到某報社奪權，與保守派對峙，造反派通知各校集合人馬支援。我們當時是支持造反派的，毫不猶豫地參加了他們的行動。晚上，天很黑，我們和成都體育學院體育系的造反派一起乘大卡車去報社。我們在報社呆了很長時間，並未發生任何衝突，後來就撤回來了。

第二次是成都造反派在人民廣場召開群衆大會批鬥西南局領導人。

我們這個小分隊在成都最重要的一次活動是吳仙虎帶人大鬧西南局。西南局書記李井泉一個兒子在清華讀書，一個兒子在北航讀書。8月 24 日，在北航的李明清貼了一份《炮轟……》的大字報，影射毛主席。因為這個緣故，吳仙虎抓住李井泉不放，在西南局軟磨硬泡，一定要李井泉接見。11月 4 日，四川省委李大章、廖志高、廖井丹陪同李井泉出面接見了“清華北航南下串聯小分隊”的人。吳仙虎帶着小分隊的幾個人整夜圍攻西南局領導人，逼迫李井泉對他兒子的大字報表態，實際上是企圖逼迫李井泉承認自己是李明清大字報的後臺。李井泉耐心地與吳仙虎

周旋，避免直接對他兒子的大字報表態。吳仙虎態度蠻橫，拍着桌子，大聲呵斥。當然，李井泉也知道李明清大字報的嚴重性，最後不得不寫了一份表態性的文字交給了吳仙虎。全文如下：

最近，清華大學南下串聯的同學提出關於李明清等五人八月二十四日在北京航空學院所寫的一張題為《炮轟……》的大字報問題，要我表示態度。

李明清是我的第二個兒子。他在北京航空學院寫這張大字報我事先不知道。他也没有向家裏任何人談過。後來我看到了同學們抄來的這張大字報，我認為這張大字報是極其錯誤的，性質是嚴重的，立即托在北京的同志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並且贊成和支持同學們對這張大字報進行徹底地批判。

對於同學們給我提出的各種批評意見，我熱忱歡迎，希望繼續對我提出批評意見。我堅決同革命師生站在一起，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李井泉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

還是這個吳仙虎，別看他在串聯時多麼造反，回到北京後却改變了對中央文革的看法，據說他寫了一份《談談孫悟空》的大字報，大字報中把江青比喻成白骨精。北航的造反派竟將他活活打死了。

而清華井岡山的那個同學仍然緊跟中央文革，1967年7.20事件前後，積極參與外地“抓軍內一小撮”，據說在一

次武鬥中死于非命。

## 康藏之旅

我們本不想更多地介入當地的運動，也不想在成都長期活動，在對成都的情況有了大致的了解後，我們準備到別處繼續串聯。在討論串聯的下一個目的地時，李井泉的秘書建議我們到西藏去串聯。他說，參加工作以後，到全國各地出差機會很多，但是到西藏的機會不會很多，不如抓住這次機會進藏。他還說，進藏是一輩子難得遇到一次的經歷。李井泉的秘書實際上是想早早把我們這幫人打發走，免得再去糾纏李井泉。我們經過討論決定進藏。

李井泉的秘書寫了個便條給西南局的工作人員，西南局的工作人員又寫了個便條介紹我們去找西藏駐蓉辦事處。西藏駐蓉辦事處按照幹部進藏的管理辦法，借給我們每人一套棉衣和十幾元人民幣。67年1月和3月，我們向“清華大學革命串聯接待工作清理辦公室”如數歸還了借款和衣服。

進藏一般分兩個行程，第一段，從成都到昌都，第二段，從昌都到拉薩。西藏駐蓉辦事處的同志替我們找到一輛去昌都的車。

當時，從四川進藏祇有一條路——康藏公路。1954年12月25日竣工的康藏公路，東起原西康省省會雅安，西至西藏首府拉薩，全長2255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由衆多的“之”形組成。1951年解放軍進藏部隊遵照毛主席“一面進軍，一面修路”的命令，在人迹罕至的雪域高原，餐風臥雪，揮汗灑血，歷

經數年，修築了寬闊平坦的大路，它像“一條金色的飄帶，把北京和拉薩連起來。”

從成都乘汽車到昌都，晝行夜宿，一般要走七天。11月中旬左右，我們離開成都，向西南進發。我們乘坐的是一輛解放牌大卡車，除了車廂上面架着帆布篷子外，車廂裏沒有任何其他設施。我們一會兒蹲，一會兒站，一會兒坐在行李上，不停地變換姿勢，讓麻木的腿腳恢復知覺。公路上滿是泥土，車子一過，塵土飛揚，倒卷進車廂，讓我們吃個够。盡管如此，我們仍然異常興奮，一路高歌猛進。當然是我們負責“高歌”，司機負責“猛進”。同車的還有西北民族學院的幾個藏族同學，其中一位女同學叫卓瑪，家住德格，非常貧窮。後來路過德格時，我們的同學還到她家訪貧問苦。藏族同學也跟我們一起唱歌。我們把能够記得的歌都唱了，後來就向藏族同學學習藏語歌。滿載歡歌笑語的大篷車，途經邛崍到達康藏公路的起點雅安，第一天晚上，我們就住在雅安。

第二天，司機早早帶我們離開雅安向西進發，說是要翻二郎山，我們就唱起了《歌唱二郎山》。“二呀二郎山，高呀高萬丈，枯樹荒草遍山野，碎石滿山崗，羊腸小道難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擋，那個被它擋。二呀二郎山，哪怕你高萬丈，解放軍鐵打的漢，下決心，堅如鋼，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康藏公路一共翻過十四座高山，二郎山是第一座，也是最矮的一座，山高3437米。我們在山脚下向山上望去，祇見山腰裏有一條雪綫，雪綫以下，尚有綠色，雪綫以上，一片白茫茫，黑白兩個世界，格外分明。汽車開到雪綫時，停了下來。司機拿出幾條鐵鏈子，把他們纏繞在汽車的輪胎上。他告訴我們，祇有這樣汽車才能

繼續前進，否則祇能在原地打滑。汽車沿着“之”字形的山路爬到了山頂，停在啞口，司機要我們領略一下雪山的風光。我們下了車，一塊巨匾立刻映入我們的眼簾，上面寫着“貫通康藏”四個大字。這是當年康藏公路的建設者們留下的紀念。山上雲霧繚繞，我們叫着、跳着，試圖用帽子、布袋“兜”住雲霧，用水壺“裝”一些雲霧帶下山，當然這祇是徒勞一場。我在蘇北平原長大，除了北京的香山，還沒有見過什麼大山。現在看到祖國西部的河山，原來竟是這麼壯觀，我對崇山峻嶺向來陌生，一時竟不知道用什麼詞兒來形容它們、贊美它們。

汽車翻過二郎山，很快就到了瀘定。司機決定在瀘定住宿，讓我們參觀著名的瀘定橋。我們從這邊的橋頭堡走到大渡河對面的橋頭堡，遙想當年紅軍勇士曾在這裏冒着槍林彈雨、匍匐前進，飛奪瀘定橋的情景。站在瀘定橋中央，祇覺得江風呼嘯，吹得寬闊的鐵索橋橋身直晃；橋底下，飛流湍急，據說水的流速每秒有 7 米之多；橋西面幾百米處就是解放軍修建的公路大橋，不時有車輛從橋上駛過。我們在瀘定橋上照了相，留下了珍貴的記念。晚上，我們游覽了瀘定的街景。最突出的印象是瀘定的水果特別便宜，大鴨梨又嫩又甜。司機說，這裏的交通不便，水果運不出去，到冬天祇好讓這些水果爛掉。

第三天，我們跨過大渡河，西行不遠就到達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康定；從康定繼續西行，我們開始翻越海拔 4200 米的折多山。翻過折多山，我們在新都橋拐了個九十度的彎，徑直北上；到達乾寧後，我們又折向西北，在道孚跨過鮮水河，然後溯江而上，向爐霍和甘孜前進。汽車在懸崖峭壁上急速行駛，可以看到下面的大江祇是一條白色的

帶子。

我們的司機是從朝鮮戰場回來的老運輸兵，據說在這條公路上開車的司機大多數是從朝鮮戰場回來的老運輸兵，他們的技術非常過硬，汽車在崇山峻嶺之間飛馳，還不停地向我們介紹沿途風景，談笑風生。康藏公路真是一條運輸大動脈，不時可以看到一長串的軍車，滿載着各種物資，運往西藏。

康藏公路也是一條危險之路，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翻車事故。在返回的途中，我們就有一次危險的經歷。大概是離開昌都的第三天，我們的汽車在山體的陽面由西向東疾駛，在一個幾乎九十度角的拐彎處，司機鳴笛減速，向左打方向盤，猛地發現對面衝過一輛大卡車，卡車司機沒有照章鳴笛，我們的司機立刻讓道剎車，卡車過去了，我們的車前輪正好壓着懸崖的邊，再往前一點點，我們就將車毀人亡，死無葬身之地。我們的司機嚇得臉色煞白，他讓我們全都下車，自己蹲在路邊連抽了幾支烟，平息了情緒，這才上路。

一路上我們住宿招待所，這些招待所都是公路道班辦的，專為過往司機及乘客提供食宿。我們睡生火的土炕，吃不熟的牛羊肉。那些道班的工人們長年工作在公路邊，簡陋的條件，繁重的勞動，寂寞的生活，誰能知曉？為了祖國運輸大動脈，他們默默無聞地貢獻着自己的青春和時光。我們看到這些人，不禁肅然起敬。他們見到我們這些從北京來的大學生倍感親切，有問不完的問題，我們向他們介紹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況，送給他們一些毛主席紀念章，他們特別高興。

我們雖然年輕，却也架不住長途奔襲，連續作戰。通常，

我們上午還興致勃勃，有說有唱，笑聲不斷，到了下午就灰頭土臉，懶得開口了，第一個頂不住的是我們班外號叫“老九”的同學。大概是在甘孜，老九肚子疼，疼得在炕上打滾。道班的同志說不遠處有個兵站，趕緊去讓醫務室軍醫看看。我帶他去了兵站，軍醫說是闌尾發炎，要留下來一邊治療，一邊觀察。我是小組的頭兒，又是大哥，便決定留下來陪同老九，讓其餘的人繼續前進。我們約定：如老九好轉，在昌都會面；如有問題，我陪他回成都動手術。

於是我們倆便住在兵站，兵站的頭，好像是連長，非常熱情地收留了我們。解放軍和當地藏族群衆關係很融洽，常有藏族青年來兵站玩兒。他們看到解放軍戴着毛主席紀念章，知道是我們給的，就向我們要。我們送了一些給藏族青年，結果引起大批的藏族青年都來找我們要紀念章，連長祇好讓我們躲在屋子裏。

經過軍醫的治療，老九的病好了，連長說可以去昌都。幾天後，從成都來了一輛小面包車，連長與車上的軍官和司機商量之後，讓我們搭乘小面包去昌都。第二天，我們就擠上了車。車上已經滿員，有軍官，有戰士，還有婦女和小孩，沒有空位子，我們祇能坐在中間過道的行李上。路上，我們跟着軍車一路住兵站，吃住都比道班好一些。

車子跨過雅礱江，經玉隆到馬尼幹戈，遂改向西行，翻越雀兒山。雀兒山是康藏公路上最高的一座山，海拔 5050 米，有 80 多公里的路程爬行在雪線之上。翻過雀兒山後，我們從德格南下，越過金沙江大橋便進入西藏；進入西藏後的第一站是崗托，從崗托西行，經江達、妥壩，連續翻過海拔 4200——4800 多米的五座大山，就到達康藏公路的

中點——瀾滄江畔的昌都。康藏公路總共翻過 14 座高山，跨越 10 條大江大河，我們從雅安到昌都就翻了八座大山，過了五條大江。

我們身處軍人之中，比較拘謹，無心欣賞沿途風光。我記得在到達昌都之前，汽車翻越一座海拔 4800 米的達馬拉山，其中有一段路程，連續 72 道急拐彎，我祇覺得頭昏眼花，兩手緊緊抓住旁邊的座椅，手心直冒汗。到達昌都的時候，我已經筋疲力盡了。

解放軍把我們送到昌都行署招待所，很容易就找到了我們的同學，因為進藏的幹部總是住在那裏。住宿條件與路上一樣，還是一起擠在一張大通鋪上。昌都行署有一位秘書姓劉，四川人，大個子，他愛人是北京人，知道我們是北京來的，對我們特別友好熱情。招待所的工作人員大都是內地來的援藏人員，都很喜歡我們這些首都來的大學生，像照顧小弟弟那樣照顧我們。

昌都地處高原，空氣稀薄，走路走快了就要喘大氣。水很容易就燒開了，但米飯煮不熟，我們大家經常搶鍋巴吃。蒸出來的饅頭粘乎乎的，我們總是把饅頭放在爐火上烤焦了再吃。我們吃的菜，除了牛羊肉，還是牛羊肉，而且是半生不熟的牛羊肉，味道特充，實在讓我難以下咽。從西藏回來後，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一聞到牛羊肉的味道，我就躲得遠遠的。

昌都是西藏第二大首府，我們抓緊時間游覽了市容，參觀了喇嘛寺，還特地走了很遠的路去看了西藏的天葬。我突出的感覺是，昌都完全不象一個繁榮昌盛的都市，藏民的生活比我們蘇北老家還要貧窮。

在昌都，我們完全是一副造反派的架勢。

我到昌都的第二天，同學們陪我上街游覽，路過一家新華書店時，我們一個同學一眼看到了書店櫃臺上擺放的毛澤東主席和劉少奇主席的像。

他對新華書店的售貨員說：“你們把劉少奇的像收起來，不準再賣了！”

售貨員說：“劉少奇是國家主席，為什麼不能賣他的像？”

我們這個同學說：“劉少奇挨批判了，他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北京的紅衛兵造了他的反。”

售貨員說：“我們祇知道劉少奇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我們不知道他執行了什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你們憑什麼污蔑他？”

我們在一旁幫腔：“劉少奇已經從第二位排到第七位了。”

售貨員說：“排到第七位也是黨和國家領導人。”

我們說：“北京都不讓賣了，你們還敢賣？”

售貨員說：“北京是北京，昌都是昌都，我們沒有得到上面通知。”

我們說：“你們再不收起來，我們就造你們的反。”

我們幾個大叫大嚷，氣勢汹汹地要造反，惹得許多過路群衆駐足圍觀。書店經理怕鬧出什麼事來，影響不好，忙說：“好，好，我們不賣了。”他把劉少奇像卷起來，拿到裏屋去，這才平息了風波。

昌都的黨政機關和幹部隊伍基本上沒有受到衝擊。昌都“援藏工作組”中有幾個幹部，自稱是造反派。在我到昌都之前，吳仙虎等人已經與這幾個幹部建立了聯繫，支持他們造反。他們常常到行署招待所來找同學們討論問題，

尋求小分隊的支持。盡管如此，這幾個造反派始終也沒有形成什麼氣候。聽說北京大學的同學比我們來得早，到處造反，也沒有搞出什麼名堂來。

我們小分隊支持造反派的行動遭到了昌都幹部和群衆的反對，不時遭到一些人的圍攻，我們感覺很孤立。在行署禮堂召開的一次辯論會上，昌都的幹部和群衆憤怒地指責我們亂造反。我們小組的人輪番上臺發言，却也說服不了他們。我們第一次遭遇到作爲造反派的尷尬，那麼遭人怨恨，那麼理屈詞窮。幸虧有昌都行署劉秘書和招待所的工作人員的保護，我們才得以安全離開禮堂。

11月30日左右，我得了病，發燒，頭疼，惡心，嘔吐，躺在招待所瞎叫喚。同學們以爲我祇是感冒而已，捂一捂，出點兒汗，就會好，哪知道高燒幾天不退。12月4日，同學們不得不把我送進昌都專區人民醫院。這是昌都最好的醫院。各科醫生爲我會診，認爲我的癥狀比感冒重得多，需要進一步觀察和檢查。他們抽了我的腦脊液，進行化驗。腦脊液裏白細胞含量較高，因此懷疑我得了腦膜炎。這下子同學們着急了，生怕我把小命兒丟在西藏，沒法向我的父母交代，整天派人守在我的身邊。幸虧醫生醫術高明，對癥下藥，再加上藏族護士的精心護理，總算控制了病情。醫生說他們把醫院裏最好的藥都拿出來用在我身上了，有一種藥還是進口的。經過一周的住院治療，我的病情已經穩定，再次抽了腦脊液，進行化驗，腦脊液裏白細胞含量明顯下降，但到底得的什麼病，醫生並未確診，祇是給出了兩種可能：上呼吸道感染，腦膜炎。

按原計劃，我們小分隊在昌都稍事休息後就啓程去拉薩，由於我生病住院耽擱了大家的行程。而此時中央發出

通知停止串聯，要求在外地串聯的學生一律限期返校。在討論是否去拉薩的問題時，大家意見不一，吳仙虎堅持要去拉薩，去打“土皇帝”，其實就是去造張國華的反，因為當時有大字報稱張國華是西藏的“土皇帝”。吳仙虎已經把

“清華北航南下串聯小分隊”改為“清華北航專打土皇帝小分隊”。他甚至利用昌都行署的電話與拉薩的張國華直接通了話，張國華表態歡迎紅衛兵去拉薩串聯。

考慮到中央通知和身體狀況，我決心返回北京。小分隊何去何從？經過幾次討論，最後決定一起回北京。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昌都聚集了很多保張國華的藏族學生，他們扼守着去拉薩的道路，不讓內地學生去拉薩造反。不僅如此，據說他們還扼守着青藏公路，不允許任何造反派到拉薩串聯。他們認為黨和人民政府把藏族同胞從奴隸社會帶到社會主義社會，張國華和解放軍給藏族同胞帶來了幸福生活，西藏沒有修正主義，不需要造反。他們揮舞着藏刀，誰要去拉薩造反，他們就向誰下手。北京大學的學生先前要去拉薩，受到阻攔，已經與藏族學生發生過衝突，差點動了刀子。如果我們堅持去拉薩，勢必與藏族學生發生衝突，其後果將不堪設想。

12月15日左右，通過劉秘書的安排，我們小分隊乘坐昌都運輸公司的長途客車，踏上返回成都的路程。臨行時，藏族學生以為我們去拉薩造反，召來大批人馬，對我們進行圍追堵截。劉秘書和招待所的工作人員怕我們受到傷害，一起出來保護我們，并向藏族學生反復說明我們是回成都的，藏族學生才勉強放行。

離開昌都時，我的思想受到了極大震撼，藏族學生不準造張國華的反，藏族學生痛恨北京造反派，這兩點始終在

我的腦海裏揮之不去。我朦朧地意識到：不能懷疑一切，當權派不一定都是走資派；不能到處造反，造反派不一定就是革命左派；而鼓動懷疑一切和到處造反的中央文革似乎也不象我們過去崇拜的那樣高大完美了。我敬佩那些藏族學生，他們既不屬於“特權階層”，又不屬於“既得利益集團”，爲了保護張國華，竟不惜以命相搏。他們對文化革命、對造反和保守的理解，似乎比我們實際得多、深刻得多。莫非這就是民意？

## 第二章 黨內有派

### 裂痕初現

經過兩個半月的大串聯，我和同學們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那是一個寒風凜冽的清晨，當我們走出北京站的時候，我們發現到處都是“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大標語。我們不由得一驚：北京發生了什麼大事？回到學校，我匆忙找人了解情況。留校的同學們向我介紹了最近一段時間北京和清華文化大革命的重大事件。

在北京，刮起了一股反對中央文革的“十二月黑風”。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是：

北京林學院李洪山提出“踢開中央文革小組自己起來鬧革命”的口號，公開反對江青，反對陳伯達。

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八一縱隊連續貼出了《一問中央文革小組》、《二問中央文革小組》、《三問中央文革小組》三張大字報，指責中央文革小組“採取新的形式繼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清華大學學生易振亞在林學院的辯論會上支持李洪山，認為中央文革小組犯了一系列錯誤，中央文革小組不是黨中央，林彪也可以懷疑。

清華大學學生顏曉東發表《給毛主席的一封公開信》，指出：十月三日之後，北京的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并點名批評陳伯達、關鋒、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支持少數派打擊多數派、挑動群衆鬥群衆的錯誤做法。

所謂“十二月黑風”實際上是青年學生對中央文革小組

的第一次大規模的、自發的抵制與抗爭。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經歷了半年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之後，青年學生對文化革命的第一次反思，這次反思雖然短暫，但涉及到如何評價我們的黨和國家，如何正確對待黨的幹部和人民群衆，文化革命要不要加強黨的領導等根本問題。這些問題也引起了我的思考，聯系到我們在昌都的遭遇，中央文革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經大打折扣了。

在清華，井岡山紅衛兵、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臨時總部和八八總部三大組織已于 12 月 19 日宣布聯合，成立了《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所有其他的紅衛兵組織都已宣布解散，清華大學成為井岡山兵團的一統天下；12 月 21 日井岡山兵團總部成立了由 20 位總部委員組成的“兵團臨時籌委會”；蒯大富當了司令。

12 月 24 日，井岡山兵團唐偉、朱德明、許勝利等三位總部委員宣布退出總部，剛剛成立的井岡山兵團出現了分裂。

唐偉他們為什麼退出總部？這使我感到很奇怪，特別想弄明白最初的分歧到底是什麼？

同學們告訴我：唐偉他們與蒯大富最初的分歧是因“12.25 行動”引起的。我們還記得，10 月 9 日，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八八總部曾集體到城裏靜坐，向中央提出申請，要求將王光美揪回清華鬥爭。當然，任何人都明白，揪鬥王光美，矛頭是對準劉少奇的。此事未獲主席批准。12 月 19 日，井岡山兵團成立的當天就通過了“炮轟資產階級司令部，揪回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來校檢查”的決議，12 月 22 日，井岡山兵團又發表聲明：強烈要求王光美回清華作檢查；勒令薄一波在 29 日前、

王任重在 31 日前回清華檢查還賬；並決定于 12 月 25 日進城游行。

1966 年 12 月 25 日，蒯大富率領清華大學 5000 多人舉行聲勢浩大的游行，從清華園出發，一直游行到天安門廣場，率先喊出“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在廣場集會後，游行隊伍兵分幾路，分別到王府井、西單、北京站、前門等鬧市區開展宣傳活動。那一天，高音喇叭響徹在首都上空，大字報、大標語貼滿了首都街頭，數萬份傳單散發給過往的群衆，流傳到全國各地，“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震撼了整個北京城，這就是著名的“12.25 行動”。

當初，在蒯大富提議 25 日進城搞打倒劉少奇的統一行動時，並未向與會者深講此次行動的意義，當場就有一些群衆對此表示不解，唐偉也持不同意見。

為了抵制“12.25 行動”，唐偉于 12 月 24 日貼出大字報，將周總理 12 月 19 日“關於劉少奇的問題還未定性”的講話公諸于衆。

隨後，唐偉又貼出“辭職書”，聲明因“常常跟不上形勢，對兵團總部一些行動很不理解”而退出總部。

與此同時，唐偉成立了《向何處去串聯會》，和總部唱對臺戲。他反對兵團總部“運動群衆”，宣稱自己“寧願右傾，不願當阿鬥”，即寧願被別人罵自己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不願不明不白地被蒯大富牽着鼻子走。蒯大富將唐偉的話改了兩個字，變成“寧願當右派，不願當阿鬥”，唐偉對此耿耿于懷，30 多年後提起此事還唏噓不已。

盡管毛主席已經認定劉少奇是睡在他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並利用中央文革不斷向劉、鄧發難，但由於

劉、鄧在黨中央和廣大幹部群衆中的威望，他們雖已失勢但仍處于打而不倒的狀態。蒯大富的“12.25行動”是中央文革利用造反派向劉、鄧發動新一輪攻擊的重要步驟。事前，12月18日，張春橋單獨召見蒯大富，指使他“把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搞臭”。事後，12月30日，江青、王力、關鋒、姚文元又一起來到清華，對蒯大富及其“12.25行動”大加褒獎，他們在西大操場對全校師生員工發表的講話中，還進一步鼓動蒯大富“徹底批判劉鄧的錯誤路線”，“向資產階級發動全面的總進攻。”

與此同時，受毛主席委托過問清華問題的周恩來總理也在密切注視着清華園，并採取了與中央文革針鋒相對的行動。12月31日夜，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召見清華井岡山負責人，總理說：“你們（揪鬥王光美）的要求，我已經兩次請示主席，主席還是不同意王光美回清華”。總理還說“你們不要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貼到天安門去。外賓問起來，我祇好說是我們國家發揚大民主，可以發表各種不同的意見。這樣的提法，矛盾的性質就變了。”有同學問：難道劉少奇的問題不屬於敵我矛盾嗎？總理說：“你們可以這樣認為嘛，但我不是這樣看的，你們不能把看法強加于我啊！”<sup>[4]</sup>

後來，唐偉貼出《十二月三十一日與總理座談（追記）》，詳細公布了總理的這次講話。

盡管當時人們還不可能象今天這樣深刻理解總理和中央文革之間的鬥爭實質，但是毫無疑問，清華井岡山兵團內部的分歧就是這種鬥爭的反映，或者也可以說，正是這種鬥爭引發和加劇了井岡山兵團內部的分歧。

1月2日，唐偉成立毛澤東思想縱隊。次日，唐偉、

朱德明、許勝利等三位總部委員給全校師生員工寫了一封公開信，闡明了他們退出兵團總部的理由，主要是兵團總部委員產生不民主，兵團總部內部有宗派主義、運動群衆、樹立個人威信等現象。

唐偉的舉動對蒯大富的權威形成了挑戰，并在群衆中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共鳴。這在 1 月 3 日晚總部召開的全校大會上充分表現出來。本來這是討論形勢和任務的會議，却變成了炮轟總部、要求總部整風的會議。會上群衆大發牢騷，給總部提了許多意見，而且指名道姓批評蒯大富，有人善意提醒蒯大富要警惕糖衣炮彈的襲擊，還有人直言不諱地指出總部組織編印蒯大富大字報選編是不恰當的。

我們班的同學們在這次全校大會後議論紛紛，大家認為群衆提出的意見基本是正確的，并對老蒯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反感：全國人民都在學習毛澤東選集，你却要搞一個蒯大富選集，實在狂妄得可以。

1 月 4 日，陳育延貼出《唐偉同志在個人主義的泥坑中是不會有所作為的》大字報，從而拉開了“反唐戰”的序幕。曾經是唐偉親密戰友的陳育延公開抨擊唐偉，這在八八分子中引起了強烈不滿。我對陳育延的做法也很不以為然，我覺得，朋友之間意見分歧在所難免，反目成仇惡語相向並非善舉。

1 月 5 日，“28 團”發表聲明，認為“井岡山兵團亂了，這是兩條路線鬥爭在革命左派內部的反映，左派隊伍中某些人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言人”，“總部右傾，運動群衆還不够”。這樣，唐偉的問題又從“個人主義”上升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言人”。

“28 團”是蒯大富的嫡系部隊，這是蒯派骨幹分子于

66年12月24日成立的一個組織，他們崇拜林彪，因為在井岡山時期林彪曾擔任過紅軍的一支部隊——28團的團長，所以他們將自己的組織取名為“28團”，後來的“團派”由此得名。

蒯大富和28團對總理的規勸置若罔聞，却對中央文革的指示奉若聖明。1967年元旦出版的《井岡山》報在“炮打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的通欄標題下，刊登《看劉少奇的醜惡嘴臉！》的長篇文章，并發表《把批判劉鄧路線的鬥爭進行到底》的元旦獻辭，首次將劉少奇的問題公開見報。

更為惡劣的是，元月六日，蒯大富居然指使《雪蓮花》等六個戰鬥組共四十多人，將在師大一附中讀書的劉少奇和王光美之女劉萍萍綁架到醫院，然後分別以交通隊和醫院的名義打電話給王光美，謊稱劉萍萍被汽車撞傷，傷勢嚴重，手術之前，需要家長簽字，將劉少奇和王光美騙到醫院，并將王光美非法劫持到清華，進行了長達七個小時的鬥爭。這就是清華文革史上有名的“1.6行動”。

總理得知王光美被蒯大富騙到清華進行批鬥後，非常氣憤，立即給予四點指示，并派聯絡員坐鎮清華，採取相應的措施，確保了王光美的人身安全。次日，總理在接見七機部代表時嚴厲批評清華井岡山的“1.6行動”，說：這個行動確實不光明磊落，共產黨人不這樣做，這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鬥爭。

“1.6行動”使清華井岡山兵團內部的分歧進一步擴大，并因此而使群衆分成“好得很”和“糟得很”兩個陣營，一場大論戰從此開始。

毛澤東思想縱隊和部分群衆認為“1.6行動”糟得很。

他們反對“12.25行動”和“1.6行動”，並不見得是要保衛劉少奇和王光美，因為王光美在清華的表現以及她所扶植的清華大學“三臨”（臨籌、臨總、臨主）並沒有給清華師生員工留下什麼好印象。他們反對“12.25行動”和“1.6行動”，一方面是因為中央並沒有宣布劉少奇是敵我矛盾，蒯大富隨意打倒國家主席，為報私仇，大出風頭，運動群衆，另搞一套，破壞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另一方面，周總理受毛主席委託處理清華問題，他已說明兩次請示主席，主席還是不同意王光美回清華，蒯大富剛上臺幾天就妄自尊大，陽奉陰違，把總理的再三規勸當作耳旁風，這還了得？！

從我這個旁觀者看來，以唐偉為首的毛澤東思想縱隊和部分群衆對蒯大富和28團的所作所為不滿，要求總部進行整風，這並無不妥，因為當時中央文革也已經號召紅衛兵群衆組織進行整風，克服風頭主義、山頭主義等小資產階級思想。蒯大富為首的總部如能正確對待群衆，虛心接受批評，克服缺點 改正錯誤，肯定能取得多數群衆的擁護。

可是，蒯大富對形勢有自己的判斷，他認為：總部和28團的“12.25行動”和“1.6行動”都是把矛頭對着劉鄧的，大方向是正確的，而唐偉等人要求總部整風則是把矛頭對着革命小將，是想搞垮我蒯大富，是反對新生的紅色政權；他還認為：目前存在着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是在左派內部尋找代理人和反對派，抓住革命派的缺點和錯誤不放，上綱上綫，企圖將革命左派搞臭，而唐偉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言人。

根據這樣的形勢估計，蒯大富採取了反擊政策，掀起了“反唐戰”，要打退唐偉的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

反撲”，不僅大罵唐偉本人，大揭唐偉老底，而且把“反唐戰”擴大化，在群衆中大抓所謂“唐偉之流”。

第一次公開的大辯論發生在1月7日，毛澤東思想縱隊向28團發出挑戰書：“28團，我們向你們挑戰，今晚七點半在禮堂辯論，你們敢來嗎？”28團當然不甘示弱，辯論如期進行。辯論會一開始，28團就在講臺上貼出“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的大標語，把階級鬥爭的弦繩得緊緊的，搞得氣氛極為緊張。

毛澤東思想縱隊在辯論中認為：兩條路線鬥爭的根本點是對待群衆的態度問題，并一一列舉總部“運動群衆”的若干事實，說明總部是典型的“運動群衆”，從不信任群衆到打擊群衆、壓制群衆，現在抓“唐偉之流”就是把矛頭指向群衆，28團是新形勢下的保皇派，總部必須整風，有人甚至提出了“踢開總部鬧革命”的口號。

28團在辯論中避而不談群衆路線的問題，而是一味指責唐偉搞分裂、反總部，是反對新生的紅色政權，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并堅持認為唐偉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言人，是陶鑄在清華的代言人。

辯論會上，兩種觀點，針鋒相對，唇槍舌戰，難分伯仲。最後，蒯大富在會上作總結發言，表示支持28團的觀點。

### 縱隊成派

我非常關注這場爭論，認真傾聽所有的發言，仔細閱讀各種大字報，向熟悉的朋友了解情況，和他們交換看法，討論如何看待這場爭論。相當一部分普通老百姓認為：唐偉和毛澤東思想縱隊希望總部正確對待群衆並無大錯，不

能因為唐偉批評總部就把他說成是反對新生的紅色政權，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言人。群衆認為：28 團上綱過高而證據不足，把唐偉說成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言人和工作組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的做法如出一轍。不少人認為：蒯大富和 28 團居功自傲，盛氣凌人，一副“今日清華，捨我其誰”的架勢；他們任用親信、排斥異己、獨攬大權；他們文過飾非、堵塞言路，群衆剛剛給他們提了一點不同意見，他們就把群衆說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這樣的政權算什麼紅色政權？這樣的領袖算什麼左派領袖？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舊黨委，趕走了工作組，難道就是為了這樣的結果嗎？難道這樣就能反修防修，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斷然不是！這部分群衆理所當然地紛紛表態支持唐偉和毛澤東思想縱隊。還有相當多的同學支持唐偉僅僅是出于同情、出于義憤，同情唐偉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對蒯大富欺人太甚表示憤慨。

經過幾天的調查研究和分析思考，我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傾向，即支持唐偉和毛澤東思想縱隊的觀點。那時我本可置身事外，因為我已長期脫離清華運動，與論戰雙方都無任何關係。但是，毛主席“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衆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的”等一系列教導已深入我心。作為一個熱血青年、共產黨員，面對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我怎能逍遙自在，袖手旁觀？面對事關清華文化大革命運動前途的大是大非問題，我又怎能無動于衷、不負責任？尤其在有了確定的政治傾向後，我更覺得應該主持正義、維護公道，反對強權政治和高壓政策。于是我不猶豫地參與這場辯論，大膽地發表自己

的見解。

與文革前半年消極被動地跟着別人走大不相同，這一次，我是自覺、積極、主動地投身于清華的文化革命運動。我想，清華當前的這場爭論僅僅是群衆中不同意見之間的爭論，既不牽涉中央復雜的政治鬥爭，又不存在深奧的理論問題，沒有什麼神秘之處，自己完全可以把握。可萬萬沒有想到，我恰恰因此陷入了最復雜的政治鬥爭，牽涉到最深奧的理論問題，使得我的戰友們及追隨我們的師生員工歷盡磨難傷痕累累，有的甚至付出了鮮血和生命，我自己也未能全身而退。在這裏我首先要向他們和他們的親屬真誠地說一聲：“對不起”。

一天晚上，我在路邊碰到宿長忠，他是水利系水工七一班的學生，和我同住 13 號樓，同在 10 飯廳就餐，互相認識。我們聊起學校形勢以及蒯大富和唐偉之間的爭論，非常投機，觀點一致。他說他已經聯絡了一批戰鬥組，成立了一個八八縱隊，支持毛澤東思想縱隊的觀點，反對蒯大富排斥異己和“運動群衆”的錯誤做法。這些戰鬥組的成員都是老八八派，隊伍純潔，陣容整齊。他動員我們《千鈞棒》參加八八縱隊。因為我們《千鈞棒》小組既是老八八派，又曾參加過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八八總部，對八八很有感情。隨後，宿長忠帶我會見了他所聯絡的張雪梅、王永縣、李良壽等人，他們分別來自水利系、電機系、精密儀器系，其中張雪梅還是井岡山兵團總部組織部長。我覺得這些人都挺不錯，和他們合作可以形成一支堅強的隊伍。於是，我們《千鈞棒》全體成員參加了八八縱隊。時間大概在 1 月 8 日。在八八縱隊，宿長忠是負責人，我最多祇能算個副手。

與此同時，陳楚三成立了一個“東方紅縱隊”，支持毛澤東思想縱隊的觀點。毛澤東思想縱隊、八八縱隊和東方紅縱隊合稱為“三縱隊”。1月9日，八八縱隊和東方紅縱隊發表《參戰聲明》，明確支持毛澤東思想縱隊，指出這次大論戰是總部壓制群衆與革命群衆反壓制的鬥爭，是“革”與“保”的鬥爭，是兩條路線鬥爭在左派隊伍內的反映。從此三縱隊正式結盟。

稍後，工程物理系6年級同學劉萬章成立了一個名為“毛主席警衛團”的縱隊，“三縱隊”變成了“四縱隊”。再往後，孫怒濤、汲鵬率領的天安門縱隊的一部分人，與四縱隊聯合，最終形成了五大縱隊。“四縱隊”也好，“五縱隊”也好，人們在發言中，在大字報裏仍然使用“三縱隊”的稱謂，“三縱隊”成了縱隊派的代名詞。

每個縱隊包含了許多戰鬥組，分別來自不同的系，不同的年級，都是因為觀點相同才結合在一起的。我早就認識東方紅縱隊的負責人陳楚三，他和我同系、同專業，我上二年級，他在畢業班，我們經常來往，關係密切，總在一起討論形勢，交換意見，由於觀點一致，很快成為摯友，我的《千鈞棒》和他的《戰地黃花》常常聯名發言、出大字報。我們倆并肩戰鬥，出生入死，直到工宣隊進校。

五大縱隊中比較特殊的是天安門縱隊，這是在28團和三縱隊之前就已存在的一個組織，因為當前的論戰而一分为二，其領導人孫怒濤曾受到過工作組的壓制和打擊，并以一篇《革命少數贊》的大字報而聞名全校，現任總部委員，他加入三縱隊的陣營對蒯大富是一個嚴重的打擊，而對縱隊派而言却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孫怒濤儒雅謙和的君子風度與蒯大

富顧指氣使的政客嘴臉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群衆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吸引了不少中間群衆倒向縱隊派。

蒯大富和 28 團的高壓政策不僅沒有整垮唐偉、壓服群衆，反而壓出來一個反對派——縱隊派，這個縱隊派就是 414 的前身。

井岡山兵團成立還不到一個月就產生了一個反對派，這也是毫不奇怪的，因為縱隊派與 28 團的矛盾，從實質上說，就是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與井岡山紅衛兵的矛盾，就是八八派與蒯派的矛盾，歸根到底是“平民”與“痞子”的矛盾。所謂井岡山兵團一統天下，其實是徒有虛名，廣大的八八派從來就沒有把蒯大富奉為左派領袖，如果没有中央文革的支持，誰也不會聽從他的號令，而現在他却要把八八派的頭頭唐偉置于死地。這是八八派所不能容忍的。

五大縱隊基本上是各自為政，各自為戰，作為一個反對派，既無統一的政治綱領，又無明確的鬥爭策略。他們的共同點是主持公道，不滿、批評和抵制蒯大富、總部及 28 團的錯誤做法，動機單純，做法簡單，有時候顯得非常稚嫩，就像小孩過家家。

三縱隊和 28 團大論戰的時期，正好是“一月革命”時期，所謂“一月革命”是指從 1967 年 1 月 4 日到 2 月 5 日，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進行全面奪權、並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活動。他們的活動得到毛主席的肯定。1 月 9 日，《人民日報》發表被譽為全國第二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的《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告上海人民書》，提出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製造了形勢危急的氣氛。

28 團認為大敵當前，應該一致對外，要求暫停辯論。

八八縱隊不肯罷休，堅持辯論到底。八八縱隊基本上是由老八八的人組成，我們都曾經是唐偉和陳育延的追隨者，現在對陳育延攻擊唐偉極為不滿。因此八八縱隊各戰鬥組採取統一行動，寫出很多大字報，集中火力攻擊陳育延，罵她賣友求榮，搞政治投機，是清華園最大的兩面派。陳育延是我們專業比我低一班的同學，我們了解她，她心直口快，是個單純、真誠的“左派”。但她帶頭反對唐偉，被28團利用了，我們攻擊她，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在八八縱隊的攻擊下，28團沉不住氣了，《第一星火》貼出大字報《陳育延是什麼樣的人？》拋出了陳育延。這時，我們又指責這是28團和總部“捨卒保車”。

1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又發表社論《反對經濟主義，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28團發表聲明稱“28團對形勢估計完全正確，以唐偉為代表的一股資產階級反動思潮，企圖奪取領導權，配合社會上的右派勢力一起為十二月黑風翻案，充當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的急先鋒”，並決定重新參加辯論。四縱隊却發表聯合聲明要求停止內戰，殺出清華園，並且組織大批人員迅速離校，去外地宣傳“抓革命、促生產”，使28團一下子失去了論戰對象。

### 反擊逆流

1月14日，我隨八八縱隊的人去上海串聯，病倒在交通大學，幾天後回到了學校。此時的清華園又是風雲突變，28團找不到“唐偉之流”，轉而把矛頭對準了康生和總理。

1月21日，清華井岡山聯合高級黨校“紅戰團”、天津

大學“8.13”成立了“調查康生問題聯絡委員會”并由清華28團《烈火》戰鬥組的戴國珍起草了《調查康生問題聯絡委員會公告》。

在這之前，1月18日，葉志江、劉泉等四人聯名寫出《康生同志，我們懷疑你！》的大字報，并刊登在當天的《清華井岡山通訊》上。

更早之前，28團對總理批評1.6行動就非常不滿，劉泉在28團的會議上說“對待1.6行動的態度是區別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嶺”，影射總理。

1月11日，《井岡山》報發表的評論員文章《好得很！》中說“那些生怕革命烈火燒傷自己的手指的政治庸人，閉着眼睛，看不到這一革命行動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相反却這指責，那挑剔，甚至無中生有的造謠污蔑，尋找機會進行攻擊……”其中引用的所謂攻擊性語言，幾乎就是總理的原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罵誰。

1月20日，28團《捉鬼隊》戰鬥組發表聲明則指名道姓，責難總理“說了王光美不敢說的話，發泄了劉少奇不敢發泄的恨”，公然要求總理“作檢查”。

28團這下子捅了馬蜂窩，主要不是因為他們反總理，而是因為他們直接反到中央文革顧問康生的頭上。1月22日凌晨2點50分，中央文革馬上做出反映。陳伯達、關鋒親自出馬，又是打電話，又是寫條子，嚴厲批評蒯大富。陳伯達對蒯大富說：

我是陳伯達。今天我們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調查康生問題聯絡委員會》發出的。這個組織內部有你們井岡山兵團，你知道嗎？（蒯答：知道。）你們的態度怎麼樣？

(蒯答：準備退出。) 你們應該出一個反公告。出這份《公告》這個行動是錯誤的、反動的，是同中央文革作對！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顧問，是中央信任的。怎麼樣？你們能說服他們嗎？如果不能說服則開除！你們這樣幹就等于同中央文革決裂！我們是支持你們的。康生同志一直是反對楊獻珍、反對林楓的。你們的矛頭完全錯了。紅戰團是反動的。不能與他聯系。

關鋒接着對蒯大富說：

在你們困難時，我們支持你們，我們不願意看到你跌倒，願意你繼續革命。你們要收攏組織，要保持革命派的純潔性。不然你們的旗幟就會倒下去的。以上意見，我們和你們商量。你們願意怎樣做就怎樣做，我們不勉強，但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是很肯定的！

耐人尋味的是陳伯達、關鋒大保康生，而對總理却祇字不提。也許他們已經感到自己的做法太露骨，所以關鋒在3點35分時又打電話對蒯大富說：

伯達同志要我補充幾點，你們學校貼出了一些攻擊總理、攻擊康生同志的大字報，希望你挺身而出，痛加駁斥！

高級黨校的權不能接管，那裏的權在左派手裏。向高級黨校奪權，就是向左派奪權，就是向無產階級奪權。

你們不要喪失你們的榮譽，要階級分析，不要迷失方向。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分清敵我，這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作鬥爭的繼續，防止壞人渾水摸魚。再說一句，要階級分析，

## 不要迷失方向。[5]

中央文革一貫煽動造反派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甚至隨意打倒剛剛主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但這次在康生問題上却一反常態。原來他們祇準懷疑和炮打別人，絕不允許懷疑和炮打他們自己。中央文革對清華井岡山炮打康生非常惱火，對蒯大富恩將仇報的做法感到無比氣憤。1月22日晚到1月23日凌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接見了高校代表，江青說：“現在北京出現了大量的攻擊陳伯達、康生的大字報，你們表了態沒有？這是敵人在進行挑撥。蒯大富你記不記得那時被關，被押着去中央，我們是怎樣對待你的，我和陳伯達同志怎樣為你着急。你被打成反革命，那麼久沒有翻身，是在十萬人大會上我們為你平的反。”她還動情地說：“我希望你們不要忘掉，你們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是怎樣支持你們的。你們現在對劉、鄧、陶、王、薄都恨不起來，不去搞他們，却來給我們貼大字報，這樣祇能使親者痛、仇者快。”說着說着還哭了起来。

會上，江青嚴厲批評蒯大富炮打中央文革的行為，却閉口不提他們炮打總理的行為，總理不得不自己站出來嚴肅地申明：“你們善意的批評我一定接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惡意的批評我是堅決不接受的。”[6]

毫無疑問，我們縱隊派是站在保總理、保康生的立場上的，我們把28團的言行稱為“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動逆流”，并立即響應中央文革的號召，反擊這股逆流。

就我個人而言，通過67年以來的若幹事件，我對總理的態度有了很大轉變。過去，我埋怨總理四平八穩，指責

總理事事右傾；現在，我敬佩總理堅持原則，同情總理的困難處境。盡管在當時來說，我對周總理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具備的無可比擬的博大胸襟和世所罕見的人格魅力還理解不深，但我們從總理的言行中，感到了溫暖，看到了希望。總理對革命幹部熱情幫助堅決保護，對青年學生苦口婆心循循善誘，對自己的過去勇于解剖坦承錯誤。總理的言行與中央文革以救世主自居到處鼓吹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我既對 28 團和劉泉等人用惡毒的語言謾罵總理表示憤慨，更對中央文革不肯站出來為總理說話而憤憤不平。

至于康生，過去我對他了解極少，現在保他，很有些“凡是蒯大富反對的，我們就擁護”的味道。後來受到陳楚三的影響，陳楚三對我說，康生是中國的捷爾任斯基，因此，我對康生很崇拜。在我們和蒯大富鬥爭的初期，陳楚三給康生寫過幾封信匯報清華的情況，希望得到康生的支持，雖然從來也沒有得到任何回復，但我們總覺得康生了解了清華的情況。因此，我對康生，崇拜之外，似乎又多了一份親近感。在整個文革期間，我都是毫無保留地擁護康生的。

## 二月整風

28 團反總理反康生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評，蒯大富被迫檢查，這使縱隊派得到很大鼓舞，也使其隊伍迅速得以壯大。

縱隊派抓到 28 團“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把柄”，

向蒯大富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攻。五大縱隊和很多群衆貼出了許多大標語、大字報，要求老蒯“痛擊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動逆流”，揪出他的嫡系部隊 28 團中的壞人；要求兵團總部整風，罷免劉泉，改組總部相關機構。我們用幸災樂禍的語氣問蒯大富：你們一貫以左派自居，動輒給別人扣上“反動路線”、“反對中央文革”的大帽子，現在你們自己炮打中央文革，看你老蒯如何執行陳伯達的指示，“挺身而出，痛加駁斥”？

蒯大富對中央文革的批評陽奉陰違，對群衆的批評不予理睬，他那裏仍然我行我素。我覺得反對派自發的、分散的行動對蒯大富和總部無法構成任何壓力，五大縱隊各自為政的狀況已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向宿長忠建議：八八縱隊應與其他縱隊互相串聯，協調行動，建立統一戰線。宿長忠開始不太同意，他認為我們不熟悉其他縱隊的人員，不了解他們的背景，搞不好會被別人利用，上了“黑手”的當，拖垮自己的隊伍。而我則堅持認為：必須與其他縱隊協調一致，聯合行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能與蒯大富和總部抗衡；而防止被他人利用的唯一辦法就是一切經過自己的大腦，經過自己的分析和判斷，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獨立思考，絕不盲從。宿長忠後來接受了我的意見，于是，我經常在各縱隊之間跑來跑去，或交換對形勢的看法，或磋商採取聯合行動，如遇重大事件，幾大縱隊會共同簽署聯合聲明，表明縱隊派的立場，而這聯合聲明一般都由我執筆起草。

一月二十五日，尹尊聲的《刺刀見紅》戰鬥組與我們《千鈞棒》、《紅色小老虎》等戰鬥組串聯。他們提出：用整風的旗幟，廣泛動員群衆炮轟總部，幫助總部整風。這與我

聯合反對派、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的思想不謀而合。于是，我們幾個戰鬥組發起成立了《整風串聯會》。

整風串聯會的海報貼出以後，得到了群衆的熱烈響應。當晚在“二教”（第二教學樓）402 室召開了第一次整風串聯會，有七十多個戰鬥組 300 多人參加了會議，其中大多數是學生，也有一部分教師和幹部。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在幾個主要問題上統一了認識：整風必須從“反擊逆流”開始；保蒯必須轟蒯，整風要先整頭頭；“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的整垮活該”；整風就是要把不在左派手裏的權奪回來。當時，整風串聯會確定的中心任務是：挺身而出，痛擊逆流；發動群衆，徹底整風。

整風串聯會的成立既使縱隊派有了一面整風的旗幟，又使縱隊派有了一個統一的協調機構。此後整風串聯會召開了一系列全校大會，與 28 團針鋒相對展開辯論，批評蒯大富、總部和 28 團，在制造輿論、動員群衆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這段時期在清華的文革史上稱為“二月整風”。在 414 成立之前，整風一直是縱隊派高舉的旗幟，整風串聯會一直是縱隊派聯絡和協調的中心。

67 年的二月整風期間，清華大學是一個自由論壇，大字報鋪天蓋地，人人都在發表自己的見解；宿捨裏、飯廳裏、教室裏、馬路上到處都在進行激烈的辯論。盡管各種觀點尖銳對立，但在唇槍舌戰之中仍不失文明和禮貌。每天晚上七點左右，大禮堂就坐滿了人，工人師傅拿出話筒，打開擴音機，為辯論準備好條件。任何人都可以按照先後順序跳上講臺發表自己的見解。有的人手拿講稿，照本宣科；有的人全憑靈感，即席發揮。誰的觀點能獲得群衆的

支持？掌聲決定勝負。為了博得群衆的掌聲，發言者除了立論準確，邏輯嚴密之外，還必須使用極富煽動性的語言，或者用一連串的排比句，層層深入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或者抓住對方發言的漏洞，加以譏諷，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縱隊派方面孫怒濤、汲鵬、陳楚三、宿長忠、劉萬章、周泉纓、陳家國以及教工代表傅正泰都是大禮堂辯論會上最活躍的分子。汲鵬常常即席發言，他瀟灑自如，妙語連珠，總能博得滿堂喝彩。他的一句名言“歷史就是歷史，絕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已經鐫刻在無數支持者的記憶中。

除了大字報、大辯論之外，對聯也成了常用的武器。整風初期，《刺刀見紅》貼出一副對聯：

上聯：攻擊總理攻擊康生的逍遙法外

下聯：反擊逆流要求整風的打成托派

橫批：清華現狀。

後來，28 團貼出另一副對聯：

上聯：反唐反托反康再檢查也要揪住不放

下聯：反崩反謝反康不承認還要倒打一耙

橫批：什麼邏輯

大標語也是針鋒相對。有一天晚上整風大會開始前，三縱隊在大禮堂前面貼出兩條標語：

“誰反對周總理、康生同志誰就是反革命！”

“把捉鬼隊、28 團同情者揪出來！”

28 團毫不示弱，也貼出兩條標語：

“清華大權在左派手裏，誰敢奪？！”

“1.6 行動就是好得很！”

## 初露頭角

整風串聯會成立以後，各縱隊和整風領導小組的頭頭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到 2 號樓 169 房間聚會。2 號樓 169 室是動農系《刺刀見紅》戰鬥組的負責人尹尊聲的宿捨。開始，這裏是自由論壇，大家暢所欲言，既無人主持會議，也不做出任何決定。然而，通過分析形勢，研究對策，基本上能達到統一認識、協調行動的效果。慢慢地，這裏就變成了縱隊派統一戰線的指揮部。在這裏我結識了孫怒濤、汲鵬、劉萬章、陳家國、周泉纓以及傅正泰、李秀芙等人，他們是整風積極分子，後來都成為 414 的主要負責人。應當說 414 的領導核心就是在 2 號樓 169 房間逐漸形成的。我是八八縱隊的負責人之一，也是整風領導小組的成員，因而是 2 號樓 169 房間的常客，並且是討論問題發表意見的積極分子。由於我經常在各縱隊之間穿針引線，所以我便成為縱隊派例會事實上的組織者。

整風期間，28 團最為狂妄，他們以左派自居，老虎屁股摸不得。他們的思維定式是：誰給他們提點意見，誰就是攻擊左派，誰就是否定井岡山的大方向，誰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誰就是反革命。28 團成了壓在縱隊派心上的一塊石頭。

我對 28 團的囂張氣焰和霸道行為特別反感，下決心和 28 團鬥一鬥，掀掉壓在縱隊派心上的這塊石頭。針對《第一紅岩》1 月 26 日寫的《28 團旗幟不倒》的大字報，我們《千鈞棒》在 1 月 28 日寫了《28 團破旗必倒！》的大標語和《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永遠在清華園上空高高飄揚——論某些人支撑的 28 團破旗必倒！》的大字報，把它們貼

在大禮堂前的醒目位置，向 28 團發起反擊。我在大字報中說 28 團“打擊群衆，壓制革命”，“在清華園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代表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并“充當了可耻的角色”。大字報還說“群衆要革命，要前進，一小部分人，28 團的個別人要保，阻止革命，起着保護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作用，這是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的規律”。我把 28 團扣在縱隊派頭上的帽子全部反扣到 28 團頭上，為縱隊派狠狠地出了一口氣。

《一論》不解恨，我又寫了《再論》。當時蒯大富是中央文革樹立的響當當的左派領袖，大多數人在大字報或發言中都回避他。我就不信這個邪，在《再論》中毫不客氣地直呼其名，警告蒯大富懸崖勒馬，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滑得更遠，并稱“28 團破旗倒了，即使蒯司令倒了，井岡山上毛澤東思想大旗仍然會高高飄揚”。此時此刻我已經對中央文革不再那麼迷信了，更不用說老蒯了。後來，我還不斷給他“上綱上線”，指責他“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左派中最大的分裂主義者”。在所有批評蒯大富的人中就數我們《千鈞棒》和陳楚三的《戰地黃花》“上綱”最高。

由於《千鈞棒》“立場”堅定、態度強硬，站在了與蒯大富和 28 團鬥爭的最前列，成為縱隊派中的著名的強硬分子，在全校也有了更大的名氣。作為《千鈞棒》的代表，我在 2 號樓 169 房間逐漸受到與會者的重視，我的發言也有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在 2 號樓 169 房間，我十分活躍、十分投入，一方面，經常直抒己見，發表自己獨到的見解；另一方面，認真傾聽別人的發言，注意吸取別人的觀點或提法。在意見分歧、衆說紛紜的情況下，我常常耐心和各方面溝通，進行協調，將大家的見解進行歸納、整理、綜

合，提出一個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比較完整的主張。于是，我逐漸成為 2 號樓 169 房間的主角。可以說，經過“二月整風”，縱隊派的許多骨幹分子已經自然而然地團結在我的周圍。不過那個時候，絕大多數人並不關心我姓甚名誰，人們祇知道我是《千鈞棒》的代表。

### 聯合聲明

在整風串聯會的攻勢下，蒯大富 1 月 27 日發表《五點聲明》，一方面承認在康生和總理問題上犯了錯誤，另一方面認為那些反康生和總理的人動機是好的，必須保護；一方面歡迎群衆批評和幫助，另一方面揮舞棍棒，說什麼“有些人想借我們犯錯誤的機會，從內部、外部施加壓力，想搞垮井岡山兵團，進而對中央文革施加壓力，我是絕對不能答應的”，“要想我把清華大權輕易交給那些投機成性的托派分子手中，那是白日做夢！”蒯大富首次提出在清華群衆當中抓托派的口號。

1 月 29 日，蒯大富對鄭州問題發表四點聲明，指責唐偉“在井岡山兵團內部充當托派，一貫搞投機分裂”。此時，唐偉和毛澤東思想縱隊的部分人正在鄭州介入河南問題，他們支持“河造總”，反對“二七公社”。

1 月 30 日，28 團《第一紅岩》貼出大字報《八八必須根本否定》。文章說：那些“老八八”實際上是一批地地道投機成性的托派，由他們所操縱的“八八”在清華兩條路線鬥爭中實際扮演了一個繼續壓制革命派、忠實執行劉鄧陶路線的工具的反動角色。“八八”的大方向是反動的，必須根本否定。

作為呼應，原為“八八”串聯會主要負責人、現為井岡山兵團主要負責人的陳育延馬上也在《徹底批判八八的改良主義、投降主義路線，樹立徹底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大字報中進行“自我批判”，表示堅決支持28團《第一紅岩》的文章，并說八八串聯會假批判真包庇的實質必須否定。與此同時，28團的骨幹戰鬥組、廣播臺、大字報編委會等紛紛發表文章、聲明，一時間，清華園憑空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否定八八的浪潮。

2月1日，《井岡山》報13、14期合刊發表四篇所謂《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大奪權》（簡稱“四論”），在“一論”裏提出“決不能同右派、折衷派聯合”；在“二論”裏要“粉碎向左派的反攻倒算”；在“三論”裏輕描淡寫地談到“糾正左派隊伍中的幾種錯誤傾向”；在“四論”裏則高呼“清除托派”，要“打倒一小撮托派，粉碎他們的陰謀，把他們從革命的營壘中清除出去”。

2月4日晚在整風大會上，蒯大富代表鮑長康、劉才堂、劉泉等八人作了題為《八八串聯會的建立是劉鄧陶的一個大陰謀》的長篇發言，在這篇發言中，蒯大富不僅否定八八的大方向，而且幹脆把八八串聯會說成是“劉鄧陶的一條後路”，是“劉鄧陶的一個大陰謀”，說“反革命兩面派陶鑄就拿出了兩手：一手指使王任重、王光美去支持、組織一支由黑高幹子弟為核心的保皇軍——八九串聯會；另一方面，更‘高明’的一手，就是指使鐵杆保陶派去支持、組成一批保蔣反蒯的投機分子唐偉等人所操縱的八八串聯會”，“伺機反攻倒算，為劉鄧翻案”。

蒯大富立論的根據是“關鍵在於翻案”。他說：“問題是如此尖銳，蒯大富和劉少奇是不共戴天的，要麼蒯大富翻

案，要麼劉少奇翻案，這就是蒯大富和劉少奇的厲害關係所在，也就是兩條路線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在清華園的關鍵所在。蒯大富的徹底翻案，就意味着劉鄧反動路線的徹底完蛋，關鍵的問題就在這裏”。因為八八串聯會祇是抽象地提“為清華園革命造反精神翻案”，沒有具體地提“為蒯大富翻案”，所以八八串聯會實際上是為劉少奇翻案，因而八八串聯會就成了陶鑄死保劉鄧的得力工具。這就是蒯大富的三段論式。

為什麼要否定八八？老蒯毫不隱晦：“是因為直到今天，還有那麼幾個人（實際上是指三縱隊的負責人），恬不知耻打着老八八的破旗，裹着自己去嚇唬別人，大搞宗派，大搞分裂”；要“撕掉唐派手中的最後一張王牌”，就必須根本否定八八。老蒯認為，縱隊派表面上要整風，要反擊逆流，實際上是否定井岡山，否定左派，是反蒯，是奪權；三縱隊的頭頭們是別有用心的假醫生，他們為別人醫病時，刀子不是指向傷口，而是指向心臟，因此蒯大富及 28 團“不得不帶着傷口和這個假醫生進行生死的搏鬥”。

初聽老蒯的發言，我們感到驚訝：此人怎麼如此心胸狹隘？難道僅僅因為當初八八串聯會祇籠統地提“為革命造反精神翻案”，而沒有專門為他個人翻案，沒有奉他為左派領袖，他就對八八懷恨在心，今天來報一箭之仇，將八八串聯會打成陶鑄的工具？細細研究後我們發現，蒯大富所代表的八個人既是兵團總部的主要負責人，也是所謂“蒯派”的代表人物，他們現在以否定八八為名正式向三縱隊宣戰，向八八派宣戰，向他昔日的戰友和盟友宣戰，向他今日的部下和群衆宣戰。這是清華運動的一個重要事件，它把清華抓托派的運動推向了極端。蒯大富抓托派也好，

否定八八也好，目的祇有一個，那就是一個“權”字。他是想通過否定八八來否定縱隊派，爲任人唯親、排斥異己尋找借口，從而保證蒯派分子全面掌權。因爲當時清華的基層組織還是三個紅衛兵組織的聯合政權，而主要掌權的還是八八派。事隔不久，蒯大富果然在各基層組織有計劃、有組織地發動了“宮廷政變”。

老蒯的發言立即遭到縱隊派的強烈反對，各大縱隊紛紛發言或發表聲明對老蒯的言論加以駁斥。散會不久，很多批駁老蒯言論的大字報就貼了出來，有的戰鬥組針鋒相對地提出“反托派鬥爭應該根本否定”。

陳楚三的東方紅縱隊是反對老蒯的骨幹力量，陳楚三因此也被 28 團打成“托派”。陳楚三並不退縮，反而更加堅定，鐵了心與他們鬥爭，并自稱“鐵托”，從此“鐵托”成了他的雅號。

正當老蒯如火如荼地抓托派的時候，2月5日下午3點，中央文革辦公室的閻長貴給老蒯打來電話說：“我前幾天來你校看了一下大字報，發現了你們反托派，這是不對的，不應該把矛頭指向群衆，而應當指向當權派。”蒯大富當即向 28 團作了傳達，却不想全校師生員工傳達。

拖到 2 月 7 日晚，總部不得不在整風大會上傳達閻長貴的電話指示，會場一片嘩然，群衆紛紛質問蒯大富爲何貪污中央指示，爲何對群衆有親疏之別？蒯大富在會上表示反“托派”、反“唐派”都搞錯了，但又狡辯說沒有把矛頭指向群衆，并繼續堅持 1 月 27 日和 1 月 29 日發表的聲明和 2 月 4 日的講話的主要觀點。

爲了回應蒯大富 2 月 4 日講話，五大縱隊和整風串聯會在會上宣讀了長篇《聯合聲明》，對總部和 28 團的言行進

行了系統的清算。《聯合聲明》列數蒯大富六大罪狀：1、大搞“反唐戰”，把矛頭指向革命群衆；2、反總理、反康生，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3、通過否定八八的大方向，分裂左派隊伍，大張旗鼓地搞反“托派”，反“唐派”，企圖在清華實行蒯式階級路線，實行所謂蒯派的絕對獨裁；4、插手其他學校，破壞北京大聯合；5、插手鄭州、上海，破壞全國大聯合；6、《井岡山》報“清除托派”的四篇社論流毒全國，影響惡劣。《聯合聲明》說“事實已經充分表明，兵團總部自成立後，逐步背離了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不是把矛頭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是致力于全校、全北京、全國的大聯合大奪權，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矛頭對準群衆，分裂瓦解左派隊伍，破壞全校、全北京、全國的大聯合大奪權。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聯合聲明》表示要“堅決批判總部的方向錯誤、路線錯誤”并向總部提出了改正錯誤的六點要求。1、嚴肅處理反總理、反康生事件，將《捉鬼隊》等戰鬥組的頭頭開除出井岡山；2、蒯大富收回1月27日和1月29日發表的聲明和2月4日講話，公開承認錯誤；3、《井岡山》報編輯部自己批判“四論”；4、徹底改組廣播臺和大字報編委會；5、通過巴黎公社的選舉，建立新型的組織形式；6、總部必須整風，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實現真正的大聯合。

這是一個重要的《聯合聲明》，可以說它是二月整風期間縱隊派的綱領性文件。

蒯大富抓托派沒有抓出幾個，却把大多數老八八推向了反對派，蒯派成了唯我獨“革”、唯我獨“左”的孤家寡人。蒯大富的高壓政策促進了反對派的團結和合作，而反對派

則在抵制蒯大富錯誤的過程中、在和 28 團的鬥爭得到了發展壯大。

## 黨員登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閻長貴剛剛制止清華反托，2月 7 日，劉泉又貼出《黨員登記倡議書》和《黨員登記條例》，說什麼清華黨員參加的是劉少奇的修正主義的黨，要對黨員進行重新登記，這在清華又引起了很大震動。

文化革命中黨員重新登記的始作俑者是“北航紅旗”。1967 年 1 月 9 日，《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奪權聲明》下令：“北京航空學院各級黨團組織必須由我紅旗戰鬥隊及其他革命群衆組織進行審查或重新登記”，于是，不是黨員的韓愛晶領導實施了北航的黨員登記。

北航的做法傳到清華，有個戰鬥組貼出了《論清華黨權必須歸井岡山》的大字報。1 月 31 日，井岡山兵團冶金系教職工分團率先奪取冶金系的黨、政、財大權，宣布“立即解散冶金系黨總支和所屬的教職工黨支部，所有教職工黨員三日之內向井岡山兵團冶金系分團登記”。因為冶金系出現的事件祇是局部情況，而且祇涉及教職工，所以並沒有引起我們的重視。而現在作為井岡山主要負責人的劉泉拋出《黨員登記倡議書》和《黨員登記條例》，并在廣播臺反復廣播，這就清楚地表明：清華井岡山想仿效北航紅旗全面奪取清華大學的黨權。

我在想，過去幾個月，幾乎所有的當權派都被打倒了，現在到處又要奪黨權，難道我們的黨也不行了？我們怎麼去理解十幾年來在各條戰線上取得的偉大成就？我們不是

天天在宣傳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嗎？怎麼一下子就修掉了？我絕不相信！我們黨的大權絕不能交給一個群衆組織！蒯大富連黨員都不是，讓他領導清華黨的組織豈不是天大笑話？一個黨員的責任感促使我挺身而出，立即用真名貼出大字報，鄭重聲明：我們參加的中國共產黨是毛主席的馬列主義的黨，不是劉少奇的修正主義黨，堅決反對黨員重新登記。

當晚，在全校整風大會上我又第一個跳上講臺，宣讀我的大字報，并呼呼所有共產黨員堅決抵制黨員重新登記。許多戰鬥組和廣大黨員也在會上發言，強烈反對進行黨員重新登記。

幾天之後，有人在大禮堂前面貼出中央的指示：黨員問題一般在運動後期由黨組織處理，群衆組織無權處理。這樣清華的黨員登記當然也就不了了之。

### 蒯氏路線

“蒯氏階級路線”是縱隊派和蒯大富爭論的焦點之一。老蒯在 2 月 4 日的發言中說：“在十月份以前，八八派和八九派的戰士有本質的不同。廣大的八八派戰士，包括從前受打擊最重的‘蒯派’同志，當時，他們在政治上是最下層的，受壓迫是最重的，因而反抗也是最强的。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八八派的戰士相當於農村中的貧下中農。再說一遍，他們是文化革命中的依靠對象。而八九派的同志呢？我們應當承認他們當中大多數是受蒙蔽的，他們在文化革命前期，政治上沒有什麼壓迫，因而‘怕’字當頭，他們相當於農村中的中農，是團結對象”；“唐偉等幾個人就是

‘挂起紅帶子，裝得很熱心’，用騙術鑽入八八，把持一切，排斥蒯派的‘小地主富農’式的人物”；祇有蒯大富、劉泉、劉才堂他們才是清華園裏“受過深重壓迫的革命造反派”。

我們把這些話歸納起來，稱之為“蒯氏階級路線”，並掀起了一股批判的浪潮。

3月12日蒯大富在《關於目前局勢的十點聲明》中重申：“我們在2月4日聯合發言中提出的階級路線，依靠八八派（包括蒯派），團結和爭取八九派的階級路線，盡管有缺點，但基本上是正確的，必須從根本上肯定。它是符合黨的階級路線的，清華園必須貫徹這條階級路線。如果從根本上否定這條階級路線，那麼清華園的右派就要翻天，資本主義就要復辟。同學中所傳的‘蒯氏階級路線’是惡意的歪曲，我們根本不承認，我們根本沒有提出過什麼‘蒯氏階級路線’”。

在這裏，蒯大富僅僅否認了“蒯氏階級路線”的名稱，却堅持和重申了這條階級路線的實質。蒯大富之所以這樣理直氣壯是有他的根據的，他的根據就是《十六條》。《十六條》的第五條“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中就有依靠左派，團結和爭取中間派，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的提法，蒯大富把它“清華化”了。

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認為蒯大富的這條階級路線的實質在於它確立了重新劃分階級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文革運動初期那五十天的政治態度，也就是對蒯大富和劉少奇的政治態度。蒯大富以這樣一個新的標準重新劃分了清華園的階級，并據此提出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階級路線，我們把這條路線叫做“蒯氏階級路線”是恰如其分的。

在蒯大富看來，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

的大革命，階級敵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蒯派是最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其他的人祇能是團結和爭取的對象，這是順理成章的。

但是，在我們看來，他的這條階級路線不是根據人們是否占有生產資料、占有什麼、占有多少、如何使用等情況去區分階級的，與我們黨歷來所主張的階級路線根本不符。其實我們對蒯大富僅僅由于在那幾十天內反對了工作組，就一下子變成了最革命的左派是很不以為然的，因為我們知道考察一個人是不是革命的，一定要看他歷史的、長期的、一貫的表現，而不能僅僅看他一時一事的表現，否則，豈不是鼓勵人們進行政治投機？難道僅僅因為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五十天的運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已不存在了？祇剩下造反階級和保守階級？造反階級真的代表了先進的社會生產力？毫無疑問，我們堅信黨的階級路線，而絕不接受“蒯氏階級路線”。而現在蒯大富却要以他劃線，給每個師生員工劃定階級成分，這是清華園的廣大師生員工所不能接受的。

據說有人把蒯大富的講話送到《紅旗》雜志，接待人員說：“蒯氏階級路線”是反動的，就象在學校分什麼“紅五類”“黑五類”一樣。

在這條階級路線的指導下，蒯大富採取了一系列錯誤的做法，如提高八八，教育八九，圍剿八九思潮，解散幹部堆，打擊群衆、打擊教師、打擊幹部、打擊一切與他們意見不和的人；提倡什麼“一切權力歸蒯派”、“痞子要掌權”，“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等錯誤口號，從根本上混淆了階級陣線，在清華園造成極其惡劣的後果。因此，我們說“蒯氏階級路線”理論上是錯誤的，實踐上是有害的。

中國的階級和階級關係是否根據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的政治態度）而發生大變動，這是我們與團派最基本的分歧之一，圍繞“蒯氏階級路線”所展開的爭論是這一分歧的最初體現。應當指出，最早提出關於文化大革命引起階級關係大變動的不是蒯大富，而是陳伯達。66年8月5日後陳伯達在《擁護毛主席的大字報》中說：“一個共產黨員，在大的政治鬥爭的關鍵，忘記了群衆，忘記了階級分析，看不見階級大變動的新動態，還進行鎮壓群衆，這就是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軌道，脫離了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同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方針政策背道而馳”。這個“階級大變動”的提法不管是蒯大富自己發明的，還是從陳伯達那兒批發過來的，看來他們的心都是相通的。[7]

### 無限上綱

67年的二月份，整風串聯會不斷開會，開小會研究形勢和對策，開大會批評總部和蒯大富的錯誤，在這些大大小小的會議中，縱隊派的核心和骨幹力量得到進一步鍛煉；縱隊派的隊伍得到了壯大和發展。

從縱隊派的觀點來看，蒯大富和蒯派的問題是不能做到五個正確對待，即不能正確對待無產階級司令部，不能正確對待自己，不能正確對待持有不同意見的戰友，不能正確對待運動初期受蒙蔽的群衆，不能正確對待廣大的幹部和教師。因此，他們必須徹底整風，改正自己的錯誤，否則祇能成為歷史舞臺上曇花一現的人物。

從團派的觀點看來，蒯大富和28團始終把矛頭指向劉鄧，大方向是正確的；三縱隊把矛頭指向總部，大方向錯

了，一切都錯了；群衆是有階級性的，他們引用謝富治的話說：相信群衆是什麼？就是相信造反派。左派犯錯誤，右派利用，歷來如此，三縱隊背後必有壞人。

迫于中央的壓力，蒯大富、劉泉及 28 團的幾個戰鬥組做出了種種姿態，一次又一次地公開檢查，三縱隊還是揪住不放，死纏硬打，處處與總部作對。2月 28 日在整風動員大會上，鮑長康代表總部作了一個題為《革自己的命，造自己的反》的檢查，承認總部一月份以來犯了方向性錯誤，把矛頭指向總理、康生，壓制了不同意見。但是他們始終不肯向批評他們的三縱隊做出任何讓步，他們自始至終都認為階級敵人在背後操縱三縱隊反對革命左派，要揪出三縱隊背後的魔影來。作為三縱隊的強硬派，我們是老百姓，沒有什麼顧忌，既然你老蒯不斷給我們上綱上綫，我們也祇好以牙還牙，給你無限上綱了。

2月 3 日，我和陳楚三發表聲明稱：“蒯大富親自掀起的‘反托派’高潮是挑動群衆鬥群衆的嚴重事件，這是蒯大富及兵團總部的嚴重錯誤發展成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集中表現”，“這個大陰謀充分說明蒯大富是左派中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井岡山的政治路線是右傾的、反動的”。

2月 7 日，毛澤東思想縱隊的《老百姓》說：蒯大富和總部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資產階級專政，搞的是個人獨裁和蒯氏獨立王國。

2月 10 日，《雲水怒》的周泉纓說，北京大專院校的革命派聯合不起來，很大的責任在蒯大富，是蒯大富破壞了無產階級的大聯合。蒯大富現在已經不是左派了。

2月 15 日，朱德明說，對蒯大富這個人不能洗溫水澡，得用 100 度開水燙！

2月16日，革命教職工負責人傅正泰說，要批判總部的方向錯誤、路線錯誤，蒯大富結黨營私，對抗中央，挑動內戰，制造分裂，破壞左派大聯合，是最大的無政府主義者。《第一換新天》說，蒯大富包庇右派，打擊左派，挑動內戰，破壞大聯合。

我們經常引用1月31日出版的《紅旗》第三期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中的一段話警告蒯大富。這段話是：“我們期望，在運動中涌現出來的革命鬪將……在政治上成熟起來，不要做歷史舞臺上曇花一現的人物。而要做到這一點，祇有老老實實地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工農群衆相結合，認真改造自己的非無產階級世界觀，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

三縱隊的人曾走訪《紅旗》雜志社，接待人員說：曇花一現的人物是有所指的，不是隨便說的。我們理解這是暗指蒯大富。從此“蒯大富不要做歷史舞臺上曇花一現的人物”成為我們的口頭禪，叫得老蒯心煩意亂。

我們沒有迷信蒯大富，沒有懼怕蒯大富，但在公開場合我們還是給他留了點面子，可是蒯大富身邊的人却不給他留面子。

總部成員寫大字報揭露老蒯有說謊、欺騙、耍手腕、耍小聰明等資產階級政客作風。

老蒯同班的兩位同學貼大字報說：“蒯有風頭主義，用人唯親，表現的不是那麼老老實實，好文過飾非，隱瞞自己錯誤，甚至耍手腕來蒙騙人們”。

其實，蒯大富這位社會上炙手可熱的人物，在清華園早已是毀譽參半，至少在我們這些縱隊派強硬分子的眼裏，他根本就不是什麼革命左派的領袖，而是一個“得志便猖

狂”的政治暴發戶。

我們反對蒯大富，給他上綱上線，遭到 28 團的還擊，他們掄起大棒：“反對蒯大富，就是反對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反對蒯大富會不會得罪中央文革？這是縱隊派不容回避的問題。對此，我們有心理準備。我們認為，蒯大富是錯誤的，即使得罪中央文革，我們也照反不誤。周泉纓在全校大會上說：“有人說中央文革支持蒯大富，我們應該相信黨，相信中央，不要看臉色辦事，否則就是奴隸主義。”

在外校看來，我們反對蒯大富，其實就是反對中央文革。當時中國科大有一個群衆組織《雄獅》，以公開反對中央文革而大出其名。他們派人與我們《千鈞棒》聯絡，找到了我們的宿捨，與我們座談，希望我們和他們聯合起來。我對他們說：“你們公開提中央文革不合適，我們搞蒯大富比較策略。以後怎麼樣，要看形勢發展。”

後來，科大《雄獅》遭到鎮壓，他們交代了與我們的聯繫，還貼了《千鈞棒，你溜不了！》的大字報，把我對他們說的話公諸于衆。有人把這張大字報抄回來貼到清華，我也没有理他們。

## 政治綱領

蒯大富在反工作組時曾說過一句名言“權、權、權！真正的革命派，應該滿腦子裏想的是奪權，眼裏看的是奪權，雙手幹的是奪權”。蒯大富對於權力的認識可謂敏感之極，對於權力的迷戀可謂登峰造極。當 28 團在與三縱隊展開的大辯論中節節敗退時，他們掄起的最後一根大棒是指責三縱隊想從蒯大富這些左派手裏奪權。三縱隊當時真的

想奪權嗎？不是！絕對不是！唐偉早已名聲顯赫，如果他迷戀權力的話，與大紅大紫的蒯大富緊密合作才是捷徑，而不應該辭去官職；孫怒濤一直得到蒯大富的信任和器重，追隨蒯大富才能得到更大的權力，何苦充當反對派？張雪梅已經是井岡山兵團組織部部長，權力可謂不小；至于我等無名小輩，從未覬覦過任何權力。我們不知道權為何物，也不知道權有何用。我們大都當過小小的學生幹部，我們祇知道，當幹部就要犧牲自己的學習時間，承擔更多的社會工作；當幹部就得處處嚴格要求自己，事事做模範當表率。在我們看來，權力僅僅意味着責任，權力僅僅意味着奉獻。文化大革命搞到今天，我們既無所失，也無所得，我們沒有為個人利益、個人權力而鬥爭的任何理由。我們反對老蒯完全出于意見分歧觀點不同，出于對清華前途和文革成敗的關心和責任感，我們認為這是為正義、為真理而鬥爭。捫心自問，我們無愧！

但是面對 28 團的指責，我們如何向清華師生員工解釋？我們反對蒯大富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既然“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那就不能回避權的問題。在三縱隊內部，人們在權的問題上也發生了分歧，有人講，我們就是要奪權，另外一些人則反對奪權。我們怎樣正確理解、正確處理所謂政權問題？我們怎樣統一三縱隊的思想？內外形勢都要求我們必須提出明確的政治綱領。

那時，我們真正用心讀了不少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并且很會“活學活用”，所謂活學活用其實就是生搬硬套。我們在學習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時，看到了有關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論述，就提出整風串聯會也應該制定一個政治綱領，明確規定我們所要達到的目標，既

要防止陷入“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機會主義泥坑，又要防止清華的師生員工誤認爲我們三縱隊是一批陰謀奪權者。經過反復討論，縱隊派公開提出了自己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最低綱領是：部分奪權，即把整風的領導權控制在整風串聯會手裏；最高綱領是：徹底奪權，即按巴黎公社的原則，重新建立井岡山兵團新型的組織機構。

這個最高綱領在2月7日整風串聯會和五大縱隊發表的聯合聲明裏得到了體現，聲明明確提出要“通過巴黎公社的選舉，建立新型的組織形式。清除黑官，清除一切官僚機構；鏟除舊國家機器的一切殘餘，建立堅強的左派領導核心”。

十六條中規定“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文化革命初期，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選舉產生革命的領導機構，從根本上防止修正主義，一度成了我們這些青年學生所篤信不移的理想和信念。而對理想和信念的執著追求，正是我們那一代青年的特徵，這就是我們大多數人積極參加文革的初始動機，也是我們反對蒯大富的重要原因。

三縱隊的政治綱領得到了許多群衆的擁護。後來的實踐表明，最低綱領很容易就實現了，整風的領導權被我們所掌握，正像28團驚呼的那樣：三縱隊控制了清華的講臺！

蒯大富和兵團總部雖然遭到口誅筆伐，却牢牢地控制着清華大權，三縱隊的最高綱領和所謂巴黎公社原則祇不過是徹頭徹尾的空想。二月整風沒有達到任何目的，反而加深了裂痕，最終導致清華分裂成兩大派。

需要指出的是，隨着政治形勢和政治口號的不斷變化，

我們也在不斷改變我們的政治綱領。上海“一月革命”以後，巴黎公社的原則被“三結合”所代替，中央規定在各省市的奪權鬥爭中實行革命群衆組織的負責人、當地駐軍負責人和革命領導幹部“三結合”的方針，作為三縱隊的政治繼承者 414 的政治綱領變成了“徹底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解放幹部，實現革命的三結合”。而到了 1968 年初，414 的政治綱領祇剩下一句話：強烈要求中央對清華大學實行軍管。1968 年 7 月 27 日工宣隊開進清華，雖然打着“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旗幟，但清華大學實際上被 8341 為首的部隊軍管了。

### 反攻倒算

3 月 1 日，《人民日報》報道了貴陽棉紡廠按行政系統實行大聯合的經驗，并發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好形式》的社論，要求解散跨車間、跨班組、跨系、跨班級的組織，實現按行政系統的大聯合，表明一種“恢復秩序”的姿態。蒯大富和兵團總部立即抓住這一機會，發出通知，要求解散縱隊，回班鬧革命。28 團馬上響應，公開宣布解散 28 團，但在內部却布置骨幹力量回到各自的系裏、班裏抓權。不久，天安門縱隊、毛主席警衛團也宣布解散。

從與老蒯論戰以來我們第一次感到如此被動。中央號召按組織系統實現大聯合，我們在井岡山兵團下面保留跨系、跨班級的縱隊，顯然與大聯合的精神背道而馳，但我們又不甘心就這樣放棄。經過討論，三縱隊決定暫不解散，看看形勢如何發展。作為一種姿態，我們《千鈞棒》和《戰地黃花》發表“降綱聲明”，進行自我批評，承認在過去的

大字報中給蒯大富和總部上綱過高，有可能被階級敵人利用來否定井岡山。

清華師生員工要求大聯合的呼聲日益高漲，大聯合的潮流不可阻擋，3月11日三縱隊被迫宣布解散。

然而，就在三縱隊宣布解散的第二天，蒯大富等十人發表《關於目前形勢的十點聲明》，對我們這些縱隊派進行反攻倒算。這《十點聲明》不僅全面否定群衆在整風期間對總部提出的意見，堅持所謂的“蒯氏階級路線”的實質，而且繼續把矛頭指向三縱隊。聲明說什麼“面臨死亡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正在竭盡全力，進行垂死的絕望的掙扎。他們有的撕去畫皮，暴露出狰狞的面貌，赤膊上陣；有的力求混入革命陣營，構成革命陣營中所謂反對派，瓦解革命陣營。他們用各種手法，從各個方面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向中央文革小組，向毛主席展開猖狂的反撲，全國從上到下存在着一股資本主義復辟的逆流。在清華園也是這樣。”蒯大富第一次將清華的反對派與全國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聯繫起來。這裏的所謂“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二月逆流”，這是指67年1月下旬和2月中旬，三老四帥在京西賓館和懷仁堂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胡作非爲所進行的一場激烈抗爭。

蒯大富給我們上了一課，我們這才認識到：蒯大富絕不會改正自己的錯誤，祇要他掌權，清華的文化革命就不會有什麼好的前途，清華的師生員工們也不會有什麼好的前途。我們與蒯大富的鬥爭是不可調和的，我們需要保存力量，等待新的時機。于是，我和陳楚三決定逆風而上，將數力系的幾個縱隊派的戰鬥組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數力

系紅色聯隊》，爲縱隊派保留了一塊“根據地”，繼續評論清華時局，抨擊總部錯誤，硬着頭皮堅持鬥爭。

### 圍剿八九思潮

3月16日，兵團總部發表“政策聲明”，說什麼當前的中心任務是提高八八，教育八九，打擊反革命逆流。廣播臺廣播評論員文章，號召“殺回各系各班去，展開巷戰、樓道戰、宿捨戰”，“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八九反動思潮”，全校掀起了所謂圍剿“八九思潮”的政治戰。崩派分子在許多班級組織了對所謂鐵杆八九同學的批判和鬥爭，強迫他們做檢查。二月整風時期周泉纓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八九同學之所以犯了一些保守的錯誤，是因為他們對黨有階級感情。現在崩派分子大肆批判周泉纓的話，說八九派沒有階級感情，祇有“劉鄧感情”。

我們對原八九派的同學遭到這樣的圍攻表示不滿，特別對高幹子弟的處境表示同情。我們認爲，他們雖然跟着工作組壓制過造反派，但他們不過是跟我們一樣的青年學生，他們不必爲工作組的錯誤路線承擔責任。況且，他們的父輩爲了中國的解放事業立下了豐功偉績，沒有他們父輩的奮鬥，也就沒有我們的今天。崩大富憑什麼去圍剿他們？他們現在已經不再掌權，爲什麼還要趕盡殺絕？我和陳楚三決定出面打抱不平，組織《數力系紅色聯隊》的幾個戰鬥組採取統一行動，貼大字報強烈反對所謂圍剿“八九思潮”的運動，指出兵團總部採取高壓政策去圍剿打擊曾經是保守派的青年學生是錯誤的，應該否定。

### 解散《二万五千里》

3月18日，總部二辦（即2月27日成立的專門負責幹部問題的總部第二辦公室）發出《通令》，說“前一階段我

校存在一股資本主義復辟的逆流和反動思潮，其表現有二個方面：（一）一小撮人企圖為蔣南翔翻案，（二）惡意攻擊左派，否定兵團總部的大方向，企圖搞垮年青的紅色政權，攻擊中央文革，否定文化大革命。一小部分立場未變的前黨委紅人和鐵杆八九派，拼湊起來的幹部堆，在前一階段的整風中，惡意攻擊總部，充當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急先鋒，必須徹底解散。”《通令》特別點名《二萬五千裏》等三個戰鬥組，勒令他們立即解散，檢查錯誤，交代罪行。

《二萬五千裏》是動農系的十來位年青教師組成的戰鬥組，二月整風時期我和他們來往較多，認識他們當中大多數人。他們既不是鐵杆八九，也不是幹部堆，最大的幹部不過是教研組黨支部書記。

總部二辦為什麼要解散《二萬五千裏》？真實的原因是：《二萬五千裏》是整風串聯會的發起人和骨幹分子。他們經常在整風大會上發言，旗幟鮮明地支持三縱隊，批評總部的錯誤，這在教師隊伍中是很突出的。特別是 1 月 26 日他們曾經貼過大字報，向總部提出了四點“嚴正要求”：總部犯了錯誤，應做檢查；攻擊總理的《捉鬼隊》必須公開檢討；總部委員進行必要調整；徹底改組各宣傳機構。2 月 12 日在整風大會上，《二萬五千裏》又揭發了 28 團《烈火》與黨校《紅戰團》的聯系和活動情況。所有這一切都讓蒯大富和 28 團懷恨在心，現在祇不過是進行報復罷了。

二辦《通令》在校引發了關於解散《二萬五千裏》的大辯論。《二萬五千裏》態度強硬，拒不解散。我們《數力系紅色聯隊》幾個戰鬥組紛紛發表聲明，反對二辦，聲援《二萬五千裏》。我們指責老蒯解散《二萬五千裏》是“反托派”的繼續，第一步是拿《二萬五千裏》開刀，下一步

就是收拾三縱隊。不過，在一片反對聲中，老蒯的第一步就走不下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以後，《二萬五千裏》戰鬥組的成員中有三人當了全國人大代表。

### 宫廷政變

3月21日，兵團總部發表《關於分部建設的意見》，提出分部領導成員應是堅定的左派，調和派、折中派不能擔任領導。此時恰逢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表四十周年，于是乎，“一切權力歸蒯派”、“痞子要掌權”的口號充斥了清華園。如前所述，三總部合併時，各系、各分部是三個紅衛兵的聯合政權，蒯派分子本來就是少數，且威信不高，主要掌權的還是八八派。在總部的策劃下，工化、土建、數力、水利、電機等系分部相繼發生“宮廷政變”，將八八派成員排擠出去，許多基層組織的負責人都變成清一色的蒯派分子。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數力系紅色聯隊》的幾個戰鬥組又貼出了《清華文化大革命運動向何處去？》的大字報，指出：大搞“宮廷政變”和解散《二萬五千裏》是“反托戰”的繼續，“一切權力歸蒯派”是錯誤的，“痞子”就是不能翻身掌權。

孫怒濤的《第一湘江》和汲鵬的《輪機兵》貼出大字報《對蒯派就是應當階級分析》。3月10日，孫怒濤還針鋒相對地提出，罷免劉泉、陳育延等四名總部委員。

3月10日，一個名為《尖刀班》的戰鬥組貼出了《論造反派》的大字報，指出“所謂哪裏壓迫最重，哪裏反抗就最力的蒯氏理論顯然是缺乏階級分析的。於是，人們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疑問：造反不造反究竟是不是革命不革

命的標準？換言之，造反派是否就是革命派？”

我們《千鈞棒》寫了《“痞子”與“紅人”》的大字報，對痞子與紅人進行了階級分析，指出：“今日之天下是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的天下，是無產階級專政了十七年的天下，是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殊死鬥爭了十七年的天下，是毛澤東思想的陽光普照了十七年的天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不是什麼痞子運動”；對黨員和幹部採取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是無政府主義思潮；痞子和某些蒯派掌權就意味着資本主義復辟。

憑心而論，我們的所謂“階級分析”在質疑“造反派就是革命派”這一點上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我們這些出身較好的同學以紅五類自居，用我們的“階級偏見”對待那些出身不好的師生員工，動不動就用“階級分析”的緊箍咒，指責他們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基礎，也是非常錯誤的。

在“蒯氏階級路線”指導下，總部採取了圍剿“八九思潮”、解散“二萬五千裏”及砸爛“幹部堆”、大搞“宮廷政變”三大步驟，將相當一部分八九派學生、廣大的教師和幹部以及持有不同意見的戰友推向自己的對立面。

### 幹部抗爭

清華大學共有黨支部書記、行政科長、教研組副主任以上的幹部 500 多人。人們通常把清華 500 多人的幹部隊伍分成基層幹部、中層幹部和上層幹部三個層次。其中，中上層幹部共 156 人，基層幹部 350 多人。黨委各部副部長、黨總支副書記、行政各處副處長、各系副主任以上的幹部

屬於中上層幹部，其餘為基層幹部。而在中上層幹部中，人們又把黨委常委以上的校級領導稱為上層幹部。

清華的幹部隊伍在經過文革初期的“緊跟”、工作組時期的“靠邊站”、“三臨”時期的“勞改”後，已經逐漸“蘇醒”，開始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和他們自己的處境，并為改變自己的“黑幫”命運進行了抗爭。

關於清華幹部的“勞改”情況，有一個戰鬥組進行了調查研究，他們從原學校文革小組得到了具體數據，截止到1966年10月，總支書記和總支委員級的幹部142人，被強迫勞改136人，占總數的95%；校部行政處長級幹部33人，被強迫勞改27人，占總數的82%；黨委各部部長級幹部31人，被強迫勞改30人，占總數的97%。在上述被迫“勞改”的幹部中，打黑幫旗號、挂黑牌全日勞改、一兩天要寫勞改日記的所謂一類勞改幹部共163人，占206人中的79%。而全校被強迫勞改的幹部，則占幹部總數的70%以上。

1966年10月，一部分基層幹部不顧政治壓力，組織起來，成立了自己的戰鬥組，如《揪要害》、《毛澤東思想小組》、《橫眉俯首》等，寫了許多大字報，指出“一下子把大批幹部打成‘黑幫’是錯誤的”，主張“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幹部”，“解放黑幫”。他們呼呼革命的師生員工和群衆組織支持基層幹部自己解放自己，參加文化大革命。

這些基層幹部的行動遭到了以《紅教聯》為代表的一部份教職工的反對。《紅教聯》是67年12月31日成立的教工組織，後來改名為《紅教工》。《紅教聯》認為“清華的黨是法西斯黨，是黑黨，全爛了”，“基層幹部和黨員是劉、鄧路線的社會基礎”，他們提出“上揪下掃，除惡務盡”的

口號，繼續壓制幹部起來參加文化大革命。

這個時候，清華的中上層幹部也沒有沉默，他們利用少有的機會為清華黨委和自己辯護。作為清華黨委第一副書記的劉冰在 11 月初直接寫信給毛主席，向毛主席陳述“清華黨委和蔣南翔同志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黨中央方針路線的，是衷心擁護毛主席、黨中央的，不是黑幫”。

到 66 年 12 月份的時候，為清華黨委和蔣南翔鳴不平的人越來越多，出現了“清華黨委是幾類？”“蔣南翔是揪出來的還是拋出來的？”“清華黨委性質未定”等等議論。校園裏貼出大字報，公布了蔣南翔、劉冰和其他黨委副書記的《談話紀要》。蔣南翔說：“反毛澤東思想我不承認”，“清華黨委……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工作積極，成績是主要的”。劉冰說：“根據已有材料，不能說明蔣南翔是黑幫”。

“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的泛濫，黨政工團組織的徹底癱瘓，群衆組織之間的嚴重對立，黨的幹部和普通公民的權利遭到了任意的踐踏，不僅使黨的幹部、也使青年學生對文化大革命運動進行反思。人們很自然地把這一切歸罪于中央文革，青年學生敢說敢為掀起了一股反對中央文革的浪潮。這股浪潮就是本章開頭所說的“十二月黑風”。

結果，為蔣南翔翻案的活動和反對中央文革的活動一起被作為清華園的“十二月黑風”，遭到了造反派的鎮壓。《紅教聯》的一些人把《揪要害》戰鬥組的成員打成為蔣南翔翻案的復辟逆流，使得一些基層幹部多的戰鬥組被迫解散。

然而清華幹部隊伍並沒有停止鬥爭。1967 年 2 月，作為基層幹部代表的《揪要害》、《毛澤東思想小組》等繼續為幹部問題大喊大叫，《毛澤東思想小組》寫了五篇《論清華幹部問題》，提出要徹底批判並肅清工作組、“三臨”形

“左”實右反動路線在幹部問題上的影響，團結大多數幹部起來革命。劉（冰）、何（東昌）、高（沂）、胡（健）、艾（知生）五位清華黨委副書記從2月3日開始每天晚上在胡健家或何東昌家碰頭，交流情況、研究形勢。經劉冰提議，決定聯名寫信給周總理、陳伯達、江青、康生，反映清華情況。“翻案信”由何東昌執筆起草，劉高胡艾集體修改，19日定稿，23日送出。劉冰在他的《風雨歲月》中回憶道：

信的內容主要有三點：第一，17年清華大學的工作雖然有缺點錯誤，但總的是執行了毛主席、黨中央的路線，成績是主要的；第二，蔣南翔同志雖然工作中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對清華是有貢獻的，因此，不能說蔣南翔是“黑幫”；第三，清華的幹部雖然缺乏社會實踐的鍛煉，但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因此，不能把清華的多數幹部看作不好的。[8]

2月22日，《紅旗》雜志第四期發表了經過周總理審閱并修改的社論《必須正確地對待幹部》，全面闡述了黨的幹部政策，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年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占統治地位的，大多數幹部和黨團員是執行這條路線的。十七年來，在各條戰線上所獲得的偉大成就，就是鐵的證明。要把幹部一概打倒的觀點，就是抹煞十七年來的基本事實，就是否認十七年來的偉大成就”。社論的發表給清華園帶來了一股春風，極大地鼓舞了清華的幹部，他們紛紛表示擁護社論精神，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

2月23日，團委副書記譚浩強貼出《二月十三日給中央文革的一封信》，信中說：“去年六月初，劉、鄧派的工作組一進校就把數百名校系幹部全部打成‘黑幫’，剝奪了他們的政治權利，限制了他們的自由。這種形‘左’實右的做法，包庇了真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嚴重地混淆了兩類矛盾。這種做法的惡果，至今還嚴重存在。‘黑幫’成了幹部的代名詞。”

同日，羅徵啓、陳聖信、李康和張慕津貼出《永遠跟着毛主席幹革命》的大字報，擁護《紅旗》社論，支持《揪要害》、《毛澤東思想小組》在幹部問題上的觀點。

2月24日下午，《迎春到》小組與劉冰座談，劉冰說：“清華黨委作爲一個集體、一個組織，是不是黑幫，根據我的回憶，把清華黨委說成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我覺得是不對的”。

2月25日，劉冰貼出《熱烈歡呼紅旗第四期社論發表，永遠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大字報，說清華黨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過去的工作中犯有嚴重的錯誤，但不同意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郭影秋代表新市委匆匆忙忙地爲清華黨委所做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結論。

2月26日，胡健在大字報中說：“整個說來，清華黨委是一個擁護并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黨組織，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占主導地位，是毛主席的黨”，“蔣南翔執行的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祇是犯了些錯誤”。何東昌、艾知生也貼大字報表示了自己的觀點。

當然，幹部當中也有不同的看法。2月24日，自控系黨總支書記凌瑞驥、黨委辦公室主任周家慤貼出《打倒私字，轉變立場，堅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的大字

報，他們認為以蔣南翔為首的黨委犯了修正主義的路線錯誤，不同意去年十二月蔣南翔、劉冰和其他黨委副書記的《談話紀要》。

大批幹部“亮相”，形成了不小的衝擊波。衝擊結果如何？正象《風雨歲月》中所說：

我們2月的信，沒有得到中央的回答，而被中央文革的某些人轉給了以蒯大富為代表的造反派。于是在劫難逃，被他們扣上“清華園的二月逆流”的帽子，在全校進行了批判。我和何東昌、胡健、艾知生四人被造反派實行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遭到殘酷的、無休止的揪鬥。[9]

清華幹部的抗爭逐漸吸引了學生們的注意，不少學生開始關注清華幹部問題的動向，思考清華幹部問題的出路，并逐漸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誰也沒有想到，關於清華幹部問題上的兩種不同的觀點直接導致清華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群衆組織。

### 導火之索

3月31日《紅旗》雜志發表評論員文章《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和調查員文章《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兩月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這兩篇文章根據對清華幹部情況的調查，得出結論：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幾個人，派出大量工作組，指使工作組，一方面打擊廣大革命

群衆，把革命群衆打成“反革命”，一方面打擊廣大幹部，把大批好的和比較好的幹部打成“黑幫”；清華工作組和“三臨”在幹部問題上執行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現在看來，這兩篇文章說劉鄧提出了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中央文革為打倒劉鄧而給他們妄加的罪名；而首次在《紅旗》雜志上將清華大學的主要領導人蔣、劉、胡、何、艾點名定性為“一小撮真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是錯誤的。但這兩篇文章批判了工作組和“三臨”對幹部不做階級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倒；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基層幹部中人人檢查、人人下樓；利用幹部整群衆；組織“黑幫勞改隊”；對幹部進行體罰等錯誤做法。這樣就從根本上徹底否定了清華的所謂“鬥黑幫”運動，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清華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這在當時來說已經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進步，因而也受到了我們和廣大幹部的歡迎。

然而，這兩篇文章却引起了團派的強烈反對。據說在《紅旗》雜志文章發表之前，主管《紅旗》雜志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林杰曾來清華找兵團總部負責幹部工作的頭頭徵求意見，此人承認文章中所舉例子都是事實，但對文章的提法有不同意見，要求對文章進行修改，遭到林杰拒絕。

4月12日，28團《井岡哨兵》、《金戈鐵馬》等骨幹戰鬥組貼出大字報《紅旗雜志調查員文章欺騙毛主席罪責難逃》（簡稱《罪責難逃》），隨後又貼出了《再評紅旗調查員文章》、《問紅旗調查員》、《紅旗調查員、評論員就是罪責難逃》等大字報，突然掀起一股有組織的討伐《紅旗》雜志的浪潮。《罪責難逃》的主要觀點有兩個，第一，紅旗

調查員沒有像《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那樣歌頌運動初期造反派揪幹部游街、鬥爭、勞改是“好得很”的群衆運動，因而是立場錯誤；第二，紅旗調查員的文章既沒有突出“保護一小撮”，也沒有算清“打擊一大片”，閉口不談清華幹部所犯的錯誤，因而是醜化造反派、為劉鄧翻案埋下伏筆。他們認為《紅旗》雜志評論員是借批判反動路線為名，行攻擊革命派之實，醜化了群衆運動，歪曲了歷史事實，為劉鄧翻案、為改良主義在清華園的實現、為資本主義在清華園的復辟製造了輿論。《罪責難逃》認為“清華大學是由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長期統治的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蔣南翔是教育戰線上貫徹修正主義路線的元凶，清華的幹部有特殊性。”

《罪責難逃》一經貼出，立即受到許多戰鬥組的批判，連兵團總部也不得不于下午六點發表聲明說《罪責難逃》是根本錯誤的。三縱隊的戰鬥組更是抓住不放，說《紅旗》雜志調查員和評論員文章是毛主席親自批准發表的，《罪責難逃》把矛頭指向《紅旗》雜志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據說林杰和關鋒對《罪責難逃》也大為不滿，直接打電話指責蒯大富。

《罪責難逃》是清華井岡山兵團分裂的導火索。

《紅旗》雜志調查員和評論員文章的發表，《罪責難逃》的出現，使幹部問題一下子成為清華文化大革命的焦點。

事實上，幹部問題不僅是清華文化大革命的焦點，也是當時全國文化大革命的焦點，因為這是事關政權的關鍵問題，因而也是周總理與中央文革鬥爭的焦點。

衆所周知，中央文革在上海策動的“一月革命”，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後，《人民日報》刊登了《紅旗》雜志的文

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號召“堅決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從那時開始，造反派奪取地方黨、政、財、文大權的全面奪權風暴席卷全國。

面對這一復雜的形勢，周總理煞費苦心採取了各種辦法進行鬥爭。最初，對於奪了權的造反派組織，周總理明確宣布他們不是權力機構，祇是業務監督機構；同時支持和鼓勵中央各部委和各地黨政負責幹部緊跟形勢，堅守崗位，忍辱負重，苦撐危局。

在造反派反復揪鬥老幹部，原有黨政機關陷入癱瘓不能正常工作時，周總理又採取果斷措施，對國家重要權力機關和要害部門實行軍管，依靠軍代表控制局面，既減輕了造反派對重要權力機關的幹擾，又保護了大批的老幹部。那一陣子，大字報、小傳單充斥着軍管的消息，到處都是軍管、軍管、軍管！

對於各省及地方的奪權鬥爭，中央規定實行革命群衆組織的負責人、當地駐軍負責人和革命領導幹部“三結合”的方針，也就是說新建立的政權要以“三結合”作為基本組織形式，其中特別強調解放幹部並讓幹部在三結合的權力機構中發揮骨幹和核心作用。“三結合”最初出自何處，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分析，把“三結合”提升為新政權建設的基本方針應當歸功于周總理。因為一方面，這符合周總理的一貫思想，另一方面，周總理是中央兩個“碰頭會”的主持人，掌握着新政權建設的具體操作權，在處理各地問題的過程中積極貫徹了“三結合”的方針。

總之，周總理始終不願把各級權力交給造反派。“三結合”的方針成了防止造反派全面奪權的重要保證。

在北京高校，雖然造反派奪了權，建立了紅衛兵政權，

但周總理從來沒有把他們看成是權力機構，祇說他們是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機構，而派軍隊代表到學校約束那些狂熱的青年學生是他的一貫主張。起初中央規定大中專學校實行革命學生代表、革命教職員工代表和革命幹部代表的三結合，在實施過程中，周總理極力提倡群衆組織代表、革命幹部代表和軍隊代表的三結合。

對於清華，周總理說過：“祇要清華成立三結合的革委會，就派軍代表來。”[10]

可是，蒯大富認為清華已經實現左派掌權，他不願與軍代表和學校幹部分享他的權力，而由他們這些左派學生單獨掌權。他們之所以強烈反對《紅旗》雜志調查員和評論員文章，就是反對幹部參加三結合，就是為了維護他們的紅衛兵政權。

在這以前，幹部問題並不是三縱隊特別重視的問題，起碼對於我來講，並沒有認識到幹部問題的重要性。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反對蒯大富紅衛兵政權問題上。現在，回過頭去再看《紅旗》雜志第三期、第四期社論，我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我們認為現在形勢發生了重要的轉折：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2、3、4月看出眉目來（後來毛主席因為所謂“二月逆流”問題改變了主意），文化革命現在已經處於收尾階段，建立三結合的權力機構是當前的主要任務；學生領袖的表現讓中央十分失望，清華和北京高校的實踐已經充分表明，學生領袖不僅不能單獨掌權，而且無法委以重任，祇能成為歷史舞臺上曇花一現的人物；解決幹部問題具有特殊的急迫性，解放幹部，讓幹部在三結合的權力機構中發揮骨幹和核心作用，才能穩定大局，實現“祖國山河一片紅”，這就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我們

認為，過去我們反對蒯大富的紅衛兵政權，却没有提出什麼好的解決辦法；現在我們突然認識到，清華問題的最終出路是建立以軍代表為首的三結合的革委會，這是取代蒯大富紅衛兵政權的最佳途徑。

我們注意到，當時有小報登出毛主席的講話，大意是：大學生現在還沒有能力單獨地管理國家，單獨地管理城市，連學校也不能單獨管理。

後來張春橋和毛主席批判 414 思潮的實質是“造反派祇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可以這樣說，我們的所謂“造反派祇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思想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

## 第三章 勢 不 兩 立

### 揭竿而起

4月10日，清華井岡山在主樓前廣場召開大會批鬥王光美，并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蔣南翔等一大批被打倒了的中央領導幹部拉到清華陪鬥。從1月6日蒯大富擅自揪鬥王光美遭到總理嚴厲批評，到4月10日毛主席批準清華井岡山公開鬥爭王光美，這一重大變化充分表明毛主席對劉少奇的看法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他明白無誤地向全國發出了徹底打倒劉少奇的信號。對於蒯大富來說，在打倒劉少奇的鬥爭中，他充當了急先鋒，深得毛主席的信任與贊許，攫取了巨大的政治資本。就在蒯大富春风得意、躊躇滿志，夢想成為全國造反派領袖的時候，我們却在密鑼緊鼓、秘密策劃拉起隊伍豎起大旗與蒯大富公開對抗。

4月11日，在多次醞釀的基礎上，我、陳楚三、宿長忠、劉萬章、張雪梅、郭仁寬、王蓮芝等二十多人在頤和園秘密聚會，策劃成立新的串聯會，繼續與蒯大富和28團進行鬥爭。會上大家對目前的新形勢進行了討論，一致認為：前一階段，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批判群衆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廣大群衆平反；而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被打成黑幫的廣大幹部平反，解放幹部，建立三結合的權力機構則是文化大革命現階段的主要任務。過去，蒯大富和28團在批判群衆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立了功；現在，他們成了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絆腳石，井岡

山兵團總部已經演變成壓制群衆、壓制幹部革命的蒯氏獨裁政權，已經不能領導清華文化大革命，應該建立三結合的權力機構取代蒯大富的紅衛兵政權。《紅旗》雜志評論員文章的發表給了我們一個絕好的機會。我們要抓住這次機會，成立新的串聯會，高舉徹底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旗，為在清華實現革命的三結合而鬥爭。

大家認為：毛主席摒棄了“北京人民公社”和“上海人民公社”，縱隊派過去崇尚的“巴黎公社原則”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三結合”原則。因此，我們要把“徹底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現革命三結合”作為新的串聯會的政治綱領。

大家還分析了“二月整風”期間縱隊派的經驗教訓，認為缺乏統一的組織和堅強的領導是縱隊派失敗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們決定：徹底打破縱隊的界限，成立一個單一的串聯會，建立相應的領導機構，統一領導參加串聯會的戰鬥組。

頤和園秘密聚會的參加者都是八八縱隊、東方紅縱隊和毛主席警衛團的核心人物，二月整風時，我們相互之間早已建立了信任和默契，因此在所有問題上都順利取得了一致意見。這次，大家還特別表示：牢記三縱隊解散的慘痛教訓，抱成一團，棒打不散，堅持不懈地進行長期鬥爭。

我們沒有通知毛澤東思想縱隊和天安門縱隊派人參加頤和園秘密聚會，主要是擔心人太多，怕無法統一思想。回校後我們立即與孫怒濤、汲鵬、周泉纓和尹尊聲等人聯絡，通報我們的討論結果，倡議聯合起來成立新的串聯會。

我們的倡議得到了毛澤東思想縱隊和天安門縱隊的積極響應。清華園關於《罪責難逃》所進行的辯論為我們做

了最好的輿論準備。13日晚上，我們邀請縱隊派 20 多個戰鬥組在二院召開形勢討論會，會上一致同意發起成立《徹底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現革命三結合串聯會》，因為串聯會將在 4 月 14 日成立，所以簡稱“414 串聯會”。會議通過了《串聯會 001 號公告》，《公告》說：

《叛逆者一分隊》《井岡山哨兵》等組所拋出的大毒草《罪責難逃》等大字報并聯系三個月來左派內部兩條路線鬥爭，說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流毒甚廣，在左派內部有一股形“左”實右的危險思潮。總部、二辦及 28 團的某些人正是這股形“左”實右思潮的代表，《罪責難逃》等大毒草的出籠正是這股反動思潮的總爆發。如果不徹底批判這股反動思潮，按照總部、二辦及 28 團的某些人這樣做下去，我校文化大革命就有半途而廢的危險。為此，我們發起組織《徹底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行革命“三結合”串聯會》，深入群衆，發動群衆，緊緊依靠群衆，不怕任何謾罵、詆毀，不怕戴“分裂”、“奪權”的帽子，徹底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肅清形“左”實右的反動路線在左派內部的流毒，緊緊把握運動大方向，為實現真正的革命“三結合”、勝利進行鬥、批、改而奮鬥。

“414 串聯會”一開始就有明確的政治綱領，那就是：徹底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解放幹部，實行革命“三結合”

串聯會的發起單位共有 23 個戰鬥組，他們是：千鈞棒、戰地黃花、從來急、翻騰、第一湘江、輪機兵、不怕鬼、

八八探照燈、人民萬歲、第一紅五星、1356、爭朝夕、鷹擊長空、暴風驟雨、曙光初照、八八春雷、開新宇、第一靠舵手、第一換新天、第一高舉紅旗、二萬五千裏、雲水怒、刺刀見紅。

4月14日下午3時，我們在西主樓3區208室召開414串聯會成立大會，與會者700多人，代表了250多個戰鬥組。陳楚三主持大會，劉萬章、譚浩強、傅正泰、魏洪波、唐偉、孫怒濤等人輪流發言。會上氣氛熱烈，群情激昂，順利通過了《414串聯會第一次大會決議》，宣告414串聯會正式成立。

### 一條主綫

《414串聯會第一次大會決議》說：

廣大的兵團戰士、革命群衆、革命幹部，經過幾個月的鬥爭實踐，終於認識到，在兵團內部、包括兵團總部內長期存在的兩派鬥爭根本不是什麼“宗派鬥爭”，而是兩條路綫、兩種思潮、兩種世界觀的鬥爭。

《決議》指出：

這股思潮受形“左”實右反動思潮的影響，對“左”的口號很有興趣，常常以極“左”的面目去幹擾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它常常打着反右傾機會主義思潮的旗號來推行其形“左”實右路綫。這個思潮祇能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壞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破壞革命的三結合，破

壞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結果使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廢或走過場。

《決議》中有一條貫串始終的主線——反對形“左”實右思潮。（後來我們知道那是極“左”思潮，而不是什麼形“左”實右思潮。）反對形“左”實右思潮的口號最初是我和陳楚三提出來的。在策劃成立 414 串聯會之前，陳楚三拿來一份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潘復生在哈爾濱市紅衛兵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及相關文件，文件指出：在這次會議上，經過激烈辯論，一致認為形“左”實右是紅色造反團的主要危險。得到這些文件，我和陳楚三如獲至寶，結合清華的情況反復學習反復討論，猶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從《數力系紅色聯隊》成立以後，我幾乎就和陳楚三形影不離，經常在一起研究討論一些問題，比如，為什麼我們雖然知道蒯大富“左”的口號和做法不對，却又駁斥不力或不能擊中要害？為什麼三個月來總是蒯大富主動打壓我們，我們祇能被動應戰？為什麼清華會存在兩派鬥爭？怎樣從理論高度去認識和理解清華兩派鬥爭，從而更加自覺地進行這場鬥爭并在鬥爭中掌握主動權？現在，哈爾濱市紅衛兵政治工作會議關於形“左”實右的提法為我們正確理解清華大學兩派鬥爭的實質提供了理論根據。

我們認為：蒯大富在清華的種種做法都是形“左”實右的表現；形“左”實右的特點是打着“徹底革命”的口號，以極“左”的面目出現，用極“左”的詞句，掩蓋右傾的實質，因而頗能迷惑善良的人們；形“左”實右的根源是一些掌權了的造反派頭腦中的“私”字以及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世界觀作怪，唯我獨“左”，唯我獨“革”；文化

大革命現階段的主要危險是形“左”實右思潮，而不是所謂改良主義思潮。

我們還認為：現在必須旗幟鮮明地提出反對形“左”實右的口號，祇有這樣，才能使我們與蒯大富的鬥爭上升到自覺的階段、理性的階段。

在 414 串聯會成立的那一天，陳楚三的《戰地黃花》、我們的《千鈞棒》、張雪梅的《八八探照燈》聯名貼出《搞臭形“左”實右》的大字報，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我們的觀點。《搞臭形“左”實右》是我們的得意之作，我們在串聯會的發起和成立大會上反復闡述反對形“左”實右思潮的觀點。我們的這些觀點得到大家的贊同並成為 414 串聯會《公告》和《決議》的靈魂。

解放幹部和批判形“左”實右思潮，這是 414 串聯會高舉的兩面大旗。

## 主持大局

4月14日晚，我們開會確定領導班子（當時叫“革命委員會”，後來改為“勤務站”），協商推選了20多名領導班子成員，他們是孫怒濤、汲鵬、宿長忠、張雪梅、沈如槐、陳楚三、王永縣、王蓮芝、尹尊聲、劉萬章、黃瑞和、李良壽、任敦渭、郭仁寬、周泉纓、蔣南峰、傅正泰、李秀英、譚浩強。這些人基本上是 414 發起單位的負責人，也是各縱隊和整風串聯會的代表人物，其中傅正泰和李秀英是教師代表，譚浩強是幹部代表。

會上同時確定沈如槐、孫怒濤、陳楚三、宿長忠、劉萬章、汲鵬等人作為核心組成員，主持串聯會的常務工作。5

月底成立 414 總部的時候，核心組好象又增加了陳家國、張雪梅和蔣南峰，核心組成員大都是五大縱隊的頭頭，只有蔣南峰屬於“無黨派人士”。

在隨後召開的核心組會議上，大家一致推舉我為核心組組長，孫怒濤為核心組副組長。

推舉我為 414 的一把手主要出于這樣一些考慮，一是低班學生，二是堅定分子。孫怒濤、陳楚三、宿長忠、劉萬章幾位都是五、六年級的學生，即將畢業，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離開學校，而我是二年級學生，離畢業還早，推選低年級學生為 414 的一把手，可以保證 414 串聯會領導的連續性；而最主要的因素則是在前一階段與蒯大富的鬥爭中，我的態度堅決，旗幟鮮明，并在策劃成立 414 的過程中起了主要作用。另外，我出身貧農，學生幹部，在運動中既不是有名的造反派，也不是死硬的保守派，雖然沒有什麼政治資本，却也沒有什麼政治把柄。28 團很難從我身上打開缺口，借以攻擊 414。

事實上，按照我個人的看法，當時五大縱隊的負責人誰都可以當 414 核心組組長，其中宿長忠和孫怒濤應該是最有競爭力的人選。

就各縱隊的實力而言，八八縱隊位居前列，可謂人多勢衆，作為八八縱隊的代表人物，宿長忠做 414 的一把手是理所當然的。略顯遺憾的是，在前一段時間裏，宿長忠專注于八八縱隊的策劃和組織工作，極少參加縱隊派之間的聯絡和協調工作，他的才能還沒有在縱隊派面前充分展示出來。

就知名度和群衆威信而言，現任兵團總部委員孫怒濤做 414 的一把手也是衆望所歸。但是，在前一階段的鬥爭中縱

隊派已經有了溫和派與強硬派之分（後來演變成三七戰團與東方紅戰團），天安門縱隊是溫和派，孫怒濤是代表人物，其他的四個縱隊都是強硬派，我是代表人物之一。在 414 的發起人、414 的核心組中，強硬派占大多數，他們不希望溫和派做一把手，主要是擔心溫和派在關鍵時刻有可能把隊伍引向妥協之路，重蹈縱隊派解散之覆轍。

事前，我們就誰擔任一把手的問題曾經有過簡單的醞釀，陳楚三、宿長忠、劉萬章、周泉纓、尹尊聲等人都不希望讓孫怒濤做一把手，全力擁護我擔任核心組長。

其實我心裏很明白，《千鈞棒》雖然名揚清華，我却是一個無名小輩，我來主持大局，恐怕難以服衆，一定會遇到各種挑戰。但是，我心裏更明白，作為與大紫大紅的蒯大富相抗衡的反對派的一把手，沒有絲毫的權力和榮譽，祇有無限的責任和風險。當這樣的一把手，需要勇氣，需要魄力，需要一種“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精神。既然我們走上了反對派的道路，既然朋友們信任我、支持我，我怎麼能畏首畏尾、把責任推給別人？因此我就毫不猶豫、當仁不讓地挑起了這份重擔。

好在我們學過毛主席的著作，多少知道點兒一把手應當怎樣“出主意、用幹部”，團結核心組的“一班人”開展工作。我們的核心組分工明確，各負其責，大家配合得很好。雖然難免有些風風雨雨，却總是有驚無險。

一個堅強、穩定、團結的領導集體是 414 能夠堅持與蒯大富長期周旋的重要因素。

我做 414 的核心組組長，一直把蒯大富當作一面鏡子，充分吸取了他的教訓，其中最重要的有兩條。第一，實行集體領導，決不獨斷專行。在 414，凡屬重大問題，我們從

來都是集體討論，集體決策，集體負責。在我的這本書裏，大量采用“我們”的稱謂，就是指 414 核心組這個集體。第二，搞“五湖四海”，決不任人唯親。一個鮮明的對照是，蒯大富的幾個同班同學都成了兵團總部要員，而我們《千鈞棒》小組的戰友們雖然自始至終和我并肩戰鬥、衝鋒陷陣，在清華文革舞臺上也算得上是叱咤風雲、名聲顯赫了，但卻沒有一個人擔任過 414 的一官半職。

不記得出于何種考慮，414 核心組成員和組長、副組長名單一直都没有公諸于衆。事實上，由於孫怒濤在群衆中具有很高的威望，絕大多數人，無論是 414 還是團派，都以為他是 414 的一把手。團派的頭面人物和宣傳機器一直把孫怒濤作為重點打擊對象。團派在大字報中寫道：“銀基忽發領袖狂，前如槐、後萬章，瘦驢挺戈離井岡……”。這裏的“銀基”指的是孫怒濤，他的原名叫孫銀基。直到謝富治主持兩派談判簽署“四項協議”時，團派才知道實情。5 月 23 日，團派《清華動態》第 35 期發表短訊：“414 總勤務站組長是沈如槐，而不是孫怒濤。”

### 爭奪喉舌

整風期間我們最反感的事情之一就是 28 團壟斷廣播臺，大搞一言堂，反對派的觀點得不到任何發表的機會。因此，我們一直要求總部改組廣播臺，也一直在尋找借口發難。這次策劃成立 414 串聯會的時候，我們就下決心在廣播臺的問題上採取行動。因為我們覺得廣播臺實在太重要了，廣播一篇文章的影響，要比辯論會上的發言、比大字報的作用大得多。

4月14日上午，我拿着召開414串聯會的《公告》和《海報》去找鮑長康，要求廣播臺給予廣播。我們明知他們會拒絕，還是去進行了交涉，無非是為今後採取行動製造一個現實的借口罷了。果然，鮑長康想都沒有想就一口拒絕了。他對我採取了不屑一顧的態度，揮揮手把我打發走了。

晚上，我主持414核心組會議研究的第一個議題就是如何對廣播臺採取行動。會議決定：4月15日暫時接管廣播臺，目的是迫使總部同意改組廣播臺，接管行動由宿長忠總負責。會上還討論決定了接管行動的具體問題，如進入明齋（清華的一座樓名）廣播臺的一線人員50人，占領廣播臺所有崗位，將原廣播臺工作人員請出明齋，在明齋附近待命的二線人員150人，準備阻止總部派人重新進入明齋，連夜起草《四一四革命串聯會就暫時接管井岡山廣播臺告全校革命同志書》，將我們行動的理由和主張昭示全校，配備機務、編輯、播音等專業人員，《千鈞棒》的主要人員參加一線行動並負責廣播《告全校革命同志書》，絕對禁止武鬥，如遇挨打，不準還手，祇準高呼“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口號。

4月15日中午12點整，廣播臺裏傳出了《千鈞棒》成員馮克莊的聲音，他在廣播《四一四革命串聯會就暫時接管井岡山廣播臺告全校革命同志書》，這說明接管行動相當順利。

過了一段時間，老蒯組織起大批人馬，包圍明齋，進行反擊。由於正是午飯時間，414二線人員150人未能及時到齊，無法封堵明齋正門，團派人多勢衆，涌入樓道，砸破門窗，衝進室內。這樣就形成了房間爭奪戰，局面一度僵

持，好象有一個多小時。最終，廣播臺再度易手。

後來，老蒯用大喇叭傳達中央文革指示，大意是停止武鬥，愛護公物，通過協商解決不同意見。聽到中央文革的指示後我心裏發毛，感覺到好象中央文革在批評 414 挑起武鬥，心想：不好，414 剛剛成立就沒有給中央文革留下好印象。此時在明齋樓前雙方都聚集了幾百人，414 核心組的大多數成員都在現場。我們簡單地研究後決定不再組織群衆反衝鋒，并通知裏面的 414 戰士放棄抵抗，撤出廣播臺。我們同時決定讓 414 群衆在明齋前靜坐，要求總部派人與 414 談判改組廣播臺。老蒯當然置之不理。隨後我們就地舉行 414 第二次串聯會，並通過決議，表示擁護和執行中央文革的指示，派代表去中央文革匯報情況，重申改組廣播臺的要求。

在撤退的過程中，不少 414 戰士被打得頭破血流並從窗戶扔出來。“哀兵”的形象喚起許多師生員工對我們的同情和支持，很多群衆現場參加 414，和我們一起靜坐，414 的隊伍一下子發展到近二千人。這真是一個意外的收穫。我真正體會到群衆的力量、群衆的支持，深受鼓舞。為了不失時機地鼓舞士氣，我們又決定帶領這近二千人的隊伍圍繞西大操场游行兩圈後，一直游行到主樓廣場繼續開會。

我們在主樓廣場舉行了 414 串聯會第三次大會，很多發言肯定 4.15 行動是革命行動。孫怒濤說：4.15 行動是一個失敗的行動，但卻是一個革命的行動。不少群衆寫紙條給我們出主意、提建議。我們核心組的同志也在研究對策，考慮如何領導和組織迅速壯大的隊伍。經過一番緊張的工作，我們起草了 414 串聯會第三次大會決議。決議的內容是：第一，宣布 4.15 行動是革命行動，取得了政治上的徹

底勝利；第二，決定在各系各單位成立 414 串聯會的分會；第三，要求徹底改組廣播臺、徹底改組《井岡山》報編輯部、徹底改組《井岡山》雜志編輯部、徹底改組總部；第四，重申 414 的政治口號：徹底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行革命“三結合”。

我個人認為，這個決議對 414 來說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在政治上，它再次重申 414 的政治綱領；在組織上，決定成立基層分會，實際上就是建立 414 獨立的組織體系。沒有相應的組織保證，所謂政治綱領祇能是空喊口號，這就是八八串聯會和整風串聯會留給我們的歷史教訓。昨天，我們僅僅豎起了一面政治大旗，還沒有考慮到建立基層組織問題，今天，在群衆的提議下我們果斷地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可以說，414 從此就不再是一個簡單的串聯會，而是一個獨立的群衆組織了，盡管她還打着井岡山兵團的旗子。

實事求是地說，4.15 行動是一個考慮不周的滬莽行動，是曾經給我們造成一度被動的失敗行動，但是由於我們因勢利導，反而取得了意外的成功，真正起到了“宣傳群衆、動員群衆、組織群衆”的作用。我們戲稱之為軍事上的失敗，政治上的勝利。

與此同時，在大禮堂召開的團派幹部大會上，蒯大富說：越來越證明，八八越來越向它的反面發展，到今天，具有反動作用；三縱隊、414 代表保守勢力，414 是非法組織，是反革命復辟逆流的一部分；要抓出 414 背後的堅持不改而又屢教不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他還堅持認為清華幹部是保守勢力，當前的主要危險是改良主義。會上宣讀總部六點決議，宣布 414 是非法組織，是反革命復辟逆流。最後，蒯大富還帶領團派“宣誓”，企圖用高壓政策摧

毀 414。

## 依靠群衆

面對清華復雜的政治局勢，414 的領導層怎樣做出判斷，做出決策？我們一開始就注意吸取兵團總部脫離群衆運動群衆的教訓，決心走一條“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新路。4月 15 日晚，我們主要領導聚集在二院 223 室，那裏原來也是縱隊派聯絡的地方，大家有事經常到那裏碰頭。今天這裏擠滿了 414 群衆，他們把我們圍成一圈一圈的，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提建議，可以說是個個熱情高漲，人人獻計獻策。有人為我們鼓勁，說要堅持真理，不要怕打成非法組織；有人批評我們不該採取滄莽行動，應該注意鬥爭策略；有人提醒我們要注意對中央文革的態度，防止中央文革偏袒一方；有人告誡我們要堅持好鬥爭大方向，別讓團派抓住把柄；有人建議我們高舉解放幹部的旗幟，保護革命幹部……群衆的建議涉及政治綱領，組織建設，政策策略等各個方面。我們從群衆中吸收到巨大的力量，受到鼓舞，得到啓發。在綜合群衆意見的基礎上，核心組于 4 月 16 日連續發表了四份聲明。

第一號《關於所謂中央文革三次指示的嚴正聲明》向師生員工澄清“所謂中央文革三次指示，經我們核實實際上是中央文革辦公室聽取總部某些人單方面匯報後，普通工作人員的三次電話意見，并不是中央文革指示”，借機表示“我串聯會的革命同志絕對服從中央文革的領導”。在 414 剛剛成立的時候，表示這樣一個政治態度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號《嚴正聲明》指出蒯大富 4.15 講話是一篇挑動

群衆鬥群衆，挑動群衆鬥幹部的宣言書，他把 414 串聯會打成非法組織，打成反革命復辟逆流，嚴重對抗中央文革歷次指示，是根本錯誤的，并表示最強烈的抗議。

第三號《關於保護革命幹部的嚴正聲明》說：

目前，在兩條路線鬥爭尖銳化的時候，革命幹部紛紛自動表態，這是極好的事情。但是，總部和 28 團利用 4.15 事件，壓迫革命幹部表態，并壓制打擊敢于支持 414 的革命幹部，這是極端錯誤的。這將給革命幹部以極大打擊，破壞革命三結合，將給我校文化大革命帶來重大損失。

我串聯會全體革命同志對上述嚴重錯誤行為，必須予以堅決反對，堅決抵制。我串聯會全體革命小將必須對革命幹部予以堅決支持，堅決保護，這是革命事業的最高利益。在關鍵時刻不保護革命幹部是左傾機會主義的表現！我們希望革命幹部在大風大浪裏要不怕壓制、不怕打擊、敢于堅持真理，堅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必勝，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最勇敢地戰鬥！

毫無疑問，在“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甚囂塵上的年代，發表一份保護幹部的聲明是需要相當的政治遠見和政治膽略的。

第四號《聲明》說：414 革命串聯會的成立標志着清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兩條路線鬥爭進入了新階段；要求“串聯會一切革命同志都必須結合當前國際、國內、北京市以及校內階級鬥爭的形勢，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努力學習最近《人民日報》及《紅旗》雜志的社論文件，深刻

領會毛主席、黨中央的精神，提出我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任務，提出當前鬥爭的方針、策略，<sup>為實現毛主席交給我們偉大而艱巨的任務而努力奮鬥”；聲明還說：414串聯會是“井岡山兵團內部合法的群衆組織，它應享有井岡山兵團中的一切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各種物質待遇，不容受到任何歧視。任何人都無權宣布我串聯會為非法組織，一切與此有關的聲明、命令都是無效的”；414串聯會“廣大革命小將對參加我串聯會的革命教職工、革命幹部以最堅決的支持、堅決保護，堅決反對一切打擊、壓制他們的行爲”；聲明表示：414串聯會的“一切行動都是光明磊落的”，蒯大富要“揪出414的後臺”的做法注定要失敗；並重申：“井岡山兵團414革命串聯會對兵團總部的正確領導將無條件地接受，對其錯誤領導，將堅決抵制、反對”。</sup>

聲明發表以後414群衆反映很好，認為基本上說出了群衆想要說的話，對穩定414的隊伍起了很大作用。

從此二院223室成了414的群衆接待站，每天都有好幾個414頭頭輪流值班，聽取群衆意見、批評、建議，向群衆解釋414所採取的方針政策的理由等等，而大批414的熱心群衆則每天晚上都到二院223室積極“參政議政”。二院223室成為414領導與414群衆聯系的固定渠道。如遇重大問題，414則召開戰鬥組組長會議，首先進行辯論，而後做出決策。可以說414所做出的重大決策都是在充分聽取群衆意見的基礎上形成的，很少是由幾個人頭腦發熱拍板決定的。414真正貫徹了“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方針，這是414在高壓下不散不垮，反而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 兩張表格

團派動態組對 414 的隊伍狀況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並發表了幾份統計報告。統計報告顯示，四月底五月初的時候，414 的隊伍已經發展到 4500 人左右。這個統計數字與 414 簽建廣播臺時的捐款人數相符合。我把這兩張表格抄在下面。

統計表一

單位	全體人員		其中學生幹部黨員		
	總人數	414 人數	總數	414	28 團
土建系	1034	413	320	230	90
工物系	743	328	125	69	21
水利系	535	298			
電機系	897	479	105	77	28
自控系	919	500	238	147	45
工化系	616	237	196	82	52
無線電	1065	542	253	149	103
機械系	596	320	125	84	41
動農系	833	473	269	191	78
數力系	1015	423		103	
代表隊	170	52			
合 計	8423	4065			
百分比			100	62.6	27.4

統計表一（續）

單位	八九分子			反蔣分子			反工作組分子		
	總數	414	團派	總數	414	團派	總數	414	團派
土建系	278	223	55	153	43	92	267	76	191
工物系	285	163	22	105	28	54	69	14	48
水利系	188	139	49	37	13	24	82	23	59
電機系	367	255	112	98	23	75	196	50	146
自控系	399	266	51	128	41	64	206	63	127
工化系	273	132	48	110	22	58	104	18	79
無線電	336	242	94	140	58	82	116	42	124
機械系	176	124	52	126	54	72	148	71	77
動農系	349	271	51	107	38	67	298	128	160
數力系		209							
合 計	2651	1815	534						
百分比		68	20		32	60.3		29.3	65.6

摘自《內部參考》第 20 期 井岡山兵團第一動態組編  
1967 年 4 月 26 日 [11]

統計表二

單位	全體教職員工				其中黨員			
	總數	團派	中間	414	總數	團派	中間	414
動農系	222	74	31	117	87	18	15	54
土建系	319	125	96	98	111	32	13	66
無線電	353	133	160	60	131	37	62	32
自控系	249	111	61	76	81	21	10	50
數力系	194	71	53	70	106	31	26	49
水利系	222	114	55	53	89	25	30	34
工化系	232	80	72	80	84	22	19	43
冶金系	188	68	81	39	68	26	23	19
機械系	362	147	136	79	95	37	29	29
電機系	259	115	23	121	77	26	2	49
工物系	192	106	19	67	85	38	7	40
基礎課	475	180	156	139	99	23	13	63
合 計	3267	1324	944	999	1113	336	249	528
百分比	100	40.5	29	30.5	100	30.2	22.4	47.4

統計表二（續）

單位	教授				工人實驗員			
	總數	團派	中間	414	總數	團派	中間	414
動農系	9	7	1	1	58	29	10	19
土建系	41	16	14	11	92	52	27	13
無線電	11	4	5	2	113	55	45	15
自控系	5	2	2	1	114	65	41	8
數力系	9	5	3	1	44	27	3	14
水利系	10	1	7	2	75	45	12	18
工化系	2	0	2	0	55	28	14	13
冶金系	9	5	4		69	35	25	9
機械系	8	5	3		153	66	52	35
電機系	22	8	14		93	48	5	40
工物系	5	3	2		63	44	8	11
基礎課	20	7	9	4	65	45	10	10
合計	151	63	66	22	994	537	252	205
百分比	100	41.7	43.7	14.6	100	54	25.3	20.7

摘自《內部參考》第 22 期 井岡山兵團第一動態組編  
67 年 5 月 9 日（5 月 5 日調查）[12]

注：表中的“合計”是作者將表中的數據進行累加後加進去的。

表中的“百分比”是作者根據同一期《內部參考》上刊登的“反蔣成員分化表”、“反工作組成員分化表”、“學

生幹部黨員分化表”等表格中的數字加上去的。

414 的成立是清華師生員工隊伍在文革中的又一次分化改組。這是繼校黨委問題、工作組問題之後的第三次分化改組。這次分化改組最終導致清華形成了長期對立、爭鬥不休的兩派群衆組織。

這兩份珍貴的統計表格，為我們研究清華文革時期兩派群衆組織人員構成情況提供了具體數字和相應的定量分析。我不知道表中所列出的各單位總人數、教職員工總人數等數字是否準確，但我認為這並不會對定量分析產生重大影響。

統計表格列出了各單位的學生、教職員工以及其中黨員、八九分子、反蔣分子和反工作組分子在 414 成立以後的分化情況。我們看到：60%以上的學生黨員幹部參加了 414, 30%以下參加了團派, 50%的教職員工黨員參加了 414, 30%參加了團派, 70%的八九分子參加了 414, 20%參加了團派, 30%的反蔣分子和反工作組分子參加了 414, 60%參加了團派。

統計表格列出的分類其實隱含了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現兩大要素，其中政治表現又分文革前的政治表現和文革中的政治表現。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是：大多數家庭出身好，文革前先進，文革中保守的師生員工參加了 414。

對於這樣一個事實，兩派有截然不同的解釋。

團派說 414 是一個保守組織。按照“蒯氏階級路線”的標準，這是不容置疑的，因為“蒯氏階級路線”的實質是以造反與保守來劃分階級的。黨員幹部保黨委、八九分子保工作組，這些人是保守階級，他們所參加的組織當然是保守組織。

我們對團派的指責不以為然，我們說，判定一個群衆組織性質的主要標準是這個組織的政治綱領和政治實踐，而不僅僅是這個組織的人員構成。我們 414 的政治綱領和政治實踐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所以 414 是一個革命群衆組織。414 中黨員幹部多、工農子弟多，這是值得我們引以自豪的，這說明 414 是一個純潔的革命群衆組織，同時也說明 414 的政治綱領代表了廣大黨員幹部和工農群衆的根本利益，是正確的。

此時此刻，我們急于爭得一個與團派一樣的“革命群衆組織”的合法地位，並沒有否定團派是革命群衆組織，但我們沒有忘記用傳統的階級分析方法去“分析”團派，我們說，團派混進了太多的流氓痞子和地、富、反、壞、右分子，兵團總部執行了形“左”實右的路線，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

很多人在探求清華兩大派群衆組織的原因，這兩張統計表格告訴人們：一個人的家庭出身和政治地位是決定其政治立場的重要條件，但却不是充要條件（充分而又必要的條件）。正像人們在探求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一樣，我們還要從社會、政治、思想等各方面深入研究清華兩大派群衆組織形成的客觀規律。

我們身邊的一些事例也許是令人深思的：我們班同學包括團幹部和班幹部都已一分為二，而我們年級的另一個班，他們班所有同學，不管是團幹部，還是班幹部，還有高幹子弟全部參加了團派。我們專業教研組的教職工們幾乎全部參加了 414，而這個教研組的一位副主任却是一位鐵杆的團派分子。

## 平反黑幫

414 成立以後，兩派關於《罪責難逃》的論戰愈加激烈。爭論的焦點仍然是對去年六月九日——六月二十三日清華運動的評價。團派的同志堅持認為“游街一大串、鬥爭會一大片、勞改一大隊”是革命的群衆運動，是“對修正主義體系的一次總衝擊”，否定這些，就是否定造反派。他們觀點似乎很有根據，一是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二是林彪的“群衆運動是天然合理的”。我們 414 核心組認為這場辯論是 414 成立後的第一個政治戰役，決定發動 414 群衆廣泛調查研究，結合學習《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積極參與辯論，打贏這場政治戰役。

4 月 21 日，414 召開了第六次串聯會大會，許多戰鬥組從事實和理論兩方面詳細說明去年六月九日——六月二十三日清華鬥黑幫，并不是什麼群衆運動，而是不分青紅皂白、打倒一切幹部的錯誤行動，是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表現。

會前，414 勤務站成員黃瑞和以《不怕鬼》戰鬥組的名義貼出了一份《六月九日——六月二十三日的所謂鬥黑幫必須基本否定》的大字報，打響了第一炮。我看了黃瑞和的文章後覺得論述深度不够，請他重寫，要他說清楚這樣一個觀點：團派將舊社會農民揪鬥土豪劣紳與文革中學生揪鬥幹部相提並論，實際上混淆了新舊社會的界限和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黃瑞和重寫之後，我又對他的文章進行了修改，并重新起了個題目叫《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因為團派的大字報反復引用林彪“群衆運動是天然合理的”的語錄，為群衆揪鬥幹部的

行爲辯護。我並不贊同林彪的這種提法，覺得這種提法不符合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但我們又不敢直接反駁林彪，他可是副統帥啊。我記起林彪有一個題詞是：“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用這個“題詞”去反駁那個“提法”真是再恰當不過了。會上，我以《不怕鬼》《千鈞棒》《戰地黃花》《八八風雷》的名義宣讀了這篇文章。

後來以 414《千鈞棒》為首的一批戰鬥組就“辯論 6.9 ——6.23 的運動”問題向團派的《金戈鐵馬》等戰鬥組提出公開挑戰，但團派却不來應戰。看來 414 的觀點贏得了大多數中間群衆的人心，我們覺得打贏了這一仗，取得了主動權。

《紅旗》雜志的文章說：工作組進校以後，對待幹部的做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六月九日工作組進校到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組對所有幹部，全部“撤職罷官”，統統靠邊站，并趕“上樓”。然後大搞人人過關檢查。實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紅旗》雜志把“游街一大串、鬥爭會一大片、勞改一大隊”說成是工作組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團派則說這是革命小將的革命行爲。王力在得知清華兩派的爭論後說“蒯大富為什麼硬要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往自己身上拉？”天安門縱隊有一位同學當時在王力辦公室工作，他把王力的話傳到清華，我們聽了很高興。

4月22日，善于提出新觀點的黃瑞和又寫了一份《革命小將要勇于為革命幹部平黑》的文章。文章認為：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中心問題在於為被打成黑幫的革命幹部徹底“平黑”，解放黑幫，這就意味着必須

恢復革命幹部的本來面目，打破幹部和群衆的尖銳對立，建立幹部和群衆的親密關係。黃瑞和徵求我對“平黑”提法的意見，他解釋說，工作組把反對它的學生成為“反革命”，現在已經“平反”；工作組把所有幹部都打成“黑幫”，現在需要大膽“平黑”。我非常贊同他的觀點，我對他開玩笑說，你的“平黑”二字很妙，實在是妙，你的“平黑論”實在是妙論。他請我對他的文章進行了一些修改，隨後便抄成大字報，以《不怕鬼》和《千鈞棒》的名義發表了。

我說“平黑”是妙論，團派却說“平黑”是謬論。大字報一貼出來，立刻引起大嘩，團派戰鬥組群起而攻之。其中一篇《論“平黑”》的文章說：414 鼓吹的平黑“實質就是主張清華的幹部應該基本肯定”，“414 所主張的平黑論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它根本不利于廣大革命幹部的思想改造、世界觀的改造，而有利于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復辟”。有些大字報說“平黑論”是“地地道道的改良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宣言書”，是“爲黑幫翻案”，是“給革命小將抹黑”等等，《井岡山》還專門刊登了批判“平黑論”的文章。414 的一些人也嫌“平黑論”太右傾。

“平黑論”之所以引起很大的爭論，歸根到底是兩派對清華黨的組織和幹部隊伍有不同的估計。團派認爲：“清華黨是按照清華黨綱建立起來的修正主義的黨，他們把大批真正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的優秀分子拒之門外，大量收買忠實于他們的爪牙。事實證明，清華黨是爛掉了”。他們說清華“大多數幹部的現狀是不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他們的世界觀還沒有得到改造”。

爲了回應團派的指責和 414 內部的不同意見，我和黃瑞

和在五月份又寫了《再論革命小將要勇于爲革命幹部平黑》的大字報，更加全面地闡述了“平黑論”。我們在文章裏駁斥了“幹部是保守勢力”的觀點，明確提出：“我們的幹部絕大多數是群衆中的先進分子。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我們的共青團是先進青年的群衆性組織。這是誰也否定不了的，否定了這個，就是否定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就是否定我們的黨，就是否定我們的共青團。一句話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在這篇文章裏，我們把爲革命幹部平黑的目的說得很明確，那就是要重新樹立革命領導幹部的威信，讓他們進入三結合並起核心作用和骨幹作用。

### 保鬥分明

在我們大張旗鼓地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宣傳“平黑論”的時候，有人揭發說艾知生整了譚浩強的黑材料，認爲這是走資派反攻倒算，打擊起來革命的幹部。

譚浩強是何許人？他 1953 年入黨，1959 年在清華大學自動控制系畢業後，留校工作，擔任清華團委副書記。他曾于 67 年 2 月寫信給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得到了戚本禹的贊許并擬調其到中央文革文藝組，但遭到老蒯拒絕。3 月 26 日，陳伯達、戚本禹約請清華幹部和總部委員座談教改問題時，譚浩強提名《二萬五千裏》等支持縱隊派的教師參加座談，受到總部責難。譚浩強曾表態反對解散《二萬五千裏》。他與團委幾個幹部組成《向太陽》戰鬥組，編寫了《劉少奇反毛澤東思想言論 100 例》。他支持並參加

414，說：“要革命的幹部是壓不垮的，我向你們保證，我堅決支持414，我們不怕圍攻，不怕譏笑，不怕被打成黑幫”。現在譚浩強是414串聯會領導班子成員，是我們414中幹部的代表人物。

有人提議揪鬥艾知生。開始時，我們有點猶豫，我們聲稱是解放幹部的，怎麼一上來就鬥爭幹部？經過討論，統一了認識。我們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必須牢牢把握鬥爭大方向，把矛頭對準走資派，避免團派說414是保守勢力，不鬥走資派，祇熱衷于攻擊總部和二辦。《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中有這樣的話：“謹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從‘左’的方面阻擾幹部起來革命，破壞革命的‘三結合’”。我們想：艾知生不就是這樣的走資派嗎？為了保護譚浩強，必須鬥爭艾知生！如果我們不能旗幟鮮明地保護幹部，我們414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如果我們不能制止走資派的反攻倒算，還會有哪個幹部敢站出來說話？誰敢再支持414？我們來個“打擊一小撮，解放一大片”，豈不是既捍衛了大方向，又解放了廣大幹部？於是我們在4月25日召開了“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艾知生”大會。

文化革命中受磨難最多的清華黨委副書記就是艾知生，工作組時期鬥他，“三臨”“時期鬥他，井岡山鬥他，聲稱致力于解放幹部的414第一個鬥爭的也是他。我想他對此也是百感交集。我們鬥爭艾知生的行動使團派猝不及防，取得了出奇制勝的效果。我們鬥爭的是走資派，解放的是革命幹部，大方向正確，團派抓不住什麼把柄，雖然“打在艾知生身上，疼在蒯大富心上”，蒯大富却也不得到會表示支持。

26日、27日、29日 414 又連續召開三次“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這些大會宣傳了 414 的觀點，營造了濃厚的氣氛，實際上解放了廣大的中下層幹部。然而，414 在解放幹部的同時却又無理地打擊了另外一些幹部，除了艾知生，電機、數力、化工等系的部分領導幹部如陶森等人也受到我們 414 點名批判，414 紿他們上綱上綫，把他們定性為走資派。在 414 的初期，我們解放幹部是不徹底的，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解放基層幹部，而對於中上層幹部，我們同樣認為他們不少是走資派，不敢沾邊。既然我們有“打擊一小撮，解放一大片”的指導思想，就必然有所謂的“一小撮”不能幸免于難了。

在這裏我願意誠懇地向那些所有被我們 414 批判、揪鬥、關押甚至體罰毆打的幹部表示道歉。

### 集體亮相

4月 29 日，146 名支持 414 的幹部發表了《致全校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幹部的公開信》。這是清華幹部的一次集體亮相。《公開信》說：

過去，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蔣南翔把持清華黨政大權的時期內，我們都曾經犯過大大小小的錯誤。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把我們之中的許多人推上第一線，充當了鎮壓革命群衆運動的手。每當我們想到所犯的這些錯誤，就感到慚愧，感到痛心，我們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清華大學革命的師生員工。我們誠懇地歡迎革命群衆繼續對我們的錯誤進行毫不留情

的揭發和批判。

但是錯誤，哪怕是嚴重的錯誤，決不能變成我們身上的包袱，我們要繼續革命，而且要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堅定，更加徹底。……

當前的戰鬥任務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大批判中促進革命的大聯合，實現革命的三結合，這是一場尖銳復雜的階級鬥爭。不管哪一級幹部都在經受嚴峻的考驗，都不能回避這場鬥爭，都應該公開表明自己的政治觀點。我們要接受過去犯錯誤的教訓，用毛澤東思想來衡量一切，檢驗一切，毫不猶豫地堅決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和革命小將一起，參加戰鬥。

現在井岡山 414 革命串聯會的小將們打開了清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新局面，也教育和幫助我們認清了當前的形勢和大方向。

這封公開信並不是 414 組織策劃的，而是中層和基層幹部們自己搞的，我們事先對此一無所知。據說是譚浩強牽頭策劃，胡大忻執筆起草。

414 核心組曾經就“如何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召開過部分中層幹部座談會，徵求他們的看法，他們對 414 解放幹部的做法表示歡迎。現在 150 名幹部聯名公開表態支持 414，這真讓我們感到意外的驚喜，也使我們倍受鼓舞，信心大增。因為我們覺得這一事實充分說明 414 的政治綱領深得人心，我們的路走對了。

清華幹部集體亮相，這是清華園的重大政治事件。它標志着清華幹部作為一種政治力量開始積極參加清華的政治鬥爭，并使清華的文化大革命出現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

團派的反映是可以預料的。《公開信》遭到團派的圍攻。先是在大字報上加批語，接着發表聲明，然後組織文章進行批判。他們說《公開信》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黑色信號彈”，是“向革命小將反攻倒算，復辟舊清華的宣言書”，團派頭頭劉才堂在《公開信》上批道“這篇大字報本身證明你們這批人（或者執筆者）世界觀基本上就是資產階級的！”

5月3日，老蒯親自出馬，發表了《給譚浩強的公開信》，他先指責說“414串聯會作為無政府主義、分裂主義的代表產生了，它不過是《向何處去》串聯會、‘三縱隊’‘整風派’以新的花樣出現罷了，他們的政治綱領和組織路線都是一貫的。”“可是你，譚浩強同志作為一個有影響的大人物竟大力支持414少數人的分裂行動，客觀上把我們左派內部的分歧擴大化，轉移了鬥爭大方向，祇會起到保護劉鄧蔣，挑動一部分革命小將去反對另一部分革命小將，搞垮兵團總部的效果。”在批判了414的觀點和做法以後，蒯大富把矛頭指向在150名幹部的《公開信》上簽字的清華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羅徵啓，說：“這個家伙竟在我們搞革命三結合的關鍵時刻又跳了出來，煽陰風，點鬼火，對革命小將反攻倒算，挑撥離間。他採取打進來，拉出去的手法，妄圖篡奪我們井岡山兵團的領導權，妄圖擠入革命三結合領導機構。羅徵啓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堅持不改和屢教不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可是你却和他鬼混在一起，并蒙蔽一百多名幹部寫出一封‘公開信’，這封公開信是復辟舊清華，向革命小將開火的宣言書。”

5月14日團派舉行“打倒羅徵啓”的示威游行。蒯大富把羅徵啓打成走資派，無非是想說明150名幹部的《公

開信》是走資派策劃的，要從 414 後面找出一個走資派來。團派打擊羅徵啓和 414 打擊艾知生實際上是異曲同工。

幹部隊伍發生了大分化。在《公開信》上簽名的幹部越來越多，後來達到 331 名。當然也有一部分幹部寫大字報嚴厲批駁《公開信》。其中最突出的要數團委的九名幹部。他們 4 月 22 日就發表過《撕開 414 的一張王牌——從譚浩強看 414 的改良主義本質》的大字報；5 月 1 日，他們第一個批判 150 名幹部公開信，說《公開信》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黑色信號彈”；5 月 3 日他們又發表《關於譚浩強問題的嚴正聲明》，譴責譚浩強“一手拉攏幹部，一手蒙騙群衆，上與走資派鬼混，下與分裂派搭當，集合保守勢力，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兵團總部大唱對臺戲，犯下了新的嚴重錯誤。”

清華幹部隊伍的分化有一個特殊現象：大多數中下層幹部支持 414，而大多數上層幹部却支持團派。這個現象令我百思不得其解：這些上層幹部是為了免遭政治迫害而違心地躲藏在團派強大的保護傘下，還是他們徹底轉變了立場真心擁護蒯大富的觀點？是 414 的所作所為傷害了他們，還是他們根本就不相信 414 能成什麼大氣候？抑或是他們政治經驗豐富，早就看清了我們兩派學生胡鬧過後遲早還要他們出來收拾局面？

根據團派機械系周家寶等 18 名幹部的倡議，兵團總部決定召開幹部辯論會。雙方都組織了幹部辯論團，414 的幹部辯論團由龍連坤、魏宏波、譚浩強和胡大忻領軍。5 月 5 日，雙方在西大操場就 150 名幹部的《公開信》問題舉行辯論會。414 的幹部辯論團有備而來，在辯論會上全面、系統地闡述了 414 在幹部問題上的觀點，批判了團派

在幹部問題上的觀點，駁斥了團派對《公開信》的指責。團派辯論團祇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群衆的掌聲表明，414 的觀點占了上風。

也許是團派在辯論會上理屈詞窮，也許是團派不願在《公開信》上糾纏不休，而想盡快成立革委會，一次辯論之後，他們就不再理會 414 的叫板了。

## 兩小撮論

在二辦通令解散《二萬五千裏》及砸爛“幹部堆”之後，有人揭發二辦中的大部分人是紅教聯的成員，這時紅教聯問題引起我們的注意。

首先指出紅教聯問題的是孫怒濤，他在 3 月 28 日的全校大會上指出：資產階級是修正主義的基礎，他們現在鑽進了造反派內部，吹捧革命小將，我們應該提高警惕。

一些戰鬥組陸續揭露了紅教聯的各種言論，其中以 4 月 1 日《刺刀見紅》貼出的《紅教工揮舞在幹部頭上的五條大棒》的大字報最為典型。《刺刀見紅》歸納紅教工散布的這五大錯誤言論是：三類幹部是最危險的敵人；200 元的教授比 46 元的幹部更革命；基層幹部是劉鄧路線的社會基礎；學生管上揪、教師管下掃；清華幹部都爛了。《刺刀見紅》還貼大字報點名批判紅教工的負責人、土建系教師陶德堅，說她 57 年嚴重右傾、受過警告處分，文化革命中保蔣、保工作組、反蒯等等。還有大字報揭發說，1 月 25 日，紅教工曾經到學校的武裝部奪權；2 月 10 日，紅教工發表過《關於奪黨權的聲明》稱“前清華黨組織屬於劉鄧黑司令部，必須砸爛重建”。

4月2日我們《千鈞棒》和《戰地黃花》馬上做出反應，提高調門，上綱上線，發表《關於紅教工問題的緊急聲明》，號召批判紅教工頭頭的“反動思潮”。我們當時的認識是：紅教工的言論代表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的進攻，他們否定黨的組織，打擊革命幹部，就是乘文革之機進行階級報復；而總部和二辦之所以這樣打擊、壓制幹部，原來是受到紅教工的嚴重影響，紅衛兵的政權機構混進了階級敵人，必須加以清除。

414成立後，在分析清華幹部解放的阻力來自何方時，我們對形勢有這樣的估計，一是象艾知生這樣的一小撮走資派，他們直接攻擊站出來的革命幹部；二是象紅教聯這樣的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們散布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反動思潮。我們要解放幹部就必須打擊這兩個一小撮。這就是後來遭到團派大肆批判的“兩小撮論”。

在“兩小撮論”的指導下，我們在4月25日鬥爭了艾知生和其他的走資派後，又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紅教聯。4月27日，414核心組發表《關於批判紅教聯某些頭頭所代表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反動思潮的號召書》，正式將打擊“兩小撮”付諸行動。

可是，團派認為，“兩小撮論”是不值得一駁的，十六條中的一句話“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可將“兩小撮論”擊得粉碎。他們說414提出的“兩小撮論”，與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背道而馳，實際上就是要打擊紅教聯，進而打擊二辦和總部，這是一個轉移鬥爭大方向，保護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錯誤的口號。

我們則爭辯說：十六條上有“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我們理解，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而紅教工就是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我們既要打擊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也要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二萬五千裏》和《刺刀見紅》還引用戚本禹3月3日在人民大學的講話，戚本禹說“不要打倒一切、排斥一切，不要把矛頭對準一般的學生、一般的教員、一般的黨團員。要對準那兩小撮：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的學術權威，這就是我們鬥爭的大方向。”看！戚本禹早就說了兩小撮。“兩小撮論”沒有錯！

5月10日，414召開《鬥爭反革命分子沈孝宇、批判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陶德堅的反動言行大會》，批判了紅教聯過去發表的一些言論，將陶德堅戴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帽子加以鬥爭，并通過決議將陶德堅從井岡山兵團清除出去。我們想搞陶德堅，但她的錯誤似乎還够不上批鬥，祇好拿她的丈夫沈孝宇出氣。沈孝宇是北京地質學院的教師，我們414未經允許，擅自派隊伍把沈孝宇揪到清華進行鬥爭。為此，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發表聲明對414提出了強烈抗議。

陶德堅自己當然不服，但我們沒有給她辯白的機會。團派《第一紅岩》等48個戰鬥組做出強烈反應，他們發表聲明認為：紅教聯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陶德堅是革命的好同志，414批判陶德堅是卑鄙的、非法的，是向革命群衆反攻倒算。

毋庸置疑，我們和紅教聯之間在政治觀點上有極大的分歧，我們認為他們的許多言行是錯誤的，為了解放廣大幹部，我們必須駁斥紅教聯的言行。但是對於觀點上的分歧，應該通過辯論，明辨是非，即使是錯誤觀點，也應該允許保留，不應該一棍子打死，更不應該採取批判鬥爭的方式。另一方面，我們沒有認真全面地研究紅教聯的觀點，僅僅為了政治的需要，為了打擊團派，就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把紅教聯的成員一律說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社會基礎，採取無情鬥爭的政策。其實我們在犯和蒯大富一樣的錯誤，一樣的亂扣帽子、亂打棍子，一樣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即使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樣做也是錯誤的。

在這裏我也願意誠懇地向那些被我們 414 批判、揪鬥、抄家、關押甚至體罰毆打的教師、職工及其他同志表示道歉。

## 自力更生

414 成立以後，井岡山廣播臺不僅拒不廣播 414 觀點的文章，而且連篇累牘地廣播攻擊 414 的文章，搞得我們很是憋氣。有人這樣說：十篇大字報抵不上一篇廣播稿。大字報貼在那兒，你可以不看。大喇叭整天衝着你嚷嚷，你不聽也得聽，真是煩死人。因此，414 許多人建議：414 一定要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廣播臺。經過一番緊張的籌備，4 月 30 日，414 廣播臺誕生了。陳楚三任臺長。群衆推薦了各種各樣的能人把守不同的崗位，有的管機務，有的管線路，能寫的當編輯，能說的去播音。我印象最深的是一

位姓鄭的同學，他心靈手巧，能用手工製造出非常好的高音喇叭，俗稱“九頭鳥”。我們《千鈞棒》幾位主要的筆杆子都當了編輯，廣播臺的一號男播音也是我們《千鈞棒》的成員。414 廣播臺的建立，徹底打破了井岡山廣播臺的一統天下。從此兩派廣播臺，晝夜不歇，互相對攻，倒霉的却是清華大學的幾萬師生員工，他們再也没有過過安靜的日子，直到 68 年 7 月 27 日工宣隊進駐清華。

雖然我們有了自己的廣播臺，但畢竟是因陋就簡，土洋結合，設備短缺，功率不足，所以，其影響力遠遠不能達到我們的要求。要改變這一狀況，就必須有足够的資金，可是我們手裏分文不明。5 月 6 日，《二萬五千裏》等 52 個戰鬥組聯合發出倡議，號召 414 戰士踴躍募捐，購買廣播器材，自力更生辦好 414 廣播臺。廣大 414 群衆積極響應倡議，在短短的幾天內便有 4500 多人參加捐款，共捐款 2803 元 9 角 2 分。當時我們規定，學生捐款最多不得超過 5 角，幹部和教師捐款最多不得超過 2 元。實際捐款時，學生捐 1 角、2 角、3 角、4 角、5 角的都有，個別的捐了 1 元，也有人祇捐了 5 分錢。大多數幹部和教師捐了 1 元或 2 元，有些幹部教師捐了 10 元、20 元。捐款最多的是校部的幹部錢錫康，他捐了 200 元。但凡超過捐款規定額度的，我們都如數退還給了本人，錢錫康也不例外。盡管如此，錢錫康還是被團派說成“化了 200 元錢買了個革命幹部的稱號”。

我要特別指出的是，不少中間群衆和一些團派群衆也為 414 廣播臺捐了款，他們在捐款時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們雖然不贊同 414 的觀點，却非常贊同兩派都有平等辯論的條件，用現在的語言來說就是公平競爭的環境。

我們手中有了錢，414 廣播臺越辦越好，足以與井岡山廣播臺分庭抗禮。初期，兩派廣播臺還是文明辯論，慢慢地變味了。不久，團派在第一教學樓（簡稱“一教”）又建了個所謂“民辦”的“前哨廣播臺”，廣播那些語言激烈、上綱過高的稿件，其中還夾雜着大量平常人羞于啓齒的詞句。414 針鋒相對，在 12 號樓也搞了個民辦的“紅尖兵廣播臺”，與“前哨廣播臺”展開對罵。

團派廣播臺不斷播放《中央首長評 414》，歌詞是這樣的：“414 出現是有背景的，414 頭頭是不純的，414 是有後臺的，414 大方向是不正確的，414 的理論是反動的。414 上臺不行！不行！！不行！！！”

還有一個歌詞是這樣的：“你說那個 414 為什麼這麼壞？因為它有個羅徵啓和沈如槐。你說那個沈如槐為什麼這麼壞？因為他的一只眼睛睜不開。”

414 以牙還牙，不斷播放記不得名字的歌曲，歌詞是“井岡山是老剃的山，二十八團小爬蟲滿山鑽，革命幹部凌老機，革命阿姨陶德堅，堅決要求大翻個，流氓痞子要掌權。”

臺上動嘴，臺下動手。趁着夜深人靜，兩派不斷破壞對方的廣播線路，或者幹脆摘掉對方的喇叭。

### 良師益友

清華文革時期有很多記者在學校活動，在我的眼中，這些記者政治背景深，活動範圍廣，給人一種極其神秘的感覺。可我沒有想到我竟有機會和一位叫張廣友的神秘記者交上了朋友。初識張廣友是二月整風時期。有一次我在大禮堂的講臺上發言後，他走過來對我說：“我是新華社記

者，能不能把你的發言稿給我，我要向中央反映你們的情況。”能向中央反映情況，這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我不假思索地便把發言稿給了他。從此我和張廣友開始有了交往。

有一天，張廣友對我說，無論你持有什麼樣的觀點，都要及時向中央反映，讓中央了解你們。於是我們經常主動把大字報底稿送給他，或把我們了解的情況寫成材料交給他。為了證明他的權威性，他不無得意地對我說：“你們上午交給我的材料，我保證晚上送到中央文革，擺在江青的桌子上。”

張廣友住在清華南校門附近的招待所裏，我不時去找他，有時和尹尊聲一起去。來往熟悉以後，談話就比較隨便了。他對我們說：“我是上面派來的記者，必須客觀地向中央反映情況，你們兩派的觀點我都如實上報。對清華的爭論，我不便公開表示我的看法，但是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觀點，我可以告訴我們，我是傾向于你們的觀點的。”他還指着對面的門說：“你們不要去找他，他是支持那一派的”。對面門裏住着一位《解放軍報》記者，好象姓董，我們幾乎沒有與他打過交道。

414成立後，張廣友不時參加我們核心組會議，事前他對我說他經常參加兵團總部的會議，現在也希望參加我們的會議，以便更全面地了解情況。我很爽快地答應了。後來只要我們開會，我就通知他參加，什麼事情都不瞞他，他對我們的情況也是了如指掌。我們開會時，他總是坐在一旁，聽我們發言，不停地做記錄，但從不插話。

我們與張廣友接觸越多，對他的信任也就越多，漸漸地，我們把他作為值得信賴的朋友，有什麼話都願意跟他說，他也給我們提出過許多很好的建議。比如，他對我說，不

要一味批評團派怎麼怎麼錯誤，要拿出自己建設性的方案。後來，在團派匆忙拼湊革委會時，我們馬上提出《關於實現我校革命三結合的建議》；在與老蒯徹底分裂成立 414 總部以後，我們又主動提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實現我校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建議》。這樣，上對中央，下對群衆，我們都表現出誠意，爭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動。他還說，團派輿論攻勢很大，外界很容易相信他們的宣傳。你們要將清華的情況和 414 的觀點及時向中央反映，讓中央了解 414，爭取中央的理解和支持。于是，我們成立了以尹尊聲為首的簡報組，不斷就清華的重大問題寫簡報上報中央。關於使用呂應中，關於解放劉冰，關於建立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的初步意見和清華中上層幹部的狀況，關於要求清華全面軍管等等，我們都寫了簡報上報中央。這樣的簡報總共有幾十期。

每當 414 處於關鍵時刻，我們都去徵求張廣友的意見和看法，他都會毫不忌諱地表明他的態度。張廣友的沉着冷靜，真知灼見，善意批評，輕鬆點撥，都給了我們這些剛出道的毛頭小伙子極大的幫助和支持。

張廣友是我的良師益友，也是 414 的良師益友。

張廣友不時對我和尹尊聲的文筆加以贊賞，說我們經過嚴格訓練後都可以當記者。他說過：“你沈如槐現在是 414 的一把手，領導幾千人，責任重大，我不好意思拉你走，尹尊聲我是一定要拉走當記者的，你可不要捨不得呀。”

前幾年我從新華書店的書架上看到了一本書，書名是《改革風雲中的萬裏》，作者就是張廣友。我把這本書買來一讀，才知道，張廣友是一位名記者。出版社介紹說：張廣友 1959 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後就進入新華社當記者。

在三十多年的記者生涯中，張廣友實地採訪了許多當代中國的重大歷史事件，其中包括“文革”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唐山大地震、中越戰事和中國改革，寫下了一系列具有珍貴價值的內部和公開報道。他自言遵奉的信條是：對事實負責，對歷史負責，回首平生無憾事。

張廣友在他的“開篇語”中提到他來清華的事情，他寫道：“1967年春天，社裏派我去清華大學採訪，清華紅衛兵說我是死保王光美。《井岡山》小報憑空捏造，登了我整整一個版，罵我是‘狗記者’、‘小爬蟲’、‘黑爪牙’，還抄了我的住處，拿走了我的筆記本和採訪材料，竟然不了了之，新華社軍管小組還要我‘正確對待’”。[13]

### 革籌小組

正當兩派圍繞幹部問題展開激烈辯論的時候，4月30日晚10點兵團總部突然宣布成立“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革籌小組），作為學校的最高權力機關，領導文化大革命。

此前，在4月25日的總部會上，劉泉等人就向蒯大富進言：學習三總部合併時動作迅速、亂中抓權的經驗，盡快成立革委會。根據這一思路，二辦立即發出《關於實現三結合的若干建議》，并于次日下午召開幹部介紹會，介紹他們選定的幹部韓銀山、張修身等人，接着又成立了以韓銀山、張修身為首的“參謀部”。

韓銀山，曾任校黨委委員兼總務處總支書記，59年被撤職，63年任校園科科長兼支書。

張修身，54年轉業來清華，先任人事處檔案科科長，

後任電機系總支委員，參加“四清”回校後未受重用，安排在精密儀器系，做接電話、跑跑腿之類的工作。

團派樹立韓銀山、張修身作為清華革命幹部的典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些幹部“受蔣南翔長期壓制、打擊”。

當團派介紹幹部、搞什麼參謀部的時候，我們沒有理會。現在，他們成立革籌小組并把它作為學校的最高權力機關，我們不得不做出強烈反應。我們認為中央提倡大批判、大聯合、三結合，三者密不可分。而清華目前兩派分歧嚴重，對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剛剛開始，革命幹部尚未得到解放，三結合沒有基礎，成立革委會的條件遠未成熟。況且，革籌小組的產生既未經過群衆推選，又未經過總部委員會討論決定，許多總部委員對此一無所知，現任總部委員、414 主要負責人孫怒濤莫名其妙地成為革籌小組成員，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足見“革籌小組”完全是少數人“欽定”的，因而它既無代表性，又無權威性。再者，一個紅衛兵群衆組織居然任命一個學校的最高權力機關，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蒯大富為了將他的紅衛行政權合法化，竟連起碼的“程序”都不顧了。相當一批團派群衆對此也有不同意見。我們認定，團派回避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繼續壓制廣大幹部起來革命，韓銀山、張修身在清華幹部中沒有代表性，是隨便拉來搞“三湊合”的，其實質是繼續打擊 414，搞蒯大富的一統天下，使自己披上革委會合法政權的外衣。於是，我們採取兩項措施，一是 414 第十一次串聯會通過決議，宣布 414 堅決不承認革籌小組；二是由孫怒濤發表聲明：政治上不承認革籌小組，組織上不參加革籌小組。而 414 中貼大字報公開聲明反對革籌小組的戰鬥組更是不計其數，一時間，

革籌小組有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爲了平息群衆對革籌小組的意見，5月8日，蒯大富傳達了謝富治在市革委會常委會上的講話：“北京市革委會成立了，但下面還沒有成立革委會……各縣、區、各大企業、各大學校都要成立三結合的革委會，先成立籌備小組，籌備小組的形式好。”

5月9日，團派公布了《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井岡山兵團總部關於414串聯會問題的重要決議》，稱清華大學井岡山414革命串聯會是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部領導下的合法的群衆組織，4月15日兵團總部決議中所說“不承認414革命串聯會”予以取消，所說“414串聯會是反革命逆流一部分”也予以取消。

很顯然，團派是想退一步，進兩步，以對414做出的有限讓步，換取414對革籌小組的承認，進而成立革委會，等到他們建立了合法的政權後再來收拾我們。我們當然不會上這個當，立即發表《關於兵團總部5.9決議的聲明》，繼續堅持不承認革籌小組的立場。

有趣的是，就在這關鍵時刻，總部委員王良生貼出大字報公開他和總部的原則分歧，聲明加入414。我們真是喜出望外，馬上吸收他爲414勤務站成員。有人曾提醒說，王良生這個時候參加414，沒準兒是蒯大富派來的間諜，讓他做414勤務站成員是不是有點兒玄？我們覺得414是個堂堂正正的群衆組織，不是什麼陰謀集團，我們勤務站討論的一切問題都是公開的，沒有什麼秘密可言，記者隨便都可參加，還怕什麼間諜？再說，王良生這個人真誠可愛，說什麼也不像個間諜。後來，在414與團派徹底分裂之後，

這位可愛的王良生又祇身離開了 414，回到了井岡山。

1967 年 5 月 12 日，謝富治、丁國鈺、周景芳來到清華大學接見兩派負責人，首先單獨接見了團派，然後又單獨接見了我們，414 核心組全體成員參加了接見。在單獨接見 414 時，我們向他們匯報 414 的觀點和對若幹問題的看法，謝富治根本不感興趣，毫不客氣地批評 414 說：“414 大方向是不對頭的，你們的小道理有些是對的，但大道理錯了”，“你們千條對，萬條對，可你們的大方向不對。”謝富治指責 414 把矛頭指向蒯大富，指向群衆。我們自然要爭辯，可謝富治不願意聽。我這個人生性剛強，寧折不彎，看到謝富治這樣對待 414，很不服氣，大聲與他進行爭辯。謝富治對我極為不滿，他指着我說：“你祇能當閹將，不能當統帥。”

隨後謝富治將兩派召集到一起作指示，他說：414 要支持總部，首先大聯合，然後再讓革命幹部出來。革籌小組增加一些人，增加不同意見的人，再增加幹部。可以把兵團總部與革籌小組分開，有個分工，具體問題你們自己討論。革籌小組增加一些人就行了。

謝富治離開清華後，有人散布消息說：謝富治單獨接見團派時要蒯大富高姿態，不要講 414 是保守勢力，什麼地方都有左中右，革命委員會也有左中右，讓 414 一些人進革籌小組。團派造出的輿論是：謝富治要讓 414 作為保守勢力和右派代表參加革籌小組，而蒯大富還對此不滿，認為謝富治對 414 太軟，讓步太大，不應該同意 414 代表參加革籌小組。

從三縱隊與蒯大富論戰以來到 414 成立近一個月，第一次有中央領導專門來清華處理兩派問題。而這第一次就否

定了 414 的大方向，這對 414 來說無異于當頭一棒！在 414 的核心組會上，我們仔細研究了謝富治的講話和態度，認為他是蒯大富搬來的救兵，偏聽偏信，有意打擊 414，為蒯大富撐腰；他不聽 414 的申辯，輕易否定一個群衆組織的大方向，是不妥的。在下午召開的 414 戰鬥組組長會議上我們如實傳達了謝富治接見時的講話。當時我們認為中央文革和謝富治不了解清華的情況，曾想組織部分 414 戰士去中央文革反映情況，由於群衆對中央文革心存畏懼，未果。很自然，414 中充滿了對謝富治的不滿情緒。

5 月 13 日在北京市革委會會議上蒯大富又向謝富治告狀說：清華 414 頭頭要對中央文革施加壓力，挑動 414 群衆向中央文革和謝副總理示威。謝富治說：“我是受總理和中央文革的委托到清華去的，回來後向總理和中央文革匯報了我了解的情況和處理意見，總理和中央文革是同意我的處理意見的。”[14]

蒯大富把謝富治的講話公開傳達後，團派興高采烈，在各種場合利用謝富治的講話壓 414，特別是 5 月 15 日晚團派召開的“促進革命派大聯合”大會，對 414 進行了系統而全面的攻擊，甚至揚言要對 414 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連當時頗有影響的中間派《五七串聯會》都看不過去，發表聲明予以譴責。

我們已經意識到中央文革和謝富治對 414 採取的是不屑一顧、簡單否定的態度，這是一個非常不利的形勢；414 想堅持真理，就要進行長期、艱苦、曲折的鬥爭。我們認為謝富治來清華並沒有耐心聽取 414 的意見，他的“處理意見”是不符合清華的實際情況的，也是不利于清華大聯合、三結合的。他到清華勞而無功，現在又想用總理和中

央文革來壓服 414。我們沒有屈服，繼續堅持“414 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硬頂謝富治的批評。我們清楚地意識到硬頂會造成什麼後果，為了表示 414 為真理而獻身的決心，在紀念 414 成立一周月的大會決議中我們引用了這樣一段林彪語錄：“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于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這段語錄後來被 414 戰士譜了曲，變成了《四一四戰歌》，成為鼓舞 414 與團派鬥爭的有力武器，并導致陳楚三的牢獄之灾和 414 的“倒謝運動”。

謝富治來清華的目的是壓 414 承認和服從蒯大富和革籌小組的領導，無論謝富治和蒯大富怎樣軟硬兼施，我們就是不買這個帳，堅持反對革籌小組。我們確信，我們的立場是站得住腳的：革籌小組不是通過合法程序產生的，不能作為清華的最高權力機構，祇能作為工作機構，而且必須調整擴大；清華大學的大聯合沒有實現，幹部沒有得到解放，不具備成立三結合革委會的條件。

#### 四項協議

在這種情況下，5 月 21 日謝富治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兩派負責人，414 方面參加接見的代表是我、孫怒濤、宿長忠、劉萬璋、王良生和龍連坤等六人。

這次接見，謝富治總的原則正如他自己所說是“在批評 414 大方向的原則下，和稀泥，搞三結合。”他還說：“我跟中央文革、周總理講了，他們同意我的處理意見。”

謝富治不僅繼續否定 414 的大方向，而且全面否定 414 的所謂“小道理”。

談到 414 批評蒯大富的錯誤時，謝富治對我們說：“聽說 414 要把總部打倒，你們是不是想讓蔣南翔回來？”“不存在推翻蒯大富的問題，可現在你們就這樣做了。”

談到“蒯氏階級路線”時，謝富治說：“是不是讓蔣南翔回來，就什麼事情都沒有了？‘蒯氏階級路線’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有那麼嚴重？這麼說羅徵啓比蒯大富還好了！”“羅徵啓是什麼人？你們是要彭真出來，蔣南翔回來，劉、胡、何、艾出來嗎？”

談到幹部問題時，謝富治說：“我們現在強調解放一大片，打擊一小撮，不等於過去批判錯了。批判錯了祇是一個半個。這裏有兩條，一條是毛主席對幹部的大政策，第二條是幹部自己原來站錯了。就是有過火，責任也在一小撮。否則就是翻案，大方向完全錯了。講平保平黑，那是完全錯了。”

談到“兩小撮”時，謝富治說：“祇有一小撮，沒有兩小撮。”

他警告參加接見的幹部：“你們幹部站出來要為大聯合做貢獻，不要祇為自己的利益，否則就是挑撥離間，破壞團結，就是繼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他疾言厲色地對 414 代表說：“你們表面聽中央文革的話，實際上不是的，將來要走向反面的。”他還說：“你們要不聽話，愛怎麼搞就怎麼搞，我不管了，讓蔣南翔回來管。”“你們再搞個總部，再搞個 414 學校？一條是一個總部、一個學校，第二條是讓蒯大富下臺。這第二條路走不通。”

總而言之，謝富治採取高壓政策，想一舉制服 414。謝富治之所以這樣起勁地支持蒯大富，反對蔣南翔，是因為

他們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打倒了彭真，謝富治取而代之，清華打倒了蔣南翔，蒯大富取而代之。

在對 414 一頓棒殺之後，謝富治主持兩派協商談判。其實根本不存在所謂協商談判，我們祇不過將謝富治講的幾條原則變成文字而已。謝富治的幾條原則是：一，停止互相攻擊；二，統一領導，不準扶植山頭的權威；三，大聯合就不允許對立面存在；四，革籌小組成立後 414 就解散，革籌小組實際上是有權力的。

經過討論，雙方達成“四項協議”，全文如下：

- 一、雙方停止一切“內戰”，不許相互攻擊。廣播、大字報、標語等不準攻擊對方。有不同看法希望協商解決，或通過正常辯論來解決，尤其不要把“內戰”打到社會上去。
- 二、雙方要整風，主要是自我批評，總結經驗，發揚優點，克服缺點，整風要達到大聯合大團結的目的，逐步實現按班、系的大聯合。
- 三、調整和擴大革籌小組和總部，要盡快實現我校革命三結合。
- 四、井岡山兵團總部、革籌小組做出的決議必須執行。

協議的前三條雙方都無爭議，要害是第四條，這無疑意味着把 414 的生殺大權交給團派。談判時我方強烈反對這一條，認為團派會利用它來壓 414，謝富治說：“協議還沒執行，怎麼知道他們會那麼做？你們還有沒有誠意？”王

良生說：“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是 28 團，28 團不改變態度，414 不放心。”謝富治說：“那不見得，你們要整風。”

這時我想起 1966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報發表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并配發評論員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派來說，我們遵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紅旗》雜志第十一期重新發表這篇文章時改為“……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並且加了一句話：“對於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

於是，我堅決要求取消第四條，我說：“正確的決議才能執行，錯誤的決議必須堅決抵制，否則就是奴隸主義”。

謝富治說：“奴隸主義是有階級性的，革籌小組做出的決議要統統執行，現在無政府主義可厲害了。”

我仍不服，要求對第四條進行修改，提出在“決議”前加“正確”二字，即把協議的第四條改為“井岡山兵團總部、革籌小組做出的正確決議必須執行。”

謝富治強硬地說：“不行！這是原則問題，決不退讓。”

當他們煽動造反派向我們黨奪權時，他們鼓吹抵制錯誤領導，而當他們要維護自己的政權時，却又要人們無條件地服從。這不是典型的實用主義又是什麼？

在謝富治的强大壓力下，我們被迫在四項協議上簽字。當時還確定了革籌小組組成人員名單，其中學生 13 人，幹部 5 人，教職員工 3 人，共計 21 人。在學生中，團派為 9 人，414 為 4 人，這就是九比四的來歷。414 推薦孫怒濤、汲鵬、王良生和我為學生代表、龍連坤為幹部代表、李振民為教職員工代表參加革籌小組。蒯大富任革籌小組組長，

鮑長康、孫怒濤、韓銀山、韓啓明為副組長。

在討論革籌小組名單時，團派祇接受孫怒濤、汲鵬、王良生三人，堅決不同意我參加革籌小組。他們說我過去在反對蒯大富和 28 團中最積極，沒有資格參加革籌小組。414 方面不得不向團派說明我是 414 的一把手，經謝富治表態同意後，團派代表才勉強接受我參加革籌小組。

回到清華，消息傳出，414 炸開了鍋。六位談判代表處于群衆的包圍之中，接受他們憤怒的聲討。群衆指責我們喪失立場，出賣原則，簽署了一個讓 414 任人宰割的協議。我們趕緊召開核心組會議，向大家匯報談判的詳細情況，聽取意見，研究對策。會上大家都能體諒談判代表當時的處境，對謝富治表示強烈不滿。大家議來議去也想不出好的辦法擺脫困境，但是，又不甘心就這樣束手就擒，所以會議決定，由 20 名未參加談判的勤務站成員發表聲明，接受“四項協議”的前三條，反對“四項協議”的第四條。聲明引用“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的毛主席語錄，指出第四條協議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這樣既承認了“四項協議”，又保留了抵制總部某些決議的權利，以一種進退自如的姿態，來應付未來事態的發展。

然而，414 群衆反對“四項協議”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首先是東方紅戰團連夜發表著名的“5.21 聲明”，明確指出“四項協議”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東方紅戰團堅決不承認“四項協議”，不承認革籌小組，不接受革籌小組的一切領導。隨後，反對“四項協議”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5 月 22 日，414 三七戰團和其他近二百個戰鬥組發表聲明，或完全反對“四項協議”，或反對“四項協議”的第四條，

並指責 414 頭頭出賣 414 戰士，出賣無產階級利益。414 群衆如此強硬的態度使我們很受鼓舞。

可是，謝富治馬上又打來一悶棍。5月22日深夜，謝富治的秘書打電話給清華兩派，傳達他的指示：“你們總部和 414 協商所達成的四項協議，我已經報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你們應當堅決執行，這樣做對你們有好處。”[15] 他的潛臺詞就是：誰反對“四項協議”，誰就是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毛主席，誰就沒有好下場。在文革中，這樣的大帽子誰也戴不起。

我們 414 核心組感到事態嚴重，決定對謝富治的電話指示做出反應。5月23日2時30分，孫怒濤通過 414 廣播臺傳達了謝富治的電話指示。在上午由總部召開的全校大會上，孫怒濤又代表 414 核心組表態：堅決擁護“四項協議”，並不折不扣貫徹執行。我們的目的是暗示 414 戰士不要輕舉妄動，要靜觀其變，以靜制動。我們擔心 414 還會有人貼大字報反對“四項協議”，怕他們遭到打擊。

當天上午，清華園內，兩派情緒形成鮮明的對照，團派歡欣鼓舞，414 萬馬齊喑。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23 日中午，東方紅戰團發表“緊急聲明”，重申 5.21 聲明，不承認“四項協議”，不承認革籌小組，聲明引用林彪語錄“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于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表明為堅持真理“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的決心。緊接着，414 主要負責人陳楚三、張雪梅等四人挺身而出，發表“鄭重聲明”，支持東方紅戰團聲明，表示“任何人違反毛澤東思想、背離毛主席革命路線，我們堅決造反，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惜”。這兩份聲明的強硬立場給 414 戰士極大

的心理支撑。廣大的 414 戰士也沒有在高壓下屈服，紛紛在大字報上簽名表示支持。兩派形成僵持局面。

不料，更大的打擊還在後面。5 月 24 日上午蒯大富又在全校大會上傳達謝富治 23 日對他的談話。謝富治說：“我把我們那天協商的四條告訴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是贊成的”。他還說：“我把我們那天協商會上提出的解決問題的三條途徑告訴毛主席。一條是讓蔣南翔回來，第二條是讓總部和蒯大富下臺，414 上臺。毛主席說‘這兩條都不行。’我又說第三條就是雙方都讓幾步，聯合起來。毛主席笑着說‘你又和稀泥！’” [16]

全校大會結束後，團派馬上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旌旗飄揚，鑼鼓喧天，慶祝似乎已經到手的勝利。“毛主席為我們井岡山人撐腰，我們為毛主席爭氣！”“最高指示：‘414 上臺，不行！’”等口號響徹清華園。

隨後，團派召開戰鬥組長會議，做出兩項重要決定，一是向 414 發動強大的政治攻勢，爭取瓦解和摧毀 414，二是立即成立革委會，從根本上鞏固勝利成果。24 日中午《611》等戰鬥組的“最最緊急聲明”和 28 團的“嚴正聲明”就是明證。他們確定的口號是“充分發動群衆，以大躍進的步伐，爭分奪秒，日夜奮戰，全力以赴，排除萬難，以祇爭朝夕的精神，盡快成立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28 團在聲明中說“414 大方向始終是錯誤的”、“414 必須解散”、“東方紅戰團和陳楚三、張雪梅等人的聲明是反革命大字報，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攻擊謝副總理，反對毛主席贊成的四項協議，罪責難逃”、“羅徵啓是挑動群衆鬥群衆的罪魁禍首”。

24 日下午，蒯大富主持召開革籌小組會議，決定 5 月

30 日成立革命委員會，並提出 50 名革委會委員候選人名單，供全校師生員工進行辯論。當晚，鮑長康在全校大會上宣布了革籌小組的決定和總部關於成立革委會的緊急動員令。

毫無疑問，蒯大富和謝富治把 414 逼到了牆角。“414 上臺，不行！”的“最高指示”給我們造成極其巨大的心理壓力。我們在討論時認為：對於這段“最高指示”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但又不理解毛主席他老人家為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心中很不服。起初我們還以為毛主席聽信了謝富治的片面之詞，但後來分析，毛主席對清華的情況了如指掌，也許他老人家確信清華 414 的主張實質上就是“蒯大富下臺—414 上臺—蔣南翔回來”。可我們自己當時絲毫沒有這種意識。我們雖然反對蒯大富，主張解放幹部，讓幹部成為三結合的領導核心，但並沒有讓蔣南翔復辟的思想，所以感到很冤屈，當然也不覺得很害怕。那麼如何應對當前的局面呢？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是極其神聖的，現在從蒯大富的口中隨意說出來，其真實性就大打折扣了。鑑於蒯大富有“貪污”和歪曲傳達首長講話的“前科”，我們暫且認定蒯大富偽造“最高指示”，不予理會。

在團派的强大攻勢面前，414 的隊伍保持了異乎尋常的冷靜和穩定。三七戰團發表聲明，支持東方紅戰團 5.21 聲明，表示要與東方紅戰團並肩戰鬥到最後勝利。在這關鍵時刻，作為 414 核心力量的兩大組織表現了高度的團結一致。陳楚三、張雪梅等人更以大無畏的精神再次發表“嚴正聲明”，繼續堅持強硬立場，在原則問題上決不退讓，準備為堅持真理而赴湯蹈火，粉身碎骨。與學生隊伍一樣，414 的教職員工和幹部隊伍也是一支壓不跨的隊伍。414 的

幹部代表龍連坤、魏宏波、譚浩強、胡大忻、王學芳聯合發表聲明，動農系 25 名幹部和數力系 13 名幹部分別發表聲明，堅持認為 414 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呼呼兩派群衆求同存異，共同對敵。414 的一個戰鬥組寫了一份題為“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的大字報，這個標題恰當地反映了當時處于政治高壓之下 414 的狀況。

### 徹底分裂

面對嚴峻的形勢，414 的領導核心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祇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是服從革籌小組的決定，參加革命委員會，以反對派的方式進行合法的鬥爭，走所謂的“議會道路”；第二條路是在組織上徹底分裂，成立新的紅衛兵組織，脫離井岡山兵團總部領導，這有點兒“武裝割據”的味道。我們的期望是：如果清華正式分裂成兩大派，清華就不具備成立革委會的條件，蒯大富所籌建的革委會就不一定能得到中央的批準，我們就可名正言順地與蒯大富繼續進行鬥爭。

最初，我們是沿着第一條路在走的。我們認為 414 雖然有大量反對四項協議的大字報，但 414 幾乎沒有採取任何違反四項協議的實際行動，中央文革一時還無法抓住 414 的小辮子。414 中相當多的群衆也會認可這條路。5 月 24 日，我們參加了蒯大富召開的革籌小組會議，被迫同意 5 月 30 日成立革委會，并提出了 414 方面的 9 名學生 3 名幹部 1 名職工共 13 名代表，列入革委會委員候選人名單。與此同時，我們也在抓緊進行第二條路的可行性研究。

5 月 25 日一天事態的發展粉碎了我們“議會道路”的

幻想。這一天按照蒯大富對 414 候選人“先搞臭、再進來”的指示，團派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造謠、污蔑、歪曲、誹謗，指名道姓，公開謾罵，無所不用其極，企圖把 414 提名的革委會委員候選人徹底搞臭。他們不僅要搞臭 414 的候選人，而且全面否定 414 的大方向，繼續把“復辟逆流”、“分裂主義”、“老保組織”的大帽子扣到 414 的頭上。與此同時，他們推薦一個個的所謂“一反到底”的“蒯派”英雄進入革委會，要建立一個“蒯氏”獨裁政權。

我們別無選擇，祇有走徹底分裂的道路。

但徹底分裂之路並不好走。我們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中央文革“扣帽子”、“打棍子”。中央提倡大批判、大聯合、三結合，我們搞分裂肯定是逆潮流而動，必然授人以柄，被中央文革扣上分裂主義的大帽子。再則，前有謝富治的“414 大方向錯了”，後有毛主席的“414 上臺不行”，如果 414 繼續對抗“毛主席同意的四項協議”，中央文革很可能改變“和稀泥”的態度，採取“打棍子”的方針，宣布 414 是反動組織，逮捕 414 主要頭頭，摧毀 414 整個組織。

我們經過多次討論，對 414 成立以來的言行進行了冷靜的審視，認為：從三縱隊到 414 將近 5 個月的時間內，我們所提倡和堅持的觀點都是正確的，這些觀點都是當時《紅旗》雜志、《人民日報》、《文匯報》所提倡和宣傳的觀點，很多精神都出自中央甚至是毛澤東主席本人。414 既沒有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也沒有為劉鄧和蔣南翔翻案，我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我們最大的“罪狀”就是反對蒯大富，反對蒯大富的一系列錯誤。實踐已經證明蒯大富並不是合格的革命事業接班人，我們一定要和蒯大富的錯誤分裂，為了抵制他的錯誤，我們祇能和他分裂。這種分裂是

革命行爲，我們相信世人不難理解這一觀點。如果中央文革一定要對 414 “扣帽子”、“打棍子”，硬要死保蒯大富，整垮 414，那祇能理解爲政治需要，我們別無出路，祇有爲堅持真理而獻身了。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不願束手就擒，我們也要拼死抗爭！不是說“政治鬥爭要結成死黨”嗎？那我們就結成死黨、拼死抗爭！與誰抗爭？與中央文革抗爭！所謂結成死黨，其實我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組織一幫堅定分子，抱成一團，死不分離，前赴後繼，中央文革祇要抓走其中任何一個人，其他人都一起跟着去，要坐牢一起坐牢，要殺頭一起殺頭。我們認爲用這種方法或許可以迫使中央文革改變態度。

大概是 5 月 27 日，我們精心挑選了 50 名 414 的堅定分子，在圓明園小樹林內開了一個及其重要的秘密會議。我們向大家分析了當前形勢，闡述了“結成死黨，拼死對抗”的方針以及成立新的總部、與井岡山兵團總部徹底分裂的決策。參加會議的人大都是東方紅戰團和三七戰團的骨幹分子，知道我們的決策後，個個熱血沸騰，慷慨激昂，人人都願意作爲死黨的一員，大家紛紛表示：“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于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不抗爭，肯定是死；抗爭了，還有一線生機，爲堅持真理而犧牲，死而無憾，豁出去，徹底分裂！

別以爲這祇是說說大話而已，不！我們每個人都是認真的。

會後，我給父母寫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說，兒子參加了清華的文化大革命，成了一個群衆組織的負責人，卷進了政治旋渦，恐怕很難全身而退，不能爲父母盡孝，更不能照顧弟弟妹妹了，無論我在清華發生什麼事情，都請父母

不要過問，權當沒有我這個兒子，懇請父母保重，希望弟弟妹妹健康成長。我還隨信寄去五枚毛主席記念章，作為給父母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的告別之物。

方針確定了，還要研究分裂的策略，選擇分裂的時機。在團派利用辯論革委會候選人的機會，全面否定 414 的時候，我們沒有以牙還牙，而是恪守四項協議，退出辯論，完全停止攻擊對方，并在 25 日、26 日、27 日連續三天發表聲明，要求蒯大富刹住“搞臭風”，暫緩成立革委會，警告蒯大富要對自己的分裂主義行為承擔責任。我們採取祇警告不反擊的策略，讓團派充分暴露其違反四項協議的行為。團派極端分子得意忘形，“搞臭風”愈演愈烈，作為總部第三號頭頭的劉才堂也親自上陣，違背四項協議，貼出《兵團內部存在的機會主義思潮》的大字報，繼續攻擊 414 是資本主義復辟逆流。

徹底分裂就是成立一個新的紅衛兵組織，打破井岡山兵團的一統天下，使清華一分為二。在 414 核心組做出決策之前，我們在東方紅戰團已經多次秘密討論過徹底分裂的方案。我們覺得東方紅戰團是 414 的中堅力量，又有廣泛的群衆基礎，這支隊伍拉出來具有足夠的影響力和震撼力。因此我們設想由東方紅戰團為主成立一個“東方紅紅衛兵”，與井岡山兵團分庭抗禮，造成事實上的分裂；同時，大部分 414 群衆留在 414 串聯會，仍隸屬井岡山兵團。這樣由東方紅戰團單獨承擔分裂的風險，使 414 的廣大群衆避免受到牽連。我、陳楚三、宿長忠、劉萬璋、張雪梅、陳家國等人都在東方紅戰團的成員，將義無返顧地挑起大旗並準備承擔一切後果。考慮到孫怒濤、汲鵬、王良生將會進入革委會，我想讓他們主持 414 串聯會的工作，在兵

團內部堅持鬥爭，與我們裏應外合。

在 414 核心組開會時，我向大家介紹了東方紅戰團關於成立“東方紅紅衛兵”的方案，孫怒濤、汲鵬堅決表示：三七戰團要和東方紅戰團並肩戰鬥，他們個人也決不參加革委會，而要和我們患難與共。於是我們對方案做了修改，決定東方紅戰團和三七戰團一起拉出來，成立一個新的組織，由我、孫怒濤、陳楚三、劉萬璋、汲鵬、張雪梅及陳家國挑頭分裂；宿長忠、王永縣、尹尊聲、王良生、鬱強、寧奎喜、張承耀等七人則留在 414 串聯會，主持串聯會工作。

當然，新組織的名字也要重新討論。

在討論新組織名稱時，着實費了一番周折。記得那是在新水利館開的會。東方紅戰團的人堅持甩掉井岡山的牌子，以表示與井岡山徹底決裂，他們主張幹脆就叫“東方紅紅衛兵”。三七戰團的人希望保留井岡山的牌子，因為井岡山的旗幟在全國有很大影響，而我們才是井岡山正確路線的代表。而無論是東方紅戰團還是三七戰團又都認為 414 的旗幟也不能丟，那是幾千名 414 群衆艱苦奮鬥的象徵。經過一番討論，大家覺得從井岡山拉出去一支隊伍，對老蒯影響可能不大，而在井岡山內部“另立中央”，會使老蒯十分難堪。為了盡可能多地爭取廣大群衆的同情和支持，最後我拍板決定採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 414 總部”的名字。雖然這個名字有些不倫不類，但她帶來的好處却妙不可言。

需要提到的是我和尹尊聲曾就分裂後中央文革會不會“打棍子”的問題徵詢過張廣友的意見。他說：“中央對於群衆組織是很慎重的，一般不會輕易加以否定”。他對我們

選用的新名字不以為然，他說：“我看甩掉井岡山的牌子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分裂的時機選擇在 5 月 29 日，這是革委會選舉後的第二天，革委會成立的前一天。早一天，蒯大富暴露不充分，反而給他足夠的時間調整策略；晚一天，木已成舟，起不到震撼作用。

5 月 28 日晚，蒯大富一意孤行，舉行了單方面的革委會選舉，“表決機器”通過了所有團派人選，414 方面僅有孫怒濤、汲鵬、王良生三名候選人勉強獲得通過進入革委會。

蒯大富的一意孤行，激起了 414 群衆的極大憤慨，就連團派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感到太過分了。26 日和 28 日，總部委員寧奎喜、土建系分部負責人張用藩相繼宣布脫離兵團總部加入 414。我們同樣給他們委以重任，他們一直在 414 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26 日、27 日兩天，我們組織了兩次活動，宣傳、學習《516 通知》和《紅旗》雜志社論，414 戰士踴躍參加，陣容整齊，情緒激昂。一切迹象表明，414 的群衆已經充分認識到分裂不可避免，他們聽從我們的號令，等待我們的大膽決策。

5 月 29 日 0 時 30 分，414 廣播臺廣播了“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 414 總部成立宣言”、“給毛主席的致敬信”、“告全校革命師生、革命幹部書”，宣告 414 總部誕生。同時廣播的還有：第一號決議，宣布以我為首的七人為 414 總部負責人；第二號決議，宣布不承認所謂的“革委會”，不接受其領導；以及“關於井岡山兵團 414 革命串聯會的決議”；“414 革命串聯會緊急聲明”；東方紅戰團“嚴正聲明”和

三七戰團“嚴正聲明”。這些文件全面體現了我們的原則立場、行動綱領和鬥爭策略，字裏行間充滿了為真理而獻身的悲壯。特別是周泉纓起草的東方紅戰團“嚴正聲明”中引用了民謠：“前不通，後不通，窮人四處無路走，一心去找毛澤東！”以及“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許州官放火，就許百姓點燈！”給人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29日上午9點30分，我們在大禮堂召開了414總部成立慶祝大會，禮堂內擠得水泄不通，禮堂外到處人頭攢動，幾千名414戰士用他們的實際行動堅決支持頭頭們的大膽決策，幾天來受壓抑的情緒一下子爆發出來，形成了不可阻擋的氣勢。日前，團派一位女頭目曾在大會上發誓說：

“老子鐵了心了，5月30日非成立革委會不可！”一位女同學自稱“老子”，曾引得衆人側目而視。今天，汲鵬在大會上說：“老子也鐵了心了，不把清華建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不在清華園樹立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絕對權威，死不瞑目！”此話與那位女頭目針鋒相對，一下子把會場氣氛推向了高潮。

在這次會上，我發言說，成立414總部是我們和蒯大富鬥爭的必然階段，是繼三縱隊、414串聯會之後的最高階段。三縱隊是一種分散鬥爭的階段，具有同一思潮的人們自發地組織成縱隊，批評、抵制蒯大富的錯誤；而當蒯大富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分散鬥爭不足以遏制蒯大富的錯誤時，各縱隊聯合起來，并團結一批幹部群衆，在兵團內部成立414串聯會，形成反對派，這是一種“黨內有派”的階段；當蒯大富一意孤行，堅持錯誤時，我們祇能與他徹底決裂，成立自己的組織，這是“黨外有黨”的階段。我說，我們與蒯大富鬥爭的三個階段就是馬列主義者與修

正主義者鬥爭的三個階段，我們所走過的道路就是中國今後反修防修鬥爭的必由之路。那時候我們的自負和狂妄，由此可見一斑。

團派似乎並沒有因 414 成立總部而受到多大幹擾，他們繼續張燈結彩，披紅挂綠，緊張地籌備革委會成立慶典。全國各地的造反派代表也陸續抵達清華。我們曾開會研究如何破壞團派的慶典，有人提出，組織敢死隊衝擊大會會場；有人提出，在校門口攔阻首長車輛，訴說“冤情”，阻止革委會成立。多數人不同意採取滷莽行動，認為滷莽行動未必能阻止革委會成立，倒反而顯得 414 沒有水平，尤其考慮到周總理要來參加會議，更不可蠻幹，免得在總理面前丟臉。我們決定採取“先虛張聲勢，後突然襲擊”的策略：414 廣播臺從晚上開始不斷廣播東方紅戰團“戰備”指令，造成一種氣氛，似乎正在調兵遣將部署若幹重大行動，搞得團派神經緊張，疲于奔命，我們自己則充分休息。到凌晨 5 時左右，我們將傾巢而出，用事先準備好的大字報復蓋大禮堂區和其他重要地區團派所有的大字報，把團派慶典氣氛破壞殆盡。

奇迹在 5 月 30 日凌晨 4 點發生。團派廣播臺突然廣播謝富治給蒯大富的信：

蒯大富同志并轉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你們今天成立革命委員會，我請示了周總理，總理對你校運動非常關心，他要參加你們的成立大會，但是總理近幾天中央工作特別忙，今天不能參加你們的成立大會，總理建議你們革委會往後推遲幾天，請考慮。[17]

聽到廣播後，414 群衆欣喜若狂，他們從床上爬起身來，敲打臉盆、搪瓷杯和一切能够發出聲音的器具，歡呼團派革委會的破產和 414 的勝利。這個勝利對於我們來說也是相當意外的，因為我們拉出 414 總部，原本是想說明革委會沒有建立在大聯合、三結合的基礎上，不具備代表性和權威性，因而是無效的，沒想到革委會居然流產了。

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周總理不來參加 5.30 革委會成立大會？自從 1966 年 7 月 29 日受毛主席委托之後，周總理一直在關注清華事態的發展，也一直在過問和處理清華大學文革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我們不妨回顧一下 414 成立前後總理就清華問題所做的一系列指示。

3 月 26 日，總理接見新疆代表團時講：“清華井岡山有八千多人，內部亦有左中右，可以辯論，有辯論、有對立好嘛！對幹部要一分為二，不要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我 10 月底去清華，從支部書記、政治輔導員統統靠邊站。工作組否定一切，說他們是黑幫，是蔣南翔分子，哪有那麼多黑幫，那麼多蔣南翔分子……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遺毒，這是形‘左’實右的。”[18]

4 月 6 日，總理接見經委計委建委各派代表時講：“我問過蒯大富：你那井岡山統一了麼？蒯大富說：統一起來了，其中也有人反對我……假如造反派處于領導地位，就要允許少數存在，你們怕少數幹什麼？在運動中祇要大前提不反對，就要允許人家存在嘛！十幾年來，主流還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是一串紅綫。毛主席路線是主導的，否則怎麼能有四大呢？祇有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才有可能。你們能把這個主流忘記了麼？資本主義復辟逆流，祇能是某些地方，某些人，不能把主流

說成逆流。”[19]

4月14日，總理在廣州接見代表時講：“聯合的形式，一個學校祇能保留一個組織，如清華井岡山有一萬多人，我對他們的負責人蒯大富說，你們要注意，你們組織這樣大，組織內部就有左中右了，過去是外部，現在是內部展開鬥爭。舊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出現了。統一是暫時的，矛盾會不斷的發生。統一後又會出現新生力量，又是少數教育多數，爭取多數，不斷循環，不斷發展。”[20]

4月28日總理接見國際關係學院代表時，有人問：“聽說總理支持清華414，有此事嗎？”總理說：“什麼是414？是不是清華的一個戰鬥隊啊？”答：“不是，是清華的一個派。”總理說：“我不知道，清華我就知道有個井岡山，祇認識一個蒯大富”。[21]

5月2日，蒯大富在全校大會上傳達了周總理和首都紅代會負責人座談時與他的對話。總理問蒯：“你們的革委會什麼時候成立？”蒯答：“大概5月底。”總理說：“等你們成立革委會時，我去參加。我們準備很快派軍代表到你們學校去搞三結合試點。這件事我已經和蕭華同志講過了。”[22]

5月6日，總理又在蒯大富的信上親筆寫道“清華還是試行軍代表制，以革命造反派為基礎來實現三結合好。”[23]

5月19日，總理接見鐵道部代表時講：“你們幾個學校好好看看今天的《紅旗》雜志的文章，《紅旗》雜志的文章就是對你們講的。你們總想把人家壓服，保守派是壓不倒的，壓是壓不倒的，人家不服，結果就會變得勢均力敵。”[24]

在我看來，總理有關清華的上述指示，是總理對蒯大富

的善意規勸和正確引導，也是總理對全國造反派的善意規勸和正確引導。在規勸和引導中，總理表明了自己的原則立場：

第一，關於十七年的評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主流，紅線主導；

第二，關於當前運動，對幹部要一分為二，不要打倒一切，對群衆中的反對派，要允許存在，允許辯論，不要壓服；

第三，關於革委會，試行軍代表制，實現三結合。

我們不難看出，總理的這些原則立場與中央文革鼓吹的否定一切、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奪權是針鋒相對的。蒯大富之類的造反派當然聽不進總理的話。

“清華還是試行軍代表制，以革命造反派為基礎來實現三結合好。”這是總理處理清華問題的基本方針，它體現了總理依靠軍隊代表，約束造反派，保護幹部，穩定局面的一貫思想。

然而，身為副總理的謝富治在處理清華問題時，竟無視總理的一系列指示，用“蒯大富下臺——414上臺——蔣南翔上臺”的斷語，對抗總理處理清華問題的基本方針。謝富治和中央文革執行了另一個基本方針，這就是：支持蒯大富，打擊反對派，壓制革命幹部，使單一的紅衛兵政權合法化。他們的險惡用心是慾慮、縱容蒯大富之類的造反派繼續搞亂社會，以便這些野心家們亂中奪權。

蒯大富甘心投靠中央文革，迫不及待地要將他的蒯氏獨裁政權披上革委會的合法外衣，這是總理所不能容忍的。總理以委婉的方式行使否決權，建議革委會推遲幾天，總理這一英明的“建議”使得蒯大富的革委會“推遲”到了

永遠。

這時，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地質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北京郵電學院、北京體育學院和北京林學院都已經成立了革委會。而作為中央文革“鐵拳頭”的蒯大富，作為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一的蒯大富，盡管他在北京、在全國，名聲顯赫，影響巨大，他的一句口號、一個指示、一張大字報都足以掀起某地的血雨腥風，但却始終未能將他在清華建立的獨裁政權披上合法的外衣，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必然。

盡管總理沒有正面承認 414，我們也從本質上感到總理對 414 的巨大支持。

形勢的發展比我們預料的要快，414 串聯會大批戰鬥組發表聲明脫離團派總部，加入 414 總部，有些團派分部負責人帶着群衆集體加入 414。到 6 月底，414 的“分會”全都改為“分部”，“414 串聯會”被“414 總部”取而代之，“一個兵團，兩個總部”的格局正式形成，清華大學已經一分為二。

## 內外反應

對於這種形勢，團派是決不甘心的。5 月 31 日，團派中的極端分子成立了 624 戰團，他們在《624 戰團成立宣言》中說：

這場鬥爭的雙方，一方是以總部、部隊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一方是以 414 總部為代表的保守派。

這場鬥爭的實質，就是資產階級復辟和無產階級反復辟，就是你下臺，我上臺！

這場鬥爭的實質就是鬥批改大權落于誰手的問題，這場鬥爭的結果關係到清華今後走什麼道路的問題。

624 戰團第一個任務就是向這個偽 414 總部代表的保守思潮宣戰！我們要把這個分裂主義、保守勢力集合成的絆腳石一脚踢開！徹底砸爛！

同日，兵團總部發表聲明，向北京和全國各地的造反派代表解釋周總理沒有來清華參加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的原因是“為了教育和團結 414”，並繼續指責“414 是右傾保守思潮的代表”，“414 的成立是旨在搞垮蒯大富”，“414 攻擊謝副總理，對抗最高指示，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等等。

414 總部的成立也在北京高校引起了巨大的反響。5 月 31 日，以北航紅旗為首的 28 個高等院校的紅衛兵組織就清華局勢發表《聯合聲明》，聲明表示“堅決支持以蒯大富為代表的清華井岡山兵團總部，永遠同他們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聲明說“四項協議是一個大聯合的協議，是一個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協議，是一個為堅決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井岡山人撐腰的協議”，聲明譴責 414 負責人公開拉出 414 總部，用分裂的手段破壞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是極端錯誤的，無論在北京，還是在全國，都已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聲明說：“對於分裂主義的產物——414 總部，我們堅決不承認。”

但是這 28 個紅衛兵組織不包括師大井岡山、地質東方紅。

衆所周知，進入 1967 年以後，北京高校的紅衛兵運動出現了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從各個學校來說，在造反派組織取代了保守派組織成了當權派後，又迅速分裂成兩

個敵對的政治派別，嚴重的地方甚至發生了武鬥；二是，從高校系統來說，校際造反派組織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并逐漸演變成相互對立的兩大陣營，即後來所說的“天派”與“地派”。

“一月革命”後，北京高校的造反派組織都走出校門，積極參加社會上的奪權鬥爭。正是這種奪權鬥爭導致了高校造反派組織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北京日報》的奪權與反奪權就是一個典型事例。

1月16日，各個造反派組織駐《北京日報》聯絡站聯合發表《告北京市人民書》說：必須把舊《北京日報》的辦報方向、辦報路線及組織系統徹底砸爛，把領導權奪回到真正的革命左派手裏。

1月18日，師大井岡山聯合幾個學校成立了“促進《北京日報》新生聯絡站”，并支持《北京日報》一部分群衆組織成立了“《北京日報》革命造反委員會”，奪了《北京日報》的權。

1月19日，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新北大等組織成立了“創立新《北京日報》聯合委員會”，并支持另一派群衆組織從“《北京日報》革命造反委員會”手中進行了再奪權。

隨後師大井岡山聯合地質東方紅等組織發表聲明對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新北大的再奪權行動予以譴責。五大領袖之間的分歧已初見端倪。

在聯合奪權的問題上出現了兩種傾向。清華井岡山、新北大熱衷于跨行業的大聯合，倡議召開“工農兵學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會”；師大井岡山、地質東方紅則致力于北京高校紅衛兵的大聯合，醞釀成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

表大會”。也許正是這兩種傾向最終導致北京高校紅衛兵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

一月中旬，以北京市三個工人組織為核心，加上原北京市委的造反派，聯合了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北大校文革，成立了“北京市奪權委員會”。一月十八日奪了市委大權，此舉得到了謝富治的支持。

1月27日，由清華井岡山、北大校文革和北京第一機床廠等33個單位發起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倡議召開“工農兵學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會”。

2月1日，“北京市奪權委員會”與“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舉行雙邊會議，決定成立“北京人民公社”。

在籌建“北京人民公社”的活動中，清華井岡山、北大校文革起主導作用。

2月4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醞釀成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

2月16日，三個紅衛兵司令部召開各單位代表大會，討論成立“紅代會”，設立了由地質東方紅、林院東方紅、農機東方紅、北航紅旗、輕工紅鷹、師大井岡山、礦院東方紅等七個單位組成的籌備處。在這個籌備處裏，地質東方紅、師大井岡山起主導作用，清華井岡山和新北大公社被排斥在外。

2月17日，根據謝富治的指示，“紅代會”籌備處吸收清華井岡山和新北大公社參加。（受“公社”風的影響，北大校文革改名為新北大公社）。

2月18日，謝富治指示“北京人民公社”停止發展。聶元梓、蒯大富的“工農兵學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會”胎死腹中。這是因為毛主席放棄了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

想法，主張成立“革命委員會”。

2月22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正式成立，聶元梓、蒯大富雖被指定為核心組正、副組長，但却徒有其名，主導權仍然控制在地質東方紅和師大井岡山手中。

新北大公社、清華井岡山與地質東方紅、師大井岡山之間的矛盾由此產生並不斷發展。

後來北航紅旗參與其中，五大領袖分成兩派，明爭暗鬥，互不相讓。

五大領袖之間的矛盾與各個學校兩派之間的矛盾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非常復雜的局面。

矛盾的爆發是因為北京民族學院的一個展覽會。北京民族學院有兩派，一派叫民院東方紅，另一派叫民院抗大公社。地質東方紅支持民院東方紅，新北大公社支持民院抗大公社。4月8日，民院抗大公社從民院東方紅手中搶走了展覽會的材料，轉移到新北大公社。民院東方紅向地質東方紅求助。4月11日，地質東方紅派了3000人進入北京大學，替民院東方紅向新北大公社索要材料，新北大公社組織大批人員與之對抗，雙方發生大規模武鬥。

414成立之初，我們無暇過問社會上的運動，對五大領袖之間的恩恩怨怨知之甚少。當時盛傳紅旗雜志社的負責人林杰是北師大譚厚蘭的後臺，我們對紅旗雜志社特別崇拜，因而對他們支持的師大井岡山抱有好感。而師大井岡山和地質東方紅對清華414採取了支持的政策。我們上街游行經過這兩個學校時，總要進入這兩個學校的校園，他們都給以熱烈歡迎。我們感到很親切。宿長忠不知道通過什麼關係和師大井岡山建立了聯系渠道。414成立後的很長時間裏，我們都無權參加中央首長的接見，宿長忠總是從

師大井岡山那裏借來首長講話稿，向 414 戰士傳達。我也通過 414 戰士的介紹認識了地質東方紅的一位負責人劉海濤。我們游行到地質學院時，劉海濤常常出面帶頭鼓掌歡迎，還會對我講些支持鼓勵的話。據說後來他因反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

在“天派”、“地派”對抗日益加劇後，我們 414 核心組專門討論過這一問題。我們的結論是：“天派”與“地派”之爭僅僅是“權力”之爭、“核心”之爭，不是“觀點”之爭、“思潮”之爭，沒有任何理論色彩，與我們清華兩派的鬥爭沒有共同之處。因此我們 414 不值得卷入“天派”與“地派”的鬥爭。但是我們也不必拒絕師大井岡山和地質東方紅對我們的支持。因為 414 是作為蒯大富的對立面存在的，自然而然地，外界把我們 414 看成“地派”成員。

北航紅旗為首的“天派”28 個高等院校的紅衛兵組織承認不承認 414，對我們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地質東方紅、師大井岡山等“地派”骨幹組織間接承認了 414。此前不久，即 5 月 18 日，他們還發表聲明表示“一如既往堅決支持以蒯大富同志為首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而現在他們却不再參加譴責 414 的大合唱。

中央文革對於清華事態的發展和 414 總部的成立保持沉默，就連謝富治也一言不發。在清華的問題上，祇有林杰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6 月 9 日，林杰與輕工、礦院、清華部分同學座談時說：

關於清華問題，不要跟着人家瞎跑。凡事都要經過自己的大腦，要進行科學分析。我看真正有作為的人是那些並不出名的小人物，善于用毛澤東思想分析問題的人。不要

做振臂一呼的英雄，象蒯大富，當時講一句話，就有許多人響應。不是因為他自己有什麼了不起，而是他站到了歷史的前面。才二十多歲，有什麼了不起？如果認為了不起，那他就危險了。五四就有許多風雲人物，象陳獨秀、張國燦……當時有兩個人是很偉大的，一個是毛主席，一個是魯迅。

有人問：清華 414 你了解嗎？

林杰：不了解，我和 414 沒有接觸。

團派對林杰說：414 最近給我們上綱很高，什麼總部長期以來背離了毛主席革命路線，要反總部的形“左”實右。

林杰：我看你們總部確實是形“左”實右，有些問題，象《紅旗》調查員文章，那是很明確的。王光美看得跳了起來，她給毛主席說我們不實事求是，可你們看不清。都是通過陳繼芳安排人了解的。最後我親自去把他們都找來問材料是否屬實，他們說是事實。在這個問題上 414 是對的。有人說我支持 414，沒有權無所謂支持不支持。誰對，我就支持誰。[25]

6月14日下午，北航紅旗戰士訪問林杰，林杰說：

蒯大富在處理 414 問題上有很多錯誤，把他們打成反動逆流是壓而不服的。這樣兩派誰也不能垮，就要看誰走得更遠，誰走得更遠，誰就垮。414 到底什麼觀點，我也没有很好了解過。（有人談到 414 錯在分裂上，林杰表示同意。）[26]

6月16日，他主動打電話給北航紅旗的井岡山說：

我根本和團派、414 都沒有接觸。但是我還是希望兩派都聯合起來，文化革命中涌現出來的小將需要進步。外面傳我支持 414，我和 414 沒有任何聯繫，過去找過我，但沒有見過面，談不到支持。還有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會嘛！

對清華同意謝富治的意見。希望蒯大富、414 聯合起來解決清華問題。蒯大富在反劉鄧中有很大作用的。兩派，一派搞垮另一派是不行的。團派和 414 互相說要搞垮另一派，分裂是錯誤的。現在清華已經分裂了，人數又多，需要慎重對待。謝富治去過，你們有力量可以促進他們的聯合。你們或師大，你們應多做一些。[27]

林杰這些言論我們是後來斷斷續續了解到的。事實上，我們 414 和林杰沒有什麼聯繫，祇有汲鵬見過林杰一面，還是團派同學引見的。我們支持《紅旗》雜志的文章，我們覺得《紅旗》雜志和我們的觀點一致，我們從《紅旗》雜志那裏得到支持和力量，使我們在清華和團派的辯論中處于有利的地位。所以《紅旗》雜志一發表社論，414 就趕緊派人去祝賀，清華有什麼問題，我們也是派人去反映情況。因此我們和《紅旗》雜志社的工作人員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於是外界以為林杰是 414 的後臺，林杰當然不願意做 414 的後臺。林杰前兩次講話似乎站在客觀立場上評論兩派，但更傾向支持 414。他實在不知道水木清華的水有多深，清華也不是他可以隨便發表意見的地方。6月16日，不知道他受到什麼壓力，匆忙聲明和 414 摆脫幹系，并表示支持謝富治處理清華問題的意見，那個意見就是支持蒯大富，否定 414。

## 組織狀況

414 的組織是在與團派的鬥爭中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到 6 月底已基本成型。那時，學校的基層單位即各系的學生班級、各教研組、各處、科、室都已一分為二，絕大多數基層單位都有了 414 的群衆，他們持有 414 的觀點，參加 414 的活動，其中許多人組成了戰鬥組，積極寫大字報發表政見，參與辯論。基層單位 414 群衆的集合就是 414 的基層組織。414 的基層組織大多數沒有名稱，祇有少數單位自稱為 414 某某支部或某某支隊。

支撑 414 總部的柱石是 414 分部，分部是以學校的二級行政單位為基礎建立的。十一個系就有十一個 414 分部，這十一個系的 414 分部，是 414 的主體，因為學生大部分都在這十一個系裏。除此之外，幾乎每個二級單位都有相應的 414 分部，如 200#分部、基礎課分部、行政處分部、研究生分部等等。414 組織大型活動如全校大會、上街游行、下鄉支農、擁軍愛民等都以分部為單位布置任務、組織隊伍。總部經常召開分部負責人聯席會議，討論形勢、決定方針、研究策略、分配任務。分部負責人既不是總部任命的，也不是群衆選舉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每個分部有幾名負責人，他們觀點鮮明，立場堅定，品德優秀，威信很高；他們既能够寫大字報參與辯論，又能够動員和組織群衆，414 的基層組織主要靠他們掌握和維系；他們是 414 的骨幹分子和中堅力量，不少人先後都成了 414 總部委員，參與領導工作。

戰鬥組可以說是基層組織的核心。414 經常召開戰鬥組組長會議，就某些重大問題闡述總部的戰略與策略并接受

質詢。這類會議一般有幾百人參加，並不局限于戰鬥組組長，許多 414 積極分子也參加。會上一般安排一、兩個頭頭做主旨發言，隨後是自由論壇，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時有激烈的辯論，但一般都能達到統一思想、協調行動的目的。戰鬥組組長會議是公開的，與會者可自由進入，因而經常混入一些“奸細”，我們討論的事情，第二天就會在團派的動態報上刊登出來。

戰團是一種特殊的組織，它是跨越行政單位的具有相同觀點的若幹戰鬥組的集合。最有代表性的是東方紅戰團和三七戰團，他們是 414 中兩個不同的政治派別，前者是 414 中的鷹派，後者是 414 中的鴿派。這兩個戰團主導着 414 的政治方向。

414 還有“五二戰團”、“三軍戰團”、“風雷激戰團”，這三個戰團是 414 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五二戰團”中的“五二”即五月二日，這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講演的日子。你可別小看這個 414 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她聚集了清華大學文藝社團的精英，經常自編自演一些在當時來說政治水平、藝術水平都很高的歌舞節目，他們的表演與專業隊伍相比毫不遜色，其中最受歡迎的節目是毛主席詩詞大聯唱。他們在清華演，在北京演，還到外地演出。據說文革中北京祇有三支文藝演出隊伍最出名，排在第一的是三軍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第二是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我們 414 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排第三。第一名集軍隊文藝之精英，第二名集首都高校文藝之精英，而我們僅憑一派之力就可名列三甲，着實讓我們自豪。

二七戰團是 414 中的工人組織，成立於 67 年 8 月 8 日。

其前身是 67 年 6 月 1 日行政處 414 的工人成立的“六一戰團”。67 年 12 月 19 日，團派成立了“清華大學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我們知道當初上海的“工總司”用武力殘酷鎮壓了“上柴聯司”。我們極擔心蒯大富仿效上海“工總司”，以工人階級的名義，用武力鎮壓 414。我們絕不能讓“上柴聯司”的悲劇在清華重演，因此 68 年元旦後我們馬上將各單位的 414 工人群衆組織起來成立了“清華大學革命工人造反總部”（簡稱“革工總”），形成某種威懾力量，與團派的“工總司”相抗衡。

414 的領導機構是總部及其核心組，414 的一切重大決策均出自總部特別是核心組。核心組由我、孫怒濤、陳楚三、宿長忠、劉萬璋、汲鵬、陳家國、張雪梅和蔣南峰等人組成。總部委員進進出出，基本保持 30 餘名的水平，其中 20 多名為學生代表，其他為幹部和教職工代表。最初，幹部代表是譚浩強、龍連坤；教師代表是傅正泰、李秀英；職工代表是李振民。後來根據形勢的需要又增加了工人代表劉洪文、劉福生、吳國良、幹部代表魏洪波、曲淑鳳、胡大忻等人。

從保護幹部教師的角度出發，我們沒有吸收更多的幹部教師進入總部，也盡可能地不讓幹部教師參與 414 某些特殊的政治決策，以免他們受到牽連。我們請龍連坤、李振民一直參加核心組會議，因為他們都是轉業軍人，我們不必擔心他們會遭到老蒯的打擊。龍連坤、李振民總是旗帜鮮明地支持我們的決策，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而後來總部增加的幹部代表魏洪波、曲淑鳳、胡大忻三人也都是轉業軍人出身的基層幹部。除譚浩強外，清華牌的中上層幹部始終都不能進入 414 的領導核心。

毫無疑問，青年學生是清華 414 的主體和中堅力量，也正是這些青年學生始終主導着清華 414 的政治方向并最終承擔了全部政治風險。

414 總部機關建立了極其簡單的工作機構，設有辦公室、幹部辦公室、組織部、宣傳部、政治部、後勤部、保衛部、作戰部等部門。辦公室、組織部、後勤部、保衛部的功能無須解釋。政治部負責 414 內部政治思想工作，幹部辦公室負責解放幹部，作戰部負責鬥爭走資派，宣傳部最重要，下面分廣播臺、報紙、動態、簡報四個組。動態組搜集動態主要是中央首長講話并編發《聯合風暴》、簡報組編寫簡報，不定期地向中央匯報清華及 414 的情況和觀點。後來又隨形勢的需要成立了鬥批改辦公室、教育革命辦公室等等。

到六月底，414 已經發展到 7000 人。從 414 串聯會成立之初的 700 人，到 414 總部的 7000 人，祇有短短三個月的時間，這一事實生動說明，以蒯大富為首的井岡山兵團總部從來就沒有真正贏得清華廣大師生員工的心，團派從來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多數派。從兵團成立的第一天起，他們就用“蒯派”這個政治詞匯將他們自己置身于清華廣大師生員工的對立面，通過“反唐”、“反托”、“否定八八”、“圍剿八九”、“解散幹部堆”和“反 414 復辟逆流”，一步步將清華廣大師生員工推向 414，造就并鍛煉了一個強大的反對派。

# 第四章 思潮之爭

## 爭取主動

6月12日，蒯大富在全校支農政治動員大會上說：今晚見到了周總理，總理很關心地問：“你們聯合起來沒有？”我說還沒有做到。總理說：“你們聯合起來嘛！聯合起來打美帝。”[28]

總理的講話對清華師生員工的觸動很大，特別是414群衆強烈要求頭頭採取實際行動，主動與團派實現大聯合。6月14日414總部在西大飯廳召開形勢討論會，多數意見主張大聯合。

經常到二院223室給414頭頭們出謀劃策的群衆、特別是一些幹部提醒我們說，414雖然不是當權派，但是地位也發生了變化，變成了名副其實的群衆組織，擺在第一位的是要正確認識團派群衆，祇有解決這個認識問題，才能真心實意地與團派搞聯合。

414核心組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我們認識到，團派群衆的政治觀點與414不同，就其總體說來，主要是思想認識上的不同，跟他們的階級地位、家庭境遇以及在學校的表現都沒有必然聯繫。414與團派之間是觀點之爭、思潮之爭，雙方都認為自己堅持的是真理，所謂兩軍對壘，各為其主嘛！我們和團派的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左”的做法對付團派群衆，必須立即停止在團派群衆中抓所謂的“痞子”，而要突出兩派之間的原則分歧，強調兩派之間平等地進行論戰。

414 的群衆還建議我們抓住大聯合的旗幟，提出大聯合的具體方案，爭取主動權。

我們認真研究了群衆的意見，搞了一個大聯合的方案，在公布這個方案之前，我們決定讓幹部在大聯合的問題上發揮發揮作用。

6月15日，414總部委員、工農幹部代表龍連坤、李振民貼出《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促進革命大聯合——兼答復韓銀山、張修身同志》，強調革命幹部要為實現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出力，對雙方有爭議的問題如150名幹部公開信、四項協議等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并表示第二天登門拜訪，與韓銀山、張修身討論協商大聯合的問題。

6月16日，龍連坤、李振民和韓銀山、張修身進行了三小時的會談，韓銀山、張修身堅持認為414大方向是錯誤的，拒絕承認414總部，因而未達成任何協議，但並未關上談判大門。

6月17日，414總部在大禮堂召開大會討論大聯合問題，會上公布了我們事先起草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實現我校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建議（草案）》。這個《建議》體現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團派總部，不再給他們無限上綱，但並不掩飾兩派存在的原則分歧，照樣批判他們的錯誤。

我們心裏很清楚，這個時候與老蒯談聯合，無異于與虎謀皮。我們採取的是與當年共產黨參加“重慶談判”類似的策略。我們的《建議》面向全校師生員工，面向中央文革，向他們宣示414在大聯合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和合理建議，主要目的是爭取政治上的主動權。談得成，搞聯合，

固然很好；談不成，打內戰，責任也不在我們。

《建議》中提出大聯合的三個具體方案是：

(1) 成立兩總部聯合辦公室，負責組織協調全校性的活動，如進城宣傳、畢業分配、參加中央和北京市召開的紀念大會等；

(2) 成立兩總部聯合革委會籌備小組，以祇爭朝夕的革命精神盡快實現我校革命的三結合；

(3) 成立兩總部聯合總部，共同領導我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關於這三點建議，我們是這樣考慮的：第一點建議體現先易後難的原則，搞一個聯合辦公室，負責處理那些具體事務性工作，並不涉及權力的分配，從具體事情做起，慢慢建立信任機制；兩總部聯合辦公室沒有成立，但兩派經過協商還是按對等原則成立了“畢業生工作小組”，領導清華畢業生分配工作。

第二點建議是想直接籌建革委會，跨過兩個組織的聯合過程，從而避免在群衆組織席位上的爭吵。

第三點建議是成立聯合總部，兩個組織真正實現聯合，在大聯合的基礎上成立革委會。

《建議》警告老蒯：團派總部必須頭腦清醒地認識到在革委會成立以前，清華園的一切重大事情，離開 414 總部的參加，要想獨斷專行，是根本不行的！兩總部協商解決，才是辦法，想用資產階級政客手腕，“假聯合，真吞并”，那是永遠辦不到的！

我們還宣布成立“清華大學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 414 總部代表團”，由孫怒濤、龍連坤同志組成，隨時準備與團派總部代表協商解決大聯合問題。

在我們的建議裏面，提出了大聯合的幾個重要原則：團派總部承認 414 總部；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做深刻檢查；正確對待幹部；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群衆等等。

此外，我們還有一個沒有宣布的原則，那就是：對等原則。所謂對等原則就是在任何聯合機構的組成中兩派人數對等。414 的大字報、廣播臺還說了不少“大聯合要以 414 為核心”、“大聯合要以 414 為主體”的話，這不過是為了爭取對等原則而造的輿論。雖然我們相信在未來的三結合政權中，414 一定會成為主體，但在大聯合階段，要想以 414 為主是不切實際的。

承認 414 總部、按對等原則實現聯合，這就是 414 堅持的兩項基本原則。不言而喻，我們的兩項基本原則徹底否定了四項協議，當然也就徹底否定了“革籌小組”。

蒯大富肯定也遇到極大的壓力，團派群衆要求承認 414 總部、要求聯合的呼聲很高。可是，蒯大富在承認 414 總部的問題上採取了“駝鳥政策”。6月 19 日公布的一份《與蒯大富座談紀要》中，蒯大富說：

你認為承認不承認 414 總部是大聯合的關鍵。我們認為不是這樣，而是認為承認不承認毛主席贊成的四項協議才是大聯合的關鍵。對於承認不承認 414 總部的問題，革籌和總部討論過十幾次，現在基本一致：就是不能承認 414 總部。414 總部是客觀存在，所謂承認不承認，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手段，它要達到一種政治目的。我們認為如果承認 414 總部有利于大聯合大批判，我們就承認。如果承認 414 總部不利于大聯合大批判，我們就不承認。因為大聯合大批判是當前最高的原則，也是我們的政治目的。如果我們

承認了 414 總部，那就意味着我們否定了兵團總部，就意味着我們否定了我校的革命左派，就意味着否定我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意味着分裂有理，就意味着有第三個、第四個總部出現，就意味着我們學校將分成數塊，就意味着我們撕毀了毛主席贊成的四項協議。

井岡山兵團已經得到我校、北京、全國的革命造反派甚至世界上的革命派的承認和支持。它是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中央首長一貫支持的。而分裂出去的 414 總部想取得和兵團總部同等的政治地位是不合理的，是全國造反派不容許的，因此也是辦不到的。

我完全同意和擁護謝副總理的評價：開始 414 的大方向是不對頭的，後來 414 的大方向是不好的，是錯誤的。

由此可見，不承認 414 總部，堅持四項協議，這是蒯大富的兩項基本原則。蒯大富的原則和 414 的原則針鋒相對，因而清華兩派的大聯合無從談起，出路祇有一條：大打內戰。

### 出爾反爾

1967 年 6 月 26 日下午，陳伯達、戚本禹突然來到清華，在中央主樓接見兩派組織的負責人。清華當時還有一個叫“五七戰團”的派別，屬於中間派，他們的負責人也參加了接見。

陳伯達說，他們來清華是研究教育革命問題的，因為離九月份開學時間已經很近了。他說：

過去的一套教育制度要改，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毛主席講，我們現在的這種教育制度要不得，現行的教育制度是資產階級教育制度。……每個階級社會，奴隸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根據它的需要都有一套教育制度。現在我們學校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從清朝末年有高小、中學、大學，辛亥革命以後，繼續發展了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中國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摻雜了一些帝國主義、買辦教育的東西。燕京、天津、協和、輔仁等大學都是美國人辦的，他們的目的是為美國資本主義服務的。它的制度、教材都是從歐洲來的。解放以後，我們的教學內容有些改變，增加了一些新內容，但是基本上沒有很大的變動。又抄了蘇聯的一套，而蘇聯的一套也是資本主義的一套教學制度。……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一年了，應該提出一個教育革命、教學改革的方案。教育革命的大的方向，毛主席已經指出了，已經解決了，可是要具體化，要從群衆中來，吸收大家的意見。學制、教學內容、教學時間、教怎麼教、學怎麼學，時間要多少？都要逐一加以解決。毛主席不斷批評這個問題。從小學到大學，大學畢業25歲了！青春時代，精力最旺盛的時期都放在學校，脫離社會、脫離實踐、脫離群衆，很危險，這樣不知不覺就會演變，不知不覺可以走到修正主義道路，不以人們意志而轉移！脫離勞動、脫離群衆，那不走到修正主義？不僅文科要徹底革命，理工科也要徹底革命。……你們研究一下，無產階級專政下社會主義社會的教育制度。這對資本主義教育制度是一個大革命的問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沒有的，蘇聯是沒有的。教育的革命應該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你們研究一下教改

的問題，提出一套大體的方案。不然，下半年你們怎麼開學！確定以後可以使教學大踏步地前進，可以使思想大踏步地前進，以便能够更快地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陳伯達一通長篇大論之後，團派代表說：“現在學校分裂了，没法搞教改！”414的代表馬上接過來說：“我們建議兩個總部商量一下聯合起來搞。”陳伯達說：“你們商量一下嘛！現在聯合討論教改，這就是基礎，這就是給你們一個機會，大聯合的機會。”這樣，話題就完全轉到清華兩派聯合的問題上來了。

在團派代表談到過去曾經把414打成復辟逆流時，陳伯達打斷團派的話，顯得不耐煩地說：“什麼逆流？復什麼辟呀？”我們一陣竊喜，從三縱隊開始到現在，整整六個月來，蒯大富就一直罵我們是資本主義復辟逆流，今天，陳伯達輕飄飄一句話就摘掉了蒯大富扣在我們頭上的大帽子。

在談到大聯合問題時，有一段對話，現抄錄如下：

戚本禹說：“不要搞一個井岡山兵團總部，一個414總部，還是搞一個兵團總部。”

陳伯達說：“你們可以開聯席會議嘛！能合就合，不能合就開聯席會議。”（414鼓掌）

戚本禹說：“現在能否實現大聯合關鍵恐怕開始向你們414方面轉化。”（團派鼓掌，414也鼓掌。）

陳伯達說：“要商量”。

團派說：“414提出了聯合的三個條件：第一，要我們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陳伯達說：“不要動不動就上綱。”

戚本禹說：“這一條可以不要！”

414 說：“我們可以考慮收回！”

團派說：“第二，他們要我們承認 414 總部。”

陳伯達說：“這個你們自己商量，建議你們開聯席會議，采用聯席會議的形式共同決定一切問題。”（414 鼓掌）

團派說：第三，414 要我們承認以 414 為主實現大聯合。

陳伯達說：“你們商量吧，我們不管。”

戚本禹說：“誰正確以誰為主。（414 鼓掌）天生的以 414 為主也不行。誰正確要由毛澤東思想來判斷嘛！”（兩派一起鼓掌）

陳伯達對 414 說：“現在你們人多了，價錢就高了。”

陳伯達說：“一切問題開聯席會議解決。一起辦教改刊物，搞一個共同的編輯部，人數對等。”（414 热烈鼓掌）

戚本禹馬上說：“我們不做結論，你們自己解決。”

陳伯達接着說：“我們不包辦代替嘛！”

有人講：“團派要 414 回到毛主席贊同的四項協議上來。”戚本禹問旁邊一位同學：“什麼四項協議？哪四項？”那位同學一一做了回答。

戚本禹馬上說：“剛才談四項協議，我告訴大家，那天謝副總理向主席匯報時我們倆都在場。謝副總理簡單地匯報了幾句，匯報了清華的情況，謝副總理向毛主席匯報時說：清華有兩派，這派要吃掉那一派，那一派要吃掉這一派，結果誰都吃不了誰！我向他們建議，兩派坐下來協商，也就是伯達同志剛才的意思。毛主席贊成這個精神，主席

不知四項具體內容，就是說互相不要吃掉！”

這個時候，414 情不自禁地鼓掌並高呼“毛主席萬歲！”因為謝富治的所謂“毛主席贊同四項協議”，團派廣播的“414 上臺，不行！”的所謂最高指示等等蒯大富用來打擊、壓制 414 的“核武器”，原來祇不過是謝富治編造的神話。

後來，戚本禹說：

“將來還是要成立一個總部。兵團總部要改組。”（414 鼓掌）

戚本禹接着說：“還要擴大。”（兩派一起鼓掌）

戚本禹問：“414 有多少總部委員？”

414 回答：“有三十名。”

戚本禹問：“團派有多少總部委員？”

團派回答：“有二十幾個。”

戚本禹問：“總部擴大到五十幾個不行嗎？”

蒯大富說：“我建議成立革委會就行了。”

戚本禹說：“現在你們總部都搞不統一，還搞什麼革委會？”

陳伯達說：“我們不能包辦代替！我們的意見祇供參考。平心靜氣坐下來協商，不要在枝節問題上吵架。我不贊成廣播車，它沒有用，不知道吵什麼，廣播車使人緊張。不要性急，聯合不起來，不要勉強！聯合起來搞個聯合編輯部可以吧！”

戚本禹說：“開個聯席會議可以吧？可以搞個整風辦公室！”[29]

接見之後，我們 414 的總部委員們真有些喜不自禁。我們總結，這次接見 414 有三大收獲。一是，陳伯達和戚本禹接見我們，實際上表明中央文革承認了 414 總部的合法地位；二是，戚本禹否定了謝富治的所謂“毛主席贊同四項協議”的說法，去掉了 414 頭上的“緊箍咒”；三是，陳伯達和戚本禹關於大聯合的建議及“對等原則”與我們的期望完全一樣。這些迹象似乎表明，中央文革的天平在向 414 傾斜。

不過我們覺得沒有理由高興得過早了，因為我們還有些納悶：他們怎麼說“現在能否實現大聯合關鍵恐怕開始向你們 414 方面轉化”？“現在你們 414 人數多了，價錢就高了”？把兩派的總部委員合在一起組成一個 50 多人的總部？怎麼會有這樣的好事？為什麼中央文革會說這些反常的話？這其中必有蹊蹺！

果然，晚上 8 點 10 分，陳伯達秘書王保春打電話給蒯大富，念了陳伯達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蒯大富同志轉全體井岡山同志：

感謝同志們對我們熱情支持。我們到清華大學是為着教育革命問題，來向大家請教的。我們共同的願望就是清華大學師生職工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好鬥批改。

井岡山的同志們一定要實行革命的大聯合，堅持原則，反對分裂。不說不利于革命團結的話，不做不利于革命團結的事，不貼不利于革命團結的大字報。不同意見的各方面都要注意這個問題。414 同志們更要注意這個問題。

安撫蒯大富，而遷怒于 414。我們私下裏憤憤罵道：堂堂一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怎能如此寡廉鮮恥、反復無常？什麼偉大的無產階級理論家？完全是一個卑鄙的資產階級政客！從此這位“小小老百姓”在我們 414 的眼裏就一文不值了。

### 啓用中幹

陳伯達的出爾反爾，徹底粉碎了 414 企圖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一切幻想，更加堅定了我們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信念。陳伯達的刻意打壓，不僅沒有達到壓服 414 的目的，反而激起了 414 群衆對他行為的鄙視和同仇敵愾的鬥志。

打個不恰當的比喻，1967 年的清華園，有點兒像 1945 年的中國。那時，美國改變了居間調停的政策，支持蔣介石打擊共產黨；今天，陳伯達扔掉了促進聯合的假面具，支持蒯大富打擊 414。

414 上下心裏都明白，清華大學兩派長期共存、全面內戰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們 414 只有團結一致，堅持實行 414 的政治綱領，獨立地領導本派的文化革命，才能立于不敗之地。于是，我們決定主動進攻，打一場解放幹部的“人民戰爭”。

在解放幹部的旗幟下，414 許多學生和基層幹部很早就開始調查、訪問，收集材料，尋找解放幹部的突破口，并向總部提出各種建議。

6 月 27 日，414《化九戰團》提出要大膽使用幹部，敢于觸及羅徵啓的問題。

6月28日，414總部在大禮堂召開第一次整風會議，校部28名幹部集體發言批評414總部頭頭的小資產階級搖擺性，不敢保護幹部，沒有堅決抵制那些打擊幹部的錯誤做法，不敢堅持原則，怕被別人說成右傾，對幹部不切實際地亂上綱。他們在發言中提出：

414不僅要進一步解放基層幹部，而且要敢于解放革命的和要革命的中上層幹部；不僅要解放工農出身的幹部，還應該解放所謂“清華牌”的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幹部；不僅要解放好的和比較好的犯有一般錯誤的幹部，而且要敢于解放犯了嚴重錯誤但還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幹部。

6月30日，414總部召開第二次整風會議，會上宣布改選總部和分部委員、設立政治部、教改辦公室和八九問題聯絡站，吸收幹部參加414各級領導機構工作。

7月1日，在紀念“七·一”大會上，我們讓羅徵啓代表15名幹部發言，為他出馬製造輿論。

7月2日，我們又召開了幹部問題整風會，成立幹部辦公室、鬥批改辦公室，安排了一批幹部參加這兩個辦公室工作。幹部辦公室成立後發布了第一號通令，宣布廢除團派3月8日的“通令”，解除對劉冰、胡健、何東昌和艾知生的專政，給以四大自由。

當時有些414戰士向我們頭頭叫板：你們不要做口頭革命派，總部委員中沒有中上層幹部，為什麼不讓羅徵啓到總部擔任領導工作？我非常贊成啓用羅徵啓。414總部委員中原來祇有一個幹部代表譚浩強，後來又增加了幾名工農

幹部代表，如龍連坤，但他們的級別比較低。羅徵啓是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屬於“清華牌”的中上層幹部，讓他當總部委員會才能說明我們身體力行，真正解放並重用幹部。

然而，這一想法遭到了 414 內部很多人的反對，主要理由是：中上層幹部犯過嚴重錯誤，不能擔任領導工作。

《十六條》中把幹部分成四類，一類是好的，二類是比較好的，三類是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四類是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現在每個幹部檢查時都說自己犯了嚴重錯誤，這豈不是說每個幹部都是三類幹部？豈不是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是好的、比較好的”相抵觸？我覺得要真正解放幹部，除了“平黑”，還必須摘掉幹部頭上“嚴重錯誤”的帽子。

7月5日，我寫了一篇文章《什麼“嚴重錯誤”？——從起用王學芳、羅徵啓談起》，黃瑞和看了以後表示的贊同，遂以《千鈞棒》和《不怕鬼》的名義發表。文章首先批判

“犯過嚴重錯誤的幹部一定不能擔任領導工作”的口號，指出：在什麼是犯了嚴重錯誤的概念還很不清楚的情況下，這句口號成了壓制幹部起來革命的口號，也是束縛革命小將不敢大膽使用幹部的口號。

文章指出：幾乎每一個幹部都說自己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僅僅這一點就足以說明“犯過嚴重錯誤”這個概念已經包羅萬象，因而也成了一副镣铐。

文章說：王學芳、羅徵啓這樣的同志錯誤並不能算為嚴重，他們的大節是好的，從他們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來看，他們的政治立場基本上是堅定的，他們是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文章強調：

在我們學校，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比較好的。他們執行的基本上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們對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作了頑強的鬥爭、堅決的抵制。他們除了在去年六月一日——十日曾受蒙蔽而站在群衆的對立面外，以前的錯誤根本就談不上嚴重。這些基層幹部過去的政治立場是堅定的，他們所做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應該基本肯定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馬列主義政黨，我們的絕大多數黨員、大多數幹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是群衆中的先進分子。我們學校的黨員、幹部也是這樣的，他們是先進分子！這是不容任何人抹煞的，他們的先進面目必須迅速恢復！現在的從上到下大多數幹部都是犯了嚴重錯誤的說法，純粹是劉鄧所散布的“黨員不如團員，團員不如群衆”的反動謬論的翻版！對於這種謬論必須徹底批判！

必須對幹部過去的錯誤進行實事求是的階級分析，作出客觀的評價，這才是合乎毛主席幹部政策的作法。

在否定了王學芳、羅徵啓過去“犯過嚴重錯誤”的說法後，文章又肯定了他們的現實表現，贊揚他們與“紅教聯”頭頭及其散布的反動觀點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并在高壓下參加414，盡管挨批、挨打、挨鬥，仍不屈服，足以說明他們有了很高的路線覺悟，應該大膽使用。

文章呼吁：“即使是犯了嚴重錯誤的革命領導幹部也可以大膽的提拔到各級負責崗位上去！”

其實，我對王學芳、羅徵啓並不熟悉，平時和他們也沒有什麼接觸。我敢于為他們說話，完全是從概念出發的。

我的基本認識是：清華大學自己培養的學生，歷史上沒有政治問題，留校後成長為黨的幹部，有些缺點錯誤是難免的，但哪裏談得上犯了嚴重錯誤？

這篇大字報貼出來以後，遭到了團派不少批判。<sup>414</sup>也有人批評我是“寧右勿‘左’”，還有一些戰鬥組貼出大字報，要“沈如槐滾出 414 總部”。

為了回答他們，我又寫了一篇名為《什麼“寧右勿‘左’”！》的大字報，大聲疾呼反對寧“左”勿右，提倡實事求是和階級分析。

最後，我們還是大膽解放並使用了王學芳和羅徵啓。我們安排王學芳為 414 幹部辦公室的負責人，安排羅徵啓到 414 宣傳部工作。與此同時，我們啓用了一大批中基層幹部參加 414 總部各個機構工作。遺憾的是 414 總部委員中始終沒有清華中上層幹部的代表。

## 衝擊上幹

解放和啓用羅徵啓和王學芳等中層幹部祇不過是小試牛刀，我們還要向清華的上層幹部發起衝擊，就是說要大膽解放和使用清華的上層幹部。7月3日，我寫了一份大字報《要什麼樣的幹部？》。大字報提出：我們必須敢于選出犯過錯誤，甚至犯過嚴重錯誤，而現在已經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革命領導幹部來擔任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工作。

大字報說：之所以要解放革命的領導幹部，是因為他們政治上比較成熟，組織能力强，鬥爭經驗豐富，有為無產階級國家掌權和管理業務的能力。一般幹部和群衆，除了

個別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突出進步較大，可以擔任領導工作外，一般是擔負不了的。這已經為一年來文化大革命的實踐，特別是革命派掌權後的鬥爭實踐所證實。

與此同時，尹尊聲的《刺刀見紅》戰鬥組發表了《革命小將要勇于讓賢》的大字報，明確提出：“要大膽使用幹部就必須讓賢，就要勇于把革命的領導幹部放到重要的崗位上去，就要讓幹部起核心和骨幹作用，要勇于把自己的權力讓給革命的領導幹部，革命小將獨攬大權的現象必須改變。”

當然，上述這些提法並不是我們的發明創造，而是當時《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所宣傳的觀點，我們 414 不過是要在清華園貫徹執行這些正確的觀點罷了。

團派當然不同意 414 的觀點。在團派看來，清華情況特殊，清華的幹部已經爛掉了，清華左派力量强大，學生可以單獨掌權。他們認為 414 的觀點是不值一駁的，解放領導幹部，讓領導幹部來分享權力，成為三結合的骨幹，這不是為黑幫翻案嗎？這不是資本主義復辟嗎？我們造反派浴血奮戰，打下了江山，現在讓幹部來摘桃子，辦不到！

至于清華的幹部怎麼辦，葉志江的大字報《清華幹部的出路——祇能由左派掌權》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設計方案。文章在考察了清華幹部問題上“客觀存在的事實”後斷言：清華幹部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他們不是左派，而是中間派，是小資產階級，很容易成為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如果一定要說他們是無產階級當權派的話，那祇能把他們稱為蹩腳的無產階級當權派，就像列寧當初所稱的蹩腳的革命家一樣。文章說：

一切蹩腳的無產階級當權派……都應該降職使用或幹脆當老百姓，而決不能掌大權，也不能為他們塗脂抹粉，更不能讓那些裝着可憐相的走資派混進三結合機構，否則資本主義復辟隨時都是可能的。——這種可能性在清華園裏是何等明顯啊！這就是我們對幹部問題的第一個結論。

……大膽地提拔地位低的左派幹部到領導崗位，使他們掌實權，成為核心，這就是我們對幹部問題的第二個結論。

你們形“左”實右，當我們提出了這兩個結論後，不出所料地會遇到這樣的責罵。

讓他們去責罵吧！而我們則堅定地相信，只有同這種機會主義者作無情的鬥爭，才能够正確解決清華的幹部問題、三結合問題、政權問題。這就是我們對幹部問題的第三個結論。

團派要同 414 的機會主義作鬥爭，414 則要與團派的形“左”實右作鬥爭，兩派就這樣反復論戰，誰也占不了上風。

可是，我們不能停留在論戰上，我們要把自己的觀點和理論付諸實踐。7月8日，由陳楚三的《戰地黃花》、汲鵬的《輪機兵》等 81 個戰鬥組，譚浩強、羅徵啓、陳聖信等 20 多名中層幹部和龍連坤、魏宏波、王學芳等 20 多名基層幹部聯合發起成立了《堅決貫徹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發揮革命幹部的領導核心和骨幹作用串聯會》，簡稱《幹部問題串聯會》，其宗旨就是解放中上層幹部，發揮革命幹部的領導核心和骨幹作用。414 組織這樣一個串聯會是為了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向中上層幹部衝擊的運動。串聯會的宣言說：

幹部問題的切實解決，迫在眉睫，勢在必行！半年來的鬥爭實踐已經證明，紅衛兵單獨掌權，就是不行！祇有一大批革命領導幹部衝殺出來，參加臨時權力機構，成為骨幹和核心，才能更好地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上來，實現以左派為核心的最廣泛的大聯合，才能建立革命的、有權威的、有代表性的臨時權力機構——三結合領導班子。

宣言還說：

我們的串聯會要堅決地貫徹毛主席的幹部政策。不怕沾“黑邊”，敢于邁大步，不怕走“極端”，敢于在被人們視作畏途的問題上作新的探索。我們要為一大片革命幹部殺上第一線鳴鑼開道，吶喊助威。對待一大片，我們就是要勇敢地保，熱情地幫，大膽地用。即使是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我們也用採取“一看二幫”、“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幫助他們做到三劃一站。我們要找出幹部隊伍中的關鍵人物，大膽解放那些已經被一些人認定為四類而實際上並非四類的幹部，讓他們全身心地投入運動，在大風大浪中認識和改正自己的錯誤，經受考驗和鍛煉。

誰是清華中上層幹部隊伍中的關鍵人物？呂應中，非呂應中莫屬！因為他既是黨委常委，又是“清華牌”幹部，把這個典型突破了，清華牌中上層幹部的解放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呂應中，清華大學黨委常委、200#總支書記兼廠長，解放後清華大學自己培養的幹部。他既是領導幹部，又是科

學家。他領導 200#的幹部職工，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原子能反應堆。我們聽過呂應中的報告，我們為他的成就感到自豪。這不僅是清華的驕傲，也是中國的驕傲。呂應中道路，就是“紅色工程師”的道路，就是“又紅又專”的道路。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都一直認為呂應中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414 總部核心組在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上，和 200#分部的負責人反復研究策劃，決定大膽解放呂應中同志。

作為第一步，由 414 的 200#分部負責幫助呂應中做到“三劃一站”。

所謂“三劃一站”是指同黨內走資派劃清界限、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劃清界限、同自己的錯誤劃清界限，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實際操作上就是要求幹部在群衆大會上，長篇大論地批判走資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自己的錯誤。然後接受群衆的批評幫助，并根據群衆的意見，不斷地給上級領導“上綱上線”，不斷地給自己“上綱上線”。做檢查的幹部態度要誠懇，語調要低沉，最好是聲泪俱下。這樣反復幾次，大多數群衆沒意見了，這個幹部就算通過了。

作為第二步，在 414《幹部問題串聯會》組織的第一次辯論會上，我們安排呂應中同志發言，讓他在全校師生員工面前亮相；同時又安排幾個戰鬥組發言支持呂應中站出來亮相。

呂應中自己還寫了《我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字報。

一個黨委常委級的幹部在 414 的大會上亮相，這在清華文革以來還是第一次，立刻在全校引起了軒然大波，414

和團派都有人指責呂應中這樣做是挑動群衆鬥群衆。為此清華園圍繞呂應中問題又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大辯論。這場大辯論既是 414 與團派的大辯論，又是 414 內部不同意見的大辯論。

在解放呂應中的同時，我們還在秘密進行解放劉冰的工作。

當時 414 有一個叫 223 戰團的班子在做解放劉冰的準備工作。我們核心組召開過會議，專門討論在清華黨委幾個副書記裏面，哪一位可以最先得到解放。我們認定，清華黨委幾個副書記不可能都是黑幫，一定要從劉、胡、何、艾幾個黨委副書記中找出典型加以解放，才有震撼作用。開始我們討論了兩個人選，一個是李壽慈，一個是劉冰。經過權衡，我們覺得，李壽慈同志身體不好，不主持學校工作，解放他，對解放其他幹部沒有什麼影響力；而劉冰是第一副書記，蔣南翔不在時由他主持清華工作，解放了劉冰，其他幹部都好辦了。再說，劉冰是工農幹部，畢業於延安抗大，歷史清白，經過戰爭考驗，解放他，無論在清華，還是在中央，遇到的阻力都會小些。於是，我們決定抓緊做劉冰的解放工作，由 223 戰團秘密進行，414 幹部辦公室不插手此事，以免引起政治上的被動。在 414 的歷史上，沒有經過群衆討論而做出重大政治決策，這是唯一的一次。

223 戰團的同志經常向我匯報解放劉冰工作進展的情況。7月7日，223 戰團的人安排我去一號樓看望了劉冰。我和劉冰談了話，鼓勵他放下包袱，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我的舉動實際上是向劉冰發出了 414 準備解放他的信號，劉冰當時很感動，還流了眼泪。

7月8日，劉冰貼出大字報《打倒私字怕字，勇敢投入文化大革命》，要求四大自由，“要做革命的動力”。7月16日，223 戰團和劉冰同游頤和園，繼續做他的思想工作。7月17日，劉冰又貼出大字報《響應黨中央號召，投入到革命的大批判中去》。

223 戰團和劉冰的行動當然瞞不過團派的眼光。他們認為這是黑幫瘋狂的翻案活動。17日，團派揪鬥劉冰並將他游街。

414 向中上層幹部衝擊的結果，使很多中上層幹部的思想得到了解放。7月15日，414 的 331 名幹部又發表了《致全校革命的師生員工及革命幹部的公開信》。廣大幹部並沒有消極被動地等待別人的解放，而是主動積極地參加文化大革命。但是，414 解放幹部的種種舉措，並沒有使哪個上層幹部得到真正解放，相反却大大激化了 414 與團派的矛盾。正如 414 幹部辦公室的負責人所說：我們解放幹部的工作總是事與願違，祇要 414 指名解放某一位幹部，團派就要收羅罪名殘酷打擊這位幹部，414 解放某一個幹部，團派就打倒那個幹部，因此，414 每解放一個幹部，實際上也是害了這個幹部。

譚浩強、羅徵啓、呂應中、劉冰代表了 414 解放清華幹部的四個典型，我們原想通過這四個典型，解放清華大多數幹部。但是這四個典型無一例外地遭到團派的打擊和迫害。在團派那裏，譚浩強是“壞幹部”，羅徵啓是“堅持不改、屢教不改的走資派”，呂應中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冰是“蔣劉反黨集團的副帥”。

盡管如此，清華的廣大幹部並沒有就此屈服，他們拒不承認自己是黑幫，也不願意當逍遙派，而是響應黨的號召，

經風雨，見世面，積極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之中。他們政治敏感，旗幟鮮明，無私無畏，敢于說話。作為黨培育多年的幹部，不管他們參加了團派，還是參加了414，他們都已經將個人的進退榮辱拋至腦後，在政治壓力和政治責任感的驅使下，為黨的命運、國家的前途、人民的未來，做一分努力，盡一分責任。我為清華廣大幹部不屈不饒的革命精神所感動，他們都不怕，我們還怕什麼？

清華廣大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充分說明了清華政治工作體系的成功和清華教育制度的成功。

### 紅綫主導

解放幹部的深入，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對清華大學十七年的評價問題。團派的口號是“徹底砸爛舊清華”。過去，我們也曾高喊過這個口號，但現在必須批判這個口號了，因為這個口號成了解放幹部的重大阻力。

團派對舊清華的估計簡單來說就是：十七年來，蔣南翔推行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把清華變成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清華大學實行的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專政，是法西斯專政，是爛掉了的單位。清華廣大的幹部都在不同程度上充當了這一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不管他們的主觀願望如何，他們客觀上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是替法西斯賣力。因此，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打碎舊國家機器的原則——徹底砸爛舊清華！

舊清華實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法西斯專政？廣大幹部是替法西斯賣力？我們絕不能同意這樣的觀點，我相信絕

大多數清華師生員工包括團派的大多數同志都不會同意這樣的觀點。

7月16日，我以《千鈞棒》和《不怕鬼》的名義發表了《什麼“徹底砸爛”？——再論肯定與否定》的大字報，批判“徹底砸爛舊清華”的口號，說它是一個毫無階級分析的無政府主義口號。大字報說：

舊清華必須一分爲二！我們砸爛的祇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砸爛舊清華中資產階級破爛貨，而那些社會主義的東西，那些表現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貫徹的東西，不僅不能砸爛，而且統統要保，統統要發揚光大。

對於舊清華的封資修，對於舊清華一切反毛澤東思想的東西，當然必須徹底砸爛，而代之以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但是，清華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清華，是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照耀下的清華，這個清華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部分，無疑爲社會主義祖國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我們的幹部大多數是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們是擁護黨，擁護毛主席，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大字報充分肯定、大力歌頌了清華廣大的幹部群衆在三反五反、恢復國民經濟、整風反右、三面紅旗和經濟困難時期、四清運動、反帝反修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鬥爭中，堅決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所取得的政治、思想、經濟等各方面的巨大成就。即使對於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廣大幹部群衆也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鬥爭。

大字報接着批判團派的觀點：

然而一些無政府主義思想嚴重的人們，對於舊清華不願作實事求是的階級分析，對於舊清華要一概打倒，徹底砸爛。這些人在“徹底砸爛舊清華”的極其漂亮的口號下面做了什麼？他們說：廣大幹部從上到下都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黑綫連續”，必須根本否定。他們說：舊清華廣大幹部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修正主義的，必須根本否定。他們說：舊清華的幹部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必須根本否定。他們說：舊清華的成績也是修正主義的，必須根本否定。

在他們看來，要來一個大翻案，大喊所謂的“要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文化革命是“否定革命”、“翻案革命”。他們的否定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毫無階級分析的“否定一切”！他們的否定一切，其實并不是真正的“否定一切”。“否定一切”其實祇是否定無產階級的東西，否定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而保存下來的却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絕不允許這樣的否定！我們要批判要否定的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東西，否定的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而讓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占領一切陣地。

這篇大字報一貼出來，就在清華引起了極大的爭議。  
團派在大字報上批道：

“不許修正主義思潮自由泛濫”！

“必須迎頭痛擊沈如槐等人的機會主義思潮”！

許多 414 戰鬥組也在大字報上批道：

“沈如槐們，不要滑得太遠了。”

“你們的言行使我們認識到你們的指導思想就是寧右

勿‘左’的機會主義思想。”

“沈如槐，警惕你的改良主義。”

“沈如槐，我有點想打倒你。”

414 的一個戰鬥組在一篇大字報中說：“沈如槐等人和團派針鋒相對而寫出的‘什麼嚴重錯誤？’和‘什麼徹底砸爛？’的大字報，純粹是右傾思潮的代表作。持有正確觀點的同志必須掌權，右傾保守思潮必須清除。因此我們堅決支持讓沈如槐靠邊站的革命要求。”

面對 414 群衆如此強烈的批評意見，我沒有暴跳如雷，因為我吸取了老蒯的教訓。二月整風時期，蒯大富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觸即跳，對批評他的人實行高壓政策，結果造就了一個強大的反對派。我覺得應該容許不同觀點的存在，對於反對意見，即使有些過火，也不必在意。我了解 414 群衆的情緒，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大多數人害怕 414 在反對團派“左傾”時，走到另一個極端，犯右傾錯誤，害怕被團派抓住小辯子，給 414 造成政治上的被動。

團派《國際歌》戰鬥組在《井岡山》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要“徹底砸爛”！——也論肯定與否定》。這是一篇真正有戰鬥力的文章。文章認為：《什麼“徹底砸爛”？》回避了舊清華的“質”這一關鍵問題。文章說：

### 什麼是舊清華的質？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蔣南翔統治下的舊清華，正如周總理所指出的，是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資產階級獨立王國”，在這裏，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實行了專政。他們抵制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打擊工農子弟和調幹生，排斥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幹部。舊清華所實行的教育方針，是

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大雜燴，它的培養目標，是脫離無產階級政治，脫離工農兵群衆，脫離勞動的資產階級接班人。

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就是舊清華的質。這就是我們對舊清華所做的階級分析。

舊清華就是這樣一個被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蔣南翔之流長期盤踞的爛掉了的單位，對它必須實行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

文章最後說：

很清楚，我們與《什麼“徹底砸爛”？》的作者們的分歧決不是一個簡單地承認不承認一個革命口號的問題。文章的作者們閉口不講舊清華的質是資本主義的，而侈談什麼舊清華中的“資產階級舊世界”和“無產階級新世界”，其目的就是否認舊清華的資本主義性質，就是否認對這個爛掉了的單位實行革命變更的必要，就是要維護舊清華的資本主義制度，就是要把清華大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引入改良主義的歧途。

這篇文章說對了，我們和團派的根本分歧就在於對舊清華性質的估計。《什麼“徹底砸爛”？》中明確宣示“清華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清華，是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照耀下的清華，這個清華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部分，無疑為社會主義祖國立下了不朽的功勳。”這就是舊清華的質！舊清華的質是社會主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的！

那時在我們的思想中，舊清華是紅綫主導，政治路線是

紅的，教育路線雖然大部分是黑的，但還不全是黑的，否則我們這些工農子弟怎麼能進清華？怎麼能在政治、生活、學習等各方面受到照顧和關懷？如何評價解放後十七年的清華大學，這才是我們與團派分歧的根本之點。正是圍繞着這個問題，兩派展開了長期而又激烈的論戰。

解放後十七年的清華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這其實祇是一個最簡單的道理。解放後十七年的整個中國，都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之下，我們天天在講“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天天都在唱“社會主義好”，怎麼能說幾乎所有的單位都爛掉了、都要奪權呢？怎麼能說幾乎所有的當權派都是走資派、都要打倒呢？怎麼能說幾億人口的中國，幾千萬黨員的共產黨，祇有毛主席一個人正確？然而，在那個年代，最簡單的道理也無人相信，或無人敢于相信。因為正是毛主席用他的深奧理論否定了這些最簡單的道理。

1966 年文化革命前的中國也好，清華也好，正處于興旺時期，作為青年學生，我們大多數人沒有看到所謂“特權階層”的存在和壓迫，我們也沒有看到清華園實行的所謂“資產階級專政”，我們甚至沒有看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我們所受到的教育并身體力行的是反修防修、做革命事業接班人；減資興無、走又紅又專的道路；鍛煉身體、“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難道這都是資產階級專政，都要徹底砸爛？

### 揪劉火綫

7月9日，劉少奇被迫向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新八一戰鬥團》交了一份檢查。很快，這份檢查被公布出來。劉少

奇在檢查中敘述了文革初期他到建工學院參加文革的簡單經過；然後就他在五十多天中領導文化大革命所犯的路線錯誤和方向錯誤進行了檢討，並承擔了主要責任；接着又對他在建工學院的言行做了檢討；最後，他說：“我要向受過以我為代表的錯誤路線壓制和傷害了的革命師生員工賠禮道歉！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受錯誤路線蒙蔽而犯了不同程度錯誤的革命師生員工和廣大工作組員，他們責任甚小，主要責任在我，他們也是錯誤路線的受害者，我也要向他們賠禮道歉！”

這份實事求是的檢查，卻被團派認為是劉少奇向毛主席革命路線猖狂反撲的動員令，是反革命復辟的宣言書，是反攻倒算的黑信號。他們舉行了游行示威，說要打退劉少奇的猖狂反撲。我們覺得有些可笑，認為團派總是錯誤估計形勢，寫一份檢查就是反撲，那劉少奇每天寫一分檢查，你們是不是天天都要上街游行？

然而，我們那裏知道，中央文革對劉少奇的迫害和誣陷正在步步升級。我們祇知道，年初的時候，周總理還明確表示，劉少奇不是敵我矛盾。可到了 67 年 4 月 1 日，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在《人民日報》發表，却把劉少奇上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此以後，“中國的赫魯曉夫”就變成了劉少奇的代名詞。

4 月 10 日，清華井岡山終於將王光美揪回清華鬥爭。5 月 8 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開始對劉少奇的全面大批判。7 月 17 日《人民日報》刊登魯迅的《論費厄潑賴應當緩行》并加編者按，指出“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權派展開

革命的大批判，這是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關係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敗的大事”。7月18日，戚本禹在中南海組織了“批鬥劉少奇”大會。

蔣南峰負責對外聯絡工作，他在向414總部核心組介紹校外形勢和動態時，認為現在批判劉少奇是當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建工學院已經行動起來，他們揪住劉少奇不放。建工學院新八一在中南海西門靜坐，要求將劉少奇揪到建工學院鬥爭，並且考慮採取絕食行動。蔣南峰建議，我們414必須支持揪鬥劉少奇的行動，但不要參與絕食行動。

414總部核心組開會時，我們有兩點考慮，第一，414要高舉大批判的旗幟，免得團派再說我們是老保，團派揪鬥王光美，走在前面了，這次揪鬥劉少奇，我們不能再落後了，要走在他們前面；第二，8月5日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發表一周年紀念日，中央很可能批准鬥爭劉少奇，我們要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於是我們414決定暫時放下解放幹部的任務，把批判劉少奇作為當前運動的主要任務，在清華掀起大批判的高潮，同時支持建工學院的行動，由劉萬章、蔣南峰負責組織隊伍到中南海西門，與建工學院革命派“並肩戰鬥”。

7月18日，414總部發表《揪鬥劉少奇緊急動員令》，聲稱“要在中南海向劉少奇示威，直到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接受全國人民審判，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7月19日，414先遣隊進駐中南海西門，并與其他已經在中南海西門“安營扎寨”的五、六個單位發起組織了以建工學院為首的“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揪劉火線總聯絡站”。因為有北師大的代表參加，這個聯絡站實際上是“地

派”的聯絡站。

晚上，揪劉火綫總聯絡站在中南海西門召開了揪鬥劉少奇誓師大會。第二天晚上，“揪劉火綫總聯絡站”又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揪鬥劉少奇誓師大會。

從此，中南海四周，變成了所謂的“揪劉火綫”，紅旗林立，帳篷毗連，人潮涌動，口號震天，形成了圍困中南海的態勢。

在清華園，414 還大張旗鼓地組織批判劉少奇，要求每個系每個分部抓住一個重點問題批判劉少奇，這些重點問題是：建黨路線、教育路線、青年工作、哲學、白區工作、國際階級鬥爭、四清與文化大革命等等。

7月 26 日凌晨，戚本禹到中南海西門建工八一絕食的地方，看望那些絕食的學生，這無疑是對他們的鼓舞。戚本禹對他們說：“你們可以在這裏批，別進中南海。解放軍現在在‘保護’他，你們去解放軍怎麼辦？你們可以喊他滾出來，可以給他勒令信，在外面開批判會，發通牒令。他的出來，可別進去，他一出來，就沒有文章可做了。主席凝而不發，才能把千百萬群衆調動起來。”[33]

“揪劉火綫總聯絡站”連續四天召開批判劉少奇的大會。

7月 30 日，蒯大富、韓愛晶率隊進駐中南海西門，成立了“揪、批、鬥劉少奇火綫勤務站”。這就是“天派”聯絡站。

後來，揪劉火綫被稱為王、關、戚鼓動造反派向周總理奪權的“圍困中南海”事件。實事求是地說，在“圍困中南海”的事件上，我們犯錯誤的時間蒯大富比還要早些，祇不過 414 人微言輕，沒有蒯大富的井岡山那麼大的號召

力和影響力。所以，在我被隔離審查時，工宣隊並沒有着意追究我們在這個事件上的責任。

8月5日凌晨，謝富治、戚本禹接見了揪劉火線的代表，與他們達成協議：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人大會，慶祝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一周年，聲討劉少奇，然後所有現場人員撤離中南海。

當天下午，我作為414總部的代表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這次慶祝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一周年大會。

在天安門城樓上，我一直找機會接近周總理，在離總理不遠的地方站着。在大會進行到群衆發言時，我看見總理一個人轉身欲向大廳走去，一祇腳已經跨上臺階。我匆忙向前跨了幾大步，走到總理身後，輕聲叫道：“周總理。”

總理回過身來，“哎”了一聲，停住了脚步。

我馬上說：“總理，我是清華414的。”

總理“哦”了一聲，從臺階上退了下來，面對着我。

我繼續說：“我代表清華井岡山414總部7000名戰士向您問好，并向您敬獻414袖章。”

總理點點頭，伸出胳膊，說：“好。”

然後，我就將準備好的414袖章戴到總理的胳膊上。我接着說：“我們清華大學的師生員工都盼望着您再次來清華。”

總理說：“我一定去。”

說完以後，總理轉身走進了大廳，我也跟着進了大廳。

總理一進大廳，馬上被許多人圍住，七嘴八舌地向總理提問。總理耐心地一一解答。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有人問總理“中國有沒有特權階層？”總理明確地說：“中國不象蘇

聯，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個特權階層。”

回到學校後，我向 414 總部的同志詳細描述了在天安門城樓的活動情況，同志們聽了以後都很高興。大家認為：總理願意戴上 414 袖章，體現了總理對待群衆組織一視同仁的原則，總理的態度與陳伯達、謝富治刻意打壓 414 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風範。聯系到總理 5 月 30 日拒絕參加蒯大富的革委會成立大會，我們切實感覺到了來自總理的關懷和愛護。

而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格外感覺到了來自總理的巨大支持，這是因為，總理斷然否定中國存在特權階層，使我們堅信 414 的一系列觀點是正確的，團派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 自毀長城

正當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鬧得不可開交時，發生了武漢“7.20”事件。

早在年初的時候，中央命令軍隊“支左”，後來又發展成為“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但其核心仍然是支持左派。這樣軍隊就不得不全面地介入地方上的兩派鬥爭。可是軍隊的官兵並沒有接受中央文革的煽動去支持那些動不動就衝擊黨政機關的造反派，而是支持那些相對保守的群衆組織，於是不斷從外地傳來有關流血事件的報道。先是新疆石河子，後是四川成都，其中最聳人聽聞的消息是說青海的趙永夫下令開槍，鎮壓造反派，造成大量傷亡。中央做出了《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逮捕了趙永夫，北京的造反派為此舉行過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

這次“7.20”事件比青海事件性質更為嚴重，清華校園裏的大字報說武漢發生了“反革命軍事政變”。

小道消息說：武漢地區群衆組織分成以“百萬雄獅”為首和以“工總”為首的兩大派，兩派鬥爭激烈，武鬥不斷升級，長江大橋上架起了機槍。一般輿論認為武漢“工總”特別是“鋼工總”是革命左派，“百萬雄獅”是保守組織，武漢軍區領導支持“百萬雄獅”，抓了“鋼工總”的頭頭，而中央文革則支持“工總”。7月份，謝富治、王力到武漢處理兩派問題，他們沒有採取“一碗水端平”的原則，而是公開支持工人總部，反對另一派，結果引發“百萬雄獅”的極端不滿。7月20日，“百萬雄獅”舉行幾十萬人的武裝大游行，抗議中央文革支一派、壓一派。武漢軍區的一些官兵全副武裝參加了“百萬雄獅”的大游行，其中有一支軍隊衝進東湖賓館，抓走王力，進行鬥爭，將其打傷，并關押在軍營。

這些道聽途說是真是假，我們無法考證。為了準確地了解“7.20”事件的真相，我向大家介紹張聰爾所著的《中國1971——風雲“九·一三”》，這本書對“7.20”事件有詳細的描述。這是我迄今為止所見到的對“7.20”事件最全面的描述。現摘錄如下：

事情起於1967年2月8日，武漢的激進派在《長江日報》上發表《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十天之後，2月18日武漢軍區發表批評這個聲明的《嚴正聲明》。於是，以對《嚴正聲明》的不同態度，武漢群衆分為兩大派。<sup>5</sup> 5月16日，擁護《嚴正聲明》的群衆一百萬人，成立了聲勢浩大的擁軍組織“百萬雄獅”，事實上，“百萬雄獅”就是

在軍區支持下成立的。

但當時已是全面奪權的局面，少數造反派恰恰代表了運動的大方向，而“百萬雄獅”恰恰違背運動大方向。

中央文革當然支持造反派。軍隊則支持“百萬雄獅”，兩派都有强大後盾，矛盾尖銳，武鬥不斷。

4月16日，江青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軍內外造反派時說：“成都、武漢，那是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可以衝一衝。”于是，武漢及南下造反派提出了“打倒陳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號，甚至綁架軍區政委鐘漢華，謾罵、圍攻、毆打“三支兩軍”官兵。

7月14日，謝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團”名義去昆明、成都解決問題後到達武漢。在武漢，他們公開露面支持造反派，壓“百萬雄獅”，雙方對立加劇。

7月19日，聲討王力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武漢街頭。

7月19日，謝富治在武漢軍區師以上三百多人會上講話，稱軍區“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公開發表聲明承認錯誤。軍區應支持“三鋼”、“三新”，“百萬雄獅”是保守組織，不能依靠他們。當然這不是謝富治個人的意見，而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意見。在此之前毛澤東已到武漢，周恩來隨後也到武漢，他們已同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談過話，內容與謝的講話大體一致。

武漢軍區連夜向所有幹部戰士傳達謝的講話，下面抵觸情緒極大。“百萬雄獅”開始游行抗議。

7月20日凌晨，“百萬雄獅”兩千多人頭戴安全帽，手執長矛，乘二十七輛卡車、八輛消防車，來到軍區大院，向中央文革派駐武漢的記者說，要質問謝、王“百萬雄獅是不是革命群衆組織”等問題。

早上七時許，“百萬雄獅”代表二百餘人和一些戰士到東湖賓館王力住處找到王力，要他到軍區大院回答問題。一向以相信群衆爲口號的王力此時却賴着不走。“北航紅旗”跟來的人又氣勢汹汹辱罵“百萬雄獅”群衆，憤怒的群衆抓出王力，塞進汽車，將其拉到軍區四號大院，要其回答問題。此時軍區政委鐘漢華、副政委葉明在場保護王力。

上午，“百萬雄獅”調汽車二百多輛，出動數萬人，頭戴安全帽，手執長矛，上街示威游行。軍區、省軍區、人武部近千名軍人加入了示威游行。獨立師幾百名軍人更是全副武裝，戴“百萬雄獅”袖章，槍上刺刀，汽車上架起機槍，公開和“百萬雄獅”一起向中央文革憤怒抗議示威！一時間，武漢三鎮工廠停產，交通中斷，到處一片反對謝富治、王力的吼聲。

下午，“百萬雄獅”開萬人大會向王力示威。

21日，“百萬雄獅”再次舉行大規模示威游行，出動卡車四百多輛。連附近的黃石市也出動卡車三十多輛。并有湖北二十多個縣、市的聲援電和外省聲援。

7月21、22日，大街上出現“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謝富治”，“打倒王力”，“打倒戚本禹”，“打倒張春橋，江青靠邊站”的大標語。[34]

7月21日下午，中央文革打電話通知北京各單位，從現在起，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馬上組織游行示威，各單位自己編“打倒陳再道！打倒百萬雄獅！”之類的口號，聲援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我們得到消息後，立即組織414的大隊人馬，上街游行。隊伍步行到新街口時，突然下起

大暴雨，幾千人的隊伍，無處躲雨，祇有任暴雨將我們淋透，我們還一邊高呼口號，一邊繼續前進，向天安門進發。所有的公共汽車都停在路邊，車中的乘客看着冒雨前進的隊伍，不禁為我們鼓掌。

第二天早上，老蒯又傳達戚本禹的電話指示：“你們要去西山游行，懂嗎？”西山，那是老帥們居住的地方，據說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元帥都住在西山。去西山游行，明擺着就是要向老帥們示威。晚上北京市又通知清華大學組織兩千人的隊伍去西郊機場迎接謝富治、王力回京。這些電話也好，通知也好，都是上面與兵團總部聯系的，沒有人把 414 當作一回事。但我們 414 却是聞風而動，惟恐落後，爭着、搶着去西山、去機場，急于在中央文革面前表現一把。因為我們以為真的發生了矛頭指向黨中央的武裝叛亂，在保衛黨中央的問題上決不能含糊，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迅速行動，那中央文革可真的認為我們是保守勢力了。

“7.20 事件”的出現給林彪與中央文革相互勾結搞亂軍隊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機會。

7月 22 日，林彪主持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會議。會上林彪把“7.20 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

7月 25 日，中央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人大會歡迎謝富治、王力回京，林彪出人意料地參加了大會，凸顯了他在軍隊問題上的特殊地位。

林彪給“7.20 事件”的定性和他主持制定的中央處理“7.20 事件”的一系列措施，得到了毛主席老人家的認可。于是，陳再道遭到揪鬥，“百萬雄獅”遭到鎮壓，軍隊受到衝擊，老帥們受到迫害。

“7.20 事件”是文化革命中廣大軍民對中央文革的一次最重要、最直接、大規模、有組織的抗爭，實際上是廣大群衆對文化大革命及其所採取的路線、方針的不滿和反抗。他們雖然遭到了血腥的鎮壓，但是，他們敢于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進行英勇抗爭的精神值得我們永遠紀念。他們的抗爭更值得今天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們認真總結。我們的歷史上錯誤的東西之所以能够持續時間之久，影響範圍之廣，危害程度之深，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我們這個民族的傳統中，“逆來順受”往往被譽為傳統美德，而“揭竿而起”則常常被稱為犯上作亂。

7月22日，江青發表了“文攻武衛”的著名講話。

7月31日，《紅旗》雜志發表社論《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提出了“抓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

“7.20 事件”的出現，給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帶來了新的衝擊，清華也不例外。團派在大會上介紹武漢、江西、湖南地區的文化革命的情況，特別是軍隊與群衆組織之間的矛盾和武鬥情況，蒯大富在大會上講：現在是資本主義復辟前夜，要準備上山打游擊。

葉志江寫了一篇大字報《無產階級革命派武裝起來》，他認為：“7.20 事件”是“中央、中央軍委內兩個司令部門爭、兩條路線鬥爭的總爆發”，“軍隊內有一個黑司令部，有統一部署地鎮壓文化大革命”，“武漢事件標志着文化大革命到了新階段”，“文化革命第二次衝擊到了”，“文化革命在目前是徹底奪回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權”，必須用“文攻武衛”的辦法，用革命群衆衝擊的方式去奪取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權。文章寫道：“歷史上哪一次革命不是用槍杆子最後解決問題？不曾伴隨着大規模內戰？”因此，全

國必定要進入“武化革命”。

團派還有人鼓吹“先進的南方，落後的北京”，說北京不重視槍杆子，大批判已經不是當前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要進行第三次大串聯了。校園裏傳出消息說，團派的軍事動態組神通廣大，把全國各地的軍隊部署和其領導人搞得一清二楚，但泄露了不少軍事秘密，被軍方逮捕了好幾個人。還有一些井岡山戰士在外地參加衝擊軍區，被解放軍打死，清華開過幾次追悼會。

還有人傳來消息，王力在天安門城樓對蒯大富說：許世友、韓先楚、陳再道三大軍區司令不聽毛主席的話。蒯大富心領神會，《井岡山》報高喊“打倒帶槍的劉鄧”。7月29日，井岡山兵團總部發表了《嚴正聲明》說“武漢事件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嚴重事件，它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是有黑手操縱的，這祇黑手就是混進軍內的走資派徐向前，武漢事件是全國問題的一個集合點”。當晚，蒯大富派人抄了徐向前元帥的家，并搶走大批機密文件。

其實，蒯大富把矛頭指向徐向前並非始于今日，早在四月份，團派就在他們的雜志上發表過名為“打倒帶槍的劉鄧——徐向前”的大作。

我們東方紅戰團專門開會討論當前形勢，大家認為，“7.20事件”是突發的偶然事件，不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事件，軍隊內不存在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我們認為，文化大革命搞到現在，應當是“收”、“治”，而不是繼續“亂”，解放幹部，搞“三結合”，成立革委會，建立政權機構，這才是當前文化革命的大方向，“打倒帶槍的劉鄧”絕不是當前文化革命的大方向。目前黨政領導機關都已癱瘓，新建立的少數革委會又沒有什麼權威，文化革命想收都收不住，

完全是靠軍隊在穩定局勢，無論如何都不能動搖軍隊這支穩定力量，如果没有軍隊，文化大革命將不知如何收場，國家和人民將會面臨不可預見的局面和難以想象的災難。現在要奪軍權，就是要搞亂軍隊，就可能使文化革命這條航船觸礁沉沒。

當時我們并不了解林彪與中央文革的陰謀，但已經深深感覺到他們在把國家搞亂，把軍隊搞亂，他們是社會局面不斷動蕩的根源。早在年初，尹尊聲的《刺刀見紅》戰鬥組就寫文章提出：各種反動勢力插手軍隊，造成我軍內部混亂，企圖使我軍喪失戰鬥力。東方紅戰團的一個戰鬥組寫了名為《斥反動的“武化運動”論》的大字報，指出：“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進行的，強大的國家機器，強大的人民軍隊都牢牢掌握在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手中，這就從根本上保證了文化革命順利開展。”

然而，414 內部也有相當一部分群衆認同“抓軍內一小撮”的觀點，他們在大字報中說：“無產階級在向黨政的走資派奪權之後，除了繼續對他們進行革命的大批判，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徹底打倒之外，還必須‘宜將剩勇追窮寇’，向軍內一小撮走資派進行組織上的奪權，撤他們的職，罷他們的官，把他們統統揪出來。”還說什麼“這是奪權鬥爭的一個新時期。”

是留校堅持搞大批判，還是出去搞“第三次大串聯”？414 總部為此召開過幾次會議，我和大部分同志都堅決反對“抓軍內一小撮”，堅決反對進行第三次大串聯，所以總部幾次都做出決定，要求 414 戰士堅持留校開展大批判，禁止外出串聯。但是，414 相當一部分群衆對總部的決定意見

很大，一部分群衆不服從總部決定，你講你的，他走他的。另一部分群衆則強烈要求總部同意放人。他們說，清華園已經空了，你搞大批判給誰看？

這樣，我們又召開了一次總部會議，會上我被迫決定：同意放人外出串聯，讓他們了解各地文化革命的情況，了解軍隊問題給文化革命造成的影响。但是，我們再三聲明，決不允許 414 群衆出去衝擊軍區，不僅不能“抓軍內一小撮”，該保的還要堅決保！

我所做的決定是個違心的決定，其實是我向 414 內部極“左”思潮所做的妥協。

這樣，414 的人也大批離校出去串聯了，414 總部的主要負責人特別是東方紅的骨幹外出的也不少。張雪梅帶了一幫人去武漢設了聯絡站，這是 414 總部在外地設立的第一個聯絡站。

陳楚三帶了一幫人去了哈爾濱，本想辦個聯絡站，但因為他保潘復生，而另一些人反潘復生，內部意見分歧，聯絡站也沒辦成。陳楚三站在哈爾濱“山上派”一邊，支持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寫了《捍衛東北的新曙光》的大字報，造成很大影響。

劉萬章帶了一幫人去了長春，主張保軍區，也是因為內部分歧，祇住了幾天就回校了。

郭仁寬去了錦州，他保了駐錦州的某個軍軍長吳忠，并與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早在年初，郭仁寬在錦州串聯時就支持吳忠。

王永縣和我同一天離開北京，他帶人去了南京，設立了 414 駐寧聯絡站。他們支持以曾邦元為首的“屁派”，保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後被清華團派與南京“好派”的人集

體綁架，押送出江蘇。

吳棟帶了一幫人去了廣州，據說他和一些 414 戰士參加當地造反派衝擊了廣州軍區。

留在學校的人也不甘寂寞，搞起了針對軍隊高級領導幹部的大批判。414 有一部分同學撰寫了許多文章，論述所謂海陸空三軍的兩條路線鬥爭，有人甚至去洪湖調查賀龍元帥的所謂“罪行”。414 把這些文章和材料編印成冊，到處散發，影響惡劣，流毒甚廣。

我自己決定到全國各地走一走，進行一番調查研究，研究外地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研究外地兩大派形成的原因、過程和他們各自的觀點，看看有什麼規律性。因為在東方紅戰團討論形勢時，大家總在問：為什麼文化大革命想“收”也“收”不住？為什麼全國都分兩大派？全國兩大派的分歧到底有沒有規律？外地的兩大派與清華的兩派究竟有無共同之處？在北京我們沒有找到類似 414 的派別，外地有沒有？我想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於是，我組織了一個調研小組，由 5 位學生，3 位幹部和教師組成。這些人思想活躍、鮮明觀點、能寫會說，平時跟我關係密切，常常為我出謀劃策，有時還為我起草發言稿。在參加了 8 月 5 日天安門廣場召開的慶祝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一周年大會後，我就帶著調研小組出發了。第一站就是武漢，因為那裏已經有了我們的聯絡站。

我們大概是 8 月 9 日或 10 日到的武漢，住在湖北省軍區招待所。在聽取了武漢聯絡站同志們的情況匯報後，我向聯絡站的同志強調說明，我們此行的目的是調查研究，不幹預聯絡站的活動。隨後，我們冒着酷暑，走遍武漢三鎮，看大字報，找人座談，從各方面了解情況。我們當時

還訪問了武漢“鋼工總”的第三號負責人沈復禮。他是我們調研小組的一位成員在清華的同班同學，畢業後分在武漢鍋爐廠工作。通過他的介紹，我們了解了一些“鋼工總”的主要觀點。

經過幾天的調查研究後，我們在一起匯總情況，討論觀點，大家覺得收穫不大。第一是感覺總體形勢不太好，摧毀了“百萬雄獅”，很多工人群衆受到打擊迫害，可以說是哀鴻遍野，也可以說是“怨鴻遍野”；第二，我們還沒有把握武漢兩大派分歧的規律，武漢兩大派與清華兩派沒有可比性。武漢的兩派似乎還祇是一般的“造反”與“保守”，不象清華兩派那樣具有廣泛而又深刻的觀點分歧。清華兩派的分歧是觀點之爭，思潮之爭，帶有濃厚的理論色彩。如果一定要在武漢找到類似于 414 的派別的話，那祇有“三新”，因為我們覺得他們是溫和的造反派，穩健的造反派，講究政策和策略的造反派。另外，我們還認為江青 7.22 “文攻武衛”的講話，客觀效果非常不好。各地造反派利用“文攻武衛”的口號，大肆搶槍，軍隊和造反派更加對立，兩派武鬥不斷加劇，流血事件時有發生，整個局勢更加不穩。

有一天，我們正走在武昌街頭，突然一輛伏爾加停在我們身旁，車上走下一位穿軍裝的人跟我們打招呼，仔細一看，原來是張廣友！他從清華不辭而別，原來在武漢。張廣友邀請我們坐他的車，送我們到省軍區招待所，并在招待所和我們談了很長時間。他說他是受中央委派來武漢了解情況的。他在武漢的出現和他的一身戎裝更增加了他的神秘色彩。我們向他介紹了我們來武漢的目的及調查研究的情況和主要觀點。他很感興趣，希望我們寫成詳細的文字材料交給他。我們照辦了。

414 駐武漢聯絡站發表了《給曾劉首長的一封公開信》，曾、劉即曾思玉和劉豐。當時，曾思玉已被任命為武漢軍區司令員，原武漢空軍政委劉豐則被任命為武漢軍區政委。因為中央已給“7.20 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所以，414 駐武漢聯絡站的人寫了大字報《武漢軍區必須大亂！》和《再論武漢軍區必須大亂！》聯絡站的人告訴我：曾思玉接見了 414 駐武漢聯絡站的代表，聽取了他們對軍區文化革命的看法，414 的人表示支持軍區內部的造反派；414 駐武漢聯絡站的人還會見了武漢軍區一位副司令員叫李迎希，他一直反對陳再道，曾經想奪陳再道的軍權，因此 414 的人認為此人是革命左派。總而言之，聯絡站的同志們想幹點事情，但由于陳再道等人已奉命進京，曾思玉則是新任命的司令員，414 駐武漢聯絡站在武漢軍區也沒有什麼好鬧騰的，於是他們祇好去大鬧湖北省軍區。

8月15日，414 的人和湖北省軍區談判，要求軍區給予 414 戰士出入、調查、宣傳的一切方便，談了兩個半小時，省軍區副政委才同意了 414 的要求。從此 414 的人有了通行證，得以自由進入湖北省軍區。在此之前，省軍區內的造反派已經和 414 的人取得了聯繫，介紹了軍區內的一些情況。

進入省軍區後，414 的人用省軍區的廣播臺廣播了《給湖北省軍區革命造反派的一封公開信》，支持並鼓動軍內的造反派起來造反。第二天，湖北省軍區內部的造反派又貼出了《造反公告》。造反派說，省軍區在文化大革命中鎮壓了革命群衆運動，整了許多黑材料。16 日，省軍區造反派和 414 的人一起在軍區搞了個查封黑材料的行動。我們調研小組的成員都參加了這次行動。省軍區造反派不知從什

麼櫃子裏找出十幾捆材料，堆在一間辦公室裏，我和另外的幾個同志從中抽出一份，看了看，原來都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領導給群衆進行排隊，根據政治表現，分成一類、二類、三類的材料，這些材料並無特別之處，算不上什麼黑材料，也不能說明省軍區鎮壓了革命群衆運動。

嚴格說來，我們 414 在武漢的這些行動就是衝擊軍區、自毀長城的行動。由於中央及時制止了“揪軍內一小撮”，414 撤消了武漢聯絡站，大多數人很快離開了武漢。在此之前，北京給我打來電話說，中央要求各群衆組織的頭頭必須限期回京，我按中央要求在 8 月 25 日左右祇身返回了北京，調研小組的其他成員則留在武漢繼續撰寫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脫稿後交給了張廣友。爾後，他們和聯絡站的其他同志一起離開了武漢，前往上海，繼續進行調查研究。因為我在臨走之前曾經和他們討論過，認為上海的局面比較穩定，《文匯報》發表的文章中有許多觀點與我們 414 的觀點一致，有必要去調查研究一番，找出一點規律性的東西來。不幸的是，這次上海之行，他們在旅途中議論的許多話被別人聽到，匯報給蒯大富。後來，團派採取“逼供信”的手段將他們打成“12 人反黨集團”，受到了殘酷的迫害。

### 四派思潮

8 月 13 日，周泉纓貼出了一篇大字報《四一四思潮必勝》。《四一四思潮必勝》的出籠把 414 和團派的論戰推向新的理論高度。可誰曾料到，這份大字報竟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視，并據此得出“414 是右的”結論；而如今，它

又成為人們研究清華文化大革命歷史和解讀四一四思潮內涵的經典文獻。

所謂“思潮”，《新華詞典》上解釋為某一時期內有較大影響的思想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們常常講這個思潮、那個思潮，比如無政府主義思潮、形“左”實右思潮、極“左”思潮等等，但對於思潮一詞的確切含義並未深究。我們祇是習慣于把種種政治觀點歸納為思潮。

414 的政治觀點有一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

三縱隊時期，我們強調的是“五個正確對待”，即掌權後的造反派應該做到：正確對待無產階級司令部、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自己的盟友、正確對待受蒙蔽的群衆、正確對待幹部。

這就是當初三縱隊與 28 團在若幹問題上的政治分歧。歸根到底，這裏涉及到對紅衛兵政權的態度。我們把紅衛兵政權稱之為“紅衛兵專政”。

28 團認為造反派政權是新生的紅色政權，誰批評造反派，誰就是攻擊文化大革命。

三縱隊則認為掌了權的造反派應該有解放全人類的偉大胸懷，應該符合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根本目的。而以蒯大富為代表的紅衛兵政權並不是我們所期望的好政權，我們已經對這種政權失去信心。

414 成立後，圍繞解放幹部的問題，414 和團派在如何評價清華的幹部，怎樣解放和使用清華的幹部，如何評價解放後的清華，如何評價解放十七年的中國，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質、任務，以及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在激烈的辯論和大膽的實踐中，414 逐漸形成了一整套政治觀點。我們把這套政

治觀點稱之爲“四一四思潮”。

最初把 414 的觀點說成“思潮”的是誰已無法考證。團派說“414 的觀點代表了一種思潮，這種思潮是右傾機會主義思潮”，而且斷言“四一四思潮必敗”。我們也樂于接受“思潮”的提法，因為這至少可以說明，我們和團派的爭論，不是什麼權力之爭，而是思潮之爭。414 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四一四思潮必勝”的口號，而且成了大會小會每會必呼的口號。

“四一四思潮”的全部內涵究竟是什麼？當時我們誰也没有下功夫進行確切定義，祇是把它當作一個政治口號而已。不過，關於四一四思潮的特色，在東方紅戰團內部討論時，倒是有一個說法，即四一四思潮是收尾思潮，也就是說，四一四思潮體現了文化大革命收尾階段所應該採取的路線、方針、政策等等。

那麼團派思潮的特色是什麼？我們認為團派思潮的特色是不斷革命，不斷衝殺，打倒一切，砸爛一切，當時我們把它叫做“形‘左’實右”思潮，後來中央稱之為極“左”思潮。

在 414 內部有兩大政治派別，一是東方紅戰團，一是三七戰團。東方紅戰團是 414 中的鷹派，三七戰團是 414 中的鴿派。414 的總部委員一部分參加了東方紅戰團，一部分參加了三七戰團，人數基本相當，而在核心組，東方紅戰團占絕對多數。我和其他同學都屬於東方紅戰團，祇有孫怒濤和汲鵬屬於三七戰團。這是由於整風時期五大縱隊的歷史原因形成的。在 414 各個分部的負責人當中，三七戰團的人數多一些。

東方紅取意於歌曲《東方紅》，意思是 414 被逼無奈，

“窮人四處無路走，一心去找毛澤東”。東方紅戰團實際上是四大縱隊即東方紅縱隊、八八縱隊、毛澤東思想縱隊、毛主席警衛團的組合，其成員主要是老八八派，他們都是蒯大富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托派”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蒯大富的排斥和打擊。在成立 414 總部的時候，他們竭力主張扔掉“井岡山”的牌子，打出“東方紅”的大旗。東方紅戰團的特色是思想敏銳，堅持反“左”，主動出擊，不怕犧牲。

“三七”取意于毛主席的“三七指示”。1967 年 3 月 7 日毛主席做出關於對大、中、小學進行軍訓的指示，其中說道：“還要說服學生，實行馬克思所說祇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教導，在軍訓時不要排斥犯錯誤的教師和幹部。”三七戰團從天安門縱隊演變而來。三七戰團以“解放全人類”作為自己的旗幟，既批判蒯大富掌權後不能做到“五個正確對待”，又引導 414 正確對待團派，不要無限上綱，將團派一棍子打死。三七戰團的特色是溫和寬容，後發制人，既反“左”，又反右，在群衆中有極其廣泛的影響。

東方紅戰團和三七戰團是 414 的兩大思想庫，互補性很強。兩個戰團就像 414 戰車上的兩個輪子，二者缺一不可。如果說東方紅戰團是“敢于”鬥爭的話，那麼三七戰團就是“善于”鬥爭。東方紅戰團在前面衝鋒陷陣，三七戰團帶領群衆緊緊跟上。兩個戰團在思想認識和觀點上各有千秋，由於 414 缺乏一個絕對權威，因而民主氣氛比較濃厚，雙方能夠自由地發表各自的意見，有時候雖然發生很尖銳的爭論，但都不會導致領導核心之間的矛盾和組織上的分裂。而且無論出現怎樣艱難復雜的局面，兩大戰團都始終

以大局為重，團結對敵，生死與共，并肩戰鬥。

在我們東方紅戰團，經常討論各種問題，四一四思潮、派別的規律性、軍區問題、紅綫主導、平黑、平保、“文攻武衛”的危害、極“左”泛濫的根源、甚至“1、3、5”與“2、4、6”之爭，“新文革”與“舊政府”之爭，都在議論之列。

所謂“1、3、5與2、4、6之爭”，意思是中央的兩條路線鬥爭是毛主席、周總理、康生代表的正確路線與林彪、陳伯達、江青代表的左傾路線之間的鬥爭。當時中央領導排名順序，毛主席、周總理、康生排在1、3、5的位置，林彪、陳伯達、江青排在2、4、6的位置。林彪、陳伯達、江青代表文革中的“左”傾路線，這是我們東方紅戰團的共識。在我們心目中，毛主席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周總理是正確路線的忠實執行者。當時我們對康生的印象很好，因為他不象陳伯達、江青那樣張牙舞爪，咄咄逼人。我們一直以為他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是中共的捷爾任斯基，沒想到他竟是一個大奸似忠的陰謀家。從延安整風到文化大革命，他不知玩弄了多少陰謀詭計，殘害了多少忠臣賢良。

所謂“新文革與舊政府之爭”是指以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與以周恩來為首的舊政府爭奪權力。這不是414的發明，而是群衆中的傳言。不過，我們倒是十分相信。因為我們確實看到中央文革要員們上竄下跳，到處奪權，周總理帶着一幫副總理疲于奔命，苦撐危局。而在副總理中還有一個與總理離心離德、對中央文革亦步亦趨的謝富治。

我們關心的是文化革命的形勢，操心的是文化革命的搞

法，擔心的是文化革命的結局。我們個個自命不凡，人人  
心系天下安危。

我們自覺地將自己置身于中央的兩條路線鬥爭之中，我  
們把清華的鬥爭看作是中央的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我們  
認為，414 反對蒯大富，就是對中央正確路線的支持，如果  
414 能成功地遏制蒯大富這樣的極“左”派，就是我們對文  
化大革命的最大貢獻。

作為東方紅戰團的負責人周泉纓，他對文化革命的思考  
最多也最為深刻，常常發表一些很發人深省的觀點。

我清楚地記得周泉纓有兩個最鮮明的觀點。一個是關於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危險來自哪裏？周泉纓說，團派總  
是罵我們 414 是從右的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什麼是否定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危險？從“左”的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  
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危險。那些鼓吹群衆運動天然  
合理的人，慾惡和縱容團派這樣的群衆組織不停地衝殺，  
這就好比船員不辨航向祇顧奮力劃水，其結果祇能使文化  
革命的航船觸礁沉沒，這就是從“左”的方面否定文化大  
革命。由於他們用“左”的口號把自己掩蓋起來了，所以  
不易被人們覺察到他們的危險性。

今天，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了，當然不是被我們這些  
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否定的，而是我們黨和人民把它否  
定的。究其原因，歸根到底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航向錯了，  
錯在一個“左”字，最終“觸礁沉沒”。

第二，周泉纓提出“勇敢分子”論，他說，蒯大富這樣  
的造反派是毛主席用來打倒劉少奇的“勇敢分子”，他們的  
歷史使命已經完成，但他們現在頭腦膨脹，常常幹擾破壞  
中央的戰略部署，因此必須用“鐵的手腕”將這些“勇敢

分子”毫不留情地“捏得粉碎”，才能穩定局面。從中我們也不難理解周泉纓寫《四一四思潮必勝》，迫不及待地要毛主席“轉舵”（即改變文化大革命的航向）的良苦用心。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當時所說的“勇敢分子”，并不是指所有的造反派，而是指蒯大富這樣的“變了質”的造反派。這些造反派在奪權後，小資產階級劣根性發作，無政府主義思潮泛濫，樹立個人權威，嚴重脫離群衆，打擊不同意見，向黨和人民伸手要權、要官，他們的所作所為不符合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根本目標。對於那些自覺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具有“解放全人類”的偉大胸懷、能够做到“五個正確對待”的造反派，我們還是十分尊敬和崇拜的。西安交通大學的李世英、上海同濟大學的陳敢鋒、甚至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都曾經是我們推崇的“紅色接班人”。414 的幾個戰鬥組還專門訪問了西安交通大學的李世英和他的同學，把他們的事迹刊登出來，號召人們向他們學習。

我在武漢接到北京電話，說周泉纓炮制了《四一四思潮必勝》，不僅遭到團派批判，在 414 內部也引起了爭論；還說 414 總部發表了關於批判《四一四思潮必勝》問題的聲明。我離京外出調研期間，在家主持工作的同志做出這樣重要的決策居然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對此，我大為光火。我想他們分明是造成既成事實，因為他們擔心我會偏袒周泉纓，不會同意他們的做法。他們的擔心不無道理。周泉纓性格張揚，言辭犀利，在以往的總部會議上，常常指責別人右傾，得罪了不少同志。因為他才思敏捷，立場堅定，所以深得我的偏愛，再加上平時我倆過從甚密，三七戰團的人私下裏都說我是周泉纓的後臺。

東方紅戰團發表聲明稱：《四一四思潮必勝》的基本觀點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它運用毛澤東思想認真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促使我們更深入地理解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聲明指責總部某些同志匆匆忙忙對一個有爭議的觀點問題作組織結論是不恰當的。我估計，這是周泉纓在唱獨角戲，因為他是東方紅戰團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想發表什麼聲明，別人是攔不住的。

三七戰團發表了《嚴正聲明》，說：周泉纓等人《四一四思潮必勝》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四一四思潮必勝》實際上是給 414 總部制定今後如何前進的綱領，是企圖把 414 總部引向右傾機會主義道路的綱領。聲明還說：三七戰團在堅決批判團總部所犯的極“左”錯誤的同時，也一直反對 414 內部的右傾錯誤，并表示要更加旗幟鮮明地痛斥以大毒草《四一四思潮必勝》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勢力。

《四一四思潮必勝》的出籠，使得東方紅戰團與三七戰團的分歧完全公開化了。

回到北京，我仔細看了《四一四思潮必勝》，覺得沒有什麼錯誤。文章裏面大部分觀點，如紅綫主導、階級陣綫基本穩定、不可能“大翻個兒”、不能劃分造反階級和保守階級、不能衝擊軍隊、鞏固和保衛新生的紅色政權、五個正確對待等等，這不正是 414 一直堅持的觀點嗎？就是所謂全國兩大派、414 派必將占據主導地位的提法也衆所周知的。孫怒濤在 6 月 9 日的講話中早就說過“四一四思潮必勝！四一四思潮必將在我校，在北京市以及在全國取得最後的勝利！因為它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我認為，《必勝》是對 414 一系列政治觀點的歸納、提煉和發展，批判《必

勝》就是批判 414，否定《必勝》，就是否定 414。《四一四思潮必勝》中其他所謂比較尖端的觀點，周泉纓或在東方紅戰團或在私下都闡述過，我們都不陌生，并且都很贊同。現在周泉纓將這些觀點系統化，并用他的獨特語言進行融合改造，構成了一套理論體系，盡管這套理論體系並不見得那麼嚴密那麼完整。

周泉纓在《四一四思潮必勝》中有許多非常精辟的論述，我特別欣賞《四一四思潮必勝》結尾的那段話：

要完成所提出的穩固政權的這一系列工作，掃除大革命中反動階級餘留下來的罪過，真正實現防修反修的目的，沒有 414 派這樣一個真正代表無產階級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是不可能的，誰能够在革命期間盡力減少經濟破壞和各種混亂狀態，并且在奪取勝利後，團結一切力量竭盡全力恢復這些不可避免的破壞，穩定混亂狀況，誰能够用“鐵的手腕”打擊那些在大革命中“露頭角”的壞分子和一切犯罪行爲、流氓行爲、賄賂、投機等等現象，誰能够完成從那些“趕時髦”“貪圖祿位”的蹩腳的革命家手裏“解放”出來的任務呢？祇能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戰鬥中不斷無產階級化的布爾什維克化的 414 派！

我也很欣賞東方紅 00 支隊把《四一四思潮必勝》抄成大字報時所加的按語中的一段話：

老實告訴你們，什麼“極右思潮”！我們的觀點不存在右不右的問題。幹部問題、群衆問題、一切一切，統統要解決。大多數一定要解放！如果你們說這是“右”，那麼我

們“右”得好，“右”得對！你們眼裏的“右”正是我們始終堅持的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主張。你們口中“極右”的叫聲愈高，我們愈是感到“右”得不够，等我們解決了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問題，再“右”個樣子給你們看看！

極左思潮終將被摧垮，比較符合毛澤東思想的 414 思潮必將在全國取得勝利，這將是歷史的結論！

不過，我對《四一四思潮必勝》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見。關於派別的規律性，我認為這是我們正在進行調查研究的課題，根據我們調研小組的討論意見，無論是北京還是武漢，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明 414 和其他哪些派別有共同的理論基礎和相同的鬥爭策略，因此現在講“派別的規律性”還言之過早。或許這是我和我們調研小組的成員還不具備周泉纓那樣敏銳的政治洞察力的緣故吧。

尤其令我不滿的是周泉纓將 414 和 414 思潮與“河造總”聯系在一起。因為關於河南問題，除了唐偉和毛澤東思想縱隊的部分同志介入外，414 總部主要領導人無人知曉。我們當初嚴格限定 414 不介入外校和外地的文化大革命問題。唐偉他們在河南的活動屬於三縱隊時期的問題，跟 414 無關。更何況戚本禹已經說過唐偉在河南問題上的觀點是錯誤的。現在你周泉纓把 414 和“河造總”硬扯在一起，這不是明擺着會給 414 帶來政治上的被動嗎？

我和東方紅戰團的同志們對周泉纓的《四一四思潮必勝》採取了支持的態度，但對三七戰團的做法也不予指責。因為我們覺得東方紅戰團在許多觀點上是超前的，應該允許三七戰團慢慢跟上。東方紅戰團和三七戰團都已清楚地認識到，作為 414 支柱的兩大戰團如果發生內訌，必然給

團派以可趁之機。因此，《四一四思潮必勝》的出籠雖然暴露了 414 內部的嚴重分歧，但並未導致 414 的政治危機。

《四一四思潮必勝》遭到團派的口誅筆伐，所有的批判文章都在重複一個觀點即：《四一四思潮必勝》的要害是否否定文化大革命。

事實上，在 414，在東方紅戰團，無論是公開場合，還是在私下議論，我們雖然對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質、任務，文化大革命所應該採取的路綫、方針、政策以及各種具體措施都有自己的看法，對極“左”思潮的危害和文革的形勢深感憂慮，並且對中央文革那幫大人物越發不滿，但是從内心來說，我們積極擁護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真誠地希望通過文化大革命達到反修防修的目的，保證我們黨和國家千秋萬代永不變色。因此，團派說 414 思潮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能令我們心服口服。

至于周泉纓本人更不會否定文化大革命，因為他“從小心靈裏就埋下了外婆‘造反有理’的種子”，在批判清華工作組時，他“已經是名副其實的造反派”了。他所真正關心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它能不能達到反修防修的最終目標。

對於周泉纓來說，團派的批判顯然未能擊中要害。陳伯達、戚本禹、謝富治也利用各種場合批判、譏諷《四一四思潮必勝》，但是他們都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

首先理解《四一四思潮必勝》實質的應該是張春橋，1967 年 12 月 10 日，他在上海接見文藝界代表時說：

我最早讀了一下清華《四一四思潮必勝》的傳單，說 414 要坐天下，四一四必勝，說上海市革委會也同意這個觀

點。他們就是說造反派祇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文章很隱晦，看了兩遍才看懂。當然，我們有我們的弱點，但是不能說要重新換班，權力重新再分配。[35]

我們能够理解張春橋當時的處境和他們對政權的敏感性。張春橋是真正掌握了政權的造反派，《四一四思潮必勝》大概擊中了這些人的痛處，所以他們才能抓住《四一四思潮必勝》的要害。

周泉纓自己是怎樣解釋他的《四一四思潮必勝》的？30多年後的1999年元月18日，他在《我心中的文革》中這樣寫道：

《四一四思潮必勝》主要有三層意思：第一，全國範圍的兩派之爭代表著兩種社會勢力的兩種政治傾向，也代表著兩種文革前途；第二，極左派企圖插手軍隊暴露了極左派的野心，同時更說明了極左派祇能利用不可依靠，現在已經到了收拾極左派的時候了；第三，依靠極左派無論如何是無法達到文革發動時所提出的防修反修目標的，真正要達到這個戰略目標唯一的出路祇能全心全意地依靠“四一四派”。[36]

看來周泉纓也同意張春橋的觀點，即《四一四思潮必勝》的要害是“造反派祇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說實在的，“造反派祇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與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本質上是不是同一回事，到現在我也沒有弄得很清楚。

## 愚蠢之舉

8月22日，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嚴重外交事件，414參加了這一行動。

我曾向414參與火燒英國代辦處的行動負責人蔣南峰詢問過有關情況。蔣南峰說：

8月22日那天，我在主樓，看到周泉纓與孫怒濤爲“揪軍內一小撮”問題爭得面紅耳赤，心裏很不高興，就離開主樓，走到了動農館。此時，我看見修建隊的張師傅帶着一幫工人，每個人手裏都拿着工具，還有許多學生，在等車。我覺得奇怪。張師傅對我說，“今晚要去看熱鬧”。我問：“看什麼熱鬧？”張說：“北京高校反帝反修聯絡站組織高校人馬去占領英國代辦處。”並說：“你是總部委員，為什麼不參加？”

我是主管414對外聯絡工作的，事先有人向我匯報過北京高校反帝反修聯絡站要去占領英國代辦處的決定。北京高校反帝反修聯絡站交待的任務是檢查英國代辦處的資料，看看英國是否竊聽我們國家的機密，宣布的紀律是不打人、不罵人、查完資料就走。他們還說，我國政府可能會廣播不讓紅衛兵衝進英國代辦處，這祇是政府作出的高姿態，大家照樣衝進去。

可是，我並不知道414總部是誰下令參加這次行動的，也不知道是誰負責組織人員，調配車輛，看見車子一到，我就和大家一起上去了。

當我帶着隊伍趕到現場時，北京衛戍區已經派部隊把英國代辦處圍住，保護起來了。高音喇叭在反復廣播，不準

群衆衝擊使館。但是我們還是紛紛爬上了英國代辦處的牆頭，有個 414 的戰士還在牆頭上揮舞 414 的大旗。剛開始時，我們還弄錯了地方，爬到了印度駐中國大使館的牆上，一看不對，就退了下來。進了英國代辦處後，最初看到有人往外搬錄音磁帶，後來看到有人燒東西。一會兒，火燒大了，救也救不了，祇好往外撤。衛戍區的解放軍看我像個負責的，就叫我站着，對我說：“那裏有現金，你幫我看着，我去找人來處理。”不一會，來了許多解放軍，這才讓我走了。

過了幾天，傳來消息：總理很生氣。總理還說：“沒想到清華 414 也參加了（火燒英國代辦處）。”

因為參加這次行動遭到了上面的批評。我祇好寫檢查，前後一共寫了三次，分別交到總理辦公室和中央文革。

參與火燒英國代辦處這一愚蠢之舉，被認為是 414 的奇耻大辱。

圍困中南海、揪軍內一小撮、火燒英國代辦處，這三大極“左”事件，414 件件有份。這一事實充分說明，414 內部的極“左”思潮也是泛濫成灾。414 中還有人據此做出結論：414 的對外政策是完全失敗的，祇要 414 走出校門，就必然要犯極“左”錯誤。

1967 年的夏季，極“左”思潮肆虐神州大地，聲稱以反對極“左”思潮為己任的 414 中的一些人也被裹脅其中，足見其來勢之猛、影響之大、危害之深。

## 後臺風波

軍隊受到空前的衝擊、各地出現的極度混亂以及“王八七”講話、外交部奪權等一系列事件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8月26日，毛主席指示周總理逮捕王力、關鋒，批判戚本禹，林彪和中央文革互相勾結亂軍奪權的囂張氣焰受到沉重打擊。周總理抓住這一契機，提出批判極“左”思潮，着手糾正“左”的錯誤。8月31日，總理在嚴厲批評外交部奪權事件時說：現在，國內的極“左”思潮和極“左”行動，已經影響到我們的外交工作，損害了我們的國際信譽。9月1日，周總理在北京市革委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指出有些人錯誤估計形勢，受壞人煽動，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把矛頭對準了新生的革委會，對準人民解放軍，到處抓“軍內一小撮”，自毀長城，這是極端錯誤的。誰違背毛主席就不會勝利，等待他們的是垮臺。接着，王力、關鋒、林杰倒臺的消息不脛而走。

團派開始在清華公開攻擊北師大革委會和譚厚蘭。與此同時，團派再次把矛頭指向414。退出414重新回到團派的王良生甚至在大會上講：“北師大完了！414不出24小時就要瓦解！”團派大造輿論，製造王力、關鋒、林杰是414的後臺的假象，對414發動了強大的政治攻勢，弄得414的群衆莫名其妙。很多414群衆真的以為王力、關鋒、林杰是414的後臺，因而人心浮動，情緒低落。414自成立以來第一次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414的群衆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

首先，從三縱隊到414，《紅旗》雜志一直為我們反對蒯大富的錯誤提供強大的思想和理論武器，我們414的許

多政治觀點都能從《紅旗》雜志中找到根據。特別是，《紅旗》雜志調查員評論員的文章本身就是 414 的誕生的導火線。每當《紅旗》雜志發表一篇社論，414 照例都要去《紅旗》雜志社慶祝、報喜，表示我們對《紅旗》雜志的支持。因此，我們 414 和《紅旗》雜志社的工作人員建立良好的關係。更有甚者，414 的一些大字報，包括我自己的一些發言都曾經公開保過林杰、關鋒、王力。

相反，團派一直都站在《紅旗》雜志的對立面，從《清除托派》到《罪責難逃》，從解放幹部到對十七年的評價，在很多重大問題上團派都與《紅旗》雜志唱反調。當然在抓“軍內一小撮”的問題上，團派倒是和《紅旗》雜志步調一致。再加上傳聞中王力、林杰都說過一些不利于蒯大富的話，如“曇花一現”等等，人們有理由懷疑，王力、關鋒、林杰就是 414 的後臺，或者他們至少是支持 414 的。

另一方面，414 成立以來，北京五大領袖中，聶元梓的《新北大》、韓愛晶的北航《紅旗》是支持蒯大富的，譚厚蘭的師大《井岡山》、王大賓的地質《東方紅》是同情 414 的。在北京的“天派”“地派”之爭中，414 被外界列入了“地派”行列。中央文革分別接見北京高校兩派負責人時總把 414 放到“地派”成員中去。當時，譚厚蘭直接受命于林杰，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我們 414 既然和師大關係密切，那麼林杰起碼也是 414 的間接後臺。現在，林杰倒了，“地派”鬧地震，414 也得跟着倒霉。

9月7日，發生了“北師大事件”。當天上午，北師大《造反兵團》舉行揪鬥革委會主任譚厚蘭大會，會上《造反兵團》宣布推翻北師大革命委員會，成立《專政委員會》，接管北師大政權。蒯大富帶領團派大批群衆參加了批鬥譚

厚蘭的大會，鮑長康在大會上發言支持《造反兵團》，祝賀《專政委員會》的成立。

在清華，團派廣播臺連續廣播北師大揪鬥譚厚蘭大會情況，并號召 414 戰士“反戈一擊”，弃暗投明。事後得知，蒯大富的如意算盤是：乘王力、關鋒、林杰垮臺的有利時機，用三天時間擁軍，一周時間批四一四，向四一四發動強大的攻勢，挖四一四牆角，爭取從四一四拉走一、二個系的隊伍，然後借聯合之名并吞之。

414 群衆如墜霧中，議論紛紛，強烈要求頭頭對目前形勢和後臺問題做出交代。為此，414 於 9 月 7 日上午 11 點召開了戰鬥組組長緊急會議。會上，我們向大家詳細介紹了北師大發生的情況以及 414 與師大《井岡山》和地質《東方紅》之間的所有聯繫。我們向大家說明：414 和師大《井岡山》和地質《東方紅》之間的聯繫僅限于借用首長講話記錄稿，此外並無深交；他們對 414 僅限于同情，並無任何實質性支持。414 和他們既沒有理論上的共同點，也沒有採取過聯合行動。我們基本上沒有介入“天派”和“地派”之間的鬥爭。大家一聽，北師大內部的事，“天派”和“地派”的事，都與我們 414 沒有什麼關係，也就放心了一半。

有人直截了當地問，林杰是不是 414 的後臺？414 到底有沒有後臺？

我在會上作了專門發言。我說：“414 是 414，林杰是林杰。414 和林杰沒有任何關係。”我向大家鄭重保證，414 沒有後臺。我說，我們的原則是獨立思考，絕不盲從。414 不需要後臺。我們相信中央，相信群衆，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走過的道路。我們在清華進行的鬥爭，都是我們 414 核心組根據中央的精神和清華的實際情況集體研究決定

的，有哪一點可以看出是受人指使？

我所說的都是大實話，我們確實沒有後臺，我們没有必要找一個大人物做自己的後臺。恐怕也沒有任何一個大人物願意做我們的後臺。事實上，除了張廣友，我没有和任何校外的大人物有過接觸，沒有和任何校外的大人物討論過清華的問題，更不用說接受什麼指示了。核心組的其他同志也是如此，他們沒有向我帶來過任何大人物的哪怕是只言片語。

我們的解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414 的骨幹放下了思想包袱，穩定了情緒，精神狀態明顯好轉。

當晚，周總理、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會採取果斷措施，宣布支持北師大革命委員會和譚厚蘭，解散非法的《專政委員會》，並逮捕了《專政委員會》的頭頭。至此，“北師大事件”宣告平息，蒯大富借這一事件搞垮 414 的想法也不攻自破。

總理利用各種場合繼續批判極“左”思潮，全國開展了批判極“左”思潮的運動，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 9 月 12 日《文匯報》發表的社論《評極“左”思潮》，可以說這篇社論說出了 414 的心裏話。

王、關、林的垮臺和“北師大事件”，從表面上看，414 受到了空前的衝擊，但從實質上看，中央批判極“左”思潮，這從根本上是對 414 有利的。414 在一度混亂之後立即振作起來，而且比原來更加活躍。因為廣大的 414 戰士終於清楚地看到了：我們一貫堅持的批判形“左”實右思潮和反對極“左”思潮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團派的思潮就是極“左”思潮。414 從成立以來，一直都受到上至大人物下到普通團派群衆的指責，說 414 的大方向是錯誤的，現在

終於證實他們的指責都是毫無根據的，他們的大方向才是錯誤的。這比一百個大人物的講話更能動員我們的隊伍。414 在這次空前的衝擊中得到了洗禮，精神狀態有了質的飛躍，414 的隊伍更加穩定，鬥志更加堅定。

相反，蒯大富在一度狂熱之後却發現自己處于被動狀態，從《井岡山》報發表《評什麼極“左”思潮》，批判《文匯報》社論一事，就可窺見他們無奈而又狂躁的心態。

### 主動出擊

伴隨着王、關、林的垮臺，小道消息傳出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現在正像辛亥革命時代。大家知道 1911 年是誰竊取了這個勝利果實？是袁世凱。袁世凱竊取了勝利果實，把孫中山排擠下去，自己當了臨時大總統。現在有沒有這種情況存在呢？在竊取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果實呢？

9月7日，姚文元發表《評陶鑄的兩本書》，提出了“5.16 兵團”反對周總理的問題。文章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似乎指向某個大人物。

我們東方紅戰團議論形勢，認為：文化大革命以來，總是看到功勳卓著的老幹部被打倒，這回第一次看到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員垮臺；總是聽到反右傾反復辟的口號，這回終於聽到反對極“左”思潮的口號，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轉折，它標志着文化革命開始了一個從“放”到“收”、從“亂”到“治”的過程，文化革命要收尾了，幹部要解放了，政策要落實了，國家要穩定了，我們感到歡欣鼓舞。

周泉纓提出一個觀點：文化大革命的航船轉向了，繞過

了一大暗礁。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時轉舵的話，巨輪就要觸礁，就會發生災難。大家同時也在議論：誰是“5.16 兵團”的後臺？誰是極“左”思潮的鼓吹者？誰應當對王力、關鋒、林杰的行為負責？誰是竊國大盜袁世凱式的人物？陳伯達！除了他還有誰？就是他在 1945 年 9 月發表過《竊國大盜袁世凱》。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周泉纓走上了炮打陳伯達之路。

清華大學新水利館有一個 316 室，這是陳楚三他們《戰地黃花》戰鬥組所在地，也是我們東方紅戰團經常聚集的地方。9 月 14 日，我和陳楚三在新水 316 室討論問題時，周泉纓夾着大字報晃晃悠悠來到 316 室對我們說，他要貼大字報炮打陳伯達。

我們一聽說他要炮打陳伯達，就急了，勸他千萬不要貼這樣的大字報。我們說，私下議論歸議論，公開炮打就不一樣了。你又沒有什麼過硬的材料，怎麼能够打倒陳伯達？我們還對他說，你是 414 總部委員，炮打陳伯達會給 414 帶來極大的被動，搞不好會讓整個 414 背上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414 剛剛經歷了一次衝擊、一次洗禮，好不容易穩定下來，經不起再三折騰，你把 414 的隊伍搞亂了，我們還怎麼去和蒯大富鬥？

毫無疑問，我們痛恨陳伯達，能够打倒他將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他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我們早已對中央文革不滿，414 群衆特別是東方紅戰團中對中央文革不滿的情緒幾乎要爆發。但是，我們千萬要注意鬥爭策略，祇要中央文革不逼我們，我們就不必直接、公開地反對中央文革。文革以來，反對中央文革的革命幹部、人民群衆、青年學生、軍隊官兵可以說是前赴後繼，他們都被無情地鎮壓了。

作為東方紅戰團的骨幹分子，我們並不缺乏這樣的勇氣，但是我們不想把 414 組織和幾千群衆推到險境。

另一方面，我認為能不能打倒陳伯達不是我們說了算，而是黨中央說了算，毛主席說了算。不錯，姚文元的文章似乎確有所指，但是，我一貫反對聽到一點風聲就貼大字報的做法，我們覺得那是“押寶”，是一種典型的政治投機。不幸的是，文化革命似乎鼓勵這樣的政治投機，祇要符合上面的胃口，一張大字報、一封信甚至一個有悖常理的舉動都會讓一個人一夜之間成為英雄。蒯大富祇不過貼了幾張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居然成了路綫覺悟最高的“左派”、反對劉鄧的英雄。作為一個大學三年級學生，他對中央的事情知道多少？他的路綫覺悟從何而來？可悲的是這種政治投機的風氣文化革命後仍然蔓延了很長時間，許多人因此吃了不少苦頭。

我一貫認為，搞政治鬥爭不能依靠這種機會主義的做法，而應該依靠組織的力量，依靠群衆的力量，依靠組織起來的群衆的力量，依靠用明確的政治綱領組織起來的群衆的力量。我們組織建立 414 就是走的這條路。

周泉纓可不聽我們那一套。他說，要什麼過硬的材料？那是單純軍事觀點！我們現在需要主動出擊，去動一動陳伯達這個大人物。這不叫政治投機，這叫自我犧牲！為了文化革命的航船不致觸礁沉沒，我周泉纓願意獻出自己的性命！你們不是怕影響 414 嗎？我既不用東方紅也不用 414 的名義貼大字報。

天真可愛而又無私無畏的周泉纓，一旦認準了方向，就決不回頭。周泉纓以《清華大學偉大轉折縱隊 00 支隊》的名義貼出了大字報：《重炮猛轟篡奪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

世凱式的人物——陶鑄……》。看過大字報的人誰都明白：大字報的題目寫的是陶鑄，內容說的是陳伯達。大字報雖然在清華掀起了一陣波瀾，但似乎並沒有驚動上層，我們暗自慶幸沒有人理周泉纓的碴，但願風波就此過去。

然而，周泉纓却不滿足于此。9月17日晚，他又貼出了《炮打篡奪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凱》的大字報。當時，我們414的主要負責人正在城裏參加中央首長的接見。會議中間，江青突然說：“今天在清華禮堂前貼了一張陳伯達的大字報，說陳伯達同志是篡奪群衆運動成果的野心家。貼大字報的人叫周泉纓，周泉纓，小醜！叫這麼個鬼名字。欺負老實人，欺負到中央頭上！”被接見的人中有人說：“周泉纓是414的總部委員。”我們參加接見的幾個414負責人面面相覷，不知道周泉纓又捅出什麼漏子了。好在除了江青以外，其他中央首長都沒有表態。

江青說周泉纓是“小醜”，從此，周泉纓就有了一個“小醜”的雅號，從那以後，我們都一直叫他“小醜”。

回到清華，我們看到了周泉纓的大字報《炮打篡奪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凱——評陶鑄之流 1967年6月重版的一篇文章》。這裏所說的“重版的一篇文章”是指陳伯達1944年發表的《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6月22日重新發表在清華《井岡山》上。清華《井岡山》發表這篇文章是否陳伯達的授意，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井岡山》推崇這篇文章，試圖把它作為團派在文革中的行動的理論根據。圍繞着如何理解《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精神實質，如何正確對待群衆和群衆運動等問題歷來是414與團派爭論的焦點之一，它深刻地反映了團派和414之間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方針等一系列問題的根本分歧。周泉纓的

大字報從理論到實踐全面地批判了陳伯達所鼓吹的“群衆運動天然合理”和他所推行的極“左”路線。

周泉纓的大字報首先批判陳伯達的文章“全民式”地歌頌群衆運動和群衆運動中的過火行爲，認為這是抹殺群衆的階級性，慫恿小資產階級思想自由泛濫。大字報說：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衆是劃分階級的，他們的政治目的、“過火”行動的目的是有明顯的階級區別的。有的是爲反修防修，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有的是開始不理解，犯錯誤，後來理解，跟上毛主席了；有的是小資產階級，目的祇是個人自身的解放；有的則是爲再分配階級權力，大翻個兒！

“袁世凱”在此地違背現實的目的正是慫恿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泛濫，迎合否定十七年，要求權力再分配的落後的、反動的、腐朽的階級欲望，大搞“大翻個兒”，使“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成爲合法的！

周泉纓的大字報接着批判陳伯達的文章片面強調群衆運動的合理性，認爲這是否定毛澤東思想對群衆運動的領導，企圖把文化大革命納入資產階級的軌道。

隨後大字報又批判陳伯達的文章鼓吹的“民衆政權”和文革中“一切權力歸造反派”的提法，認爲這是用極“左”的資產階級專政口號代替毛主席提出的“三結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

根據以上三點，周泉纓得出的結論是：陳伯達“最終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納入資產階級軌道以及篡奪文化大革命成果，復辟資本主義，建立資產階級專政，或建立必然向資產階級專政過渡的政權。”

周泉纓在大字報的末尾一口氣提出幾十個問題，每個問題都像一把鋒利的匕首，直指陳伯達和中央文革。這是繼“7.20”事件之後，又一次公開炮打中央文革的行動。這次“炮打”的顯著特點是批判中央文革所推行的極“左”路線。

實事求是地說，周泉纓的大字報代表了我們的觀點，也說出了我們的心裏話。我們過去批判的團派若幹觀點，其實就是中央文革所鼓吹的觀點，我們早就站在了中央文革的對立面。這一點，我們明白，團派也明白，他們一直不停地指責 414 反對中央文革。但就我個人而言，我不同意周泉纓的做法。我始終認爲，414 在清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批判蒯大富的錯誤，就是抵制中央文革的極“左”路線，這是反對中央文革的最好鬥爭方法。這種做法比公開反對中央文革，要實際得多，有效得多，策略得多。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這是我們所能做的最好選擇。李洪山被抓走了，“聯動”被打散了，“百萬雄師”被鎮壓了，他們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他們的教訓我們也必須吸取。假如我們不能保存 414 這支隊伍，又怎麼能繼續進行鬥爭？

在周泉纓貼出大字報後，414 總部未參加接見的總部委員以 414 總部名義發表聲明，譴責周泉纓。414 保衛組發表通令，宣布對周泉纓實行專政，抄了周泉纓的宿捨，但沒有抓住周泉纓。

我對 414 留校總部委員發表的聲明和通令表示不滿：爲什麼這樣沉不住氣？爲什麼不等我們回來，就匆忙表態？團派那麼多的人反康生，反總理，遭到中央那樣嚴厲的批評，他們都死保下來了。我們 414 祇有一個周泉纓反陳伯達，爲什麼要迫不及待地和他劃清界限？如此下去，414

還能成什麼大氣候？

後來我了解到了總部聲明和通令產生的經過。周泉纓的《炮打》貼出後，陳楚三在動農館二樓主持召開留校的總部委員緊急會議，研究對策。會議進行中，擠進來許多群衆，要求總部對周泉纓實行“專政”。陳楚三請他們退出會議室，群衆不聽。陳楚三說：“我堅決反對把周泉纓打成反革命，反對對周泉纓實行專政。你們可以批判周泉纓的論點，如果能把他的論點批倒，那才是真本事。”部分總部委員和群衆不同意陳楚三的觀點，繼續吵吵鬧鬧。陳楚三憤然退出會場。迫于群衆的壓力，總部會議通過了聲明和通令。

總部聲明和通令通過之後，群衆要求立即廣播，兼任 414 廣播臺臺長的陳楚三說：“先不忙廣播，等主要頭頭回來再說。”在群衆的圍攻下，陳楚三又憤然辭去 414 廣播臺臺長的職務以示抗議。他反對總部的聲明和通令，他不願意在他擔任 414 廣播臺臺長的時候廣播這些聲明和通令。

陳楚三還把周泉纓藏到了新水利館 316 室，每天給他送水送飯。後來，他還給康生寫了一封信，為周泉纓進行辯護，說周泉纓不是反革命。

江青批評了周泉纓，我們不能不表態。當夜，經過反復研究，我們最後確定的方針是“一批二保”，要批判周泉纓，但祇將他定性為“小醜”，而不是反革命。因為江青說周泉纓是“小醜”，並沒有說他是反革命。我心裏很清楚，周泉纓在反對蒯大富、拉出 414 的過程中做出了重要貢獻，是我們的親密戰友，他反對陳伯達，是以說理的方式進行的，有根有據，完全是為了文化大革命的前途，他決不是反革命，最多是革命小將犯錯誤，我們必須全力以赴地保他。

如果有人一犯錯誤，我們就將其拋出去，誰還會跟我們一起衝鋒陷陣？所以，在中央沒有定性之前，我們決不能說他是反革命。

周泉纓在 9 月 18 日貼出了《向毛主席請罪！》的大字報，說自己“政客式地猜測”姚文元的文章，走上炮打陳伯達的道路。他表示要寫出炮打的活思想，實際上是為他進一步批判陳伯達埋下伏筆。

9 月 24 日，他貼出被人們稱之為“假檢查，真反撲”的大字報《我炮打陳伯達同志的經過——我的第二次檢查》，借檢查“炮打”的思想過程，聯系文化大革命的實際問題，繼續批判陳伯達。

9 月 25 日，中央廣播了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的講話後，周泉纓又貼出了《收聽到今晨中央臺廣播，狂歡狂跳》的大字報，“熱烈歡呼文化大革命全盤納入毛主席所指出的軌道！”“讓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陶鑄之流，一切牛鬼蛇神去哭泣吧！”署名“無產階級革命小將周泉纓”。顯然，周泉纓很自信，他認為：炮打陳伯達的行動符合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周泉纓的一系列行動給 414 在政治上造成了極大的被動，在 414 內部也引起了相當大的混亂。我們對周泉纓採取“一批二保”的政策雖然得到了大多數 414 頭頭和群衆的認可，但也引起部分 414 群衆的強烈不滿。一些 414 戰鬥組公開指責我“長期和周泉纓之流合伙竭力販賣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千方百計支持和包庇周泉纓之流”，要我“懸崖勒馬”；另一些戰鬥組則堅決要求改組 414 總部，把總部中“周泉纓分子”拉下馬；就連東方紅戰團內部的一些人也對我非議不斷。對此，我仍舊是一笑置之。

## 聯而不合

9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毛主席的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清華兩派群衆強烈要求兩派頭頭響應毛主席和中央號召，盡快實現大聯合。面對這個大形勢，或許還有周泉纓炮打陳伯達剛剛受到江青的嚴厲批評，414正處于被動狀態，這正是蒯大富實行他并吞414計劃的最好時機。9月19日，團派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承認414總部是合法的。

9月21日，蒯大富帶領團派主要負責人到414總部所在地動農館，和414總部負責人一起學習毛選，雙方各自做了自我批評，并決定實現大聯合。討論時，大家一致同意，聯合起來的組織還叫“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其領導機構叫“聯合總部”。此時，我們414的一位負責人說：“既然聯合，就別留痕迹，幹脆叫總勤務站算了。”大家齊聲叫好。我也没有表示反對意見。這樣雙方簽署了大聯合的第一號協議，并決定晚上召開全校大會，慶祝清華大學兩派實現大聯合。消息傳出去一會兒，就有不少兩派群衆自發組織起來敲鑼打鼓，到動農館表示祝賀，表達了廣大師生員工迫切要求聯合的心聲。

大聯合的協議簽署以後，蒯大富和我一起去北京市報告，謝富治和傅崇碧還特地為清華的聯合題了詞。

然而，到了下午，414的部分群衆開始反對大聯合的第一號協議，主要理由是“總勤務站”的名稱沒有體現兩派大聯合的意思，井岡山兵團總部祇是改成了“總勤務站”而已，讓團派占了大便宜。此時，團派中的極端分子也大

幫倒忙，他們貼出許多大標語，說什麼“歡迎 414 回到井岡山的懷抱”。這無異于火上加油，大大地刺激了派性強烈的 414 骨幹分子。大批的 414 戰士包圍了我們核心組的成員，質問我們為什麼用“總勤務站”而不用“聯合總部”的名字。我們向大家解釋名稱是個次要問題，能在平等的基礎上實現大聯合，這是我們 414 追求的目標，大目標實現了，次要問題可以讓步。但是，各分部的主要負責人、東方紅戰團和三七戰團的積極分子、還有那些經常給我們出主意提意見的鐵杆的 414 戰士，情緒激昂，態度堅決，一定要采用“聯合總部”的名字，否則他們將拒絕參加晚上的大會。我考慮到今後還得要靠這些 414 的骨幹分子衝鋒陷陣，不能冷了他們的心，便同意了他們的要求。我與核心組其他成員研究後決定，在晚上的慶祝大會前與蒯大富討論修改協議，要求將“總勤務站”改為“聯合總部”。

晚上，在主樓前廣場的主席臺上，我向蒯大富提出改名問題。蒯大富先是表示為難，他說，已經簽署了協議，臨時改變，不合適。我告訴他，414 的骨幹分子反對勢力太大，我無法應付，如果不改名，414 的骨幹分子有可能退出會場，這個大聯合的慶祝大會就不一定開得成了。在僵持了相當一段時間之後，蒯大富說服了其他團派的頭頭，同意改名。此時此刻，為了實現兩派的大聯合，蒯大富表現出了少有的大度，令我暗暗佩服。結果慶祝大會順利地召開了。

414 的要求得到了滿足，當然是興高采烈。然而，團派群衆却怒火萬丈。會後，團派上百個戰鬥組發表聲明，指責 414 撕毀協議，并在校園的各個角落貼出許多大標語“誰撕毀協議，誰就是蔣介石！”無論我走到那裏，祇要放眼望去，總可以看到“沈如槐是撕毀協議的蔣介石！”這樣的標

語。對於團派的指責，我實在是無話可說。因為我已經認識到：會前臨時要求改名，純粹是出爾反爾的小人之舉。由於改名風波，兩派大聯合的氣氛已經蕩然無存。在這個問題上，我充當了不光彩的角色。就當時的情形而言，我完全應該而且可以做到從大局出發，耐心地說服 414 的骨幹分子，堅持已經達成的協議，在全校師生員工面前樹立周總理反復提倡的“言必信，行必果”的信譽。我没有這樣做，却反而做了群衆的尾巴。這充分說明我並不是一個成熟的領導者，且已深深陷入派性的泥坑，不能理智地分析臨時改名會給團派群衆情緒造成嚴重的傷害，也沒有意識到這種行為會給團派中的極端分子反對大聯合的口實。盡管我心裏很清楚，即使沒有這個“口實”，清華也不會實現真正的大聯合，我仍對自己當時的行為後悔不已。

雖然沒有大聯合的氣氛，但大聯合的進程還在繼續。9月 23 日，兩派負責人在主樓商討聯合總部組成問題。聶元梓、王大賓、韓愛晶本人以及譚厚蘭的代表參加會議，意在促進雙方的聯合。會上，414 堅持對等原則，即雙方各派相同的人數組成聯合總部核心組和下屬各機構。414 願意做出讓步，承認蒯大富的特殊性，在組成聯合總部核心組時，蒯大富除外，團派和 414 再各出 6 人，使雙方人員比例為七比六。但團派堅持按照“四項協議”規定的九比四的比例組成核心組。結果不歡而散。

第二天繼續協商，團派終於同意按照七比六的比例組成核心組，這就是大聯合的第二號協議，蒯大富在協議上簽了字，并寫上“保證有效”的字樣。接着又簽署了關於蒯大富任核心組組長，我任副組長，以及核心組組成人員的第三、第四號協議，也叫“公告”。由於團派內部對於這樣

的聯合分歧很大，這二、三、四號公告始終沒有向全校師生員工公布。所以雖然有了聯合總部，也有了核心組，但是實際上，聯合總部和核心組形同虛設，并沒有真正發揮任何領導作用。團派和 414 還是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

團派的極端分子對於按照“對等原則”實現的大聯合一百個不滿意，以劉才堂為首的一批人成立了“鬥私批修聯絡站”，發表宣言，說清華兩派的聯合是缺乏基礎的。他們認為蒯大富“私”心太重，為了自己的面子，喪失革命原則。他們要鬥蒯大富的“私”，批 414 的“修”。

### 力保戰友

聯合總部採取的唯一的聯合行動就是批鬥周泉纓。

本來，為了防止團派保衛組抓到周泉纓而加以迫害，414 曾要求公安局逮捕周泉纓，周泉纓也曾去公安局投案自首，以保性命安全，但公安局都未收留。9月 24 日，東方紅戰團和《雲水怒》戰鬥組發表聲明，要求衛戍區逮捕周泉纓。蒯大富當晚告訴 414 負責人：謝副總理說要按江青同志的指示教育周泉纓，不要抓。

可是，還是這個謝富治，10 月 14 日在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上却說：“你清華已經貼了伯達同志的大字報，聽說那個人沒有很好處理，怎麼處理呀？就那麼算了嗎？我看不行！”于是，在謝富治的授意下，團派開始利用周泉纓大做文章。10 月 19 日，蒯大富請示謝富治：“我們要把反革命小醜周泉纓扭送公安局。”謝富治說：“噢！你們今天要把他抓起來，你們同意扭送啊！我也同意！” [37]

當晚，《捉鬼隊》將周泉纓扭送公安局。很明顯，謝富治和蒯大富一唱一和，企圖利用周泉纓的問題給 414 制造麻煩。

10 月 27 日，蒯大富又寫信給謝富治：“我們要求提審反革命小醜周泉纓、楊忌非（均已被捕）。種種迹象表明，他們是有組織、有計劃地反對陳伯達同志、中央文革。他們背後有壞幹部支持他們。我們準備把這個案子徹底搞清楚，但市公安局軍管會不同意提審，請求您的意見。”蒯大富想私設公堂，提審周泉纓，其目的就是要從 414 中抓出一個所謂的由壞幹部支持的反對中央文革的集團。蒯大富的想法理所當然地遭到市公安局軍管會的拒絕，但却得到了謝富治的支持。謝富治馬上批示：“周泉纓可以拉回來批判鬥爭，但祇能文鬥，不能打人。”[38]

順便提一下，10 月 27 日在接見河北代表團時，陳伯達說：“清華大學有個學生，有一天不知發了神經病，要揪出竊取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陰謀家陳伯達。文章寫得很長，寫得很無聊，我不想看。最後謝富治同志告訴清華大學，你們怎麼不處理呀？他們就把他抓到公安局。我告訴謝富治同志：不要抓他，把他放回清華，有不同意見可以辯論，有錯誤可以批判，不要採取專政措施。事實上，他貼大字報的那天，他那一派 414 就把他藏起來了，怕把他打死。如果把他打死，群衆就犯錯誤。不應該打，更不應該打死。”[39]

蒯大富當天召開聯合總部會議，做出徹底批判周泉纓的決議，還成立了周泉纓專案組。

10 月 31 日，聯合總部在大禮堂召開批判周泉纓大會，蒯大富讓我主持會議。他這樣做，無非是想讓我難堪。周

泉纓不是你的親密戰友嗎，看你怎麼批判他？可我早有思想準備，你們怎麼批判都行，就是不能把他打成反革命。我對那些批判周泉纓的文章嗤之以鼻，如果論戰起來，他們根本不是周泉纓的對手。我在主席臺上看着周泉纓，心裏說：“你周泉纓不聽勸告，可要受苦了。”會議中間經常有人領呼口號，當我聽到“打倒反革命小醜周泉纓！”的口號時，愣了一下，覺得不對，就沒有舉手。臺下有人發現我不舉手，站起來指着我責問：“為什麼不舉手？”領呼口號的人發現了這個情況，故意反復高呼“打倒反革命小醜周泉纓！”的口號。我還是不舉手，結果引起臺下一片抗議的騷動。我置之不理，仍然從容不迫地主持會議。在每次呼“打倒反革命小醜周泉纓！”的口號時就是不舉手，每次都激起一片又一片抗議的騷動。起初，我不肯舉手祇不過是想守住“周泉纓不是反革命”的底線，後來臺下越鬧越凶，我就想，這也許能給周泉纓傳遞一個信息：你的戰友仍然在保護你，你可要頂住啊。堅持下去，就是勝利！

我們《千鈞棒》小組的戰友們發現臺下有些團派的人試圖衝擊主席臺，擔心我的安全，馬上組織起來，悄悄地集合到禮堂西側，在緊靠主席臺的地方站成一排，并控制了主席臺到禮堂西側的通道。他們通知我：一有情況，立即走到禮堂西側，和他們匯合，一起從正門出去。我轉眼望去，《千鈞棒》七、八個身高馬大的戰友正嚴陣以待，以防不測。散會時，我在《千鈞棒》戰友們的保護之下避開了那些試圖圍攻我的人，順利地離開了大禮堂。

聯合的進程還在繼續。經過艱苦談判，兩派終於達成關於廣播臺、辦公室、政治部、鬥批改辦公室合併以及聯合總部委員組成名單等五項決議。11月8日，崩大富在校

大會上宣布五項決議。在談判聯合總部委員組成名單時，我們推舉譚浩強參加聯合總部，團派則堅決反對。團派認為譚浩強是壞幹部，不能進入井岡山兵團領導機構，414 認為譚浩強是革命幹部，否定譚浩強，就是否定 414 的幹部政策，否定 414 本身。既然是聯合，各自推薦自己的代表，團派不應否決對方人選。雙方爭執良久，相持不下。最後，各自讓步：團派同意譚浩強進入聯合總部，414 同意在決議中寫上“要求譚浩強同志最近向全校作檢查，直到群衆滿意為止。”

然而，好景不長，清華兩派的大聯合因呂應中問題和陳楚三問題而徹底失敗。清華兩派陷于全面內戰。

## 第五章 全面內戰

### 爭端再起

1967年的10月份，文化大革命一派收尾的形勢。中央陸續發表了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時所作的最新指示，強調大聯合，三結合，強調解決幹部問題。隨後，中央又發布通知要求全國各工廠、各學校、各部門和各企業單位必須按照系統、按照部門、按照班級，實現革命大聯合。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中、小學校都要復課鬧革命》。11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毛主席關於教育革命的指示，同時發表了同濟大學等幾個學校的教改方案。

清華名義上已經實現了大聯合，到10月底，各系都已經全面復課。但是，聯合總部和所屬機構徒有其名，蒯大富在進一步聯合的問題上受制於團派中的極端分子，無法邁出實質性的步伐。

蒯大富祇熱衷於在周泉纓問題上大做文章，清華運動怎麼辦？我們414不能袖手旁觀，而應以積極的態度推動清華的運動健康發展。我們認為清華文化革命下一階段的任務就是解放幹部，搞好教育革命，實現三結合。我們決定仍然從解放呂應中同志入手，再次向中上層幹部發起衝擊，在清華掀起一個解放幹部的高潮。11月4日，414鬥批改辦公室、二七、三七、東方紅戰團等單位發起成立《教育革命串聯會》，試圖以串聯會的形式主導清華運動的大方向。在《教育革命串聯會》的大會上，我們安排呂應中同志發言，其目的是將教育革命和解放幹部有機地結合起來，力圖將他推上領導崗位。我們認定他是革命的領導幹部，

大膽地讓他參加了串聯會的領導機構。

我們總結了上次解放呂應中同志虎頭蛇尾的教訓，這次準備工作做得比較充分。四一四 200#分部的同志們事先經過調查研究，準備了全面評價呂應中同志的材料。為了幫助呂應中同志，我們特地派《千鈞棒》戰鬥組的主要骨幹常駐 200#，和呂應中同志一起研究如何能够做到“三劃一站”，甚至幫助他起草發言稿。200#分部還召開了大會讓呂應中同志在 200#群衆面前公開檢查，聽取群衆的批評建議。

在經過周密的準備之後，414 采取了四個步驟。第一，召開 414 戰鬥組組長會議，介紹幹部問題和呂應中同志的情況，在 414 內部統一思想；第二，414 廣播臺開始播發系列文章全面而系統地介紹呂應中同志，為解放呂應中同志大造輿論；第三，414 在主樓後廳和大禮堂召開兩次批判幫助呂應中同志大會；第四，召開批鬥蔣南翔的全校大會，讓呂應中同志第一個發言批判蔣南翔。414 一系列的動作，目的很清楚，就是向清華師生員工證明：呂應中同志在教育革命過程中能够批判蔣南翔，能够認識自己的錯誤，願意接受革命群衆的批評幫助，表明他正在做到“三劃一站”，他是一位可以參加三結合的革命領導幹部。

414 這個時候大膽解放呂應中，實在是擺脫被動爭取主動的一招妙棋。團派毫無思想準備，立刻做出反映，強烈反對解放呂應中。兩派爭端再起，并從此走向全面內戰。

首先，團派 200#的兩個戰鬥組發表聲明，將呂應中定性為走資派。此前，還沒有人說呂應中是走資派。

接着，11 月 16 日，團派在 200#召開大會揪鬥呂應中。

414 沒有忘記保護幹部的聲明，也沒有忘記保護幹部的責任，在得知團派揪鬥呂應中的消息後，我們馬上組織大

批人馬趕到 200#會場，與團派展開辯論，試圖阻止團派鬥爭呂應中。雙方發生衝突，這就是“11.16 事件”。事後，我們覺得這樣做實在有些滄莽。

隨後，團派連續召開全校性的“徹底砸爛 200#，徹底批判呂應中道路”大會，批判鬥爭呂應中。

雖然團派對呂應中的批判逐步升級，但是他們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方針。

11 月 22 日，蒯大富在會上說：“呂應中道路是徹頭徹尾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道路”，“必須徹底批判”，“200#就是要徹底砸爛”。他還說：“希望呂應中走上革命道路”，“三劃一站做得好，還可以擔任領導工作”，“但要批鬥了再說”。

12 月 3 日，蒯大富特地跑到呂應中家裏去對呂應中說：“你如果亮相亮在 414 一邊，我用兩千人拉着你，肯定你是走資派，你也無法工作。”

從這些言行中我們可以看出，蒯大富此時雖然要批判呂應中道路，但他並沒有把呂應中看成走資派，還在竭力爭取呂應中，希望呂應中脫離 414，轉而支持團派。蒯大富可能在想：清華遲早要成立革委會，如果解放了呂應中，那他肯定是被結合的幹部中職務最高的。他支持 414，將來也會代表 414 的利益。如果能說服他改變立場，參加團派，那是再好不過的了。

但是呂應中並沒有按照蒯大富希望的去做，因而，厄運便不可避免地降臨到他的頭上了。

12 月 4 日上午 10 時 30 分，團派保衛組趁呂應中同志去北醫三院看病之機，將他非法綁架。下午，團派突然召開大會，鬥爭呂應中同志，將呂應中同志定性為“反革命

修正主義分子”、“漏網大右派”，宣布對他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與此同時，批判呂應中的大字報充斥了整個清華園。團派還在甲所辦了個展覽會，展示呂應中的所謂“罪行”。

蒯大富突下毒手，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無奈之中祇有求助中央。我們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給中央首長的一封緊急請示信

1967年12月4日

總理、中央文革、聶副總理、謝副總理：

鑑于我校當前運動面臨着嚴重局勢，我們以萬分焦急的心情向中央首長請示匯報如下：

1、呂應中同志是我校原黨委常委，200#原黨總支書記及該項目工程主要負責人，國家某任務技術核心成員之一。自今年6月份以來，我們按照毛主席的一貫教導，對他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作了全面的詳細的調研和審查，並且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解放呂應中同志，從教育着手，對他的錯誤進行了多次批判、幫助，目前他對自己的錯誤有了一定的認識，并通過大小會20餘次向群衆進行了檢查，聽取了群衆的批判、幫助，初步做到三劃一站。他有決心站出來繼續革命，為人民立新功。我們認為呂應中同志是我校的革命領導幹部。

2、最近我校某些決策人在階級敵人的煽動下，變本加厲地對抗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製造了許多謠言，煽動群衆，挑撥幹群關係。在這種情況下，今天出現了一起嚴重政治事件。今天中午某些人突然強行綁架了重病去醫院治療的呂應中同志，一路上進行非法的武鬥，并在當天下

午召開鬥爭呂應中同志的大會，進行變相體罰。在會上還宣布了一項非法“通令”，對呂應中同志實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剝奪了他的人身自由，會後用汽車綁走，下落不明，呂應中同志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遭到嚴重威脅。

3、200#是我國國防科研生產的重要基地，擔負着國防科研生產的重要任務，呂應中同志過去是此項目的主要負責人，并在科研生產中有重要貢獻。但是目前某些人借鬥呂應中之名，大量泄露出工程及某部重要國家機密，嚴重危害和影響此項國防科研生產和建設，給階級敵人、美蔣特務、蘇修特務、日本特務以可乘之機。

上述情況，我們認為事關重大，為了對革命事業負責，特緊急匯報中央，望速派人前來調查，採取相應措施并予以指示。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聯合總部核心組成員：

沈如槐、孫怒濤、宿長忠、龍連坤、汲鵬、劉萬璋

414 幹部辦公室 200#教育革命串聯會

當晚，我們開着車，先到國防部，後到文津街九號總理辦公室，由我親手把信送到有關接待人員手中。我們期望呂應中同志的特殊情況能夠引起中央的重視，出面幹預，也許能使呂應中同志獲得自由。然而，我們的信如泥牛入海，毫無回音。

12月5日，團派召開“鬥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漏網大右派呂應中大會”，414組織部分戰士參加會議，要求與團派辯論呂應中問題，又造成衝突，幾名414戰士被打成重傷。

12月7日，我們414的15名聯合總部委員發出倡議，要求聯合總部全體委員開會辯論呂應中問題。我們提出四點要求：立即釋放呂應中，就綁架事件作出檢查，將呂應中的筆記等物品交由政治上經過嚴格審查的同志共同保管，在此基礎上公開辯論呂應中的問題。

12月8日，全校287名幹部發表《強烈要求立即釋放呂應中同志》的聲明，認為綁架呂應中同志是非法的，是違背《六·六通令》的，要求蒯大富立即釋放呂應中同志，恢復他的人身自由，指出呂應中問題並未定性，應通過運用四大武器進行正常辯論來解決，提醒蒯大富不要上階級敵人的當。

414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蒯大富按照自己的計劃繼續對呂應中實行專政，不斷地批鬥，不停地上綱，直到將他升級為“蔣劉反黨集團的少帥”。

呂應中同志在蒯大富私設的囚室中度過了漫長的八個多月，受盡嚴刑拷打、百般折磨，身心健康遭到極大摧殘。而最為卑劣的是團派專案組要從呂應中同志嘴裏挖出414破壞文化大革命的陰謀，大搞“逼供信”。

1968年7月27日工宣隊進校後，呂應中同志才恢復自由。有一天，他專門到清華中央主樓來看我，非常愧疚地告訴我，他對不起414，他連累了414。他沒有經受得住團派專案組的“逼供信”，編造了一個謊話，說414曾和他密謀策劃引爆200#原子反應堆，造成巨大的國際影響，以此說明文化大革命是失敗的。團派專案組還強迫他詳細描述了破壞200#的技術方案。不過，他又告訴我們，他在技術方案中做了手脚，祇有真正的核物理專家才能看出，他的技術方案根本不能破壞200#。他想日後以此證明，他所

交代的口供完全是假的。一個解放後我國自己培養的極有作為的科學家，不能專心致志從事科學研究，却要挖空心思編造虛假的技術方案，去應付革命小將對自己肉體和心靈的迫害，可悲也夫？

## 戰歌事件

12月5日，就在綁架呂應中同志的第二天，蒯大富又採取了出人意料的行動。團派廣播臺發表聲明，稱《四一四戰歌》的歌詞不是林彪語錄，唱《四一四戰歌》是炮打林副統帥，是為了挑起內戰等等。接着，團派開始大肆批判所謂“反動黃色歌曲414完蛋歌”，攻擊《四一四戰歌》使用的是法西斯語言，宣揚的是武士道精神。

校園裏突然掀起的一股批判《四一四戰歌》的狂潮，搞得我們一頭霧水，莫名其妙。是蒯大富存心挑起事端，轉移視線，以回避師生員工對他們非法綁架呂應中的不滿和批評呢？還是包藏禍心，陷害414呢？我們不得而知。

所謂《四一四戰歌》其實就是一段林彪語錄歌。文革中，到處都唱毛主席語錄歌，414有人別出心裁，為一段林彪語錄譜曲，并把它命名為《要敢于犧牲——四一四戰歌》。

這段林彪語錄是：“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于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

曾記否？5月12日，謝富治來清華，批評414大方向不對，給414造成了巨大的壓力。5月15日，在414的《一個月總結》中，我們引用了林彪的這段語錄，用意很簡單，那就是抵制謝富治對414的批評，激勵414戰士發揚堅持

真理、勇于自我犧牲的精神。至于這段語錄出自何處，我們並未在意。

沒想到這段語錄很對周泉纓的胃口。他突發奇想，要把它變成《四一四戰歌》。他先找他們動農系的人，給語錄譜了曲，聽了以後，感覺不好。他又找 414 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樂團重新譜曲，并在歌詞結尾加上了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我們的樂團給林彪語錄譜曲以後，直接在 414 的大會上教 414 戰士演唱，很快就普及開來。不幾天，414 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舞蹈團又為這段曲子編了舞。

從此以後，每當 414 召開大會，臺上，樂團奏曲，舞蹈團跳舞，臺下，全體 414 戰士齊聲高唱這個《四一四戰歌》。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四一四戰歌》成了維系 414 戰士的紐帶，在激勵 414 士氣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正因為此，團派對它恨之入骨，并引發一場風波。

12 月 13 日，蒯大富在團派的大會上說：11 月 27 日，在周總理等人接見首都工人代表時，他曾就清華《四一四戰歌》歌詞是否為林彪語錄一事，請示總理和葉群。總理把蒯大富的請示轉給了吳法憲，讓吳法憲查實。會後，吳法憲對蒯說：“林副統帥沒有講過那段話，肯定沒有講過，也不會那樣講。”蒯大富說：“我們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示已經公布于全校，他們還要唱‘完蛋歌’，我們認為這是反革命頂風，我們不允許任何人把這種很不象樣的聯動式的法西斯的歌曲強加給我們最最敬愛的林副主席。”

好一個吳法憲，沒有仔細查證，就匆忙否定，真是枉為林彪的四大金剛了。

對於蒯大富在《四一四戰歌》問題上大做文章，我們認

爲這是小動作，沒有理睬，繼續高唱《四一四戰歌》。不過，許多 414 戰士爲查找這段林彪語錄的出處而東奔西跑，其中主要是高幹子弟，他們有的拿來書籍，有的拿來照片。這些書籍和照片明白無誤地證明：《四一四戰歌》的歌詞確爲林彪語錄。

事隔兩天，蒯大富又在大會上再次就《四一四戰歌》問題攻擊 414。

不是說“政治鬥爭要引導對方犯錯誤”嗎？面對蒯大富的囂張氣焰，我們決定故意示弱、低調回擊。12月16日，414 廣播臺發表《嚴正聲明》，指出《四一四戰歌》乃是爲林副主席語錄譜曲而成的，蒯大富肆無忌憚地污蔑它是法西斯語言、反動的黃色歌曲，這是炮打林副主席的罪惡行爲。但是我們並沒有公開指出這段林彪語錄出自何處，我們想看一看，蒯大富到底要幹什麼，到底要走多遠，我們特別想看一看，究竟是什麼人在支持他這樣無理取鬧。

大人物赤膊上陣了。12月16日深夜，謝富治、戚本禹與北京高校群衆代表座談時，對清華有關問題做了一系列表態。

關於《四一四戰歌》問題，團派代表請謝富治證實《四一四戰歌》是否爲林彪語錄，謝富治說：“我從未聽見過，謠言。”

戚本禹說：“造毛主席、林副主席謠的人，罪該萬死”，“不會有這樣的事，林副主席沒說過。”他說：“你相信嗎？靠毛澤東思想嘛！你們學了這麼多年毛選，還分析不出來？”

關於幹部問題，團派代表說：呂應中是走資派，414 要保他。戚本禹說：“在呂應中的問題上，414 要作自我批評。”

團派代表說：414 批評團派保凌瑞驥。戚本禹說：“無非是派性攻擊，不要管。”

關於清華聯合問題，戚本禹說：“清華大聯合要以團派為核心，為基礎，這是我們的意見。”“你們團派要高姿態，要堅定不移地整頓自己的組織，哪怕十二級臺風你們也不要管他，把你們自己的組織整頓好，多做自我批評，自己要做榜樣。這樣等謝副總理去開個會，表揚了你們就可以當核心了。這就是我們的態度。”

戚本禹還對清華團派的代表說：“壞人要他們自己揪嘛！你們裏面也有壞人，你們少一些，414更不用說，多一些。”[40]

孤陋寡聞、專橫武斷大概是一切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的通病。不僅吳法憲，連謝富治、戚本禹都異口同聲地否定《四一四戰歌》歌詞是林彪語錄，并反誣414造謠。晚上，團派在大禮堂傳達謝富治、戚本禹的講話的時候，其神情猶如得到了一柄尚方寶劍。有這麼多大人物為老蒯撐腰，他們更加得意忘形，更加肆無忌憚，他們以為勝券在握了。

我們當然也再一次看清了：不做調查研究，不分青紅皂白，偏聽偏信，打擊414，維護蒯大富，在清華建立以團派為核心的紅衛兵政權，這就是中央文革大人物解決清華問題的根本原則，從謝富治到陳伯達，再到戚本禹，無一例外。

面對這樣的形勢，我們決定反擊。12月18日，414在大禮堂召開關於《四一四戰歌》的專門大會，陳楚三在大會上發言，大膽地向所謂大人物挑戰，公開批評“12.16講話（即謝富治、戚本禹的講話）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陳楚三還向全校師生員工指明作為《四一四戰歌》歌詞的

林彪語錄的出處，并當場展示刊有該段林彪語錄的書籍。

這本書是總參軍訓部編的《林彪元帥有關戰役方面的論述匯編》。《四一四戰歌》歌詞選自林彪 1959 年 9 月 11 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它明白無誤地刊登在《匯編》的第 85 頁。陳楚三宣讀了林彪講話全文。其中包含《四一四戰歌》歌詞的那段講話是這樣的：

打仗沒有這樣一種戰鬥作風，怕癢怕疼，那是不能打好的。當然，另一方面，我們指揮員要盡量以小的犧牲去取得大的勝利。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于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打仗的人如果不下這個決心，上戰場就要發抖了，心裏蹦蹦跳跳的。下了這個決心，就有膽子，下了這個決心，就聰明了。勇敢出智慧，膽小什麼都嚇掉了，還有什麼智慧？這是說的戰鬥作風。

事實勝于雄辯。巧舌如簧的老蒯和他那強大的宣傳機器在事實面前突然變啞了。清華園一片沉寂。我們以為蒯大富應該偃旗息鼓，不再在《四一四戰歌》問題上胡鬧了。

然而，蒯大富又出奇招。12 月 20 日中午，蒯大富竟然指使團派保衛組綁架了作為 414 主要負責人、聯合總部委員的陳楚三同志，屬於團派的十六名聯合總部委員隨即發表聲明，稱陳楚三是反革命分子，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晚上，蒯大富在全校大會上說，陳楚三是反革命分子，已經扭送到公安局，被公安局收下了。

他接着傳達了在下午召開的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會上謝富治的講話。謝富治說：“清華井岡山是大家公認的無產階

級革命派，後來分出了 414，其中廣大群衆是要革命的。當然大聯合要有個主導，主導就是原來的井岡山嘛。要想搞垮井岡山是不行的，永遠不行的！井岡山要把 414 搞垮，那也不合適。雙方都做自我批評，那是唯一的辦法。要以 414 為主，不合適嘛！”蒯大富還說，關於陳楚三問題，謝富治指示黃作珍政委處理。黃作珍政委講：“把他（指陳楚三）留下。”

事實上，當蒯大富站在講臺上唾沫橫飛的時候，陳楚三正在慘遭團派保衛組的毒打和折磨。團派保衛組的打手們對陳楚三進行了長時間的嚴刑拷打。他們剥掉陳楚三的棉衣，猛打猛踢陳楚三的兩肋、腹部和胸部，用棉帽蒙住陳楚三的雙眼，猛擊陳楚三的眼部，用烟頭燙陳楚三的臉，用火燒陳楚三的脖子，用鉗子夾陳楚三的手指，等等，用盡了法西斯的酷刑。他們殘酷地折騰了陳楚三近十五個小時，第二天凌晨三點才把他送到北京市公安局。無獨有偶，公安局關押陳楚三的房間，正是幾個月前關押周泉纓的房間。陳楚三在牢房的牆壁上發現了周泉纓刻的字和火炬狀的 414 標志。

與此同時，蒯大富指使團派保衛組大打出手，抄了 20 多名 414 的幹部和教師的家，毆打 414 的幹部和頭頭。蒯大富認定團派和 414 矛盾的性質已經發生變化，發出所謂“通緝令”，通緝 41 名 414 負責人。很顯然，蒯大富想借此機會一舉摧毀 414。清華園一片白色恐怖。

“圖窮而匕首見”也好，“狗急跳牆”也好，任何語言都無法形容蒯大富的行徑，我想用“卑劣”二字一點也不過分。整個 414 隊伍都傻眼了，大家紛紛發問：怎麼會出現這樣的事？蒯大富瘋了？他懂不懂什麼叫光明磊落、堂

堂正正的政治鬥爭？謝富治怎麼了？他顧不顧最起碼的法律程序？蒯大富抓一個，他就收一個？

我們絕沒有想到蒯大富竟會對陳楚三下毒手，也絕沒有想到謝富治竟如此縱容蒯大富胡作非爲。

蒯大富一直把 414 說成是“反動逆流”、“非法組織”，必欲除之而後快，然而，要把由七千人組成的 414 打成反動組織談何容易？于是，他們改變了策略，突然對 414 的主要頭頭下手，把這些頭頭打成反革命，企圖以此證明 414 是由反革命分子操縱的反動組織，從而達到瓦解 414 的目的。

我們清楚地意識到，414 與蒯大富的鬥爭進入了一個更加復雜、更加殘酷的新階段。

蒯大富為什麼要拿陳楚三開刀？兩個月後，在北京市大專院校學習班上，團派的第二號頭頭鮑長康親口告訴陳楚三：陳楚三在全校師生員工面前指出林彪語錄的出處，使蒯大富和支持他的那些大人物十分難堪，這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最根本的是因為，四月份陳楚三帶頭反對“四項協議”，導致蒯大富的革委會流產和 414 的壯大。在五大領袖中，唯有蒯大富的後院清華大學還沒有成立革委會，一個強大的反對派還在時時威脅着蒯司令，這怎麼能不讓蒯司令惱羞成怒、恨之人骨？因而他們選中陳楚三作為重點打擊對象。

陳楚三是誰？陳楚三是中共一大代表陳譚秋之子。陳譚秋和毛澤民一道在新疆鬧革命，被反動軍閥逮捕的時候，陳楚三母子也遭監禁。陳譚秋和毛澤民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殺害，獄中黨組織負責人張子意給陳譚秋的幼子取名楚三，寓“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之意。（《史記》卷七《項羽

本記》：居巢人範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後來陳楚三和母親被共產黨營救出獄，在黨的關懷下成長。想當年，陳楚三沒有遭遇小蘿卜頭那樣的悲慘命運，而如今，他却被共和國的公安部長謝富治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了共產黨的監獄，可嘆也夫？

在綁架了陳楚三之後，蒯大富們還裝模作樣地辟謠，說什麼陳楚三不是康生養子。今年以來，學校裏盛傳陳楚三是康生養子。因而不少人猜測，也許康生是 414 的後臺。對於相信後臺的那部分 414 戰士來說，這無疑是一個精神支柱。其實這也是誤傳。陳楚三明確地跟我說，他不是康生養子，雖然曾經給康生寫過幾封信，可從來沒有回音。但是由於我們始終沒有看到或聽到康生對清華兩派做過任何公開表態，因此，我們一直都對康生抱有好感。

我們的天真幼稚，我們的良好願望，都被這殘酷的事實擊得粉碎。蒯大富和我們搞聯合是假的，他要把我們徹底鏟除！我們和他們的鬥爭不僅僅是思潮之爭，也是一場生死搏鬥。我們對清華園 414 和團派的鬥爭的艱巨性、長期性和殘酷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面對謝富治和蒯大富聯手整垮 414 的企圖，我們理所當然地要奮起反抗。

12 月 21 日，我們採取了大膽的行動，組織 414 戰士進城游行，將《四一四戰歌》事件的真相公諸于世，以求喚起社會輿論的同情，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或許會進行某

種幹預。游行隊伍先在臺基廠北京市革委會門前舉行集會示威，後到市公安局靜坐示威，給市革委會和公安局施加壓力，迫使他們釋放陳楚三。事前有人提出，這次行動矛頭所向一個是新生的紅色政權，一個是國家專政機關，搞不好會招致謝富治更加嚴厲的鎮壓。但是我們認為問題的根子在市革委會和謝富治，沒有他們的批准，團派即便抓了陳楚三，公安局也不會收留。北京市革委會和謝富治皂白不分，羈押忠良，他們在陳楚三的問題上有錯誤，不找他們找誰？

我們沒有忘記拉出 414 總部之前在圓明園的秘密集會，當時，我們曾經相約：結成死黨，拼死抗爭。一個人坐牢，五十個人陪伴。現在，真正考驗我們的時刻到了，我們必須履行諾言。我們清楚地知道，謝富治和蒯大富今天抓陳楚三，明天就可能抓其他頭頭。與其讓他們一個一個地抓，不如拼他一個魚死網破！要抓，讓他們一起抓！要坐牢，就一起坐牢！我們別無選擇，祇有鋌而走險！414 的領導集體同仇敵愾、義無反顧地走上了與謝富治對抗的道路。

在出發前的動員會上，劉萬章說：“如果陳楚三是反革命，那我們大家都是反革命，我們與陳楚三共存亡。”

宿長忠譴責“蒯大富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清華園一片白色恐怖。”

孫怒濤高呼：“還我人生安全！還我四大自由！”

這次行動對 414 的隊伍也是一次嚴峻的考驗。我們高興地看到，414 的隊伍不愧為堅強的隊伍，在那樣的高壓下仍有 1500 多名 414 戰士將生死置之度外，與我們“共赴派難”，手挽着手，跟着我們上街游行示威，一路上散發傳單，高呼口號。我在心不禁高呼：“414 群衆萬歲”！我們在市革委

會大樓前召開了抗議示威大會，大會發言中多次點名蒯大富，并故意突出他的“市革委會常委”頭銜，其矛頭實際指向“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

當游行隊伍來到市公安局舉行抗議活動的時候，一部分414戰士衝進了市公安局，強行占領了公安局的幾間辦公室，宣布舉行長期靜坐示威，直到公安局釋放陳楚三。這部分人在清華就已經預先組織起來，并取名為“革命到底”學習班。所謂“革命到底”，其實就是“把牢底坐穿”的意思，他們下定了決心，要與陳楚三共存亡。

“革命到底”學習班的兩位負責人是張雪梅和周忠東。他們在5月份曾和陳楚三一起貼大字報，頂過謝富治的“四項協議”，頂過“414上臺，不行”的“最高指示”。那個時候，他們就準備一起為堅持真理赴湯蹈火，粉身碎骨。現在陳楚三有難，他們毫不猶豫地走向公安局，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氣概。

使我們感到寬慰的是我們的行動不僅沒有受到鎮壓，反而得到了北京市革委會在場的許多工作人員的同情和理解。特別是公安局軍管會的解放軍和公安幹警們對我們非常友好，對於“革命到底”學習班強行占領辦公室的過火行動沒有採取阻攔措施，而是表現出一種理解、寬容、默許甚至是支持的態度。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廣大的幹部和群衆對蒯大富這一類造反派的不滿。

為林彪語錄譜曲，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絕無僅有的一次。對於這段以《四一四戰歌》出現的林彪語錄，蒯大富恣意漫罵，吳法憲矢口否認，謝富治、戚本禹異口同聲誣為謠言。因為這段林彪語錄，陳楚三身陷囹圄，四一四鋌而走險，清華園血雨腥風，北京市沸沸揚揚。

這件事不知驚動了何方神聖，責令戚本禹、謝富治接見清華兩派負責人，承認《四一四戰歌》歌詞是林彪語錄，并立即釋放了陳楚三。

這是繼 5.30 革委會流產後，清華出現的又一政治奇迹。真是天助我也！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祇無形的大手在左右着清華的運動。正是這祇無形的大手，在關鍵時刻扭轉了清華的形勢，遏制了蒯大富的胡作非為，當然也遏制了中央文革錯誤方針在清華的實施。

12月26日晚，我們正在西大飯廳舉行文藝活動慶祝毛主席的生日，突然接到電話要我們 414 派 8 名負責人到人民大會堂參加首長接見。

12月27日凌晨1點40分到3點40分，戚本禹、謝富治、丁國鈺、李鐘奇接見了團派代表。3點40分到5點接見了 414 的代表。5點到6點接見了雙方代表。

在單獨接見 414 代表時，幾位解放軍同志架着陳楚三走了進來，跟我們一起參加了接見。我將接見時的主要對話抄錄如下

(談到大方向問題)

四一四：我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團派裏有壞人挑動，凌瑞驥就是一個，還有謝遐齡。

戚本禹：還有校外的沒有？有什麼大人物嗎？

四一四：團派要揪大人物麼！我們不知道！

戚本禹問：你們有後臺沒有？

四一四：沒有。

戚本禹：你們與林杰有關係沒有？

四一四：我們沒有見過他，祇有汲鵬同志與他見過一面。

汲鵬：我見過他一面，還是團派的人給我聯系的。

戚本禹：有聯系也沒關係，對人的認識總是有個過程的嘛！

四一四：我們就是沒有聯系！真奇怪！他們罵我們是王八蛋，我們連王、關都沒有見過！相反，老蒯一貫聲稱關鋒是他們的後臺。

戚本禹：王力、關鋒是什麼性質中央也沒定。有聯系也沒關係。你們不能肯定一點聯系也沒有，思想上沒有聯系嗎？

（談到戰歌問題）

四一四：《四一四戰歌》是林副主席語錄，團派污蔑是黃色歌曲，法西斯歌曲。

戚本禹：你們的戰歌也是有問題的嘛！曲調不够高昂，也不够嚴肅，應對得很準確嘛！

四一四：我們的戰歌還是比較好的 比較好聽，我們很受鼓舞。

戚本禹：你們誰來唱一唱？

四一四：我們集體唱。

戚本禹：不要向我示威！

（九位同志一起唱了戰歌）

戚本禹：不够高昂嘛！最後四句還好。“完蛋就完蛋”多了麼，怎麼那麼多？

四一四：那是反復。

戚本禹：反復也不行。說的嚴重些，這實際上就是篡改。

四一四：不是篡改。

戚本禹：起碼是不妥當、不嚴肅。

四一四：這首歌主流是好的，但他們罵成是土匪、法西

斯歌曲，這是什麼語言？

戚本禹：不管人家，你們要做自我批評。

四一四：這首歌體現視死如歸的革命英雄主義。

戚本禹：林副統帥有八大作風，你們祇引了一個地方，而且不全。

四一四：這段最生動。

戚本禹：你們的戰歌，我們專門研究了一天，（說着從皮包中拿出一本精裝書）難道你們不知道嗎？（指着書）前邊這段多好呀！這總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意思。你們的戰歌也沒講為什麼而犧牲。

四一四：有名的“八·五”海戰，麥賢得同志就是高唱這首戰歌英勇殺敵的。

戚本禹：不！那是念語錄，不是唱！

（我們四一四同志拿出一本有林副主席這段語錄的書）

戚本禹：那兒來的？

四一四：不知道，是四一四戰士送給我們的。

戚本禹：誰送的。

四一四：不知道。

戚本禹：不知道？你們對我們不放心。

四一四：首長，這本書是我們參加接見前，廣大戰士調研後，找來送給我們的。

（接着我們又拿出另一種版本的照片，其中包含那段語錄）

戚本禹：這是誰拍的照片？這是國家機密！

四一四：我們宣傳組。

戚本禹：這是絕密的。你們創作歌的時候，語錄是從那裏來的？

四一四：是從一本不大可靠的書中找來的。

戚本禹：怎麼不從可靠的書中找來！

四一四：全國都唱。

四一四：首長！

（被打斷）

戚本禹：我們不是首長！

四一四：林彪語錄。

（又被打斷）

戚本禹：你口氣這麼大，怎麼連同志二字都不加？一會兒稱我們首長，一會兒林彪！

（被批評的同志愣住了）

戚本禹：你再講，關於語錄歌，一會我還要講。

（談到聯合總部問題）

四一四：本來我們已經基本上按對等原則聯合起來了，成立了聯合總部。但是，自從陳育延傳達了首長講話（指戚本禹 12 月 17 日凌晨的講話）後，破壞了聯合，全面地破壞了。

戚本禹：（嘩啦一聲站起來）那就是我破壞了你們的聯合了，那麼我做自我批評，我該檢查了。

四一四：不！主要是團派歪曲了首長講話，破壞了聯合，造成了很壞影響。

（接着四一四將 12.17 講話團派傳達記錄及一份重點講話摘錄送上）

戚本禹：（逐條看記錄，在念到“清華大學大聯合要以團派為核心，為基礎”時）不象這樣講的，但意思差不多。

（在念到：“你們團派要高姿態，要堅定不移地整頓自己的組織，哪怕十二級臺風也不要管他”時）什麼十二級臺風，

我沒講過這個話，什麼風不風的，我沒講過。（在念到“要團派多做自我批評”時）這話我說了。（在念到“在呂應中的問題上 414 要做自我批評”時）

四一四：呂應中同志被團派抓了很久，現在還不放。

（戚本禹不語，宣布單獨接見結束，聯合接見開始，團派代表進來。）

（四一四接着講呂應中被綁架問題）

戚本禹：應按六六通令辦事，具體問題我不講了，回去自己解決吧！

四一四：我校黨委、團委的檔案都被團派搶了！

戚本禹：不管了！不管了！

團派代表大聲叫嚷：陳楚三就是反革命！

四一四：首長請看！陳楚三是放出來了，他們還說是反革命，人身安全根本沒有保證。

蒯大富：不抓了。

四一四：照他們這樣隨便把人打成反革命就抓起來，我們也可以把蒯大富抓起來。

戚本禹：那你們抓吧。[41]

聯合接見時，戚本禹和謝富治祇是照本宣科地念了書面講話。

戚本禹書面講話：

清華兩派為一個戰歌問題，發生了很大的爭論，我們研究了這個問題，讀了林彪同志關於戰役一書。林彪同志是一個偉大的軍事天才，他的著作處處閃耀着毛澤東思想的光輝，他不愧為我們偉大領袖最好的學生，不愧為我軍最

好的副統帥，他的軍事著作是無產階級軍事戰略思想和戰役戰鬥作風的高度概括，是活學活用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典範，是最活的軍事辯證法，是戰爭大海中的游泳術，是人民戰爭的海洋中不使自己沉沒而使自己既定的達到勝利之岸的經驗總結，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軍事科學，是我軍極其寶貴的財產。因此，同志們，我們要用認真、嚴肅的態度來對待林彪同志的軍事著作。414 的同志們把林彪同志論述我軍戰鬥作風的思想改編為戰歌，這是熱愛林副統帥的表現。但是這個改編沒有把林彪同志論述八大作風全部表現出來，同時也沒有把林彪同志的我軍不怕犧牲勇敢戰鬥的作風的話引全，而且在兩派閻派別鬥爭時，用這個戰歌來鼓舞士氣，這就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林彪同志偉大的軍事著作是不妥當的。此外，戰歌的曲調也不够高昂，吳法憲同志上次就戰歌問題的講話主要意思就是這樣，為此我們建議 414 的戰歌應由 414 自己根據毛澤東思想的原則作妥善處理，雙方不要再爭論這個問題。團派也不要在這個問題上作文章了。雙方都應該認真的、嚴肅的對待這個問題。

### 謝富治的書面講話：

團派、414 都應該緊跟我們偉大領袖最新指示、最高指示的原則聯合起來，不要打內戰。打內戰是違背毛主席教導、違背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導原則的。井岡山、414 原來是一個組織井岡山，後來又分開了，分開是不對的，硬壓也是不對的，現在應該重新聯合起來。從歷史上和現在的情況，團派在聯合中應該起更多的作用，但自己要有高風格，不要強調以我為核心。414 的同志應該

承認這個歷史現實，不要去爭這個高低。[42]

謝富治、戚本禹顯然受到了上面也許就是林彪的批評，不得不贊揚林彪是一個偉大的軍事天才，不得不承認“414的同志們把林彪同志論述我軍戰鬥作風的思想改編為戰歌，這是熱愛林副統帥的表現。”這無疑是414獲得的一次重大勝利。我們鋌而走險，做了最艱苦最困難的準備，本想來一個魚死網破，却沒有想到這些大人物竟如此外強中幹不堪一擊，我們的勝利來得這麼快，這麼容易，這真令我們大喜過望，彷彿還有一點劫後餘生的感覺。27日上午414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從南校門到大禮堂，旌旗飛舞，口號震天，七千名414群衆夾道歡迎陳楚三凱旋歸來。我們在大禮堂召開大會，傳達了謝富治、戚本禹接見時的講話，并安排了幾個發言，抨擊蒯大富的錯誤，鼓舞414的士氣。

但是，我們並沒有盲目樂觀。我們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我們無法接受謝富治、戚本禹的講話。明明是蒯大富挑起事端，借戰歌問題打擊414，怎麼能各打五十大板，說什麼是雙方的“爭論”？明明是他們這些大人物矢口否認林彪語錄，怎麼能文過飾非，反而批評414將林彪語錄改編為戰歌的做法不妥當，戰歌的曲調不够高昂？這豈不是鷄蛋裏面挑骨頭？中央反復強調對一個單位的兩派群衆組織要採取“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反對拉一派打一派，他們怎麼能公開唱反調？這些大人物在喋喋不休地教導別人多做自我批評的時候，却没有絲毫自我批評精神，對他們否定林彪語錄的錯誤講話沒有一點點道歉之詞。

由此看來，中央文革偏袒、縱容團派，打擊、壓制414

的態度沒有絲毫改變，他們的以團派為核心解決清華問題的基本方針沒有絲毫改變。中央文革解決清華問題的錯誤方針進一步助長了蒯大富的囂張氣焰，導致他有恃無恐，採取更加錯誤的手段對付 414，導致兩派對立的加劇。可以肯定地說，蒯大富在清華非法拘禁，私設公堂，大搞逼供信，大搞武鬥，不擇手段殘害清華的師生員工和革命幹部，都是中央文革解決清華問題的錯誤方針的直接後果。

## 革命到底

按理說戰歌問題水落石出了，陳楚三釋放了，蒯大富應該就此罷休。可是，在接見結束時，團派代表當着謝富治、戚本禹的面，大聲叫道：“陳楚三就是反革命！”而此時謝富治、戚本禹却不加制止。

回到清華後，以鮑長康為首的團派 16 名聯合總部委員再一次就陳楚三問題發表聲明，堅稱“陳楚三就是反革命！”

“我們抓陳楚三抓得好、抓得對，我們的行動好得很！今天決定把反革命小醜陳楚三放出來，是為了對他進行群衆專政。”蒯大富則進一步說：“權在我們手裏，我們要抓就抓，想放就放，我們想什麼時候抓他，就什麼時候抓他。”

顯然，蒯大富之所以氣焰如此囂張，根本原因是謝富治、戚本禹的支持。盡管我們不知道謝富治、戚本禹單獨接見團派時說了什麼話，但我們感覺得到謝富治、戚本禹支持團派、打擊 414 的錯誤態度沒有改變。另一方面，我覺得蒯大富無法向團派廣大群衆解釋戰歌事件和陳楚三問題，他們祇要承認抓陳楚三是錯誤的，就得承認整個事件是錯誤的。他們咬住陳楚三是反革命，就是掩蓋他們在戰

歌事件上的一系列錯誤。他們越是氣壯如牛，就越暴露他們內心的空虛。

早在 12 月 21 日，“革命到底”學習班的代表曾與公安局的同志討論過陳楚三的問題，公安局方面明確表示：“陳楚三是收留審查。如果是反革命就逮捕；是好人就放出來，還要公開平反。”衛戍區的同志則進一步說：“不僅要平反，而且要追究陷害者的責任。”

而現在，人是放了，但既未給受害者平反，又未追究陷害者的責任。不僅如此，蒯大富那邊還在大叫“陳楚三就是反革命！”在這種情況下，“革命到底”學習班決定繼續留在公安局，徹底調查事件的真相，要求為受害者平反，追究陷害者的責任。為此，他們與市公安局軍管會接待站、衛戍區、市革委會大學組進行了多次接觸。下面是一些訪談紀要。

在市公安局軍管會接待站。

問：蒯大富在學校裏大叫大嚷“陳楚三被公安局逮捕了”，我們想了解陳楚三被“逮捕”的原因。

接待員答：不是逮捕，也不是拘留，是群衆扭送，上級批准，我們收留審查。

軍代表答：據我們了解，收留陳楚三與收留一般人不一樣，沒有在公安局辦手續，直接送看守所。

問：能不能回答我們上級是根據什麼批准收留？

軍代表答：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執行機關，有北京市革委會大印，我們才能收留。

問：陳楚三被監禁六天六夜，為什麼又不明不白放了？

軍代表答：不是監禁，不能說是監禁。

問：你們實際上把他放在監獄裏，實行的是專政。

軍代表答：不是，那是你們誤解，不要自己認為是專政。

問：為什麼又不明不白地放？現在蒯大富大造輿論，說放回是“群衆專政。”

接待員答：收留審查不是法律制裁，釋放是上級指示，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審查。

問：現在蒯大富堅持把陳楚三打成反革命，這個問題不解決，根本無法實現大聯合。

軍代表答：他說他的，你們和他辯論嘛！

問：這個問題不是一般群衆分歧，蒯大富是革委會常委，你們公安局插手了這一案件。既然公安局收留了陳，就必須對他的這一段時間的政治生命負責，對學校大聯合負責。陳楚三到底是“無罪釋放”，還是“群衆專政”？

軍代表答：我們不是推卸責任，確實是上級指示。我們不了解，你們去問市革委會嘛！

在衛戍區。

問：蒯大富說是黃作珍政委同意留下陳楚三。

答：沒有，黃政委不會這樣做。

問：陳楚三到底是“無罪釋放”，還是“群衆專政”？

答：據我了解，陳楚三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不是反革命，否則是要存檔案，要發“釋放書”的。

問：我們要求公安局公布審查結果。

答：責任主要在蒯大富，公安局是執行機構。

問：公安局插手了這一案件，有責任幫助我們搞清楚。

答：這個問題該處理的處理了，該批評的批評了，該懲罰的懲罰了，記了一筆帳。

問：陳楚三問題不公開解決，清華大聯合就無法實現，

我們要求公安局責成蒯大富公開檢查。

答：錯誤主要是蒯大富的，你們要求蒯大富檢查，我認為是可以的。

問：我們希望把我們的情況向黃政委匯報。

答：我一定反映。

在市革委會大學組。

問：我們要搞清逮捕陳楚三和釋放陳楚三的原因。

答：我已經向組長匯報過，他說不清楚這件事情。

問：逮捕陳楚三是市革委會蓋大印，你們不能推卸責任。

答：你們應該聽公安局的答復。

問：無理逮捕陳楚三是蒯大富濫用職權的反革命陷害事件，我們要求革委會處理蒯大富。

答：我們可以向上級反映。[43]

1月31日，市公安局軍管會副主任王更印同志接見了“革命到底”學習班的三名代表。在聽取了代表們的情況匯報和三點要求後，王副主任說：

我們市公安局軍管會接受三方面領導：北京衛戍區、市革委會和公安部。總的是受謝副總理領導。我們有義務把你們的意見向上反映，向上匯報。

文化革命中，一般情況下，我們無權收留大學生。要收大學生必須有上級批准才行。具體到陳楚三，上級批准，我們收留審查，够不上法律。經過審查沒有問題就放出去。我們從來沒有說過他是反革命。況且，放他是上級首長直接決定的，性質就很清楚了。

我看你們提出的三條要求不難辦到嘛。你們可以再寫一

個報告，我給你們轉給上級。[44]

那一段時間，我經常去市革委會參加會議，接觸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從各方面了解的情況說明，公安局收留陳楚三是“上級指示”、“上級批准”，但他們都不肯告訴我這個“上級”究竟是誰。

我曾經有機會和黃作珍政委一起開會，我對黃政委說：“蒯大富說是你讓把陳楚三留下的。”黃政委一聽就急了，忿忿地說：“蒯大富怎麼能這樣胡說呢？”

我們斷定，這個上級，不是別人，就是謝富治。因此，“革命到底”學習班毫不遲疑地把矛頭指向謝富治。

1月12日，“革命到底”學習班發表了《給市革命委員會的一封公開信》。《公開信》全面系統地陳述了“四一四戰歌和陳楚三事件”的來龍去脉，明確提出：“（1）強烈要求市革委會徹底調查陳楚三案件的全部經過，審查蒯大富陷害陳楚三的全部陰謀，責成蒯大富為陳楚三公開平反，責成市公安局為陳楚三恢復名譽；（2）強烈要求謝副總理主持市革委會議責成革委會常委蒯大富對此政治陷害案作出公開的觸及靈魂的檢查。”《公開信》在清華貼出後，團派反映強烈，發表“緊急聲明”，說這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公開信”，揚言要對“革命到底”學習班採取行動。

後來“革命到底”學習班又陸續發表了《致公安局軍管會的公開信》、《給北京市革委會常委蒯大富的強硬照會》，並把這些公開信抄成大字報，張貼在北京市革委會、衛戍區和公安局的大門前，以及西單、東單、王府井、前門、火車站、北海等繁華鬧市區，力求造成廣泛的社會影響。他們還貼出了“市革委會常委蒯大富必須就迫害陳楚三事

件作出公開檢查！”“強烈要求謝副總理主持市革委會議責成常委蒯大富為陳楚三公開平反！”等大標語。

很清楚，我們要追究陷害者的責任，追究蒯大富亂抓人的責任，最重要的是追究謝富治亂關人的責任。我們對謝富治處理清華問題的錯誤政策已經忍無可忍，我們也已經無所顧忌，把點名“謝副總理”的大標語貼得滿街都是，借此發泄對他的不滿。

有一次，我利用中央首長接見的休息時間對康生講，蒯大富到現在還堅持認為陳楚三是反革命。康生淡淡地說：“是反革命的話，怎麼可能放出去呢？”

“革命到底”學習班在公安局一呆就是九十多天，成為炮打謝富治的急先鋒，直到楊餘傅事件出來後，才撤回清華。

### 炮制六評

伴隨着呂應中問題的爭論，兩派圍繞如何評價解放後的清華、清華牌幹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性質、任務等一系列問題又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67年11月，《險峰》戰鬥組的《淺談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鮑長康的《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大翻個》兩篇大字報，系統地提出了“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論”。這種論點認為：1949年解放以後清華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主要是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比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人數要多，已經遍布全校各單位，形成了一支龐大的隊伍即特權階層，在清華實行所謂的“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專政”；他們善于打着紅旗反紅旗，具有“紅皮

白心蘿卜”的特點，比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更壞、更危險；他們有政治資本，掌握實權，他們是蔣南翔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依靠力量，呂應中、高景德、滕藤這樣的中上層幹部就是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因而他們不可避免地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衝擊對象。

“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論”得到了個別中上層幹部的贊同，自控系總支書記凌瑞驥說：提出“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論”，這就接觸到了清華運動的特點。不僅如此，凌瑞驥還提出了“中上層幹部自覺反黨論”，他在團派召開的批判呂應中的全校大會上說：中上層幹部由於經歷和政治水平不同，對中央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鬥爭的自覺程度不同，有些中上層幹部是自覺意識到兩條路線鬥爭的，是自覺反黨的。此論一出，全校輿論立刻大嘩，水利系總支書記張思敬貼出大字報堅決反對凌瑞驥的發言，要求幹部學習班展開討論，而參加學習班的幹部也群起而攻之。

與此同時，蒯大富、鮑長康等人接受了我們 414 約定給他們歸納的“大翻個兒論”，他們現在開始理直氣壯地說：清華園就是要大翻個兒，教育界也必須大翻個兒！他們宣稱：“現在清華兩派的矛盾是徹底砸爛和什麼徹底砸爛的矛盾”，“徹底砸爛舊清華——這就是我們的全部理論和全部實踐。”

根據團派的一貫思路和所作所為，他們提出這些論點是不足為怪的，甚至也可以說是有根有據的，因為毛主席說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周總理說過清華大學在蔣南翔統治下成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資產階級獨立王國”。

414 則與團派針鋒相對，我們動員一切力量批判“新資

產階級知識分子論”。孫怒濤在 414 的《井岡山報》上發表了《向反動的“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論”宣戰》的文章。文章指出“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論”企圖在幹部隊伍的“一大片”與“一小撮”之間增加一個中間階段的政治概念，把廣大的幹部打成“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要害就是在幹部問題上實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擴大打擊面、縮小教育面”，就是繼續排斥、打擊革命幹部，阻止革命幹部參加三結合的領導班子，而讓那些真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政權。“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論”是在新形勢下的極“左”思潮。文章還指出“紅教聯”某些人正是這種反動理論的精心炮制者、賣力鼓吹者、忠實追隨者和既得利益者。

這時，我們覺得：應當學習中蘇兩黨論戰時中共發表《九評》時的做法，寫幾篇有分量的大塊頭文章，就解放十七年來我們國家政權的評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質和任務以及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問題，全面而系統地闡述 414 的政治觀點，批駁蒯大富的錯誤理論和錯誤實踐，唯有如此，才能擊中蒯大富的要害，打得他們趴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我們組織炮制了六篇文章，即兩個“三評”共“六評”：《閃光的東西不一定是金子——評“大翻個兒”的理論和實踐》，(12月1日)，《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和“徹底砸爛”——二評“大翻個兒”的理論和實踐》，(1月7日)，《評紅教聯——三評“大翻個兒”的理論和實踐》(1月21日)，《兩種根本對立的態度——評大翻個兒派對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理論和實踐》(1月10日)，《關於四一四戰歌和陳楚三問題——二評大翻個兒派

對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理論和實踐》(1月13日),《大翻個兒的12.25行動矛頭對準了誰?——三評大翻個兒派對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理論和實踐》(1月17日)前“三評”分別由陳楚三、黃瑞和、《雲水怒》起草,後“三評”則是414廣播臺的秀才們炮制的。

第一篇文章《閃光的東西不一定是金子》,是從論述五十天與十七年的關係入手的,因為在江青在11月12日說過:“有一個小將說,有的人祇搞五十天,不搞十七年。這實質上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江青講話的本意是不允許用批判五十天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包庇十七年的修正主義路線。我們414的小報在刊登江青講話時漏掉了這一段,遭到中央文革的嚴厲批評。

團派似乎抓住了新的理論武器,指責我們批判幹部問題上“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反動路線,解放幹部,死保呂應中,反對徹底砸爛舊清華,就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把“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的大帽子扣到414頭上。

我們對江青的講話加以全新的詮釋。我們認為五十天是十七年的繼續和發展,五十天和十七年的關係是辨證的關係,有的人是利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十七年的反動路線,有的人則是利用五十天否定十七年,否定十七年的革命路線。有包庇必有否定,包庇十七年的反動路線,必然否定十七年的革命路線,二者是一致的。我們說,對於資產階級分子,不能因為他們五十天的造反而包庇他們十七年的錯誤;對於革命幹部,不能因為他們五十天的錯誤而否定他們十七年的成績。我們堅定地認為,資產階級分子,決不會因為他在五十天內的造反而變成左派,而革命的幹部,也決不會因為他在五十天內犯了錯誤而變成右派。

我們的結論是不許用五十天否定十七年！包庇與否定，一詞之差，却反映了 414 與團派對解放後十七年的中國和清華評價的根本分歧。

江青說“不許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我們說“不許用五十天否定十七年”，如此針鋒相對！難怪團派大罵《閃光》一文是炮打江青的大毒草。

《閃光》再次批駁“徹底砸爛”論，并特意采用了“什麼‘徹底砸爛’”的小標題，重申《什麼“徹底砸爛”？》文章的觀點。當初我們寫這篇文章時，不僅受到團派的圍剿，不少 414 戰士也不同意我的觀點，而現在大多數 414 戰士都已經看清了所謂“徹底砸爛”的本質：那就是否定一切，徹底否定十七年的革命路線，否定一切幹部，打倒一切當權派，讓那些造反派掌權，來個大翻個兒，是個徹底的“大翻個兒”論！

正當清華關於“徹底砸爛”的論戰如火如荼的時候，12 月 14 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任立新的文章《在教學實踐中深入進行革命的大批判》。文中寫道“那種不願在教育實踐中做艱苦工作，空喊什麼‘完全粉碎’‘徹底砸爛’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否定，一概取消的做法是根本不可能達到教育革命的目的的，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觸動舊的教育制度”。

文章還引用了列寧的語錄：“小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特點就是不知道打倒、粉碎等等手段對於社會主義是不够的——祇有瘋狂反對大私有者的小私有者，才認為這就够了一——但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會犯這樣的錯誤”。

這是何等鮮明的 414 的觀點！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其

分量是人所皆知的，因而立即在清華掀起了軒然大波。我們自然是欣喜若狂，開動大喇叭，不停地廣播。蒯大富則是氣急敗壞，組織人馬圍攻《人民日報》社，要和任立新進行辯論，并說什麼“《人民日報》的權不在我們手裏，《人民日報》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專了我們的政。”

《人民日報》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不為所動，反復地播送這篇文章。時隔不久，《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大力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裏面有這樣一段話：自己有了錯誤，要做自我批評，不要總是認為祇有自己行，別人什麼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清華的人聽了以後，覺得這簡直就是專門批評蒯大富圍攻《人民日報》社行動的。

蒯大富總是自以爲是，老子天下第一，與宣傳機關對着幹，從《紅旗》雜志到《文匯報》，從《人民日報》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祇要不符合老蒯的胃口，他就拉起一支隊伍去造反，輕則批判，重則圍攻。

蒯大富這樣對待宣傳機關，源于他們對宣傳機關的偏見。早在 67 年的 8、9 月份，他們在《幹部問題》的文章中就這樣說過：

學校裏的人們有一種普遍的感覺：414 喜歡用公開發表的文章來解釋現象，團派喜歡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組，尤其是陳伯達、康生、江青、戚本禹、謝富治、王力、關鋒同志的講話來解釋現象。這是一種怎樣奇怪的現象呢？難道二者還有什麼不同嗎？答：有不同。或者是中央的宣傳計劃還沒有達到團派所急需達到的階段，或者是現宣傳部門還有大壞蛋。

不要以爲這是熱昏的胡話，它準確地反映了清華的現實，也生動地刻畫了團派極端分子急切希望得到宣傳機關支持的心理狀態。

對於這種所謂奇特現象，我們有我們的解釋。一方面，宣傳機關雖然控制在陳伯達、姚文元手中，並且不遺餘力地宣傳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甚至公開煽動“抓軍內一小撮”，但宣傳機關的大多數人並不同意蒯大富這些極“左”派的觀點，他們撰寫的文章還是盡可能地體現了黨的一貫思想和政策；另一方面，中央文革碰頭會一直由周總理主持，黨政大權始終掌握在總理手中，公開發表的社論等重要文章都要經過總理的審閱批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不能成爲黨報黨刊的聲音，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們到處煽風點火所造成的危害。

我們 414 總是能從《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和《文匯報》中找到支持 414 觀點的“理論根據”，並據以批判團派的觀點。團派指責 414 的這種做法是“撈稻草”。414 則理直氣壯地將宣傳機關公開發表的有關觀點和論述收集起來，編印成冊，並命名爲《稻草集》。

第二篇文章《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和“徹底砸爛”》尖銳地指出：

在“徹底砸爛”問題以及其他許多問題的爭論的背後，實際上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性質問題上的爭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在對建國十七年來我們國家政權性質的估計問題上的爭論，顯而易見，所有的爭論都緊緊圍繞着階級鬥爭最核心的問題——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的革

命，也就是說建國十七年來，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國家，我們的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偉大的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七年來階級鬥爭的繼續和發展，沒有十七年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以，這是一場部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徹底改善”就是反動的無政府主義的口號。“徹底砸爛”就是一句反動的口號。

我們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和任務牢牢地定格于《十六條》所確定的“鬥、批、改”，文章說：

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條明確規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很清楚，這裏規定的任務是“鬥垮”走資派，“批判”資產階級，“改革”上層建築，爲的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徹底砸爛”。

我們接過任立新給我們提供的理論武器——列寧語錄，將“小私有者”的桂冠牢牢地扣在蒯大富的頭上，說他的“徹底砸爛”實際上是小私有者反對大私有者的瘋狂行爲。我們主張解放幹部、讓幹部掌權，你們說我們是還原派，

是資本主義復辟；我們說你這樣的造反派掌權就是小私有者掌權，就是建立小資產階級獨立王國，那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復辟。

《評紅教聯——三評“大翻個兒”的理論和實踐》，重點批判紅教聯的觀點，把清華兩大派鬥爭的階級背景和“大翻個兒”論、極“左”思潮的階級根源都歸結到紅教聯的頭上。

關於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也是我們與蒯大富長期爭論的一個焦點。三縱隊時期，兩派曾經就崇尚群衆運動天然合理，還是堅持黨的正確領導等問題展開過激烈辯論。而關於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爭論又往往首先表現在如何正確估計文化革命的形勢問題上。去年二、三月份的時候，我們認為：文化大革命已經達到預期目的，就要收了，希望迅速建立新型的紅色政權，恢復生產秩序和人民生活的平時狀況。蒯大富却認為：全國存在一股資本主義復辟的逆流，要跟着林彪“重上井岡山”。七、八月份的時候，我們認為：經過一年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階級陣線已經基本清楚，資產階級當權派和無產階級當權派的界限已經分明，或較為分明，要盡快解放大批幹部。蒯大富却認為：全國處於內戰前夕，復辟前夜，并發出號召：武裝造反派，打倒“帶槍的劉鄧”。

蒯大富們總是危言聳聽，為他們亂揪、亂鬥和“徹底砸爛”制造借口，不停地把鬥爭矛頭指向廣大幹部和人民群衆。而滿天飛的所謂“首長講話”和小道消息却又不時為蒯大富的論調提供一些佐證。

現在，1968年年初，文化革命的形勢怎麼樣？文化革命怎麼搞？怎樣才能高屋建瓴地批判老蒯的錯誤？怎樣才

能抵制那些不符合我們胃口的“首長講話”？這次我們找到了新的理論武器——毛主席最新指示。

這裏講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是指 1967 年的 10 月份，中央發表的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時所作的一系列指示，在這些指示中毛主席強調大聯合，三結合，強調解決幹部問題，後來，毛主席又發表了關於教育革命的有關指示，隨後中央又發布通知要求全國各工廠、各學校、各部門各企業單位必須按照系統、按照部門、按照班級，實現革命大聯合。這是毛主席糾正極“左”，穩定局勢的重要部署。按我們的理解，文化革命正在收尾。這正是我們希望的，我們衷心地擁護這些指示。

可是老蒯却另有解釋，他們認為毛主席最新指示不適用於清華，清華特殊。他們的清華特殊論，一是說，清華資產階級堡壘頑固，舊清華尚未徹底砸爛；二是說，清華左派力量强大，可以單獨掌權，無需三結合。此時江青的 11.12 講話給了老蒯極為有力的支持。在 11.12 講話中，江青除了說“不許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外，還反復強調：文藝界文化革命沒有搞深、搞透，要亂敵人、亂敵人，因為敵人是很狡猾的，他們有一套一套的班子，你搞掉一套，它又弄上一套。

我們 414 的人對江青講話非常反感，認為她鼓吹重新大亂，與毛主席最新指示唱反調。但是我們又不便公開反對。面對這樣的局勢，我們反復思考，反復討論，決定高舉毛主席最新指示這杆大旗。一方面，我們認為毛主席最新指示才是當前文化革命的綱領性文件，我們真心誠意地希望按照這些指示去開展文化革命，把國家政局引向穩定；另一方面，我們認為，從鬥爭策略上考慮，抓住了毛主席最

新指示這杆大旗，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權。我們要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來清算蒯大富在清華的所作所為。毫無疑問，我們在批判蒯大富對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同時，也批判了一切違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首長講話”。但是任何人也別想抓住我們什麼把柄。于是三篇“評大翻個兒派對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理論和實踐”的文章就被炮制出來了。

第三評《大翻個兒的 12.25 行動矛頭對準了誰？》的背景是這樣的：

1967 年的 12 月 25 日，蒯大富又搞了個 12.25 大行動，拉出 6000 人的隊伍，到長安街、天安門、前門游行示威，張貼標語。這次行動的主題是“排除一切幹擾，掃除一切障礙，迎接九大召開”。1966 年的 12 月 25 日，蒯大富搞了個 12.25 大行動，首次將劉少奇的問題捅向社會，蒯大富自以爲在反劉少奇的問題上立了頭功。今年他以紀念 12.25 行動一周年爲名，又要立什麼新功呢？在動員會上，蒯大富說：“各階級、各階層、各派別、各種政治勢力都要在九大尋找自己的代理人”，“要掃除九大的絆腳石，爲九大立新功。”

他們要掃除什麼障礙呢？團派廣播臺廣播鮑長康的“座談紀要”中說得很清楚。他說“我們一貫認爲 414 是反動保守組織”，“你們惡毒攻擊聶元梓、蒯大富等革命造反派，妄圖使他們不能進入中央委員會，你們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哦，原來 414 是蒯大富進入中央委員會的障礙，當屬掃除之列。批判呂應中、綁架陳楚三，打擊 414 等等方面是爲蒯大富在清華建立小資產階級獨立王國掃清道路，另一方面，他們還有更大的“狼子野心”——爲那些不是黨

員的造反派進入黨的中央委員會、為一切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奪取黨權、政權掃除障礙。

可是僅僅一個 414，不值得蒯大富興師動衆跑到長安街去大聲疾呼，我們認為，他們真正的矛頭是指向 414 的“黑後臺”，或 414 在九大的所謂代理人。誰是 414 的“黑後臺”？在蒯大富的眼裏，總理和康生是 414 的“黑後臺”。

從 67 年初 28 團反對康生以後，蒯大富就與康生結下了“梁子”，雖然康生後來曾經試圖化解他和蒯大富之間的緊張關係，但效果並不理想，而且康生與其他中央文革成員不一樣，他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批評過 414，蒯大富對此一直耿耿于懷。蒯大富抓了陳楚三以後，此地無銀三百兩地宣布：“陳楚三與康生沒有關係”，“不是康生的養子”，無非是向世人暗示，他們的矛頭是直指康生的。

周總理更是蒯大富企圖建立極“左”政權的最大障礙。團派中的一些極端分子一直影射周總理是什麼“陶二世”，什麼“二月逆流的黑主帥”，什麼“楊餘傅最大的黑後臺”。總理批評 1.6 行動，不參加團派 5.30 革委會成立大會，也從來沒有批評過 414。他們影射周總理是 414 最大的黑後臺，并聲稱祇有將這個黑後臺揪出來的時候，清華的問題才能得到徹底解決。

蒯大富們到底是怎麼想的？是不是正如我們分析和猜度的那樣？當時我們並不知道，現在我們還是不知道。但是，我們當然不會放過攻擊蒯大富的機會，毫不猶豫就給他們結結實實地扣上一頂“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對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大帽子。

414 抓住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大旗，團派抓住江青 11.12 講話的大旗，我們指責團派“對抗毛主席最新指示”，團派

指責我們“惡毒攻擊江青同志”。

“六評”之後，清華兩派的論戰基本結束，論戰的氣氛沒有了，有的僅僅是恐怖。論戰的激情沒有了，兩派秀才都已筋疲力盡。論戰的題目沒有了，所有的領域都已涉及，大家都不願重複說過的話。論戰的結果是誰也不服誰，盡管各自都聲稱本派取得了勝利。

## 論戰實質

我們現在可以簡單梳理一下 414 與團派論戰的實質以及四一四思潮和團派思潮的主要內涵。《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和“徹底砸爛”》中已經指出：在“徹底砸爛”問題以及其他許多問題的爭論的背後，實際上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性質問題上的爭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在對建國十七年來我們國家政權性質的估計問題上的爭論。這就是說，414 與團派的論戰基本上圍繞兩個問題：一是如何評價解放後十七年的中國，二是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

### 第一個問題：如何評價解放後十七年的中國

#### 關於十七年的中國

414 對十七年的基本評價是“紅線主導論”和“階級關係不變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七年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占統治地位的。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從根本上說，當權的是無產階級。鑽到黨和國家崗位上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祇是一小撮。這是我們政治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基本事

實。正因為這樣，走資派在中國的地位和蘇聯完全不一樣。他們在黨內政權機器內未占統治地位。他們也未形成新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也正因為這樣，十七年來我國的階級陣線基本上是穩定的，經濟基礎基本上是在共產主義化的。

團派認為：

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誰要是僅僅在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承認在無產階級專政歷史條件下，還存在復辟和反復辟的鬥爭，那他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代表資產階級妄圖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掌握了國家機器，掌握了政權，掌握了思想戰線，他們聯合起來，搞復辟，鬧大亂子。他們在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他們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主要敵人。他們同廣大工農兵、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的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我國的階級陣線是不穩定的，階級關係是部分混亂，甚至在一些部門是顛倒了的。按照 414 的“不變論”邏輯，中國就根本沒有走資派，就根本不存在修正主義路線，就根本沒有資產階級篡奪了政權的爛掉了的單位，就根本沒有必要進行文化大革命。

關於十七年的清華

414 認為：

清華大學雖然被蔣南翔篡奪了領導權，但是清華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清華，是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照耀下的清華，這個清華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部分，無疑為社會主義祖國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十七年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清華占主導地位，政治

路線是紅的，教育路線雖然大部分是黑的，但還不全是黑的。

清華黨是毛主席的馬列主義的黨，而不是劉少奇的修正主義黨。

團派認為：

十七年來，蔣南翔推行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把清華變成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清華大學實行的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專政，是法西斯專政，是爛掉了的單位。

清華黨是按照清華黨綱建立起來的修正主義的黨，事實證明，清華黨是爛掉了。

## 第二個問題：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

在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414 與團派的爭論涉及到關於文革形勢的估計、關於正確對待群衆運動、關於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群衆、關於正確對待人民解放軍、關於對造反派要進行階級分析、關於反對極“左”思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性質、關於解放和使用幹部、關於政權建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這裏我祇介紹下面幾個問題。

###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性質

414 認為：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革命，也就是說建國十七年來，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國家，我們的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偉大的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七年來階級鬥爭的繼續與發展，沒有十七年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以，這是一場部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徹底改善”就是反動的無政府主義的口號。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的革命，就是要部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矛盾。這樣正是為了加強黨的領導，而不是削弱黨的領導。那種“要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要徹底否定過去的一切，要徹底打倒過去的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以後要從零開始建黨”等等論調，都是十分錯誤的論調。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不是解放前，也不是在蘇修資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革命。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革命以及蘇聯未來的革命有很大的區別。

具體到清華，414 認爲：

舊清華必須一分爲二！我們砸爛的祇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砸爛舊清華中資產階級破爛貨，而那些社會主義的東西，那些表現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貫徹的東西，不僅不能砸爛，而且統統要保，統統要發揚光大。

團派認爲：

414 在冠冕堂皇的言詞的背後掩蓋了十七年來出現在中國大地上的一股又一股的資本主義復辟妖風這一驚心動魄的現實，掩蓋了部分紅色政權已經被演變了這一血淋淋的現實，以此來否定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部還殘存着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有階級矛盾，階級鬥爭，也就否認了解決階級矛盾而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必要性。

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革命從根本上來說即從本質上來說是相同的。414 所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革命“根本不同論”就是否認代表國民黨反動派利益，代表帝國主義、資

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利益的反革命黑幫——中國赫魯曉夫等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派是社會主義條件下最危險的敵人；就是否認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革命、政權革命、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就是否認對走資派篡奪了的部分國家機器（也就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必須實行徹底打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一句話，“根本不同論”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取消論”！

具體到清華，團派認為：

舊清華是一個被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蔣南翔之流長期盤踞的爛掉了的單位，對它必須實行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實行“徹底砸爛”。

### 幹部問題是焦點

一年多來，414 與團派長期鬥爭的焦點是幹部問題，其中牽涉以下幾個問題：

無產階級當權派還是資產階級當權派？

414 認為：

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他們擁護黨、擁護毛主席、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十七年來大多數黨員和幹部是執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對幹部基本情況的這一正確估計不論在各地區、各單位都是普遍適用的。清華幹部也不例外。

清華的幹部，從他們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來看，他們的政治立場是堅定的，他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基本上是好的，他們所做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應該基本肯定的，他們執行的基本上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馬列主義政黨，我們的絕大多數黨員、大多數幹部是工人階級

先鋒隊，是群衆中的先進分子。我們學校的黨員、幹部也是這樣的，他們是無產階級當權派。

團派認為：

蔣南翔在清華貫徹了一條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十七年來在清華實行的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專政，是法西斯專政，而廣大的幹部都在不同程度上充當了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不管他們的主觀願望如何，他們客觀上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是替法西斯賣力。清華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是復辟舊清華的社會基礎。清華幹部是劉鄧反動路線的社會基礎。清華幹部不是無產階級當權派，而是資產階級當權派。

解放後清華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主要是“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已經遍布全校各單位，形成特權階層，是蔣南翔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依靠力量，清華一些中上層幹部就是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

革命動力還是革命對象？

414 認為：

廣大幹部既是革命的對象，也是革命的動力，并且首先是革命的動力。

團派認為：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批判幹部的運動。今後的文化大革命，大約都會伴隨一場群衆批幹運動。革命的群衆批幹運動天然合理。

勇敢保護還是徹底砸爛？

414 聲明：必須對革命幹部予以堅決支持，堅決保護，這是革命事業的最高利益，在關鍵時刻不保護革命幹部是左傾機會主義的表現。

團派認為：

對於蔣南翔親手經營、泡制出的一支修正主義幹部隊伍，必須從根本上砸爛。祇有徹底砸爛清華的官僚機構，徹底解散“幹部堆”，革命幹部到革命小將中去，狠觸靈魂，徹底改造世界觀，才能最後獲得解放。

平黑平反還是繼續醜化？

414 大聲疾呼：

要為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幹部平反，為被打成黑幫的革命幹部平黑，恢復幹部的本來面目，做到真正徹底解放一大片幹部。

團派認定：

文化大革命前，清華就存在一個蔣（南翔）劉（冰）反黨集團，文化大革命中，這個反黨集團的第二套班子，不斷進行着反革命翻案活動，陰謀復辟資本主義。這樣，清華一大批幹部都被劃進了所謂的反黨集團或第二套班子，不僅不能平黑平反，還要繼續實行專政。

大膽解放還是殘酷迫害？

414 貫徹對幹部勇敢保護、熱情幫助、大膽解放的政策，在解放大批基層幹部的基礎上，不停地向中上層幹部衝擊，從團委副書記、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黨委常委直到黨委副書記，抓住典型，帶動整體，試圖解除中央點名外的絕大多數中上層幹部。

團派對 414 解放的每一位典型幹部，都毫無例外地採取網羅罪名、無限上綱、堅決打倒的政策；甚至抓捕關押一批普通幹部，私設囚室，大搞“逼、供、信”，用盡一切法西斯手段殘酷迫害革命幹部。

政權問題是本質

兩派在幹部問題上的鬥爭的本質是政權問題。

414 認爲：

解放和選擇使用幹部，關係到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政權這個根本問題，它必將是一場激烈的階級爭奪戰。

紅衛兵小將還沒有能力獨立地管理國家，單獨管理城市，連學校也不能單獨管理。實踐已經證明，紅衛兵單獨掌權，就是不行！

祇有一大批革命領導幹部衝殺出來，參加臨時權力機構，成為骨幹和核心，才能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掌好權，用好權，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使我們的國家千秋萬代不變色。

要大膽使用幹部就必須勇于讓賢，就要勇于把革命的領導幹部放到重要的工作崗位上去，就要讓幹部起骨幹和核心作用，要勇于把自己的權力讓給革命的領導幹部，革命小將獨攬大權的現象必須改變。

團派認爲：

清華大多數幹部不是無產階級當權派，都應該降職使用或干脆當老百姓，而決不能掌握大權。否則，資本主義復辟隨時都是可能的。

在革命三結合中有以誰爲核心的問題。清華的大權如果不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那麼徹底砸爛舊清華的戰略任務就不可能完成，資本主義就會在清華復辟。經過文化大革命風暴嚴峻考驗的革命派井岡山必須掌權，必須在革委會中占絕對優勢。要堅持以左派爲核心的原則。

團派深知，他們祇奪取政權還不够，他們還必須奪取黨權，否則，他們遲早要交出政權。因此他們不斷鼓躁：

砸爛清華黨委，重建清華黨的組織，把一大批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好的革命闖將吸收到黨組織中來，讓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造反派在黨組織中占優勢，從而從組織上保證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絕對領導權。

蒯大富的野心更大，他的親密戰友公開放話：

“蒯大富當得了還是當不了中央委員，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勝利不勝利。”

現在我們可以將 414 的主要觀點作一個概括，這就是：

“紅綫主導論”，“階級關係不變論”，“部分改善論”，文化革命“收尾論”、“轉舵論”，“兩小撮論”，針對幹部的“平黑論”，針對群衆的“平保論”，針對造反派的“一分爲二論”，紅衛兵小將應該做到“五個正確對待”論、應該主動爲革命幹部“讓賢”論，大膽解放和使用幹部，讓領導幹部成爲三結合政權的核心和骨幹，反對衝擊軍隊，反對極“左”思潮，還有那個著名的“造反派祇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論。

我認爲，這些觀點就是“四一四思潮”的主要內涵。

團派思潮是什麼？這應由他們的代表人物加以概括。我祇記得他們的名言：“徹底砸爛舊清華——這就是我們的全部理論和全部實踐。”

1967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編輯部文章《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提出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這個理論一方面強調我國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又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這是一個悖論。現在看來，清華之所以分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并形成 414 思潮和團派思潮，主要是受這一悖論的影響。

414 強調：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下進行的革命，必須實現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如果你破壞和削弱了無產階級專政，你就是極“左”。團派強調：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理論的精髓就是繼續革命，而且既然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就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如果你反對這一原則，你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你就是極右。

### 三大戰役

團派從 68 年 1 月 5 日到 1 月 23 日連續召開了十次大會，集中三個專題開展大批判，他們稱之為“三大戰役”。在所謂“遼沈戰役”中，他們把 64 年清華大學到農村開展的社教運動說成是“假四清”，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事件；在所謂“淮海戰役”中，他們把校黨委 65—66 年“為生存而鬥爭”的活動說成是猖狂的反革命活動；在所謂“平津戰役”中，他們將 414 成立以來的所作所為都說成是蔣劉反黨集團及其第二套班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的翻案活動。

在這十次大會上，他們確立了兩個重要的政治概念，一是：清華大學有一個自覺反黨的蔣（南翔）劉（冰）反黨集團，二是：這個集團的第二套班子正在活動。蒯大富關於清華大學十七年和幹部隊伍的估計、關於文化革命的性質、目的以及路線、方針等等一系列觀點都集中地反映到這兩個重要的政治概念上了。既然清華大學存在一個以黨委書記為首的反黨集團，那麼清華的中上層幹部就不可避免地受到牽連，不僅不能解放，還要繼續批鬥；既然反黨

集團的第二套班子還在瘋狂進行翻案，那麼就必須打退他們的反撲，就必須對他們實行專政，而不應該和他們搞什麼三結合；既然 414 是受第二套班子操縱的組織，就應該徹底摧毀他們，而不應該和他們搞什麼大聯合。

文化革命進行了一年半，他們的政治綱領仍是“揪王八、亂敵人、樹隊伍，血戰舊清華”。當然，這也不是蒯大富的發明，江青 11.12 講話為他們的政治綱領提供了重要依據。

團派《井岡山》報說，蔣劉反黨集團的主帥是蔣南翔、副帥是劉冰；蔣劉反黨集團的第二套班子的頭面人物是呂應中，何介人、張慕津和羅徵啓。呂應中，被稱為第二套班子的“黑少帥”；何介人，原黨委委員、黨辦主任、校辦主任兼武裝部長，被稱為 414 “鬥蔣作戰部”的辦公室主任；張慕津，原黨委委員兼團委書記，被稱為 414 “幹部問題串聯會”核心組成員；羅徵啓，被稱為 414 的“不管部部長”。

為什麼蒯大富認定他們四人是第二套班子的頭面人物？我看最根本的原因是呂應中和羅徵啓一直都是 414 死保的幹部，也是兩派激烈爭論的焦點。而何、張兩位是團派拉來陪綁的。

經過“三大戰役”，蒯大富說，團派和 414 矛盾的性質已經改變了，由人民內部矛盾變為敵我矛盾了。

## 神聖同盟

414 採取了針鋒相對、以牙還牙的原則。為了與團派的“三大戰役”相對抗，我們連續召開了五次批判鬥爭大會，名為“落實最新最高指示，打倒派性，斬斷黑手，向階級敵人猛烈開火”。我們所指的黑手，其實就是那些支持團派

的幹部、教師和學生。

我們的第一個鬥爭對象是自控系總支書記凌瑞驥，我們說他是躲在大翻個兒派後面的走資派，是挑動兩派鬥爭的黑手。因為他現身說法，為團派的錯誤理論和錯誤實踐提供證據。本來我們並不認為他是走資派，但是他在大會上拋出了“中上層幹部自覺反黨”論，不光害了自己，其他幹部也跟着受害，他實在是太壞了。既然他自己承認是自覺反黨的，那我們給他戴上一個走資派的帽子也不為過。

我們的第二個打擊對象是謝遐齡，他是一個學生，不知由於什麼原因被逮捕，據說還把他定性為反革命分子。有人說此人擔任過蒯大富的私人秘書，有人說他是28團的“政委”。這些說法是真是假，並不重要，反正他是團派極端分子的代表人物，因為他喊過“徹底砸爛舊中國”的口號。於是我們說謝遐齡也是團派後面的黑手，利用蒯大富的派性進行反革命活動。

我們的第三個打擊對象自然是紅教聯和陶德堅。我們與團派的鬥爭每升一級，我們對紅教聯和陶德堅打擊就隨之升級。

我們把這些人捏合起來拼湊了一個所謂“隱藏在井岡山內部的篡黨、篡軍、篡政的反革命陰謀集團”，說什麼走資派凌瑞驥式的所謂“革命幹部”、資產階級右翼陶德堅式的所謂“革命教師”、反革命分子謝遐齡式的所謂“革命小將”，勾結在一起組成了反動的“神聖同盟”，煽動極“左”思潮，操縱“大翻個派”，進行反革命陰謀活動。

我們心裏明白，誰也不會真正相信這個“神聖同盟”的存在，但是，為了打擊團派，提高414的士氣，我們不得不這樣做。

兩派之間沒有調和餘地，清華的文革運動已經走入死胡同。

### 要求軍管

1968年1月4日，清華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武鬥，雙方出動了數十人，傷者衆多（詳見“百日武鬥”）。雖然北京衛戍區副司令李鐘奇親自帶人到清華主持兩派簽訂了停止武鬥的協議，但清華的局勢仍然一觸即發。

1月6日，我們414開會研究認為，清華幹部、教師、學生的人身自由已經完全沒有保證，根本談不上四大自由。蒯大富現在的方針並不是靠自由辯論來爭取群衆，而是不惜採取各種手段消滅一切反對他們的師生員工。414和團派的聯合已經徹底失敗。單靠我們414的力量，已不足以阻止蒯大富的胡作非爲。

我們覺得414的政治綱領要做重大調整，我們的長遠目標仍然是在清華實現革命的三結合，但在此之前，必須首先實行軍管。清華文化大革命的唯一出路就是實行軍管，由中央派解放軍到清華，領導清華的文化大革命。於是，我們決定提出“強烈要求中央對清華實行軍管”的口號，并組織414群衆在校內校外貼了許多“要求軍管”的大標語，制造輿論，爭取同情，希望能引起中央的重視，及早派軍代表到清華來。我們知道，周總理曾經有過“派軍代表到清華搞三結合”的設想，414關於軍管的要求沒準兒會得到總理的支持。

團派自然全力反對軍管，因為這樣一來，等於宣布蒯大富紅衛兵政權的失敗。

對於 414 要求軍管，團派是這樣評論的：

說穿了，他們就是通過上述“言”和“行”，極力向全市乃至全國施放“清華運動搞遭了，無法收拾了”“蒯大富垮臺了”的烟幕，妄圖向中央施加壓力，以達到他們否定井岡山，兌現“造反派不能掌權”的謬論的卑鄙目的。

正在此時，中央已經決定派“解放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檢查組”進清華。雖然不是軍管，但畢竟有了第三方，有了公證人，蒯大富再也不能一手遮天。我們打心眼裏歡迎解放軍。北京其他一些比清華鬧得厲害的學校也派了軍代表。

1月8日、9日，即將進校的軍代表分別與兩派的負責人座談，聽取兩派的匯報。

1月19日，軍代表正式進駐清華，說是北京衛戍區和北京市革委會派來的，可大多數人是海軍。檢查組進校實際上是想穩定清華局勢，防止發生更大規模的武鬥，同時也試圖做做雙方的工作，促成聯合。

解放軍檢查組沒有想到，他們一進清華，難題就擺在他們面前。他們召集兩派負責人開會，提出成立一個兩派共同參加的聯合檢查組，每方各派七名代表，互不干涉。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通過兩派代表的相互接觸，可以緩和對立情緒，逐步實現大聯合。可是由於陳楚三問題，這個聯合檢查組最終沒有成立。因為在我們派出的七名代表名單中包含了陳楚三，團派說他是反革命分子，不同意他參加聯合檢查組。

軍代表跟我們 414 的頭頭談話，希望我們能更換代表。

有些 414 戰士也提出是否以大局為重，換下陳楚三。為此我們在 414 戰鬥組組長大會上，專門討論了陳楚三參加聯合檢查組的問題。絕大多數人的意見是：陳楚三的問題是重大原則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

對於我來講，還有更深的考慮。我們對蒯大富本人、對他的紅衛兵政權已經徹底失望。清華當前的主要問題還遠遠不是大聯合的問題，而是 414 群衆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問題，是 414 生死存亡的問題。陳楚三是 414 總部主要負責人，是響當當的烈士後代，如果連他都保不住，我們還能保得住誰？如果在他的問題上退下來，團派得寸進尺，再生事端，抓一、兩個頭頭，414 怎麼辦？保住核心、保住骨幹、保住隊伍，才能堅持真理，否則一切都是空談！我們死死咬住一條：陳楚三問題是當前清華文化大革命的關鍵，不為陳楚三平反，清華文化革命就無法進行。

在解放軍的主持下兩派也達成了關於停止互相攻擊的協議，關於廣播機構的協議，可大家都沒有遵守這些協議。

1月 28 日，解放軍檢查組撤出清華。雖然他們並沒有解決清華兩派任何實質性問題，但我相信他們了解了清華許多真實情況，為後來的解放軍宣傳隊進校做了準備。

1月 30 日，團派綁架了羅徵啓。至此，呂應中、何介人、張慕津、羅徵啓，再加上李康，團派捏造的所謂“第二套班子”的頭面人物，全部落入團派保衛組的“法網”。

## 鬥私批修

1968年初戚本禹被隔離審查，中央文革又一員大將折戟沉沙。總理抓住有利時機，進一步糾正極“左”錯誤，穩定全國局勢。2月2日，總理在接見國務院各部委代表時的講話中縱論國內外形勢，強調大聯合、三結合，強調解放幹部，強調抓革命、促生產，還談到了整黨、整團、整頓紅衛兵和準備召開九大的問題。從總理的講話中我們明顯地感覺到文化革命“收”的氣息。

後來傳出了毛主席的講話精神：文化革命，一年發動，二年勝利，三年掃尾。

68年年初，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已有14個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經中央批准，準備在2月份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有六個省、市、自治區。中央決心在一季度或更長一點的時間裏建立其餘9個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實現祖國山河一片紅。

在北京，總的形勢不錯。市屬18個區縣，已有8個區、7個縣成立了革命委員會。農村80%的公社、70%的生產大隊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城市90%的工廠實現了大聯合，30%成立了革命委員會。

問題出在學校，主要出在大學。北京共有62所大專院校，祇有少數學校建立了革命委員會。68年元旦剛過，清華就發生了武鬥。鋼鐵學院、財金學院的武鬥時間更長，規模更大，兩派各占了幾座教學樓，構築了工事，大打出手。不少大專院校兩派嚴重對立，內戰不休。丁國鈺同志形象地說：春風吹進了玉門關，春風也吹進了山海關，但春風就是吹不進北京的大專院校。

現在是解決北京高校問題的時候了。因為北京高校不僅影響了北京，而且嚴重影響着全國形勢的發展，甚至可以說，北京高校是全國局勢動蕩的根源之一。北京的大學生還在外地亂竄，到處插手。中央經過艱苦工作，好不容易穩定了一個地方的局勢，北京的大學生一攬和又亂了。外省市強烈要求中央約束北京大學生。

文化大革命當中，總理常用的一張王牌是軍隊。因為軍隊幹部聽話，受到中央文革的幹擾少。在中央，對那些事關重要的國家部門，總理都毫無例外地實行軍管。國務院各部委基本上實行了軍管。鐵路系統，除了上海，全部路局實行了軍管。在地方，各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的主任中大多數是軍隊幹部。

依靠軍隊解決北京的學校問題也是總理的一貫思路。在這之前，北京市中小學的問題都是北京衛戍區李鐘奇副司令員根據總理指示負責處理的，並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果說周總理是全國的救火隊隊長的話，那麼李鐘奇就是北京市的救火隊隊長。哪裏有問題，李鐘奇就出現在哪裏。而謝富治卻是個“縱火犯”。作為副總理，他和王力，一把火，燒出個武漢“7.20事件”；作為公安部長，他帶頭高喊“徹底砸爛公、檢、法”；作為北京市革委會主任，他袒護五大領袖，拉一派、打一派，使得北京高校兩派對立加劇，局勢日益混亂。

北京高校問題深深地困擾着周總理。現在，他又把解決北京高校問題的重任交給了李鐘奇副司令員和衛戍區。在這個背景下，北京市革委會和衛戍區決定分期分批組織大學兩派負責人開辦大專院校學習班，集中學習毛主席的指示，鬥私批修，打倒派性，實現大聯合，建立革委會，以

利復課鬧革命，進行鬥、批、改。

與此同時，衛戍區開始向各重點高校派遣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軍宣隊兵分兩路，一部分解放軍參加大專院校學習班，做兩派頭頭的工作；一部分解放軍開進學校，做兩派群衆的工作。2月9日，軍宣隊先遣隊進清華。2月13日，40多位軍宣隊隊員進駐清華。軍宣隊的領導成員是：隊長賴尚林，政委姚正德，副隊長劉承能。他們都是海軍後勤部的軍官。

北京市的態度堅決，目標明確。那就是：北京高校一定要在二月份實現大聯合，三月份建立革委會。

一股浩蕩的春風吹遍了北京城。

第一期學習班1968年2月5日在二裏溝市委黨校開學。20所大學的200名頭頭參加學習班。清華兩派各派五名主要負責人參加學習班。我、孫怒濤、汲鵬、陳楚三、劉萬章代表414參加了學習班，宿長忠留校主持全面工作。我們有意讓陳楚三參加學習班。因為我們堅持認為，不解決陳楚三的問題，清華的大聯合、三結合無從談起。

在得知414派陳楚三參加學習班後，團派參加學習班的代表鮑長康、劉才堂、陳繼芳、任傳仲發表聲明，堅稱“陳楚三就是反革命小醜”。蒯大富沒有在聲明上簽字，保持一個高姿態。

盡管如此，他們不得不和陳楚三坐在一起，鮑長康還與陳楚三結成了“一幫一，一對紅”的對子。

李鐘奇和丁國鈺在學習班做了大量工作，解決了許多學校的問題。

浩蕩的春風並沒有帶來滿園春色，更不用說萬紫千紅了。總理的願望沒有實現。學習班後來擴大到36所大學，

1200人。原計劃祇學15—20天，但却拖了兩個多月。大專院校兩派對立問題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直到7月才得以徹底解決。從根本上說，因為五大領袖得到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的支持，五大領袖的危害還沒有徹底暴露。

在學習班，我們的主要任務是鬥私批修，圍剿派性。當時有兩篇文章《論派性的反動性》、《派性掩護敵人，敵人利用派性》是我們學習的重要材料。

我們清華兩派在學習班做了許多表面文章，但沒有解決任何實質問題。我們在學習班說的是一套，在學校裏做的却是另一套。

口頭上，我們也在檢查414的派性，態度也算真誠，但我們的内心深處，却充滿了迷茫。我們414與團派的鬥爭到底是派性？還是黨性？說是黨性吧，肯定不對。因為鬧分裂、打內戰，不符合中央的要求。說是派性吧，也覺得有點兒怨。因為我們和蒯大富之間的爭論，並非無原則的爭論，而是大是大非的鬥爭。我們認為，蒯大富是極“左”思潮的代表，與蒯大富鬥爭，是為真理而戰，為捍衛毛澤東思想而戰。放棄這場鬥爭，豈不是放棄我們的理想和責任？

我們相信團派也有這樣的迷茫。他們認為，414是右傾復辟勢力的代表，打垮414，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是毛主席賦予他們的神聖職責。

在那個是非混淆的年代，說不清什麼是派性，什麼是黨性，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克服派性，增強黨性。

## 解放劉冰

在學習班初期，我們實實在在地看到了北京市促進各大專院校實現大聯合，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決心和行動。在這種情況下，解放幹部成了不可回避的關鍵問題。

總理在 2 月 2 日說：“你要三結合，非要解放幹部不可，否則你三結合不能形成。”“我們必須真正的解放大批幹部，這就是馬克思說了的，毛主席也重複說的，不能解放全人類，就不能解放無產階級自己。你不能解放大批的幹部，你們的革命造反組織自己也不能解放，你掌不了權嘛！”

[45]

傅崇碧、丁國鈺、李鐘奇在學習班的講話反復強調解放幹部的重要性。他們已經發現兩派在幹部問題上的糾紛最多，分歧最大。為此，《北京日報》發表了社論《打倒派性，為革命解放幹部》。

面對這樣的形勢，我們很受鼓舞，也有些得意：414 是靠解放幹部起家的，形勢越往前發展，越能體現出 414 觀點的正確性。當時北京有一個“幹部問題聯絡站”，414 是“幹聯站”的重要成員之一，常常應邀向外校介紹我們解放幹部的“經驗”。

為了及早應對解放幹部和建立革委會的可能，我們做了許多準備工作。

2 月 28 日，我們給中央呈送了《關於建立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的初步意見（附中上層幹部狀況）》。

關於群衆組織，《意見》提出“恢復聯合總部，或成立清華大學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兩派革命群衆組織，要以對等原則，選拔優秀代表參加革命委員會。”

關於幹部問題，《意見》指出“目前，清華大學原黨委委員以上黨的幹部隊伍中，初步考慮有 8—10 人可以進入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

關於第一把手，《意見》建議“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第一把手最好由軍代表擔任，或中央另派擔任第一把手的幹部來。”我們在《意見》中說：“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第一把手，由革命小將擔任是不適宜的。一年多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那麼革命領導幹部能不能擔任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第一把手？我們在《意見》中做了模糊處理。《意見》說：“清華大學原黨委正副書記 6 人，其中 5 人（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黨委第一副書記劉冰，副書記胡健、何東昌、艾知生）是 1967 年《紅旗》雜志第五期調查員文章點了名的。”這裏，我們祇說是“點了名的”，而不說他們是“走資派”，因為我們一直認為《紅旗》雜志把他們定為黑幫是欠妥的。414 的人曾經找過《紅旗》雜志，據說林杰也曾說過這樣的話：“《紅旗》雜志不點名就主動多了。”這就使我們意識到，《紅旗》雜志點名並非是中央授意。

《意見》接着說：“關於原黨委第一副書記劉冰的性質問題，在群衆中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目前在團派和 414 派內部，都有一部分人，在搞他的專案工作（一部分主張打倒，一部分主張保）。鑑於《紅旗》雜志已經點名，所以在群衆中未公開辯論。”

這是為解放劉冰埋下伏筆。

前面已經介紹過，解放劉冰的工作是秘密進行的。414 內部對劉冰看法分歧很大，部分 414 群衆認為他就是走資派。大張旗鼓地解放劉冰必然造成 414 內部矛盾的激化。

爲了穩妥起見，我們甚至沒有讓 414 的幹部辦公室負責劉冰問題，而是讓 223 戰團準備解放劉冰的材料。鑑于解放呂應中的教訓，我們認爲和團派辯論劉冰問題已經沒有任何意義，要想解放劉冰，祇有準備充分的材料，向中央打報告，最終由中央說了算。

223 戰團始終堅持不懈地爲解放劉冰而奔波，主要是爲排除劉冰一切疑點而進行調查研究。我對 223 戰團的工作進展了如指掌，有一次他們在向我匯報時說，劉冰歷史上沒有任何問題，現在祇剩下一個最爲關鍵的“假黨員”問題（即清華有人指控劉冰是假黨員）。我說：“你們到河南去調查，祇要否定了‘假黨員’的問題，我們就堅決解放劉冰”。後來他們去了河南，取得了關鍵的證據。從河南回來後，他們興衝衝地告訴我，劉冰是真黨員！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在中央主樓大門口。我們立即決定，馬上起草報告，上報中央，要求盡快解放、盡快結合、盡快使用劉冰。

3 月 11 日，利用中央首長接見的機會，我親手把 414 關於解放劉冰的報告交到總理等人手裏。

1970 年 1 月，中共清華大學委員會成立，劉冰當了黨委副書記。1975 年，劉冰和黨委副書記柳一安、惠憲君、常委呂方正四人寫信給毛主席告遲群的狀，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受到了錯誤的批判。1978 年劉冰調任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1982 年調甘肅省委，曾任省委副書記、常務副書記，1986 年任甘肅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

## 批省無聯

對於我們 414 來說，1968 年的春天似乎來得特別早。

1 月份，戚本禹被隔離審查，這位和謝富治一唱一和，在清華拉一派、打一派，欲置 414 於死地的中央文革大人物從政治舞臺上徹底地消失了。414 的喜悅之情是可想而知的。我們組織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行動，矛頭指向戚本禹，當然也忘不了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攻擊團派。

1 月 24 日，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接見湖南學習班的成員，批判了“省無聯”的極“左”思潮。這又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它為我們宣傳 414 思潮，批判團派“大翻個兒”論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

“省無聯”是“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的簡稱，這是從“湘江風雷”中分出來的一個組織。“省無聯”的《綱領》、楊曦光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周國輝的講演引起了中央的重視，專門開會研究了“省無聯”的問題。會議決定請康生出面，集中批判“省無聯”的《綱領》，認為這是一個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共產黨、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綱領》。

從“省無聯”的《綱領》我們看到了兩個基本的觀點，其一，解放十八年來，中國已經形成一個“新的、腐朽的特權階層”，“幹部中的大多數是走進或走過資本主義道路的”；其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同樣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湖南要徹底革命，必須堅持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

前一個觀點是對解放後十七年的估計，後一個觀點牽涉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路線和方針。這正是清華 414 和

團派長期論戰的兩個問題。也正是在這兩個問題上，極“左”思潮的特點暴露無遺。鼓吹極“左”思潮的人，或危言聳聽，誇大敵人的力量，或無中生有，制造虛假的敵人；或斷章取義，肢解馬列主義基本原理，或生搬硬套，亂用革命導師的某些論斷，在漂亮詞藻和革命口號的掩護下，煽動青年學生的狂熱情緒，縱容青年學生胡亂衝殺，以便那些野心家們渾水摸魚、亂中奪權。

在我們看來，“省無聯”的《綱領》並沒有什麼發明創造，祇不過把蒯大富的“大翻個兒”理論從清華搬到湖南、推向全國而已。

批判“省無聯”不就是批判蒯大富嗎？414感到從未有過的痛快，甚至有些春風得意的飄飄然。在大專院校學習班，我們與團派大談聯合；可在清華園，414廣播臺的大喇叭却不停地播放總理和中央文革批判“省無聯”的講話，向團派發動了一輪又一輪的宣傳攻勢。

當然，“省無聯”受到批判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散布了極“左”思潮，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的行動。他們反對中央解決湖南問題的基本方針，反對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省無聯”認為“中央前一時期對各省、市問題的表態基調是改良主義的”，各省、市建立起來的革命委員會或革籌小組是改良主義的產物。他們宣稱“文化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省或數省取得勝利”，文化革命可能首先在湖南取得勝利。

從1967年1月上海奪權以來，籌備和建立各省的革命委員會，實現“祖國山河一片紅”一直被認為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重要標志，也是“毛主席的偉

大戰略部署”，“省無聯”挑戰這個“偉大戰略部署”，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重視。

客觀地說，文革中建立起來的革命委員會，其本身就是極“左”派占主導地位的政權。對於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來說，必須迅速將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落實到建立以造反派為主導的政權上來；對於總理來說，建立一個臨時權力機構，代替那些已經癱瘓了的政權機關，對於穩定全國局勢無疑是有益的，而軍隊和幹部代表的參加，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極“左”派的行為。在這個問題上周總理和中央文革似乎是一致的。于是，他們一起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接見各地的代表，苦口婆心地勸說兩派組織實現聯合，進而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

“省無聯”的理論和行動不僅反對了周總理，而且從根本上觸動了中央文革的利益，這就無怪乎作為極“左”思潮的祖師爺中央文革願意和周總理一起大肆鞭笞起“省無聯”來了。

但是，總理和中央文革對“省無聯”的看法還有分歧。在接見湖南學習班的成員時，總理說“省無聯”是極“左”思潮；康生打斷總理的話，說“省無聯”是極反思潮；江青又打斷康生的話，說“省無聯”是極右思潮。總理不為所動，堅持說“省無聯”是形“左”實右思潮。<sup>[46]</sup>

我們還特別注意到，康生在批評“省無聯”的《綱領》時，多次提到“省無聯”歪曲了林彪 10.24 講話和江青 11.12 講話精神，因為“省無聯”的《綱領》正是把林彪和江青的這兩次講話作為他們立論的根據的。林彪在 10.24 講話中說：湖南和長沙還沒有亂透，“三條黑線”還沒有完全暴露出來。江青在 11.12 講話中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發

展不平衡；要重新大亂，要亂敵人，樹隊伍……顯而易見“省無聯”《綱領》的理論實質上來自林彪和江青。

這與清華的情況何其相似乃爾！蒯大富們在清華大肆鼓吹的“群衆運動天然合理”、“文化革命是批幹運動”、“揪第二套班子”等等，也無一不是來自林彪和江青，當然還有陳伯達。

極“左”派們總是能從林彪、陳伯達、江青那裏找到思想武器，極“左”的根子在中央文革，在江青，在陳伯達，在林彪！不祇是 414 清楚這一點，團派也清楚這一點，祇不過大家都心照不宣而已。

### 整紅教聯

春天裏的喜訊一個接着一個。湖南“省無聯”剛剛遭到批判，清華“紅教聯”的厄運也隨之而至。

二月二十一日，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在天津接見天津市革命委員會成員和群衆代表時，提出了“一個黑會”和“一個黑戲”的問題。

所謂“一個黑會”，是指 67 年在天津召開的“全國工農兵文藝戰士座談會”，“一個黑戲”是指“新時代的狂人”。與這兩件事有關聯的方紀、孫振等人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說他們是周揚的死黨，是文藝黑線上的人。

方紀參加導演的“新時代的狂人”取材于《狂人日記》。而這個《狂人日記》是清華“紅教聯”的頭頭陶德堅、朱起鳴根據陳裏寧的真人真事組織編寫、由清華《井岡山》出版發行的。朱起鳴參加了“新時代的狂人”的編排、導

演，并親自登臺演出。

陳裏寧應該是文革中家喻戶曉的人物，他的《狂人日記》也曾風行全國。怎麼會和清華紅教聯的頭頭挂上鉤的呢？

原來，當時的紅衛醫院住着一個病人，他是清華外語教研組的方天心。因為他有一系列攻擊毛主席的言論，被診斷為精神病。1966年年底，陶德堅等人到醫院看望方天心時，一位大夫告訴陶德堅：醫院裏還有一位叫陳裏寧的病人，過去一直反劉少奇，受到迫害，說他是瘋子，這位大夫要求清華幫助造反。清華紅教聯一貫主張“現在的好人要從過去的壞人裏找”，陳裏寧正是他們要找的人，清華紅教聯從此開始了一系列為陳裏寧翻案的活動。

因為陳裏寧既批判劉少奇，又塗改毛主席著作，公安部對他進行過四十次審訊，認定他是反革命，所有檔案都保存在公安部十三局。為此，陶德堅組織紅教聯骨幹分子衝擊了公安部十三局，企圖搶走陳裏寧的檔案，被解放軍及時制止。

關鍵時刻，王力、戚本禹突然來到紅衛醫院，為陳裏寧平反，說陳裏寧是“新時代的狂人”，“馬列主義水平很高”，當場宣布釋放陳裏寧。晚上，“紅教聯”的頭頭朱起鳴組織人員去公安部十三局將陳裏寧的檔案全部運回了清華。隨後“紅教聯”就編寫了《狂人日記》。

陳裏寧釋放後，被戚本禹安排到歷史所工作，他不甘寂寞，以反劉少奇的英雄自居，頻頻露面，到處演講。《狂人日記》一版再版，大量翻印，廣為流傳。“新時代的狂人”從天津演到北京，又從北京演到全國。神州大地刮起了一陣“陳裏寧旋風”。清華“紅教聯”是“陳裏寧旋風”的頭號功臣，這可是一筆不小的政治資本。陶德堅得意忘形地

說：“顛倒的歷史終於顛倒過來了！”

然而，現在中央明確宣布：陳裏寧不是英雄，是反革命。“新時代的狂人”是黑戲，是毒草。

一切又都變了。顛倒的歷史又顛倒過去了。

康生講：“這個戲很明顯，把反革命打扮成英雄。不僅在天津，而且和北京某些學校也有聯系，希望同志們注意。”這裏的“北京某些學校”指的就是清華大學。<sup>[47]</sup>

方紀、孫振以及陳裏寧的命運和結局我們一無所知。當時我們真正關心的是一條線，這條線把清華的“紅教聯”、團派和反革命分子陳裏寧以及王、關、戚反黨集團聯在一起。蒯大富不是天天說414裏有反革命，414是王、關、戚的小爬蟲嗎？瞧！反革命就在你們團派！真正與王、關、戚有聯系的還是你們團派！我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打擊“紅教聯”，攻擊團派的大好機會。

3月8日，414突然發動了一場圍剿“紅教聯”的攻勢，宣布：“‘紅教聯’是一個有綱領、有理論、有活動、有黑手操縱、有壞人支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毛主席、否定十七年、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推行反革命的大翻個、重新培植資產階級代理人、從事資本主義復辟活動的地地道的反動組織。”在“反動組織”前面一下子加了十二個限定詞，扣了十二頂大帽子。

團派沉默了幾天後，也不得不忍痛割愛，將“紅教聯”定性為“反革命大雜燴”，宣布將陶德堅、朱起鳴等人開除出井岡山，并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搞掉“紅教聯”，414士氣大振。一年多來，我們和團派在“紅教聯”的問題上所展開的鬥爭總算以我們的徹底勝利而告終。

但我們並不滿足于此。我們打擊“紅教聯”，重點放在他們所代表的極“左”思潮，我們說“紅教聯”是清華園的“省無聯”，是清華園極“左”思潮的根源，蒯大富的“大翻個兒論”源于“紅教聯”。我們的目的是要做到：打在“紅教聯”身上，疼在蒯大富心上。

據組織這次圍剿“紅教聯”攻勢的負責人蔣南峰說，其實，414 抓住“紅教聯”大做文章，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反謝富治。當時 414 認為，謝富治是公安部部長，釋放陳裏寧、為其平反，把部管檔案交給清華“紅教聯”，他負有不可推卸責任，他就是陳裏寧事件的黑後臺；他和王力、戚本禹互相吹捧、互相勾結、狼狽為奸，理應和王、關、戚一起倒臺。

### 也不高明

春天也不盡是鮮花。

2月15日，周總理接見浙江省軍管會、省聯總、紅暴派代表時說過這樣的話：

工人階級自己起來，現在紅衛兵就需要與工農相結合，向工農學習。北京五大領袖都到學習班去了，北京都是他們亂鬧出來的。蒯大富開始是受到劉鄧路線的壓制。我也親自去過，好，後來什麼都不聽！當然，我們要幫助他，教育他。外地都說要見蒯司令，他出了不少壞主意。當然對方四一四也不見得高明。所以對立情緒很厲害。[48]

這是總理第一次談到 414，消息傳到清華，在 414 當中

產生了很大震動。大家都在琢磨“四一四也不見得高明”的含意。有的說，總理否定 414，因為他把 414 與蒯大富相提並論，彼此彼此，都不怎麼樣。有的說，總理關心 414，因為“高明”這詞兒一般是方式、方法或策略的限定詞，總理對四一四愛護有加，提醒 414 注意鬥爭策略呢。有的說，周總理根本不把 414 當作一回事，因為他譏諷 414 自以為高明，其實不見得高明呢。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414 的群衆都把周總理看成是自己思想上的後臺，414 的群衆也都以為周總理是支持 414 的。這一點已經成為 414 強大的精神支柱，有時候似乎成為一種“精神鴉片”，甚至使大多數 414 的群衆產生了某種幻覺。比如 67 年 6 月 21 日，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訪華，按照北京市的要求，清華兩派都組織了大批人員到木樨地夾道歡迎，每一派都打着本派的大旗。那天我沒有去參加歡迎活動。歡迎隊伍回到清華後，414 的戰士異口同聲地告訴我，迎賓車隊從 414 歡迎隊伍前緩緩駛過時，總理看到了 414 的大旗，并報之以微微一笑。414 戰士津津樂道，喜形于色。他們說，總理的微笑中透着希望，總理寄希望于 414。

現在，總理的批評把我們從一廂情願的幻覺中拉回到冷酷的現實。

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414 的結局將會如何？歷史將如何評價我們？

我們反對極“左”，但是，我們自己也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圍困中南海”，“揪軍內一小撮”，“火燒英國代辦處”，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批鬥那個。我們與蒯大富勢不兩立，但是，我們也犯了不少與他一樣的錯誤。我們與中央文革離心離德，但是，祇要中央文革呼風喚雨，

414 無一不爭先恐後，奮勇向前。

我清楚地意識到，一個可怕的前景擺在我們面前：

極“左”派上臺，414 就是右派。中央文革和蒯大富會把老幹部和 414 一起整死。

老幹部上臺，414 就是極“左”派。老幹部也絕不會給 414 什麼好果子吃。老幹部會把蒯大富和 414 一起整死。

414 注定是“老鼠夾在風箱裏——兩頭受氣”。414 注定要扮演一個悲劇性角色。414 注定是歷史的犧牲品。414 永遠沒有前途！

可我轉念一想：414 的前途？414 究竟要什麼樣的前途？當我們揭竿而起的時候，我們考慮的是清華的前途，祖國的前途，文化大革命的前途，何曾考慮過 414 的前途？今天我們又何必為小團體的“前途”二字所困擾？當我們結成死黨拼死抗爭的時候，我們不是說過“要敢于犧牲”嗎？我們連死都不怕，又何必顧及身後的虛名？

為了我們心中的理想，為了真理和正義，哪怕僅僅為了道德和良知，我們都應該繼續鬥爭下去。我們不願做逍遙派，我們甘願做歷史的犧牲品！

我們現在所進行的鬥爭，不求有功于國，但求無愧于心。我們曾經奮鬥過，我們將無愧于祖國，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歷史。

想到這裏，我心裏輕鬆了許多。

### 倒謝運動

我們 414 頭頭們經常議論謝富治。我們議論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謝富治究竟是忠臣，還是奸臣？我們說過，

如果他是奸臣的話，那他就是中國最大的兩面派。因為他表現出一副老實、厚道、不善辭令的形象，真有點兒大智若愚的味道。我們常常問道：為什麼他與王關戚打得火熱，而與總理若即若離？為什麼他對中央文革，唯命是從，亦步亦趨；而對總理指示，却陽奉陰違，軟磨硬抗？為什麼他對老幹部、對 414 是那樣咬牙切齒、必欲除之而後快；而對蒯大富之類的造反派却是那麼和藹可親、呵護有加？

我們的結論很明確：謝富治絕不是什麼忠臣，而是奸臣，他不是大智若愚，而是大奸似忠，是偽裝得極好的兩面派！

文化革命以來，北京市反對謝富治的可以說大有人在。1968 年的 3 月份終於形成了一股“倒謝”洪流。北京各個學校派人到我們的大專院校學習班貼了許多大字報，歷數謝富治文化革命以來的“罪行”，稱他為變色龍，即兩面派。據說蒯大富也錯誤判斷了形勢，貼出了《重炮猛轟謝富治》的大字報。

在清華，414 炮打謝富治的行動也相當活躍，并在 3 月 18 日達到了高潮。那天，414 的《八一軍團》發表了《給謝富治的公開信》。現在我已找不到《公開信》的原稿，團派的《井岡山》報 1968 年 3 月 27 日批判《給謝富治的公開信》，稱之為“右傾、復辟、翻案、分裂的代表作”。那裏引用了公開信中的幾段話，從中可以看出 414 當時“倒謝”的情緒是多麼強烈，決心是多麼巨大，信心是多麼充足。現摘錄如下：

從天津到上海，從清華到北大，在北京、在全國一個上揪變色龍、下掃小爬蟲，徹底埋葬極“左”極反思潮的文化大革命新高潮即將來臨了。革命群衆無不精神振奮、意

氣風發、鬥志昂揚、拍手稱快。不知此時此地謝副總理你的心情又如何呢？……

為什麼一個小小的陶德堅、紅教聯竟然如此猖狂，肆無忌憚地在北京、在清華向無產階級進攻了一年之久？為什麼王關戚垮臺之後，極“左”極反思潮的批判在北京仍然發動不起來？紅教聯的後臺究竟還有誰？謝副總理你敢回答嗎？……

鐵的事實充分證明了：在陳裏寧反革命案件上，從開始到平反，從暴露到退却，你謝富治是一個主要策劃者。你就是反動組織紅教聯的一個黑後臺！你必須就陳裏寧案件和紅教聯問題向毛主席、向革命群衆低頭認罪、公開檢討。……

你和戚本禹到底是什麼關係？我們還不甚清楚。但稍有政治敏感的人都能看出來，你和他是親密的，不是一般關係。

看得出來，你與戚本禹是同病相憐，你的心中是有鬼的。……

在對待清華兩大派問題上，你同樣負有不可逃脫的罪責。

67年4月，為了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徹底批判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華園裏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聚集在一起，井岡山414串聯會誕生了。一年來的實踐充分證明，414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可是你，第一次來到清華園就擺出一個教師爺的架勢，對我革命的414大方向橫加指責，是你對414施加了更大的壓力，加劇了兩大派的分裂。我們的希望破滅了。但是出于我們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信任，還以為這是你調查不周、偏聽偏信之

所致。可是，無情的事實告訴我們：這種想法不符合事實。……

你第二次對清華問題的處理就更不象話了。你沒有從上次的失敗中吸取教訓，對我英勇的 414 施加了更加巨大的壓力。你強逼着成立什麼“革籌小組”，兩派人數之懸殊是不可思議的。現在，我們有理由懷疑這一點你是和某些人預謀好的。……

正是在這以後，某些人妄想一舉摧毀革命的 414，違背了廣大革命師生員工的意志，要在 5 月 30 日强行成立革委會。有你這個大人物作後臺，他們有恃無恐、肆無忌憚。革命的 414 走投無路。前不通，後不通，窮人四處無路走，一心去找毛澤東。為了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 414 總部在階級鬥爭的急風暴雨中誕生了。從此清華無產階級革命派隊伍發生了公開的組織上的分裂。謝副總理，清華的分裂這不是你的罪過嗎？你能推卸得了嗎？……

就是你和戚本禹的兩次講話，造成我校兩派更加嚴重的對立。武鬥盛行，革命小將被打成反革命、被綁架，革命幹部被抄家、被鬥爭，人心惶惶，復課鬧革命停止了，工廠裏生產中斷了，大批革命師生不得不離開學校，校園裏冷冷清清、淒淒慘慘。謝副總理！你挑動內戰，破壞我校大聯合的罪責能推卸得了嗎？……

你必須就破壞我校大聯合向全體革命師生員工作公開的觸及靈魂的檢討。你必須就勾結陶德堅操縱反動組織紅教聯，圖謀進行資本主義復辟一事作公開的檢討。

你必須就你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所幹的一切罪過作徹底的交代，作觸及靈魂的深刻的檢討。要麼你

向毛主席低頭認罪，向革命群衆作公開的觸及靈魂的檢討，以取得革命群衆的諒解，迷途知返，為時未晚；要麼你自己栓在王關戚反黨集團的破車上，一頭栽到歷史的垃圾堆裏去。明白告訴你：在你面前的道路，祇此二條，別的道路是沒有的。何去何從，由你自選。

我們認為謝富治必倒無疑，然而，謝富治沒有倒，倒了的却是楊餘傅。

### 形勢逆轉

68年的春天似乎特別短暫。

3月24日，平地一聲驚雷，突然冒出一個“楊餘傅反黨集團”。楊餘傅是指：楊成武，時任代總參謀長；餘立金，空軍政委；傅崇碧，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事後從小報上刊登的“首長講話”中我們了解到，“楊餘傅反黨集團”的罪名是：楊成武勾結餘立金，打倒吳法憲，篡奪空軍領導權；勾結傅崇碧，打倒謝富治，顛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為“二月逆流”翻案。楊成武的主要錯誤是山頭主義、兩面派和曲解馬列主義。

我們雖然也跟在後面高喊“打倒楊餘傅”，但卻是一頭霧水：文革以來一直守護、跟隨毛主席的楊成武怎麼會組織反黨集團？中國怎麼沒完沒了的反黨集團？我們再一次慨嘆：政治鬥爭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

緊接着，中央文革在首都體育館召開“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全面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誓師大會”。會上陳伯達提出了“五大回合”論。他把楊餘傅事

件說成是文化革命以來繼打倒彭、羅、陸、楊，打倒劉、鄧、陶，反擊“二月逆流”，打倒王、關、戚之後階級鬥爭的第五個回合。

我們還記得，所謂“二月逆流”新反撲的典型事例出自外交部。2月13日外交部91名司長、大使聯名寫了一份題為《揭露敵人，戰而勝之，徹底批判“打倒陳毅”的反動口號》的大字報。與此同時，外交部大院還出現了“歡迎陳毅回外交部主持工作”的大標語。這些行動給中央文革抓到了口實，却給總理幫了倒忙，使總理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總理不得不表態說，“91人大字報，為二月逆流翻案，要恢復舊秩序”。

當時，我們根本不可能想到林彪和江青相互勾結，利用楊餘傅事件篡黨奪權。但是有一點我們却能看得很清楚，中央文革利用這次事件向總理發動了反攻倒算。從67年9月份開始，搞掉王關戚，批判極“左”思潮，中央文革處處被動；“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帥”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和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在總理的安排下重新主持工作，頻頻露面。“新文革”在和“舊政府”的較量中明顯處于不利。中央文革受壓的時間太長了。

“楊餘傅事件”的出現使整個形勢來個大逆轉。反對極“左”思潮的鬥爭戛然而止，反對右傾保守主義、反對右傾分裂主義、反對右傾投降主義又成了當前文革的主要任務。

清華園的形勢也來了個大逆轉，414陷入沉默，團派轉守為攻。在長達半年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運動中，團派是衆矢之的，一直受壓，真可謂與中央文革共命運。現在揚眉吐氣的日子到了，該輪到他們進攻了。反右傾、反復

辟、反翻案、反分裂的口號叫得比誰都起勁，這是發自他們內心的吶喊。

414 再一次處于被動地位。

餘立金的女兒在清華參加了 414，還是 414 文藝宣傳隊的積極分子。團派說，餘立金的女兒串通清華的高幹子弟，合力營救了陳楚三，從此 414 投靠了楊餘傅。

“革命到底”學習班長期占領市公安局的辦公室，得到了衛戍區軍代表的寬容和善待。團派說，傅崇碧單獨接見了我。還說，春節期間，傅崇碧招待張雪梅到家裏吃餃子，414 在傅崇碧的授意下炮打謝富治。

我對吳法憲輕易否認林彪語錄的做法很不滿意，認為他不學無術，曾經傳過“吳法憲有問題，要批判”的小道消息。團派說，414 配合楊餘傅奪空軍的權。

于是乎，“414 是楊餘傅的小爬蟲”似乎有根有據，而且活龍活現了。

無中生有、捕風捉影，把被打倒了的人說成是對方的黑後臺，這是清華兩派慣用的手法，我們也是用這樣的手法攻擊團派的，這次也不例外。

實事求是地說 414 與楊餘傅沒有任何關係，就是我們 414 想攀恐怕也攀不上什麼關係。團派說我們是楊餘傅的小爬蟲，我們倒不怎麼在意。讓我們心頭沉重的是：周總理反對極“左”、穩定局勢的努力再次受挫，前功盡棄，連總理本人也自身難保。團派極端分子又掀起了一股反周總理的惡浪。團派揚言“把 414 的黑後臺統統揪出來！”他們這樣說：“在揪出楊餘傅後，解開了我校運動中的許多‘謎’，但至今還有許多‘謎’沒有解開，其原因就在于 414 最大的黑後臺、即楊餘傅的黑後臺、二月逆流的黑主帥尚未揪

出來。”“二月逆流的黑主帥”這是蒯大富創造的新提法，其矛頭所向，不言自明。我們真為總理擔憂。

更加讓人擔憂的是毛主席又發表了他的最新指示。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衆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

我們努力學習、仔細琢磨這段話，却是莫名其妙，不得要領。文化革命所打倒的大批幹部都曾經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過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都是出生入死、功勳卓著的英雄，現在居然將他們與國民黨反動派相提並論，實在讓人難以理解。據說在“二月逆流”中譚震林說過這樣的話：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早知如此，就不該活六十四歲，就不該跟毛主席幹四十年革命。現在跟不上了，不跟了。此時此刻，我們才深深地體會到譚震林一年之前發自內心的冤屈與憤懣。

看來毛主席不想結束文化革命了，文化革命想收也收不住了。我們憂心忡忡：不知道前面的路上還有多少血雨腥風，還有多少煉獄和磨難，在等待着我們，等待着中國的老百姓。

## 冤假錯案

在清華園，最先遭到磨難的是廣大幹部，而首當其衝的則是所謂的“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的成員。

蒯大富製造“第二套班子”操縱414的神話，連團派的廣大群衆都將信將疑，更不用說414群衆了。蒯大富知道

從 414 中揪出一、兩個走資派或反革命，對 414 不能構成多大威脅，但如果從 414 中揪出一個反革命集團，而這個集團又是 414 死保和重用的幹部的話，則足以給 414 致命的打擊。為了迫害清華的幹部，為了搞垮 414，蒯大富又製造了一個駭人聽聞的冤假錯案——“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他們捏造的所謂“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包括六名幹部。這六名幹部是：

羅徵啓，清華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68 年 1 月 30 日被團派抓走。

文學宓，清華大學黨委統戰部副部長。

李 康，清華大學教務處副處長。67 年 12 月底被團派抓走。

饒慰慈，清華大學黨委辦公室副主任。

徐一新，清華大學科學生產處副處長。

劉承嫻，一般幹部。68 年 4 月 14 日被團派抓走。

這些幹部都是清華的中層幹部，實在算不上什麼走資派。他們不願呆在家裏“閉門思過”，而是聽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話，到文化革命的大風大浪中鍛煉自己。他們的全部不幸，就是因為他們支持 414，參加 414。除了羅徵啓外，其他五名幹部就是在 414 也都不是出名的，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默默地工作，誰也沒有注意他們。

可是，蒯大富却盯上了這些無辜的幹部。

當時的輿論定式是：兩派對立的根源是壞人在背後操縱，揪出兩派後面的壞人，大聯合就實現了。團派老早就造出輿論，說 414 的幹部裏有一個反革命集團。他們不停地對支持 414 的幹部進行抄家、抓捕，企圖從這些幹部身上打開缺口，搞得清華一些幹部東躲西藏，惶惶不可終日。

爲此，我們採取了種種措施，重點保護一些幹部。爲防止他們被團派抓走，我們讓其中一些幹部住在科學館。因爲科學館是 414 廣播臺所在地，陳楚三被抓後，我們封閉了科學館，加強了保衛，無關人員一律不能進入，所以住在那裏比較安全。一度時間，科學館裏幹部成堆，有幾位橋牌高手還經常比試比試。

春節前夕，有些幹部提出要回家過年。我把這些幹部召集起來，明確對他們說，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是保你們的，絕對不會不管你們，你們不要害怕。團派一定要打擊、迫害你們，你們要保護好你們自己，最好經常變換住的地方，千萬不要落到團派保衛組手裏。萬一被團派保衛組抓走了，也要實事求是，不要亂說。後來，我的這些話被團派說成是與“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訂立“攻守同盟”。

不幸的是，這些幹部離開科學館後，文學宓、饒慰慈、劉承嫻等人陸續被團派抓走。

開始的時候，團派還祇是說羅徵啓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地下復仇軍的黑幹將”，後來就上綱爲“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了。

4月 18 日，團派正式批鬥“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他們給這個集團羅列的主要罪狀是三條，一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污蔑林彪、江青；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爲走資派劉冰、呂應中翻案；三是攻擊造反派，分裂井岡山，控制 414。

蒯大富在打擊所謂“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的同時，又大造輿論說：這個集團是 414 的黑參謀部，414 政治方向的重大決策，都是由這個反革命集團根據其黑主子的旨意制定的，沈如槐和 414 所幹的每一件事都離不開“羅文李饒

反革命集團”。

這還嫌不够，蒯大富幹脆又把我加到這個所謂反革命集團裏面去，稱為“沈如槐—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5月26日，團派居然還在天安門廣場召開“徹底粉碎沈如槐—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大會”。

毫無疑問，大批幹部參加414，成為414中一支強大的生力軍，在清華的文化大革命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特別是譚浩強、龍連坤、胡大忻等一些參加414總部及所屬各個機構工作的幹部，敢作敢為，獻計獻策，對於414如何把握鬥爭方向、注意鬥爭策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是我們並沒有一個什麼幹部參謀部。因為在414，幹部和學生已經融為一體了，不需要一個什麼幹部參謀部。如果我們真正有一個幹部參謀部並認真采納他們的意見的話，那麼，我們也許不會犯“火燒英國代辦處”、“揪軍內一小撮”之類的極“左”錯誤了。

414政治方向的重大決策，基本上是這樣一個過程：首先，東方紅戰團、三七戰團分別召開秘密會議，討論形勢，提出建議；隨後，核心組開會將兩個戰團的建議加以綜合，拿出一個初步方案；在廣泛徵求群衆意見的基礎上，核心組再次開會討論做出決定。東方紅戰團、三七戰團才是414真正的參謀部。前面我也已經介紹過，我們東方紅戰團都是由那些沒有任何政治把柄的學生組成的，是所謂的“死黨”，幹部一般是不能參加我們的會議的。不是我們不信任他們，而是我們不願連累他們。這樣一個決策過程，羅文李饒哪能左右得了？至于我個人，倒是有幾位可以稱得上是“參謀”的青年幹部和教師，他們經常給我出謀劃策，偶爾也給我起草發言稿。

我們的態度很堅決，這是假案，這是政治陷害！我們發表聲明，鄭重宣告：羅文李饒等同志是革命幹部而絕不是反革命，絕不承認所謂的“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堅決抗議蒯大富迫害革命幹部的惡劣行徑，指出這是蒯大富搞垮 414 的新陰謀。我們 414 的領導集體清楚地意識到這是蒯大富手法的變化，他們不想再與 414 進行正常的辯論，而要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對付 414，我們必須準備為捍衛真理付出鮮血和生命。

蒯大富很信奉“謠言重複千遍就成了真理”的信條，井岡山廣播臺一天到晚連篇累牘地播送“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的所謂材料，包括羅文李饒的口供和錄音。團派強大的宣傳攻勢在 414 戰士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陰影。我們不得不召開 414 戰鬥組組長會議專門討論羅文李饒問題。414 群衆發問：羅文李饒都是 414 死保和重用的幹部，團派說他們是反革命集團，說他們控制和操縱了 414，你們頭頭有何解釋？你們還保不保他們？

我對 414 的戰鬥組長們說：根據我們掌握的材料，根據我們對羅文李饒的了解，羅文李饒絕不是反革命，更談不上集團！保護幹部是 414 的一貫方針，是 414 思潮的基石之一，在這個問題上決不能有所動搖。是相信 414 的核心組，還是相信蒯大富的專案組？大家很容易做出選擇。我還進一步對大家說，羅文李饒問題的出現說明，團派在與 414 的鬥爭中手段和策略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希望大家做好流血犧牲的思想準備。

我們的堅決態度雖然穩定了 414 骨幹的情緒，但是並沒有完全消除他們心中的疑慮。許多 414 戰士在私下悄悄地問我：莫非羅文李饒真的有問題？團派說鐵證如山，羅文

李饒自己也供認不諱，你能不能拿得準？你憑什麼爲他們打保票？就連 414 核心組的個別同志也有所動搖。有人甚至建議，414 不再對羅文李饒問題表態，祇保持沉默，以避免政治上的被動。對此，我堅決反對。我說：解放幹部是 414 的政治旗幟，放棄這個旗幟，不如解散 414。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艱難的時刻，因爲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然而，孤獨確實是一種難得的人生經歷，孤獨可以磨練人的毅力，孤獨可以激發人的鬥志。驀然間，一股氣——說不清是怨氣、怒氣還是豪氣——從我胸中升起：哪怕祇剩下一個人，我也要戰鬥下去。

蒯大富在公開鬥爭所謂“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的時候，有一個小小的“缺憾”，那就是這個集團的“主犯”羅徵啓不在他們手裏。

羅徵啓是 1 月 30 日被團派抓走的，一直被囚禁在清華大學教工療養院——三堡。3 月 27 日，羅徵啓利用專案組的疏忽從三堡“越獄”逃跑，在一些好心人的幫助下逃到北京。他想，此時此刻，團派一定在北京布下了天羅地網，到處搜捕他。他躲在一個郵局，打電話到科學館，希望 414 能夠幫助他，他確信 414 一定會幫助他。接聽電話的正好是尹尊聲，尹尊聲放下電話後，立即向我匯報。我們決定馬上採取營救行動，與團派爭時間，搶速度，一定不能讓羅徵啓再落虎口。我們深知，偌大的北京並無羅徵啓的藏身之地，唯有科學館裏最安全。我們決定派車把羅徵啓接到科學館保護起來。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是尹尊聲親自帶隊執行任務。開車的司機是動農系張師傅，他是一位鐵杆的 414 戰士，開車技術頂呱呱。尹尊聲他們如何在城裏兜圈子以避開團派的

耳目、如何甩掉團派可能的跟蹤等等，自不必說。我所關心的是他們回到清華後的這段路上會不會出問題。我們擬訂的路線是：汽車從東校門進校，一路往西，在二校門轉彎往北，直奔科學館。這條路線，路面寬闊，筆直平坦，過了東校門，祇需五分鐘的時間，汽車就可開到科學館。我們分析，最危險的地段是東校門，如果門崗要求停車檢查，就會發現車裏的羅徵啓。如果這個門崗是團派的人，他就會打電話報告團派總部。為防止意外，我們派尹尊聲同班同學張文法守在東校門，暗中接應。一旦執行任務的吉普車通過東校門時被團派發現了，張文法就設法控制門房的電話，必要時幹脆扯斷電話線，不讓門崗向團派及時通風報信，確保汽車有足夠時間安全到達科學館。

尹尊聲順利地將羅徵啓接到科學館後，安排他住在三樓朝南的一個房間。我立即與羅徵啓見面。我最關心的問題是他向團派專案組交代了什麼，什麼把柄落到了團派專案組手裏，致使團派專案組弄出這麼大的一個假案來。羅徵啓告訴我，團派專案組對他施以酷刑，無所不用其極，在嚴刑逼供下，他所交代了不少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是：他與別的幹部說過“林彪是全國極‘左’思潮的總根子”，“中央文革執行了一條過左的路線”之類的話。但他和文學宓、李康、饒慰慈等人在一起也僅僅是議論議論而已，沒有什麼特別之處，至于所謂反革命集團純屬子虛烏有。

羅徵啓的話，證實了我的判斷，我心中更加有底。文革當中，議論中央領導，司空見慣。在 414，對中央文革的某些大人物早已嗤之以鼻，議論林彪、江青也不是什麼秘密。我認為，羅徵啓他們議論的那些言論算不上反革命，更談不上集團。

羅徵啓住在科學館的消息一直保密得很好，不光整個團派蒙在鼓裏，就是在 414，也祇有包括核心組在內的極少數人了解情況。我祇允許 223 戰團的幾個同志負責和他聯絡並給他送飯送水。

羅徵啓在科學館住了一個月左右。百日武鬥開始前夕，在徵得我的同意後，羅徵啓的好朋友陪同他悄悄離開北京，躲到了這位同學的家鄉廣東汕頭。

羅徵啓獲救了，但他的弟弟羅徵敷却丢了性命。4 月 4 日，團派保衛組從羅徵啓的家中抓走他的弟弟羅徵敷，一頓毒打之後，用棉紗堵住他的嘴，并將其五花大綁，塞進汽車後車廂，強行綁架到清華，折磨致死。

劉承嫻也不堪忍受團派專案組的酷刑逼供跳樓身亡。

### 荒誕故事

捏造了一個“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還嫌不够，蒯大富接着又捏造了一個“十二人反黨集團”。蒯大富心裏很明白，雖然把沈如槐和羅文李饒挂上了鉤，但羅文李饒畢竟是些幹部，既不是 414 的領導核心，又不是沈如槐的身邊的人，平時與沈如槐接觸不多，對沈如槐的政治觀點和決策行為影響力不大。就是在團派專案組的“逼供信”下，他們也沒有找到羅文李饒控制、操縱沈如槐的任何有說服力的證據。要搞垮 414，必先搞垮沈如槐。從沈如槐身邊的人下手，從沈如槐所信任的人中揪出一個反革命集團來，才能使人相信沈如槐是受反革命集團控制和操縱的。這就是蒯大富捏造“十二人反黨集團”的根本原因。

事也湊巧。67 年 8 月份，我去武漢調查研究時曾帶了

幾位同志隨行，在武漢又遇到幾位同志。這些同志大多數是東方紅戰團的，有幾位就是我們《千鈞棒》戰鬥組的成員。他們平時與我過從甚密，這次又聚在一起。我們縱論天下大事，從“揪軍內一小撮”到“第三次大串聯”，從“上柴聯司”到“百萬雄師”，從“1、3、5與2、4、6之爭”到“新文革與舊政府之爭”，從極“左”，到“文攻武衛”，幾乎無所不及。

我祇身從武漢返回北京後不久，張雪梅帶着一支隊伍，浩浩蕩蕩沿江而下，直奔上海，進行下一步的調查研究。當時我們有這樣一種認識，那就是全國很多地方極“左”泛濫，形勢動盪不定，唯獨上海比較穩健，我們應該實地考察考察，看一看能不能總結出一點什麼規律來。一路上，他們旁若無人，繼續高談闊論。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隔牆有耳，其實是隔“座”有耳，坐在他們的邊上的團派同學，把他們的人名和他們議論的話一一記在心中。回北京以後，此人向團派總部匯報，說414裏有人反江青。

蒯大富真是如獲至寶，團派專案組立即採取搜捕行動。第一個抓的就是陳楚三的同班同學，在嚴刑拷打之下，這位同學編造了一個“十二人反黨集團”的荒謬故事。

根據這位同學的招供，團派專案組又突擊行動，連續抓了一位團委幹部和四位女同學。其中有三位女同學是一起被抓的。她們三人住在荷花池，那天，她們還在床上睡覺。團派保衛組破門而入，連衣服都沒讓她們穿，連人帶被子就把她們抱走了。也許團派專案組認為女同學容易招供，所以他們專對女同學下手。

在團派專案組確定的“十二人反黨集團”中與我過從甚密的有八人，而其他四人却是我不認識的。

團派專案組在搞“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和“十二人反黨集團”時，採用了駭人聽聞的“逼、供、信”手段。工宣隊進校後，遲群在一個講話中對團派專案組的“逼、供、信”做了這樣的描述，他說：

過去有一派組織，爲了把對方搞垮，從對方抓來人以後，搞了一套惡毒的東西，叫他去念，給他錄上音。實際這是一種犯罪行爲，不講，不念就打。把木頭棒子上釘上釘子打。現在我們要回來一個人，祇有半個屁股，那半個屁股被打沒了。再一個是罰站，罰站 5 天 5 夜，把大腿站的上下一般粗。有的用拔牙齒的刑罰，不講就拔牙齒，拔掉。有的把人給打死，這是犯罪。用這種辦法搞的一些人，工宣隊進校後，沒有一個不翻案的。有的人痛哭流涕說，我當時屈服了，按照他們的要求辦了。如果在敵人的法庭上我有辦法，頂得住，但是在學生面前我屈服了。[49]

可惡的是，蒯大富在制造“反革命集團”和“反黨集團”打擊 414 的時候，還把專案組捏造的所謂“材料”寄到參加 414 的學生家長那裏，并給家長們寫了一封公開信，恐嚇說他們的子女參加了反動組織，要求家長動員子女退出 414。許多參加 414 的學生家長爲此擔驚受怕，有些家長還真的找到學校來了。

蒯大富還把當初工作組搞他自己的一套做法檢起來，派人到我的老家去“挖祖墳”，企圖挖出點什麼“材料”來，好拿到學校做文章。但是，這些人在我的家鄉碰了一鼻子灰。我的父母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父親做過幾年農業合作社的會計，實在沒有什麼“材料”好挖。我自己呢，十

來歲就在村子裏小有名氣了。從小學四年級開始，我就一邊上學，一邊兼做生產隊的會計，一直做到小學六年級。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後，我還作為正式代表參加了公社的三級幹部大會。當年參加三級幹部大會的代表中年齡最長的70歲，最小的是我，13歲。我們一老一小都受到了公社的表彰，成為三級幹部大會上的趣談。鄉親們對我這個多做工作、少拿工分、既不多吃多占、又不貪污腐化的小會計十分喜愛。如果不是離開家鄉去遠處的鎮裏中學讀書，我這個兼職小會計沒準兒會變成專職小會計。我和鄉親們早就打成一片了。因此，當蒯大富派人到我的家鄉說三道四時，鄉親們對他說：“你們講沈如槐是反革命，我們貧下中農一百個不相信！”

## 第六章 百 日 武 鬥

### 特種部隊

北京大專院校學習班 68 年 4 月 19 日宣布結束，四天之後，蒯大富精心策劃挑起了 4.23 大武鬥，從此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延續近百日的武鬥時期。為了全面了解清華武鬥的來龍去脉，我們還得從 1 月 4 日發生的“1.4 武鬥”前後說起。

從 414 成立到 1967 年底，清華兩派發生過許多次衝突，如 8 月 30 日在主樓、10 月 20 日在新水利館等地發生過較大規模的衝突，除了 67 年 4 月 15 日衝廣播臺是 414 主動挑起衝突外，其餘大多數衝突都是團派借機尋釁、抓捕、毆打 414 的頭頭所引起的。團派有個兵團保衛組，聚集了一幫打手。哪裏有糾紛，這幫打手就出現在哪裏，不容分說，立刻出手，武力解決問題。414 很多人都嘗過兵團保衛組的“鐵拳頭”的滋味，特別是我們幾個頭頭，每個人身上都留下了不少傷疤。我自己曾多次遭到兵團保衛組的毆打。有一次天津南開大學文藝宣傳隊來清華，在主樓廣場演出《紅燈照》。演出開始前，我與團派的頭頭在致歡迎詞的問題上發生了小小的爭執。突然，兵團保衛組的幾個人衝過來，把我強行拖到主樓大堂，拳打腳踢，還把我摔倒在地，我勉強爬起來，還沒站穩，他們伸腿掃過來，又把我摔倒，如此反復，直到他們的頭頭致詞完畢之後才揚長而去。我的塑料涼鞋被摔掉了，他們藏起來。第二天把我的鞋挂在大禮堂前大字報席棚上，還寫了一份“招領啓示”，故意羞辱我。

兵團保衛組被團派稱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而到 67 年年底時，他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這個工具來對付 414 的學生、教師和幹部。我們對兵團保衛組恨之入骨，却又無可奈何。雖然 414 也有一個保衛組，但並不能有效地保護 414 群衆。在呂應中和陳楚三先後被團派綁架以後，許多鐵杆的老四紛紛指責我們頭頭太軟弱、太窩囊，明明知道團派抓走了人，却束手無策；他們提出要“以牙還牙，以血還血”。我們頭頭們也覺得不能總是這樣被動挨打，必須採取有效措施來對抗兵團保衛組。經過反復醞釀，我們組建了一支特種部隊，爲了遮人耳目，我們把它命名爲《李文忠學習班》。

李文忠是解放軍 6011 部隊某部六連四排排長，當時被中央授予“支左愛民模範”的稱號。他有幾句名言：“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用一位解放軍英雄模範的名字來命名一個組織，尤其是一個武鬥組織，顯然是對英雄的褻瀆，但卻是文革中的一種時尚。

我們這支特種部隊實際上是一支快速反應部隊，由宿長忠直接指揮。它的任務是在發生緊急情況時能迅速出現在事發現場，并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兵團保衛組的綁架、打人等行動，保護 414 幹部和群衆的安全。

《李文忠學習班》由 30 到 40 人組成，每個人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我們挑選成員的標準主要有三條：鐵杆老四，體格強壯，“根紅苗正”。之所以要求“根紅苗正”，是考慮到萬一某個成員被團派抓獲，除了政治觀點不同外，沒有任何其他方面的把柄可被團派利用。抓住一個人的缺點，將他搞臭，并借此否定他的政治觀點，這是文化革命

中派性鬥爭的慣用手段之一。

《李文忠學習班》有一個班長，兩個副班長。他們的辦公室設在中央主樓 414 室、415 室兩個房間，每天 24 小時都有人值班。平時，《李文忠學習班》的成員並不集結在一起，而是仍在原單位活動。祇有特殊需要時，才將他們召集起來。他們有一個聯絡暗號“陳小紅”，這是從正副班長三個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組合而成的。如遇緊急情況，414 廣播臺將廣播“陳小紅到某某處集合”，《李文忠學習班》的戰士們聽到廣播後將會以最快的速度集合起來。學習班的成員都配備了“武器”，那是清一色的鐵管。這些鐵管都是用自來水管鋸成的，其尺寸根據各人小臂長度而定，正好可以隱藏在衣袖裏而不易被人發現。

## 一四武鬥

《李文忠學習班》剛組建不久就發生了 1.4 武鬥。這場發生在 12 號樓的武鬥是蒯大富為了掩蓋他們在《四一四戰歌》問題上的失敗，轉移團派廣大群衆的注意力而蓄意挑起的。

12 號樓住的是自控系的學生，而自控系是 414 勢力最強大的系之一。414 有一個民間廣播臺叫做“紅尖兵廣播臺”，就是自控系 414 分部主辦的，它專門與團派的“前哨廣播臺”唱對臺戲。

“紅尖兵廣播臺”設在 12 號樓二樓的最西頭 227 室、229 室兩個房間。這兩個房間裏面是連通的，是個套間。廣播線路沿着 327、329，427、429，527、529 套間的牆壁往上，直到樓頂。大喇叭就樹在樓頂。從一樓到四樓的套間

都住的是老四。五樓原來住的是“6字班”的人，有團派也有414派。當時這些人已經畢業分配離開學校，自控系414分部為了保證廣播線路的安全，派人住進了527、529套間。

元旦期間，414群衆發現有陌生人在527、529套間門口來回轉悠，似乎在進行偵察。這個情況引起了自控系414分部的警惕。分部負責人判斷團派可能會對“紅尖兵廣播臺”下手，於是立刻向總部匯報情況，希望總部高度重視，同時他們採取了預防措施，派各年級414戰士輪流在五樓套間值班，并制定了應急方案。

1月3日深夜、1月4日凌晨時分，兵團保衛組、《捉鬼隊》等一大批手持鐵棍、頭戴面罩（清華運動隊訓練用的面罩）的武鬥人員悄悄地摸上了12號樓的五樓，突然向527、529房間發動了進攻。在房間裏值班的6名老四發現團派來犯，一邊用床架頂住房門，一邊按預先約定，猛烈敲擊暖氣管，通知樓下各層414的人。樓下老四聞訊後馬上向414分部和總部報告情況。自控系414分部負責人立即召集人馬按照應急方案迅速採取行動。他們首先用桌椅和床堵住西頭一、二層樓梯，切斷團派的後援部隊，接着就組織隊伍衝向五樓，增援527、529房間的戰友。

這時候，五樓的團派也已經用桌椅和床堵住了四樓通往五樓的樓梯，并有相當的人員守衛在上面，414的人根本衝不上去。

守衛房間的幾個414戰士都是“0字班”的同學，他們早有準備，頑強抵抗，所以團派攻打527、529套間的行動也不順利。團派雖然把房門砸了個大洞，并用高壓水龍頭往房間裏射水，但却進不了房間。僵持了相當一段時間後，團派一個戰士靈機一動，爬上了12號樓樓頂，在527、529

套間的房頂上砸了個大洞，並從這個大洞不停地往房間裏扔磚頭，打得 414 戰士難以招架。眼看守不住了，414 戰士就從窗口往外撤。第一個同學抓住廣播綫，沿着牆壁一點點往下墜，開始挺順利，可到達地面時還是摔傷了。第二個同學由於全身濕透，手很滑，沒有抓住廣播綫，徑直摔了下去，中間雖被樹擋了一下，却也摔成重傷。第三個同學用嘴咬住廣播綫，雙手抓住窗臺，雙腳往下試探，被四樓 414 的戰士接住，抱進了四樓。此時，團派已攻進房間，剩下三人被俘。被俘的 414 戰士遭到團派的毒打，其中一人頭被打破，流血不止。

團派雖然攻進房間，但還沒有來得及帶着俘虜撤退，就發現自己陷入 414 的包圍之中。414 總部用廣播召集起來的《李文忠學習班》已經從東面的樓梯衝上了五樓。由於樓道狹窄，兵力施展不開，雙方各守一頭，誰都不敢貿然進攻，祇能用高壓水龍頭對射。414 雖然把團派堵在樓道裏，却也不能輕易得手。在僵持一段時間之後，《李文忠學習班》一名戰士急中生智，從房間裏拖出一張雙層床，豎立起來，擋在前面，幾個人推着床，逐步前進，另外幾個人手持高壓水龍頭從兩邊往前射水。不一會就將團派戰士逼到樓道西面的死角。在一陣短暫的打鬥之後，所有團派武鬥人員全部束手就擒。414 把這些渾身濕透的團派關押在廁所裏，時值隆冬，有些人身負重傷，其慘狀可想而知。

蒯大富偷襲不成，反而損兵折將，不得不向北京衛戍區求救。上午，衛戍區李鐘奇副司令員來到清華處理武鬥事件，主持兩派談判，促使雙方簽訂了停止武鬥的五項協議，并讓 414 釋放了團派的俘虜。

這次武鬥，是清華文革以來最激烈的一次武鬥。由於有

了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特別是有了一支特種部隊，414 反敗為勝，不僅“討還”了團派的“血債”，還大大地鼓舞了 414 的士氣，打掉了對團派保衛組的恐懼心理。

這次武鬥之後，414 各級領導開始重視武鬥隊伍的建設，特別是各系分部領導，紛紛仿效總部，建立各系的特種部隊，一概以“某某學習班”命名，如“好八連學習班”等等。這些特種部隊就是百日武鬥期間 414 的骨幹力量。

### 箭在弦上

3月27日，北京大學以聶元梓為首的新北大公社挑起武鬥，打敗了北大井岡山。中央文革表態支持新北大公社，嚴厲批評北大井岡山，使得聶元梓重新確立了她在北京大學的主導地位。這一事件使蒯大富和團派中的極端分子得到啓發和鼓舞，他們決心仿效北大，主動挑起武鬥，迫使中央文革明確表態，把 414 打成反動組織，從而摧毀 414，使清華園成為蒯大富的一統天下。

上帝欲其亡，必先令其狂。蒯大富悍然挑起武鬥不過是他滅亡前的最後一次瘋狂表演而已。

雖然海軍宣傳隊還在學校，但清華的形勢迅速惡化，武鬥似已不可避免。通過 1.4 武鬥，我們看清了團派的方針已經改變，武力解決問題變成他們的主要選擇。

414 怎麼辦？414 領導集體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積極備戰，武裝自衛。

首先是思想準備。我們召開了各種會議，向 414 的各級幹部和群衆灌輸“清華武鬥不可避免、我們必須有所準備”的思想。我向 414 幹部群衆反復強調的主要觀點是：“現在

的清華不是像以前那樣靠大字報、開大會、兩派開展大辯論來搞文化大革命了。蒯大富已經失去耐心，他的方針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他們花大力氣抓‘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抓‘12人反黨集團’，其險惡用心是以此欺騙中央，逼迫中央宣布414是反動組織，從政治上徹底搞垮414。另一方面，他們早已厲兵秣馬，正在尋找機會挑起武鬥，企圖從組織上消滅414。蒯大富一心依靠武力解決清華問題，武鬥是蒯大富的必然選擇。現在大的形勢是反右，以楊餘傅事件為轉折點，周總理反對極‘左’的一系列努力付諸東流，全國的極‘左’勢力卷土重來，蒯大富也不會放過對他們有利的時機。我們將會與團派有一場決戰。414要有殘酷鬥爭、流血犧牲的思想準備。”

這場決戰是清華大學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大決戰。蒯大富的方針很明確，那就是從政治上、組織上徹底消滅414，在清華建立極“左”派的紅衛兵政權；414的方針也很明確，那就是堅決抵制蒯大富的獨裁和專政，要求中央干預，對清華實行軍管。蒯大富決不會改弦易轍；414也不會中途罷手。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也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我們相信，唯有血與火才能促使中央下決心解決清華問題。我們也確信，經過戰爭的洗禮，清華的前途一片光明。

雖然團派極端分子磨刀霍霍、咄咄逼人的氣勢使得414大多數人清楚地看到清華武鬥不可避免，但是414內部反對武鬥的人仍然很多，特別是教師和幹部，他們極力主張414採取各種手段避免武鬥發生。他們認為，一旦發生武鬥，414與團派無法在理論上繼續進行論戰，就顯示不出414的正確。一旦打起來，雙方都沒有理了，414的“正確”也被打掉了。

然而，那個時候清華的形勢已經沒有 414 選擇的餘地，主動權完全掌握在老蒯手中。刀子架在我們脖子上，我們不得不打。我們不僅是為真理而戰，而且是為生存而戰。蒯大富瘋狂地通緝和抓捕 414 的頭頭、幹部、教師，對之進行殘酷的肉體折磨和政治迫害，我們連起碼的人身自由都沒有，還談什麼論戰？還顧得上什麼正確與錯誤？經過反復討論，我們統一了認識，決心積極備戰，武裝自衛。與此同時，我們確定了在任何情況下 414 不挑釁、不進攻、純粹自衛的基本方針。

就當時的情形而言，414 的唯一選擇就是武裝自衛。百日武鬥過去 30 多年了，直到現在，我仍然想不出 414 除了武裝自衛外我們還有什麼其他選擇，除非文革一開始就當逍遙派。

其次是組織準備。我們成立了“414 文攻武衛總指揮部”，任命宿長忠為總指揮，劉萬章、蔣南峰為副總指揮，我自任政治委員，陳楚三、汲鵬為副政治委員。我們並沒有組建新的武鬥隊，我們手裏唯一的隊伍還是《李文忠學習班》。我們要求各系分部也成立相應的文攻武衛指揮系統，並保證有一支基本的武鬥隊伍。

再次就是“作戰方案”的準備，一旦團派挑起武鬥，我們將如何應對？當時我們對武鬥的長期性和殘酷性都缺乏足夠的認識，無論思想準備也好，組織準備也好，都是極其簡單的，甚至是幼稚可笑的。在我們的作戰方案中，祇考慮了三點。一是，加強守備，確保科學館的安全；二是，占領舊電機館、動農館，這是 414 的兩個重要的活動場所；三是，占領 12 號樓、5 號樓，這是兩座學生宿捨樓，又緊靠着九飯廳，有了這兩座樓就可以保證 414 群衆有一個生

活、吃飯的地方。

4月18日，團派召開“徹底摧毀羅文李饒集團”大會，正式給羅文李饒扣上反革命集團的帽子，聲稱要“向清華園的托洛茨基匪幫宣戰”并“發起總攻擊”。我們覺得，這是蒯大富發出的武鬥政治動員令。為了表示他們發動武鬥是正義的、正確的，他們必須編造政治謊言欺騙團派廣大群衆。

4月21日，團派總部宣布對科學館周圍地區實行宵禁，并組織幾千群衆在科學館前舉行抗議示威活動。

團派劍拔弩張，414積極備戰，清華園的形勢一觸即發。海軍宣傳隊對清華的情況一清二楚，他們無力採取任何措施制止局勢的惡化，祇有向上級領導反映情況。

4月22日，衛戍區李鐘奇副司令員來到清華，分別接見了兩派頭頭。在接見我們414時，他說：“昨天，北工發生了武鬥，我們向領導作了匯報，領導再三強調，沒有發生武鬥的地方要積極防止武鬥，已經發生武鬥的地方要堅決制止武鬥，武鬥的破壞性很大，大家都不要搞武鬥。”對清華，他專門講了四點意見：“1、你們雙方都應該根據最新最高指示辦事，嚴格遵守‘六·六通令’，不要互相抓人。2、希望你們雙方就抓人問題進行協商處理。如果確是壞人，送到專政機關；如果是好人，立即釋放。3、要保證四大自由，不要挑起武鬥，否則挑起武鬥的人要承擔一切責任。全校革命師生都要堅決反對武鬥，絕對不要參加武鬥。4、你們雙方廣播臺都要積極宣傳最新最高指示，宣傳毛澤東思想，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

由於蒯大富用“羅文李饒”和“12人反黨集團”大做文章，衛戍區吸取了陳楚三事件的教訓，沒有輕易相信蒯

大富的所謂材料。李鐘奇副司令員特地帶來了衛戍區聯合調查組，要求對團派的兩個專案進行調查。

李副司令員強調說：“結論祇能產生于調查的末尾，而不能產生于調查的先頭。一方說是壞人，一方說是好人，我們要進行深入調查。”[50]

李鐘奇副司令員的警告沒有對蒯大富起到任何作用，他們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 初戰慘敗

1968年4月23日凌晨，團派武裝人員占領了大禮堂。上午，團派的文攻武衛指揮部發表第一號通令，造謠說在大禮堂繳獲414藏匿的480根長矛，宣布封鎖大禮堂及周邊地區。隨後團派極端分子迅速占領了新、舊水利館、11號學生宿捨樓。

414原定當天上午在大禮堂召開批判鬥爭電機系幹部陶森大會，團派宣布封鎖大禮堂及周邊地區，無異于給414下了戰書，我們明白，蒯大富終於發動了武鬥。

陶森是電機系黨總支書記，414成立以後，她一直站在團派的立場上批評414，這倒也罷了。可惡的是她最近又寫了《打倒蔣南翔反黨集團副帥劉冰》的文章，登在《井岡山》報上，為蒯大富打擊清華的幹部和414提供炮彈。當時我們認為，紅衛兵小將不了解情況，給舊黨委上綱過高，情有可原。陶森是學校的中層幹部，對清華黨委的問題應該有個基本估計。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哪個上級組織宣布清華黨委是反黨集團，陶森却跟在蒯大富後面，隨意將舊黨委定性為反黨集團，分明是賣身求榮，她不僅出賣了她

自己，而且出賣了整個清華黨的組織，以求蒯大富封她一個“革命幹部”的稱號。她的行為引起了大多數幹部的不滿，也激起了 414 群衆的憤恨。既然你陶森認為清華黨委是反黨集團，那你也應該是反黨集團的一分子。好吧，我們就先鬥一鬥你這個反黨集團的一分子吧。於是我們說，陶森是團派後面的黑手，而且是真正的挑動群衆鬥群衆的走資派。4月 20 日，我們把陶森抓到科學館，并準備 23 日開會批鬥她。武鬥開始後，陶森被我們 414 作為人質扣留在科學館，長達百日，吃了不少苦頭，直到工宣隊進清華，才與 414 的被困人員一起獲得解放。

我們怎麼也沒有料到武鬥來得這麼快，李鐘奇副司令員昨天剛剛來過，海軍宣傳隊還在清華，他們就迫不及待地下手，真讓我們感到措手不及。聽了團派廣播後，我們匆忙命令數力系 414 分部和《李文忠學習班》兩支隊伍占領舊電機館，好像還把土建系的人也派去了。因為舊電機館是 414 行政管理機構所在地，也是東方紅戰團經常活動的地方，按照預定的作戰方案，我們必須占領舊電機館。與此同時，在得知團派占領了 11 號樓後，自控系 414 分部也占領了 12 號學生宿捨樓。即便如此，我們當時也還以為祇是各占據點而已，沒想到立刻開戰。

舊電機館是數力系的系館，414 占領了舊電機館後，數力系的團派同學聚集起來，抗議 414 的占領，兩派同學在系館門口發生對峙。上午九點，老蒯調集武鬥隊伍圍住舊電機館。

海軍宣傳隊聞訊後迅速趕到現場，解放軍手挽手插入兩派之間，隔開雙方，耐心勸說雙方撤離現場。後來又有一批衛戍區的解放軍來到現場試圖隔離雙方，防止事態擴大。

但是，蒯大富蓄意武鬥，哪肯就此罷休？他們依仗人多勢衆，使勁往前擠，不一會就將 414 的隊伍連同解放軍一起，擠到大門旁邊，大批團派戰士趁勢衝進舊電機館的一樓。解放軍眼睁睁地看着蒯大富調兵遣將，發動進攻，却也無計可施。

樓內的 414 戰士匆忙退到二樓，并用桌椅堵住樓梯。團派向 414 守軍發動一輪又一輪的衝擊。

414 的幾支隊伍雖有戰鬥力，但沒有長武器，抵擋不住長矛的進攻，祇好且戰且退，在三樓固守。

宿長忠在科學館打電話與守衛舊電機館的《李文忠學習班》的班長聯系，討論派人從建築館進入舊電機館三樓實施增援的可能性，不料團派已經占了先機，他們已經借助建築館爬上了舊電機館的樓頂，對 414 守軍實施上下夾攻。

經過數小時的爭奪，我們終於失敗。守衛舊電機館的 414 戰士全部受傷，大部分戰士跳樓逃生，我們組織了一支隊伍前去搶救跳樓受傷的戰士，把他們送到北醫三院（北京醫學院附屬第三醫院）治療，而那些沒有來得及跳樓的戰士則全部被俘。

第一仗就失敗了，而且失敗得很慘。數力系 414 分部負責人受重傷，數力系 414 的武鬥隊伍全軍覆沒，最終也未恢復元氣。《李文忠學習班》的班長跳樓受重傷，《李文忠學習班》的精英損失殆盡，我們不得不重新組建這支隊伍。

我們認真總結了失敗的原因，從客觀上看，一是沒有長武器，短棍肯定敵不過長矛；二是孤軍奮戰，缺乏有效的增援。而最重要的原因則是我們 414 指揮部的思想認識有問題，具體表現為：對大規模武鬥的形勢估計不足；對團派極端分子的凶殘估計不足；對守衛舊電機館的力量估計

過高；對解放軍幹預清華武鬥抱有幻想，以為解放軍不會坐視不管。當然，我們也清楚地知道，廣大的 414 群衆對這樣大規模的武鬥更加缺乏思想準備，我們並沒有足夠的把握動員和組織起 414 的隊伍投入舊電機館的爭奪戰。

我們想，這次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過去我們無論怎樣強調“清華武鬥不可避免，我們必須有所準備”，群衆總是將信將疑。現在，血的事實教育了廣大的 414 群衆：蒯大富決心大搞武鬥，414 只有武裝自衛，否則就是死路一條。

### 四不方針

23 日晚，北京市革委會和衛戍區就立即停止清華大學武鬥發表了聲明。聲明要求首先使局勢恢復到 23 日零時以前的狀態，即雙方撤離所占領的大禮堂、舊電機館、11 號樓、12 號樓，第二步解決科學館的問題。

414 組織群衆在校內游行，擁護市革委會和衛戍區的聲明，要求衛戍區來人處理武鬥事件。可是我們的希望落空了。市革委會和衛戍區對清華武鬥實行了不幹預政策。

我們還記得，1.4 武鬥後，李鐘奇副司令員連忙趕到清華，主持兩派談判，促使雙方簽訂了停止武鬥的五項協議，并讓 414 釋放了團派的俘虜。而這一次，他却没有露面。雖然市革委會和衛戍區發表了關於制止清華武鬥的聲明，但却是如此軟弱無力。團派照樣鞏固和擴大他們的“勝利”成果，照樣扣押着 414 受傷被俘人員。

令人納悶的是，昨天，李副司令親自來清華警告雙方不得挑起武鬥；今天上午，他派來一支部隊試圖撲滅武鬥的火焰；可是到了晚上，衛戍區的有效幹預却戛然而止，僅

以一紙聲明交差了事。按照慣例，祇要哪裏發生武鬥，李副司令就會出現在哪裏。素以北京市救火隊長著稱的李副司令，是誰阻止了他的行動？

然而，蒯大富却連市革委會和衛戍區的這一紙聲明也容忍不得，竟然在廣播裏說這個聲明是 414 偽造的。他們竭力反對這個聲明，是因為這個聲明打亂他們發動武鬥打垮 414 的戰略計劃。他們不敢正視這個聲明，是因為他們還需要蒙騙團派群衆，為他們的戰略計劃流血犧牲。

據我們了解，為了他的戰略計劃，蒯大富跑到市革委會，向市革委會負責人提出：“市革委會應該公開宣布撤消關於制止清華武鬥的聲明。”

市革委會負責人說：“絕對不能撤消，這個聲明是市革委會授意，由李副司令親自簽署的。”

蒯大富說：“這讓我們下不了臺！”

市革委會負責人說：“你們公開造謠說這個聲明是偽造的，這是讓市革委會下不了臺，你要負政治責任！”

更加令人納悶的是，市革委會和衛戍區沒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清華武鬥，海軍宣傳隊却要撤出清華。

4月 24 日晚上，海軍宣傳隊派人來科學館把我接到海軍宣傳隊的駐地靜齋。宣傳隊的領導與我進行了一次非常鄭重的談話。隊長賴尚林面色凝重地對我說：“我們海軍宣傳隊決定明天撤出清華。我們來清華前得到市革委會和衛戍區的明確指示，要我們支持左派。經過調查研究，我們對清華的情況已經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們不便公開表態。我們撤出清華後，你們的處境會更加困難，你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我們撤出清華並不是不管清華的事，祇不過住在校外而已。你們要經常與我們聯繫，有任何情況都要

及時向我們反映，祇要有可能，我們一定會幫助你們。”

在平時的接觸中，我們已經了解到海軍宣傳隊對清華兩派所持的態度：絕大多數解放軍同情和支持 414，祇有極少數例外。但是，像賴隊長這樣明白無誤地表達宣傳隊的立場，還是第一次。一向謹慎的劉承能副隊長立刻嚴肅地叮囑我：“小沈，賴師長的話，你們幾個領導心裏有數就行了，千萬不要往下傳達。”

有賴隊長的一番話，我們就知足了，我們還能期望什麼呢？414 在清華與蒯大富鬥爭了一年多，除了一位記者張廣友外，沒有任何一個大人物為 414 說過一句公道話。我們早已認識到：414 的命運祇能依靠我們自己的奮鬥，而絕不能依靠別人的同情和支持。我堅定地對賴隊長說：“謝謝海軍宣傳隊對我們的關心和幫助。我們對前面的困難有足够的思想準備，為了捍衛真理，我們會堅持下去，并且隨時準備獻出我們的鮮血和生命。”

回到科學館，我向 414 的幾個主要領導傳達了賴隊長談話的內容。大家一致認為，海軍宣傳隊的撤出，意味着中央和北京市短期內不會解決清華武鬥問題，我們必須作長期打算，必須認真研究長期武鬥所應該採取的戰略和戰術。

海軍宣傳隊撤出清華是北京市革委會和北京衛戍區的不幹預政策的必然結果。從毛主席 7.28 講話中，我們知道，這種不幹預政策就是“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我把它稱之為“四不方針”。

謝富治無疑是“四不方針”的始作俑者，他制定這樣一個“四不方針”，無非是想讓蒯大富放開手脚，用武力打垮 414。但是，我一直都沒有弄明白：“四不方針”為什麼能得到黨中央的批準？中央文革自不必說，周總理怎麼會贊

同或默認？莫非這“四不方針”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

吳慶彤同志的《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增訂本）一書給我提供了一個明確的答案。吳慶彤同志是原國務院秘書廳秘書室主任，他在書中這樣寫道：

全面奪權後，各地武鬥的烽烟四起。毛主席不僅未及時採取堅決有力措施制止武鬥，而且繼續不計後果地支持所謂“革命左派”。盡管在 1967 年他陸續批準周總理提出的關於制止一些地方武鬥的建議，但這並不表明他已經下決心制止武鬥。例如，1967 年 12 月 18 日，毛主席接見以謝佩奇為首的阿爾巴尼亞、中國友好協會代表團，在談到各地武鬥時說：“要打就打，我主張打。他要打嘛，不是我要打。凡是打得厲害的地方，解決問題比較容易。北京不疼不癢，太文明了。”[51]

“四不方針”被堅決執行長達百日之久，其結果是：清華師生員工 12 人死亡、30 多人殘廢、數百人受傷，財產損失不計其數。

三個多月後，毛主席不得不改變“四不方針”，採取幹預政策，首都工人階級血染清華：5 位工宣隊員遇難，731 位工宣隊員受傷。

難道我們不可以說，這“四不方針”是助紂為虐、縱容蒯大富肆無忌憚殺人放火的錯誤方針？這“四不方針”是浸透了清華師生員工和北京工人階級鮮血的錯誤方針？

## 逃難遇難

海軍宣傳隊撤出清華，蒯大富立刻行動。4月25日，團派攻打我科學館，雙方激烈交戰，由於414早有防範，團派未能得逞。

1917年動工興建、1919年建成的科學館位於大草坪西側，地處清華大學的政治中心區，戰略位置十分重要。414廣播臺設在科學館三樓，功率強大的高音喇叭時時刻刻在和團派論戰，頑強地顯示414的存在。我們深知廣播臺對於414的重要性，沒有廣播臺，也就沒有了414。414和團派雙方圍繞廣播線路和大喇叭發生過無數次的明爭暗鬥。為防止團派對414廣播臺的破壞，我們很早就採取了預防措施。在通往科學館三樓的樓梯口，我們用粗粗的鐵棍焊了一道門。未經許可，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團派極端分子幾次前去挑釁都未能得逞。67年12月20日，團派極端分子抓走陳楚三的第二天，我們又封閉了整個科學館，禁止團派群衆出入。封閉科學館完全是自衛措施，我和不少被團派通緝的414頭頭還有一些幹部一直都生活在科學館。科學館是我們的安全島。蒯大富找不到對我們這些頭頭下毒手的機會。科學館是蒯大富的心頭大患，所以他要千方百計拔掉科學館這顆釘子。

4.23後，兩派都忙於搶占據點。414除了科學館和12號樓外，又佔領了動農館、土木館和8號樓。8號樓是工物系的學生宿捨樓。在我們的預定方案中，並沒有佔領8號樓的任務，但414工物系分部的負責人說，他們暫時不想集中到12號樓去，他們有力量佔領8號樓、守住8號樓。即使日後守不住8號樓，現在也要佔領它。他們認為，武

鬥一開始，我們就處處退讓的話，對 414 群衆的心理會產生不利影響。

清華大學的學生——無論屬於團派還是屬於 414——絕大多數都是反對武鬥的。武鬥一開始，他們就用腳表明了態度：逃難——逃離清華到外校避難。而兩派武裝占領學生宿捨樓則直接引發了大規模的“難民潮”。同學們看到中央對清華武鬥不聞不問的態度，感到非常絕望，祇好暫時離開是非之地。

4 月的最後幾天，是逃難的高峰。有人肩扛行李，手提網兜；有人推着自行車，馱着大包小包；有人蹬着三輪車，車上堆滿了書籍和衣物。逃難的人群從各個學生宿捨樓流向南校門，匯集成一道獨特的景觀。

414 逃難者更多，特別是那些骨幹分子，要麼參加武鬥，要麼逃出清華，沒有第三種選擇。清華武鬥期間，逃到校外的 414 學生大都住在北京地質學院，因為地質學院和 414 的關係較好；逃到校外的團派學生大都住在北京航空學院，因為韓愛晶是蒯大富的親密戰友。武鬥初期，也曾有不少 414 的同學到北京航空學院避難，後來被韓愛晶統統趕出北航。文革以後，韓愛晶對我說，他一直反對蒯大富搞武鬥，曾經帶着北航《紅旗》的所有總部委員到清華勸說蒯大富放棄武鬥，可是 414 在廣播中總把韓愛晶與蒯大富相提並論，稱之為“蒯大富、韓愛晶之流”，他感到很氣憤，一怒之下，發出了驅逐 414 的命令。

在逃難的過程中，414 的一個骨幹分子姜文波遇難。武鬥結束後，他的同班同學凌桂生向我講述了姜文波遇難的大致情況，他說：

4月26日下午6時左右，團派武鬥人員開始占領2號樓，驅逐樓內群衆。

在樓內的414群衆紛紛出逃。有的人直接把行李從窗戶扔到地上，下樓後再撿起來。有的人則把行李交給本班的團派同學，讓他們送到樓下，自己先逃出去。那時候同一個班的兩派群衆雖然政治觀點不同，但關鍵時刻還能互相照應。

團派在占領2號樓的時候，有意搜捕414骨幹分子。2號樓住的是土建系同學，土建系有幾個414戰士是《李文忠學習班》的成員。在團派的黑名單上，第一個是我，第二個是姜文波。我們兩個一道混在逃難的人群中往樓下跑。當我們從四樓走到二樓樓梯口時，突然有人高喊“凌桂生！”

“凌桂生！”我一聽，是一個不熟悉的聲音，因此沒有答應，低着頭繼續往樓下跑。此時又有人高喊“姜文波！”“姜文波！”姜文波隨口“哎”了一聲，還沒等他弄清是怎麼回事，立刻就有幾個團派的人上來把他抓走了。

我逃到地質學院住了下來。當晚，我發高燒。次日清晨，被同學送到北醫三院，躺在急診室觀察。7時左右，醫生讓我騰出床位，說是清華來了個更危急的病人。我起來一看，原來是姜文波！據送醫的人說，有人路過2號樓與1號樓中間的空地時，發現地上躺着一個人，頭部腫大，已經奄奄一息，趕緊招呼幾個人把他送到三院來了。到北醫三院後不久，姜文波就斷氣了。

後來聽說姜文波被團派關押在四樓。團派的人用鐵絲綁住姜文波的雙手，并對他進行了長達數小時的毒打。姜文波趁人不備，跳樓逃跑，頭部觸地而死。

這是武鬥以來 414 第一個被害的學生，當時我們不了解確切情況，祇知道姜文波被團派抓走後死的。

### 護糧被害

為了保衛科學館，我們派了一支武鬥隊伍常駐在科學館內。武鬥人員、廣播臺的工作人員，還有那些被團派通緝不敢回本系食堂吃飯的人，共有六、七十人之多，都在科學館吃、住。解決這些人生活的問題，特別是糧食問題成了一大難題。

團派控制着清華大權，414 無錢買糧。怎麼辦？祇有搶。到哪裏搶糧？教職工食堂不能搶，學生食堂不能搶，搶了那裏的糧食會大失清華人心。有人說，運動員食堂可以搶。文化革命以後運動員停止訓練比賽，他們大都回到本系的學生食堂吃飯，搶了那裏的糧食，影響較小。於是，我們決定到運動員食堂搶糧。

4月 29 日，我們組織了一次有幾百人參加的搶糧行動，一部分人拿着長矛負責警戒，一部分人負責搬運，把運動員食堂裏儲存的大批糧食包括油鹽醬醋等統統運到了科學館。

這是一次明火執仗的搶劫。團派對此沒有精神準備，也沒有派武鬥隊伍進行攔截，祇有一位團派保衛組的工人試圖阻止，被 414 戰士用長矛扎傷。

不知是巧合還是報復，幾乎就在同一時間，團派也出動了 200 多名武鬥人員去九飯廳搶糧。團派搶糧的目的是為了給 414 的生活制造困難。因為九飯廳是武鬥後 414 控制的唯一食堂。搶走了九飯廳的糧食，住在 12 號樓裏的 414

戰士將無處吃飯。

爲了保護糧食，自控系 414 的武鬥隊伍出來阻擊，兩派的長矛隊在九飯廳前面發生了激戰。在對峙過程中，團派一汽車司機駕駛一輛大卡車突然開足馬力從側面向 414 的隊伍衝過來，撞倒 414 戰士謝晉澄，并從他身上碾過去，謝晉澄當場死亡。

喪失人性的汽車司機還不罷休，在九飯廳西側的空地上繞了一圈後，又故伎重演，再一次衝向 414 的隊伍。414 隊伍一邊躲閃、一邊用石塊、磚頭襲擊卡車司機。忙亂之中，卡車翻了，司機從駕駛室爬出來跑了。

雙方激戰一場後，團派撤走，414 趁勢占領了 5 號樓和東區浴室，使 12 號樓、5 號樓、九飯廳和東區浴室連成一片，形成一個完整的防區。

爲了保護 414 的糧食，謝晉澄失去了生命。他是在武鬥中死于戰場的第一人。親眼目睹了事件全過程的 414 戰士們震驚、悲痛、憤慨，強烈要求蒯大富緝拿凶手。

團派廣播臺爲卡車司機開脫罪責，無中生有地說什麼謝晉澄死于 414 之手，却要嫁禍于團派。

414 向市革委會和衛戍區匯報，要求懲辦凶手，制止武鬥，照例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無奈，414 抬着謝晉澄的尸體在清華游行，抗議團派極端分子草菅人命，在光天化日之下蓄意殺人，還要反咬一口；要求公安局驗尸，確定謝晉澄死因。

據說清華抬尸游行一事驚動了總理，總理指示市公安局出面處理。

五一晚上，市公安局派法醫來清華對謝晉澄的尸體進行了鑒定。幾天後，驗尸結論送到清華：“重力擠壓致死”。

我們一廣播市公安局的驗尸結論，團派就再也不吭聲了。

## 戰略決策

4月25日，團派攻打我科學館，未能得逞。

4月28日，團派攻打我8號樓，未能得逞。

5月2日凌晨，團派偷襲我土木館得手，414守軍除一人逃脫外，全部被俘。土木館被團派占領。

5月10日，蒯大富親自指揮團派隊伍攻打我動農館。414居高臨下，用磚頭瓦塊打擊進攻者，團派傷者衆多，祇好撤退。

蒯大富全面進攻，咄咄逼人，414被動挨打，險象環生。由汲鵬領導的414“文攻”隊伍天天到城裏游行、貼標語、撒傳單，向社會各界揭露清華現狀，懇求北京市和黨中央制止清華武鬥。可是，北京市聽之任之，黨中央不聞不問。形勢迫使我們不得不考慮：如何才能長期堅持、絕地求生？

經過反復討論，我們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戰略決策：建立414的根據地。我們要像當年毛主席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那樣，在清華占領一片區域，形成武裝割據的局面，與蒯大富周旋到底。

當時，所謂“軍事態勢”對我們十分不利。除了12號樓防區連成一片外，我們占領的科學館，動農館，8號樓都是孤立無援的據點，極易受到團派的圍困和攻擊。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態，我們就無法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長此以往，必敗無疑。問題很明顯：414缺乏一個根據地。

我們的根據地應該放在哪裏？鋪開清華平面圖，不用仔

細琢磨，我們就把目光鎖定在以中央主樓為核心的東區教學樓群。東區教學樓群包括主樓、主樓西側的焊接館、鑄工樓、壓力樓、汽車樓，主樓後面的工程物理系系館。

清華主樓是 1956 年開始動工、1966 年剛剛建成的一座龐大的教學樓群，它由東主樓、中央主樓、西主樓三座緊密相聯而又相對獨立的大樓組成，其規模宏大、氣勢雄偉，為全國高校所少見。

經過精心策劃和周密部署，大概是五月中旬，我們組織各系 414 的武鬥人員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占領了東主樓、中央主樓、西主樓、焊接館、鑄工樓、壓力樓、汽車樓、工程物理系系館等整個東區教學樓群。與此同時，我們還占領了焊接館北面的通用車間，占領了位於中央馬路西側的機械設備廠。

我們所占領的這些地方都是教學樓群，文革以來一直空空蕩蕩，武鬥以後更是不見人影，因此我們的占領是和平占領，沒有遇到任何阻攔。團派完全沒有估計到我們會採取這樣空前規模的行動，更不知道我們的意圖是什麼，等他們明白過來的時候，我們的根據地——也可以說是 414 的戰略大本營——已經建成。

我們占領了東區教學樓群以後立即修築防禦工事。我們所修築的工事，其實也很簡單。第一，每座大樓祇留一個門作為進出口，在樓門口挖一條壕溝，把土堆起來，形成一個掩體；第二，在樓門內焊一道或幾道鐵門；第三，用鐵條把各層所有房間的窗戶全部焊死；第四，祇留一個樓梯供上下樓使用，且在樓梯中間焊上鐵門，所有其他的樓梯，全部用桌椅堵死。在東主樓、中央主樓、西主樓之間設立秘密通道，祇有熟悉的人才能自由來往。

這樣，從東主樓到動農館，我們所占領的據點東西方向連成一片，南北方向也有一個縱深防禦，構成了一個非常理想的根據地。

從樓群規模來說，它能容納 414 所有的武鬥隊伍和後勤人員，萬一形勢危急，我們可以放棄科學館、8 號樓和 12 號樓，把人員全都集中到根據地來。一座中央主樓就可住下全部七千名 414 戰士，何況祇有區區幾百人？武鬥開始後大部分學生都到校外避難去了，留校參加武鬥的同學本來就很少。

從樓群布局來說，空間廣闊又相對集中，既有足夠的回旋餘地，又能首尾相顧、互相呼應。

從地理位置來說，樓群東面是圍牆，跨過圍牆就是校外，這是我們根據地的出口；南面是開闊地和大馬路，馬路那邊是低矮的居民住房；西面是萬泉河，我們的設備廠與團派的舊水利館隔河相望；北面是東大操場和東區學生宿捨樓群，東區學生宿捨樓群雖大多為團派所占，但與我們的通用車間還有相當的距離。這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它像一個巨大的城堡，儼然一個城中之城、校中之校。

總的來說，有了這樣一個根據地，就徹底粉碎了團派對我們進行包圍和封鎖、進而各個擊破、逐步消滅的企圖，從根本上確保了 414 的生存和安全。

我們的根據地與毛主席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有很大的區別。毛主席的井岡山地處偏僻貧窮的山區，是中國最落後的農村之一；而我們的根據地則是清華最發達的地區，它有現代化的教學樓，有先進的實驗室，更為重要的是這裏還有各種各樣的車間廠房，如機械加工、鍛造、鑄造等等，在這些車間裏，車、銑、刨、磨等各種機床設備應有

盡有，這一切為日後我們制造武器提供了極好的條件。

我們把根據地劃分為幾個防區，交給幾個系的武鬥隊伍駐守，由他們自己修築工事，自己制造武器，生活供應和後勤保障系統也由他們自己解決。至于打井工具、發電機組、汽油柴油、醫藥用品等等，一切自然都有專人負責。

我曾經提到過，各個系 414 分部的主要負責人，大多數是些文質彬彬的溫和派人士，過去他們堅決反對武鬥，一貫主張兩派平等辯論、以理服人。但是現在，他們對蒯大富蓄意挑起武鬥表示極大憤慨，對北京和中央的不幹預政策感到萬分失望，因而毫不猶豫地擁護並執行我們的戰略決策。他們拿起長矛，戴上柳條帽，拉上本系的骨幹隊伍，進駐一個個防區，當起了“衛戍司令”。這些分部頭頭的舉動讓我感動不已，我從內心感激他們，感激他們在危難時刻挺身而出，穩定了 414 的隊伍，保衛了我們的根據地。

主樓的西南方向還有一個精密儀器系的 9003 大樓。在研究方案時，有人提出，我們應該占領 9003 大樓，那樣的話，整個根據地就會更加完整、更加安全。但精密儀器系裏的 414 負責人說，9003 大樓裏有大批的精密儀器，還有全國高校唯一的恒溫實驗室，如果因為我們占領而遭到損壞，我們負不起責任。再說，當時雙方祇用長矛、磚頭，并無槍炮，9003 大樓離主樓較遠，對我們構不成什麼威脅。所以，我們決定不占領 9003 大樓，這個決定使我們 414 自控系學生錢萍華付出了年輕的生命。

關於科學館，是撤離，還是堅守？委實讓我們難以決斷。從“軍事”上說，科學館處於團派的包圍之中，是個孤立無援的據點，絕對應該放棄。但科學館是 414 的象徵，放棄科學館無異于宣布 414 退出清華政治舞臺。這正是團派

求之不得的。團派之所以發動武鬥就是想拔掉科學館這顆釘子，逐步把 414 趕出清華，使清華變成蒯大富的一統天下。為了向中央、北京市和世人顯示 414 的存在，我們決定堅守科學館。因為其政治意義遠遠超過軍事意義。我們決不能在這個時候表現出懦弱和膽怯，決不能滅自己的志氣，長他人的威風。我們提出了“414 要與科學館共存亡”的口號，以堅定 414 戰士的信心，激勵 414 戰士的鬥志。

為了堅守科學館，我們做好了一切準備工作。科學館已經儲藏了從運動員食堂搶來的大批糧食和油鹽醬醋，其數量之多，足夠使用半年。槍戰開始後，我們甚至把裝滿糧食的口袋壘在科學館的窗臺上當作沙袋使用。科學館的水電供應也不成問題。我們在科學館安裝了發電機，儲存了大量的柴油。我們還在科學館裏打了幾口井，保證有充足的水源。至于武器，長矛、彈弓、磚頭、瓦塊、燃燒瓶，應有盡有。後來，又從主樓運來了大批自制的土槍、土炮、手榴彈。作為防禦，那是綽綽有餘了。團派如果不付出慘重傷亡的代價是絕對拿不下科學館的。我們判斷蒯大富還沒有膽量下死命令，不惜一切代價拿下科學館，廣大團派戰士也未必聽從蒯大富的指揮，冒死攻打科學館。在 414 的嚴密防守下，要拿下科學館，僅靠少數幾個極端分子和亡命之徒是無濟于事的。

我們扣留了團派的幹部陶森和團派的主要負責人陳育延作為人質，使團派不得不有所顧忌。

扣押陳育延的情況是這樣的。5月14日，414一位同學孫華棟騎車路過“一教”時，被團派綁架到“一教”，遭到“狗熊”（團派保衛組一頭目的外號）等一些人的毒打致死。消息傳來，414的人對“狗熊”無端綁架殺害非武鬥人

員的行爲異常憤慨，決定伺機綁架團派人員，作爲人質扣押在科學館。幾天後，陳育延和葉志江推着自行車從科學館前路過，他們是團派中反對武鬥的“鴿派”，自以爲 414 不會爲難他們。哪知道 414 發現他們後，立即派人攔截，葉志江騎車跑了，陳育延被抓到科學館。414 用衣服蒙住陳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頓，逼迫她交代孫華棟事件的真相。陳育延知道情況却堅不吐口，并絕食抗議。一周後，葉志江來到科學館，對 414 守衛人員說，陳育延有病，他願意作爲人質留在科學館，換取陳育延的自由。結果陳育延走了，葉志江被我們扣押在科學館，直到 7.27 工宣隊進校。葉志江是 28 團的筆杆子，堪稱團派的理論家，他的許多觀點都曾遭到我們的口誅筆伐。但是，他講義氣、重情感，危難時刻捨己救人的行爲，却不失英雄氣概、男人本色，着實令人敬佩。

爲了接應科學館，我們繼續占領動農館。動農館像一把匕首，指向團派據點第一教室樓和舊土木館，與之形成對峙。

事實證明，我們建立以中央主樓爲核心的根據地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決策，414 之所以能在百日武鬥中堅持下來，根據地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建立根據地的同時，我們更加明確地採取了消極防禦的策略，即真正意義上的“文攻武衛”，完完全全的自衛。

我們向各系的武鬥隊伍頒布了三條禁令：不得向團派的據點發動進攻，不得主動襲擊團派隊伍，不得把團派的人往死裏打。我們特別叮囑 414 戰士千萬不要打死團派的人。我們對大家說，殺人償命，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適用的，古今中外，概無例外，何況在新中國。

說來可笑，我們的消極防禦策略與毛主席的積極防禦策略完全背道而馳。毛主席說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連延安都主動放棄，我們明知科學館保不住，却還要與科學館共存亡。毛主席說要抓住一切機會向敵人發起主動進攻，我們却要死守據點，處處被動挨打。毛主席說，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逐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我們却祇能“擊潰”團派的隊伍，而不敢“消滅”團派的隊伍。

我們的策略也可以說是“固守待援”。“守”就是無論如何都要守住清華這個陣地，不能讓清華變成蒯大富的一統天下；“援”，就是等待中央的幹預，對清華實行軍管。我們之所以採取這樣的策略，是因為我們確認，這場“戰爭”還是人民內部矛盾，發生在首都，發生在毛主席的身邊，終究不會打大、打久，中央不會長期不聞不問，人民不會長期不聞不問。

我們的戰略和策略雖然使我們在武鬥中處處被動，但對於我們來說可能是當時所能採取的唯一正確的選擇。可以這樣說，正是由於我們採取了這樣的戰略和策略，才大大地減少了兩派群衆在武鬥中無謂的傷亡，當然也避免了我們 414 頭頭犯更大更嚴重的錯誤。文革以後，我們 414 頭頭和群衆也因此免去了許多麻煩。

我們有了根據地，形勢得到穩定，各系的戰區司令官開始組織自己的隊伍研究兩軍交戰的攻防戰術，反復操練隊形，并不斷制造和改進武器。

武鬥初期，雙方使用的武器主要是長矛，還有磚頭、石塊之類的東西，稍微高級一點的武器是彈弓和弓箭。我們的同學把這些武器稱為“冷兵器”，

戰鬥人員隨身攜帶的最重要的武器是長矛。最初的長矛

是用自來水管做的，同學們用鋼鋸把自來水管的一端鋸成斜口，形成一個尖尖的頭，這就是長矛。後來，大家嫌自來水管太沉，使用起來很不方便，就改用鋁管。反正清華庫房裏什麼都有，且無人看管，拿起來很方便。為了增加殺傷力，同學們又在鋁管頭上焊接一祇三角刮刀或者自制的尖刀，有的人還系上一根紅綢帶，這樣，長矛就變成了一杆真正的紅纓槍。

很快出現了彈弓車，它使用自行車或三輪車的內胎，要有兩個人同時拉動，才能將磚頭、石塊或燃燒瓶打出去。最高級的彈弓車使用的是醫院裏的輸血管，十根輸血管綁在一起，彈性好，力量大。彈弓車算是重武器了，它射程特遠，殺傷力極大。武鬥中許多人被彈弓車擊中受傷。我的一位好朋友，他是一位高幹子弟，為護送我通過團派控制的封鎖區，被團派彈弓車打來的磚頭擊中眼睛，最後不得不摘掉眼球。

為防止彈弓車的襲擊，大多數人頭戴建築工人用的柳條帽。我們的柳條帽都是 200#414 分部送來的。有些人在柳條帽的前面安上鐵紗布作為面罩。武鬥期間，大多數時間沒事兒幹，大家成天擺弄和改進自己的武器。有些人用鋁板制作了頭盔，除了眼、鼻、嘴外，整個頭部都包在頭盔中。更有講究的人，在頭盔的正面鑲上透明的有機玻璃，把眼睛也保護起來。為防止對方長矛的襲擊，每個人都披鎧挂甲。這些鎧甲全是用鋁板制作的，可以有效地護住雙肩、雙臂，前胸、後背以及下身。一支全副武裝的武鬥人員集合起來，在太陽的照耀下閃閃發光，酷似秦始皇的軍團。而這復活的軍團裏的士兵都是高等學府的莘莘學子。

一天，有人特發奇想，說可以造一個土坦克。他們開來

了履帶拖拉機，用鋼板把駕駛室包起來，焊了一層厚厚的殼，拖拉機就變成了土坦克。後來，他們又在土坦克的前面焊上兩根又粗又尖的長矛。土坦克可以在兩軍對峙中橫衝直撞，彈弓車和長矛都對它無可奈何。我們在主樓東面進行了幾次清障、爬坡演習，訓練了坦克手。土坦克一度成為 414 的秘密武器，并在 5.30 大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 五卅大戰

我們的根據地建成後，團派恨之人骨，總想伺機侵犯。5月 21 日凌晨 6 時，團派偷襲我汽車樓，長矛隊激烈交戰，414 擊退了團派的進攻，但有三人受重傷。

團派頻頻主動出擊，414 處處被動挨打，我們的人沉不住氣了，紛紛要求還擊。有些戰區司令官說：在歷次長矛隊的交戰中，414 戰士勇敢善戰屢戰屢勝，團派從未占過上風。我們没有必要采取消極防禦的策略，而應該主動出擊。有人建議攻打一教，解除科學館的孤立狀態，有人建議拿下舊水利館，解除它對動農館的威脅，并制訂了相應的作戰方案。但這些建議都被我們否定了。我們給各戰區衛戍司令官的原則祇有一條，死死守住自己的據點，盡可能減少無謂的傷亡。在長達三個多月的武鬥中，414 從來沒有進攻過團派占領的任何一個據點。

5 月 29 日，414 “文攻武衛指揮部” 開會時，有人提出：一年前的 5 月 30 日，是團派革委會流產的日子，今年的 5 月 30 日，他們一定會搞一個重大的軍事行動，打擊 414，以雪心頭之耻。大家都很贊同這個看法，認為我們必須做好充分準備。

團派將在哪裏行動？科學館、動農館、8號樓，他們都進攻過了，沒有占到什麼便宜。汽車樓也偷襲過了，也未得逞。他們會進攻我們的大本營嗎？不可能。我們這裏“早已森嚴壁壘，更加衆志成城”。我們判斷：他們會在414的12號樓防區採取行動。當我們鋪開清華平面圖一看時，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東區浴室！團派進攻的目標一定是東區浴室。其理由一是，東區浴室雖然不大，但戰略地位重要，攻下東區浴室，九飯廳就失去了依托，414整個12號樓防區不攻自破，這對414將是一個重大打擊；二是，東區浴室是個孤立據點，便于包圍，而且東區浴室祇有兩層，每層祇有五間，體量很小，易攻難守，我們祇有幾名414戰士守衛此地。多次交戰證明，在正面交鋒和肉搏戰中，團派絕對不是414的對手，他們肯定會采用“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策略對付414，東區浴室是他們最理想的進攻目標。

我們進一步判斷：團派在攻打東區浴室時還會采用“圍點打援”的計策，在11號樓埋伏重兵，當414從主樓派兵救援東區浴室時，突然出擊，一舉殲滅我們的有生力量。

根據這些判斷，我們決定在東區浴室與團派進行一場決戰，打退團派的進攻，守住東區浴室。

為了打贏這一仗，我們採取了兩個重要措施。

第一個措施是暗中增兵。宿長忠臨時指派電機系20多名414戰士利用夜色的掩護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了東區浴室。他們帶去了很多長矛和食品，做好了長時間戰鬥的準備。

第二個措施是搶修工事。根據現場情況，東區浴室的爭奪戰將會在浴室屋頂展開。祇有占領了屋頂，才能占領東

區浴室。東區浴室屋頂由五個南北向的拱型屋頂相連而成，祇有南北兩端便于架設雲梯。因此，這裏肯定是團派的主要攻擊點。當晚，找了一個人們不太注意的時間，宿長忠派人在東區浴室屋頂南北兩端的邊沿上焊了一排堅固的鐵欄杆。有了這樣的鐵欄杆，414 的防守者就可大膽地從浴室拱頂向下衝鋒，用長矛捅那些爬到屋頂邊沿的團派，而不必擔心自己摔下去。相反，從雲梯爬上來的團派，却無法順利鑽過鐵欄杆，占領屋頂。

當晚，總指揮宿長忠、副總指揮劉萬章又召開會議，研究了第二天的作戰方案，給各戰區司令官布置了具體任務。會後，他們倆帶領主力部隊集中在主樓防區，加強戒備，確保根據地的安全。

5月30日凌晨，有人把我從睡夢中叫醒，向我報告說：東區浴室果然打響了。

宿長忠和劉萬章並沒有馬上採取行動，而是讓各哨所嚴密監視團派部隊調動情況，以便進一步弄清團派的真實意圖。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團派除了繼續攻打東區浴室外，沒有其他異常動向。宿長忠和劉萬章決定先採取“圍魏救趙”的策略，派一支 414 隊伍圍住了團派前哨廣播臺所在地“一教”，擺出一副攻打“一教”的架勢。宿長忠和劉萬章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試圖牽制團派的兵力，迫使團派從東區浴室抽調人員解救“一教”，減輕東區浴室的壓力；另一方面，他們也想進一步觀察團派是否采用“調虎離山”之計企圖進攻我主樓根據地。

團派指揮部對 414 在“一教”的行動毫不理會，繼續攻打東區浴室。“一教”團派守軍沉不住氣了，有些人開始跳

樓逃命。這時，414 方面有不少人主張幹脆拿下“一教”，打通與科學館聯系的通道。可宿長忠和劉萬章堅持了不向團派的據點發動進攻的原則，并向大家解釋，按照目前的力量對比，我們是可以拿下“一教”的，但雙方都會有重大的傷亡，打死人或被人打死都没法交代。佯攻一陣之後，414 就從“一教”撤退了。

前綫來人報告說，東區浴室已被團派團團包圍，團派占領了九飯廳，從九飯廳的屋頂發動進攻。414 守軍非常頑強，輪番作戰，不顧老團打來的磚頭、石子、燃燒瓶，手持長矛，扼守在屋頂，打退了團派一次又一次的猛烈進攻。團派在東區浴室南北兩側架設起好幾部雲梯，那些勇敢分子一手拿長矛，一手抓雲梯，奮勇往上爬。祇要團派露出頭來，414 的戰士就用長矛將他們捅下去。一批人倒下去了，一批人又爬上來了。如此反反復復，也不知道團派組織了多少次進攻，也不知道到底爭奪了多長時間，團派始終未能得手。414 戰士用長矛捅下了一個又一個爬上雲梯的團派戰士。這些團派戰士從雲梯上摔下去，非死即傷。即便如此，團派頭頭仍驅使他們的戰士不斷爬上雲梯，向 414 發動進攻。據後來得到的消息說，那些參加進攻的團派戰士大都受傷，其中一人從雲梯上摔下來當場死亡。這位死者名叫段洪水，是修繕科工人，他是上午 6 時許從雲梯上摔下致死的。另有一人從雲梯上摔下變成了植物人。

在確信團派對我主樓根據地沒有威脅後，宿長忠和劉萬章便率領 414 的主力部隊前去增援 12 號樓。我也隨隊而行。這時應該是上午 8 點左右。

主樓西側有條大道筆直向北，一直通到 12 號樓。這是主樓增援 12 號樓的捷徑。但必須經過團派據點 9 號、10

號、11 號三座宿捨樓。毫無疑問，團派一定會在這裏埋伏重兵，企圖趁 414 隊伍前進時三點同時出擊，將 414 隊伍攔腰斬斷，分割包圍，各個擊破。為防止在運動中被消滅的危險，宿長忠決定來一個大迂回：即繞道東主樓，沿着學校的圍牆，將隊伍秘密集中到了校園東北角的高壓試驗室，并把高壓試驗室作為增援 12 號樓的臨時指揮部和基地。我們在高壓試驗室用望遠鏡觀察了整個戰場的情況，研究了一下戰鬥方案。高壓試驗室西面是東大操場，一片開闊地。東大操場與東區學生意舍樓群之間有一條南北的大馬路，這條馬路比東大操場低一米。緊靠操場的北邊是一條土路，土路的北邊是小樹叢，再北邊就是圍牆。土路的西頭是一個斜坡，要想到 12 號樓，斜坡是必經之路。團派在這個路口堆了許多籃球架作為路障。414 的大隊伍根本無法通過。團派據點 9 號、10 號、11 號三座宿捨樓前武鬥人員活動頻繁，樓頂架設了不少大型彈弓車，果然一副“圍點打援”的陣勢。

根據現場情況，宿長忠和劉萬章決定，先集中力量打垮東線“打援”的團派，然後再與西線“圍點”的團派交戰。他們認為必須先掩護《李文忠學習班》的戰士們衝過去，增強 12 號樓的力量，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從團派的背後發起攻擊。《李文忠學習班》是我們的一支生力軍，但由于戰鬥減員太多，且班長受傷，難成獨立建制，祇好與自九戰鬥隊合二而一，由自九的樊程統一指揮。

隨後，宿長忠和劉萬章帶領 100 多人的隊伍，擺好陣勢，從東大操場向西開進。這個隊形是平時操練好的，也是從解放軍那兒學的，戰鬥序列採取三三制，三人一個戰鬥組，一人突前，二人靠後，成三角形隊列。

我們的隊伍走到東大操場中央時，團派集結在 11 號樓附近 100 多人的隊伍，馬上衝出來，從馬路躍上東大操場，擺開陣勢，與我們對峙。

在雙方對峙的時候，原先藏在高壓試驗室裏的《李文忠學習班》在樊程的帶領下按計劃從東大操場北邊的小樹叢悄悄接近路口，並迅速從路障旁邊衝過去，團派想來攔截，為時已晚。《李文忠學習班》與 12 號樓 414 的守軍匯合，對團派 11 號樓的隊伍形成了夾擊之勢。

兩軍在東大操場展開了廝殺，我們衝過去，他們就退一退；他們衝過來，我們就退一退。如此你來我往，反復不已。而在每次衝殺之中都有不少戰士受傷。

我在高壓試驗室注視着這場廝殺，這是一場真正的肉搏戰，那情景雖然算不上是驚天地、泣鬼神，却也使我心驚肉跳、震顫不已。

團派現場指揮、北京高校擊劍冠軍許恭生特別凶悍，一邊謾罵 414，一邊揮舞長矛，很多 414 戰士傷在他的長矛之下。

團派依托自己的據點，充分發揮弓箭和彈弓的威力，使我們吃虧不小，很多戰士受傷流血。

但 414 的長矛比較長，在與團派對峙中略占優勢。我們衝得凶了，團派就跳到操場下面去，集結在 11 號樓前，嚴陣以待。我們不敢貿然跳下去，祇好撤到高壓試驗室，稍事休息後，再次發起衝鋒。

在一次交戰中，11 號樓的團派用彈弓和弓箭掩護他們的戰友們向我們發起反衝鋒。團派的一支箭射中 414 戰士卞雨林的左胸，卞雨林當即受傷倒地，七竅流血。同伴們把他抬下來，還沒送到北醫三院，就咽氣了。有人說，團

派在箭頭上沾了氫化鉀，有劇毒，見血封喉。

上午 10 時許，我們又向團派發起了一次衝鋒，把團派逼下大操場。許恭生自恃武功高強，斷後掩護，漫不經心地且戰且退。但脚下不留神，被小沙堆絆倒了。對他早已恨之入骨的 414 戰士，20 多根長矛同時刺中許恭生。這位北京高校擊劍冠軍就這樣結束了他年青的生命。

在另一次衝鋒中，宿長忠由於過于突前，被團派的幾根長矛刺中，重傷倒地，戰友們及時搶上前去，把他救回到高壓試驗室。宿長忠的負傷對 414 是個重大打擊，因為他是 414 的總指揮，他和副總指揮劉萬章分工合作，互相配合，組成了一個堅強有力的指揮班子，現在祇有劉萬章一人繼續指揮 414 隊伍與團派作戰了。

長久對峙，對我們很不利，我們必須盡快解決東線的團派，與 12 號樓的隊伍匯合，才能解救東區浴室。劉萬章決定，調用秘密武器土坦克，向團派發動總攻。土坦克的出現對團派形成了重大的威懾作用。在土坦克的掩護下，414 向團派發動了衝擊，並在土路斜坡附近與團派短兵相接，雙方拼起長矛。團派經不住 414 的衝擊，全部跳下操場，但仍然守住通往 12 號樓的道路。

土坦克一點一點地將路障壓垮，414 的大隊人馬衝過路口，繼續與團派拼長矛。

此時，《李文忠學習班》從背後向團派發起了攻擊，並且堵住了他們的退路。團派隊伍全線潰敗，來不及逃跑的幾十個團派戰士被我們包圍在 11 號樓和 12 號樓中間的空地上，祇好繳械投降。當我趕到現場時，我們的人問我怎麼處理這些人？我說，留下武器，統統放人。我們沒有扣押這些團派作為俘虜，祇是希望他們回去以後不再參加武

門。

擊潰了團派東線“打援”的隊伍，我們的隊伍在 12 號樓會師了。但是，我們沒有向西線“圍點”的團派隊伍發動有效的進攻。

我們的土坦克在九飯廳前遭到團派的阻擊。團派向土坦克投擲了炸藥包，但炸藥包沒有爆炸。坦克手說，可能是履帶壓斷了導火索。團派的指揮叫他們的戰士再投擲炸藥包，那位同學始終不肯。

真正阻止土坦克前進的是燃燒瓶，因為團派的一個燃燒瓶打中了駕駛室前面的鐵網，並破碎起火。駕駛室裏有兩個人，一個駕駛員，一個指揮員，燃燒瓶裏的汽油和火苗正好濺到指揮員，使他全身着火。他們不得不停下來滅火。盡管滅火速度很快，指揮員還是被燒成重傷，留下了永遠的殘疾。

這時，414 中有人建議，我們應該立即攻占九飯廳，建立一條與東區浴室相連的通道，確保東區浴室的安全，而且自控系的一支隊伍已經集合，準備行動。也許因為看到團派有炸藥包，我們強行搶奪九飯廳會導致重大傷亡；也許因為我們的戰士們拼殺了一上午，又餓又累，疲憊不堪，戰鬥力大減；也許還有其他什麼原因，劉萬章始終沒有下達進攻命令。戰機稍縱即逝，團派迅速加強了九飯廳的防守，我們再想進攻也不行了。

雖然團派還占領着九飯廳，但對東區浴室的進攻也已停止。戰場一片寂靜。這個時候我以為戰鬥結束了，團派應該撤退了。

西線團派傷亡慘重，却沒能拿下東區浴室，東線團派“打援”未成，反被 414 擊潰。團派的極端分子惱羞成怒，決

定孤注一擲，采用火攻。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後，他們調來了消防車，用高壓水龍頭往東區浴室噴射汽油，然後投擲燃燒瓶，引發大火。不一會，東區浴室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五輛消防車趕來救火，被團派阻擋在校門之外。

對於團派的火攻，我們指揮部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束手無策。劉萬章試圖組織隊伍去接應浴室內的 414 戰士，實際情況已經不可能了。團派在東區浴室西邊的大窪地上架起了好多彈弓車，磚頭、石子像雨點似的飛來，打得我們抬不起頭來，無法組織起有效的進攻。我們祇好眼睜睜地看着 20 多名 414 戰士被迫走下東區浴室，向團派投降。許多 414 戰士被這個場面震驚了，那些堅強的小伙子都流了淚。有人喃喃地說：“太殘忍了！”女同學們祇有哽咽，却說不出話來。

20 多名戰士被俘在 414 群衆中造成了巨大影響，大家情緒低落，悲憤不已。我斷然決定：離開傷心之地，放棄整個 12 號樓防區。當晚，12 號樓、5 號樓的所有人員連同《紅尖兵》廣播臺一起撤到了中央主樓。

總指揮宿長忠受重傷離京就醫，劉萬章接任總指揮。

總結這次大戰，戰鬥前，我們有準確的判斷和正確的作戰方案，戰鬥中我們的戰術運用恰當，我們的戰士勇敢異常，但我們還是失敗了。究其原因，我認為，我們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決定了我們必然失敗。假如我們置東區浴室于不顧，集中優勢兵力，在團派空虛的腹地，把“一教”、大禮堂，甚至航空館、明齋等團派的據點砸個稀巴爛；假如我們扣押東綫幾十名團派作為俘虜，消滅團派的有生力量；假如我們不顧 414 戰士的傷亡，向占據九飯廳的團派發起主動進攻，打垮西綫的團派；等等；那麼我們也許會

取得完全的勝利。

但是，我們即使取得了完全勝利又會怎麼樣？我們將怎樣面對傷亡的戰士和他們的家長？蒯大富和團派中的極端分子又怎能善罷甘休？毫無疑問，他們還會在另外的時間、另外的地點組織更大規模的進攻，從而導致雙方更大的傷亡。

這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發生的錯誤的“戰爭”，無論你怎麼做，都是錯誤的選擇，都會導致錯誤的結局。

許多年後，我見到了當年 414 東區浴室的司令官和曾參加東區浴室屋頂作戰的同學，他們告訴我：

5.30 那天，老團早就攻占了東區浴室的一樓，但他們攻不上二樓，因為我們在二樓的樓梯也焊了一道鐵門。他們無法從底下攻占二樓，祇有從屋頂進攻。東區浴室南邊緊挨着九飯廳的鍋爐房，團派一些人爬到鍋爐房和九飯廳的房頂，用彈弓和燃燒瓶壓制我們，掩護他們的戰友進攻。他們在東區浴室南北兩端架了幾部梯子，派人往上衝。我們要集中精力對付從雲梯爬上來的老團，顧不得躲避彈弓和燃燒瓶。因此我們每個人都受了傷，主要是燒傷，那些可惡的燃燒瓶，打得我們身上到處都是火。盡管如此，我們也沒有讓老團占到什麼便宜。他們爬上來的人大多被我們捅下去了。祇有一個人衝上了屋頂，也被我們扎傷了，躺在屋頂上。不過，他的長矛也刺中了我們的一個戰友。

老團實在固執得很，他們祇認準了從南北兩端往上攻，如果他們多架幾部梯子從東西兩側往上攻，我們恐怕很難頂得住。

後來老團用火攻，大火燒起來了，烟熏火燎，够難受的，

但對我們影響還不是致命的。我們在東區浴室有 21 名戰士，與老團打了 10 幾個小時，雖然人人精疲力竭，個個有傷在身，但還可在大火中堅持。最嚴重的問題是被老團的長矛刺中的那位戰友出現了氣胸，有生命危險，需要立即送醫院搶救。我們的司令官決定與老團談判，如果老團保證把我們的重傷員送北醫三院治療，我方就集體投降。老團同意了這個條件後，我們才投降的。我們抬着傷員走下東區浴室，老團直接用車把他送去三院了。

我們東區浴室的司令官是“7字班”學生，現在擔任某國有企業黨委書記，那一天，1968年5月30日，正好是他的25歲生日。

為了救治一個受重傷的戰友，20名戰士寧願做俘虜。在那政治動亂、人性扭曲的年代，這是一種多麼偉大的人性、多麼高尚的情操啊！

### 制造武器

驚心動魄的 5.30 大戰給兩派頭頭和群衆都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和值得思考的問題。

團派那邊情況我們不清楚，但可以估計得到，大多數團派同學肯定不同意蒯大富的強硬政策，再也不願意參與攻打 414 據點的行動。因為事實上，從 5.30 之後，團派就再沒有攻打過 414 的據點。據我後來了解到，團派好幾位重要的頭頭都對“火攻”極為不滿，5.30 後就離開了清華。蒯大富祇能更加依靠團派中的少數極端分子，採取更加殘酷的手段對付 414。

我們這邊，5.30一仗徹底打掉了許多同學對市革委會、中央文革的信任。雖然5.30武鬥，比起動用機槍、大炮、火箭彈的廣西、四川的武鬥來說，祇能是小兒科。但畢竟這是發生在北京，發生在清華這樣的高等學府。從凌晨到黃昏，雙方廝殺了一整天，空前慘烈、空前殘酷，死亡三人，傷者無數，市革委會、中央文革居然不聞不問，這樣的市革委會、這樣的中央文革難道還能對它抱有希望嗎？這樣的文化革命難道還有什麼前途嗎？有的同學說：老百姓的命就這麼不值錢，什麼反修防修，愛誰誰吧！清華園再一次出現了逃難高潮，大批同學不願再參加武鬥，紛紛離校。

我也動員我身邊的好友離開清華，遠離武鬥現場。我怕他們有個閃失，日後見到他們的父母，沒法交代。到7月份，我們414祇剩下不足300人。

但是我不能走，我要堅持下去，我確信，堅持下去，就是勝利。

當然還要研究如何堅持下去。我們認為5.30雖然我們失敗了，但是，這一仗充分體現了414戰士英勇頑強視死如歸的精神，而在拼長矛的戰鬥中，團派根本不是414的對手。團派不惜動用火攻，就是他們虛弱的表現。蒯大富要想打敗414唯一的辦法就是武鬥升級，使用真槍實彈等所謂“熱兵器”。團派擁有“熱兵器”也已不是什麼秘密。晚上，大家經常聽到槍聲。我們知道蒯大富與外地造反派有密切聯繫，從這些造反派手裏搞些槍炮彈藥是輕而易舉的。

我們怎麼辦？自己製造！清華大學是一所綜合性的理工科大學，相關的設備、原材料一應齊全，應有盡有。清華

很重視學生的勞動教育，每個新生都必須參加一個月的金工勞動，所以清華學生的動手能力很强。

蔣南峰是我們武器制造的總指揮，我們戲稱他是 414 的吳運鐸。

造什麼？首先是造手榴彈。為了防禦團派的進攻，手榴彈是最有效的防禦武器。雷管不知道是從哪裏搞的，炸藥和彈體是自己制造的。我們做的是棉花炸藥，同學們把棉被拆了，用棉花胎做炸藥。棉花炸藥爆炸力強，做出來的手榴彈體積小，很適合女同學使用。但棉花炸藥不安全，很容易爆炸。試驗時，我們的一個同學把自己的頭發燒掉一大半。手榴彈的彈體是在鑄造車間制造的，煉鐵、翻砂、鑄造，一道道的工序，他們搞得像模像樣井井有條。

手榴彈造出來以後，我們在主樓前廣場進行了實彈試驗。由於我們低估了土手榴彈的威力，沒有站得足夠遠，第一顆手榴彈就炸傷了自己人。試驗結果證明，我們的手榴彈爆炸半徑達到 30 多米，爆炸碎片達到 700 多片，性能特好，殺傷力特大。這個結果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料。試驗成功後，我們便大量制造手榴彈，據蔣南峰說總共造了好幾百顆土手榴彈。

造好了足夠的土手榴彈後我們又造了一批土地雷。

我們的 200#分部負責制造土炮。土炮造出來後，他們在動農館前進行了實彈試驗。炮口朝西，那裏是團派控制的區域，也是馬路、小河以及大片荒地，沒人居住。一共打了四發炮彈。前三發飛得很高很遠，但不知道掉到哪裏去了，始終沒有聽到爆炸聲。第四發炮彈却打不遠，掉在“一教”附近，3 秒鐘後爆炸了。幸好無人路過，否則非死必傷。炮彈是用口徑很大的銅管在車床上車出來的，裏面

裝的是鐵釘、螺母、螺栓等硬東西。

第一門土炮配在土裝甲車上，老遠看上去就像個重機槍。

所謂土裝甲車，其實就是一輛卡車，祇不過在車頭和車身外面焊接了厚厚的兩層鋼板。

蔣南峰自己制造步槍。在試驗過程中土槍走火，燒傷了他自己的臉。經過多次失敗，他終於把槍造出來了，外形上與真槍一模一樣。子彈也是自己造的，與真子彈差不多。先用黃銅杆在車床上車出許許多多的彈殼，再發動所有非戰鬥人員往彈殼裏填炸藥。

步槍的實彈試驗是在鑄造車間進行的。我們在木床板上釘一塊鍍鋅板作為靶子，把它放在幾十米遠的地方。試槍者瞄準靶子一連開了好幾槍，每發子彈都能擊中靶子。我們開始還挺高興，覺得土槍成功了。但我們走到靶子跟前一看，效果特差。沒有一顆子彈穿透靶子，有些子彈嵌在靶子上，有些子彈祇在靶子上砸了個坑，就掉在地上了。原來我們的土槍沒有拉鎗綫，子彈在槍管裏無法旋轉，在空氣裏飛行時改變了姿態，飛到靶子跟前時大多數子彈是橫着的，所以出現以上情況。盡管土槍打不遠，殺傷力不強，但作為防守用的武器，那也足够了。因此我們還是決定批量生產這種土槍，總數可能有近百支。

蔣南峰繼續研究拉鎗綫的問題，鎗綫雖然拉出來了，但效果還是不好。一直到 7.27 工宣隊進校，我們也沒能造出一支真正的步槍。

蔣南峰還組織人試制過火焰噴射器，用幹冰噴汽油，祇能噴 30 多米遠，威力太小，沒什麼用處。他想試制能噴 150 米的火焰噴射器，試了幾次，都失敗了。

土槍、土炮、土地雷、土手榴彈、土裝甲車，這就是我們414自己制造的全部“現代化”武器。土槍、土炮、土地雷、土手榴彈陸續分發到各個據點，這對於穩定軍心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把土槍、土炮架在各個樓層的有利位置，在防區的周圍埋了很多土地雷。大家覺得有了這些武器，就可以打退團派的任何進攻，守住我們的根據地。

除此這些土制武器之外，我們還有兩支真正的手槍。這兩支真正的手槍是從外地搞來的。一支手槍是三八盒子，比較像樣，有十幾發子彈。另一支手槍是小擗子，很舊，有五發子彈。手槍送上來的那天，我和幾個人在主樓附近的樹林裏試槍。我給小擗子裝上子彈，捂着耳朵扣動扳機，結果一點動靜都沒有。仔細一看，原來是顆臭子兒。這兩支手槍都交給了戰鬥人員，雖然沒有什麼大用，却也能够嚇唬團派。

需要提一下的是，整個武鬥期間，414從外地、外單位搞來的武器就祇有這兩支手槍。414在外地祇有一個盟友，那就是南京的曾邦元，他給414運來了大批醫藥用品，我們能夠堅持下來，他的這些醫藥用品起了不小的作用。

我們的武器雖然落後，但我們還要制造假象迷惑團派。主樓後面有我們一個哨所，遠處九號樓有一個團派的哨所。兩個哨所經常用望遠鏡互相觀察。蔣南峰用油布包了幾支土槍送到我們的哨所，故意在哨所外露出槍托，還裝得神秘兮兮的樣子。團派哨所觀察後認為414有了機關槍，不敢貿然動用“熱兵器”。

工宣隊進清華後共收繳輕機槍1挺、步槍、手槍、衝鋒槍38支，土造步槍、手槍177支，土炮57門，手榴彈9枚，土造手榴彈1208枚，土造地雷218枚，彈藥6217發，

長矛 2820 根。這裏凡是“土”字號的武器大多數是 414 制造的。

## 冒險突圍

5.30 後，8 號樓是 414 在宿捨區的唯一據點，完全處于團派的包圍之中。5.30 那天我曾要求 414 工物系分部放棄 8 號樓，一起撤到主樓去。但 8 號樓的“衛戍司令”認為，一下子放棄所有宿捨區，會暴露出 414 的膽怯，堅守 8 號樓，就是顯示我們的膽識；雖然有風險，但可以牽制團派的兵力，減輕其他地區的壓力。他們表示再堅守一段時間，為整個 414 的安全冒點風險，如果形勢不對頭，他們就迅速撤出來，反正他們人數不多，精明強幹，撤出來很容易。

6 月 2 日，團派決定封鎖 8 號樓，切斷水源，414 僅靠打井取水生活。盡管如此，414 還能堅持下去。因為當時雙方祇用長矛、弓箭，414 武裝人員集體行動，還能進進出出，並沒有太大的危險。

但是新的情況出現了。6 月中下旬，武鬥嚴重升級。

6 月 19 日，團派中的極端分子向科學館的 414 人員開槍射擊。這一槍開創了在北京高校使用真槍進行武鬥的先例。過了幾天，團派中的極端分子又向我 414 駐守設備廠的同學投擲手榴彈，將其中一人眼睛炸瞎。

我們決定撤出 8 號樓。

6 月 28 日，劉萬章進入 8 號樓，傳達 414 文攻武衛指揮部關於撤出 8 號樓的命令，并親自執行這一任務。還有部分《李文忠學習班》戰士進入 8 號樓。《李文忠學習班》是我們的鐵軍，他們和 8 號樓裏的人員匯合，就能確保在

撤退過程中有足夠的力量突破團派的圍追堵截。

可是，一次節外生枝的盲目行動導致了意外情況的出現，打破了 5.30 後清華兩派持續一個月的相對平靜狀態，武鬥因此迅速升級，並使 414 陷于十分被動的局面。

29 日，不知何人組織 414 的武鬥人員潛出 8 號樓，前往團派據點新航空館，企圖摘掉團派的大喇叭，割斷他們的廣播線路。據說他們是想在撤出 8 號樓之前，搞點破壞行動，給團派製造點麻煩。不料，他們的行動被團派發現，立即派出長矛隊截擊 414。混戰中兩名 414 戰士被刺傷，其中一名戰士傷勢嚴重，長矛刺進了後背，長矛尖子斷在身體裏。414 慌忙撤退，抬着傷員回到 8 號樓。

劉萬章他們擔心：長矛斷在傷員體裏，隨時可能刺中內臟，有生命危險（7.27 後，傷員才得到治療，醫生從他的體內取出 15.5 厘米的長矛尖子）。於是派人與團派談判，希望團派允許傷員出樓急救。團派不允。不僅如此，團派在得知 8 號樓 414 有重傷員後，立刻加強了對 8 號樓的包圍，設置了路障，試圖利用這個機會迫使樓裏老四投降。

8 號樓用通訊密碼向我們報告這一情況。我們派了三名女醫務人員，穿着白大褂，打着紅十字旗幟走向 8 號樓，前去救治傷員。但是，團派中極端分子不顧起碼的人道主義，竟將三名女醫務人員綁架。

除了突圍，別無他法。本來，全副武裝的長矛隊衝出團派的包圍圈並不是什麼太難的事，可是，現在有了重傷員，速度慢不了，再加上團派加強了防範，突圍的難度大大地增加了。

30 日凌晨 5 時，我們組織了主樓根據地的隊伍準備接應 8 號樓突圍人員，在東大操場與團派隊伍對峙，由於團

派防範太嚴，始終無法打開一個缺口。而 8 號樓也沒有採取突圍行動。到早晨 7 時，我們祇好放棄接應行動。

8 號樓突圍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往東，祇要衝過老團的據點 9 號樓，就可進入 414 的主樓根據地；二是往南，祇要衝過老團的據點土建基地，就可到達 414 的防區汽車樓。北邊和西邊全是團派控制的地盤，是團派腹地。

究竟往哪個方向突圍？劉萬章他們認為：團派在東、南兩條路上設置了重重路障，且有重兵把守，抬着傷員的隊伍很難安全而快速地突圍出去，唯一的出路是向西突圍去科學館。雖然科學館也遭圍困，但科學館裏有醫生，有藥品，可以救治傷員。這條突圍路線要衝過老團的據點新航空館、新水利館、大禮堂三道關卡，要冒很大的風險，但最危險的路線，有時候却是最安全的路線，因為出其不意。

劉萬章把他們的決定通知了我們，希望科學館的隊伍適時接應。

6 月 30 日上午 8 時 30 分，劉萬章率領 8 號樓隊伍抬着傷員出其不意地向西突圍。他們選擇的突圍時間和突圍路線完全出乎團派的預料。團派沒有料到 414 竟會在光天化日之下採取這樣大膽的行動，那些監視 414 的團派崗哨眼睜睜地看着 414 衝過新航空館，祇好大叫“4 匪逃跑了！4 匪逃跑了！”

8 號樓的隊伍在衝過新航空館的時候，留下了幾名戰士，用長矛堵住新航空館的大門，使得裏面的團派不敢開門追趕。等到大禮堂和新水利館的團派組織起來時，8 號樓的隊伍已經衝到大禮堂東側。新水利館的團派長矛隊迎頭攔截。南邊土木館的團派長矛隊也正衝向大禮堂，後面新航空館的團派穿着背心褲衩拿着長矛也追了過來。414 的隊

伍腹背受敵，不能向南前進，祇能轉身向西，沿着大禮堂的臺階往上走。走到燈柱邊上時，擔架突然斷裂，傷員摔倒在地。團派的幾根長矛跟着刺到，414 回身迎敵。混戰中，團派一根長矛刺中劉萬章的腰部，另一根長矛刺中他的腿。

此時形勢萬份緊迫，祇要團派四支隊伍匯合，老四將插翅難逃。情急之下，有個 414 戰士向團派扔出了兩顆手榴彈，炸傷了團派不少人。老團一陣尖叫，停止攻擊，趕緊救助傷員。8 號樓的隊伍趁隙衝向科學館。可是，又有“一教”的團派從南面衝了過來，試圖阻止 8 號樓的隊伍前進。我們那個拿着手槍的同學舉起三八盒子對着遠處衝過來的老團，一邊比劃一邊大叫：“誰敢過來，我就對誰不客氣！”老團未敢妄動。這時科學館的隊伍出來接應，把 8 號樓的隊伍接進了科學館。

### 解救行動

414 使用土手榴彈炸傷了團派戰士，這是在武鬥實戰中第一次使用“熱兵器”，團派極端分子自然要借機進行報復，從此清華武鬥進入槍戰。

7月1日，蒯大富下令用槍封鎖科學館，凡有出入者，格殺勿論。

7月4日，團派槍手從“聞亭”（為紀念聞一多先生而設）開槍打死科學館的朱育生。

7月5日，團派槍手從“一教”附近的土山開槍打死科學館的楊志軍。

7月6日，團派槍手從“一教”向 414 的土裝甲車開槍，穿甲彈穿透雙層鋼板，打死司機楊述立。

414一戰士在科學館頂樓用望遠鏡觀察情況，一顆子彈穿透他的手腕；

414一戰士在中央主樓樓頂修理高音喇叭，一顆子彈在他的兩條大腿上穿了四個洞；

蒯大富確實已經瘋狂，他挑動團派中的極端分子，無所顧忌地向 414 開槍射擊，殺害對他們沒有任何威脅的 414 群衆。

劉萬章被困科學館後，我任命自控系九字班同學但燊為代總指揮。但燊既不是 414 的總部委員，也不是系 414 分部的一把手，却以一個普通戰士的身份受命于危難之時，毫不猶豫地負起了代總指揮的重任，這使我極為感動。

科學館裏，朱育生、楊志軍的尸體開始腐爛，受傷的人得不到很好的救治。100 多人時時處在團派的槍口威脅之下。我們心急如焚。我甚至開始感到後悔，後悔當初不該死守科學館。

解救科學館成為我們的主要任務。科學館雖遭封鎖，但我們與科學館的聯絡始終沒有中斷。我們有一個同學會旗語，懂密碼。他編了一套密碼，作為我們 414 通信聯絡的密碼，科學館、12 號樓、8 號樓、動農館都有個密碼本。武鬥升級前，414 各個防區之間的聯絡，白天用旗語，晚上用手電。武鬥升級為槍戰後，人不能露面，祇好由播音員念密碼，通過廣播喇叭與對方進行聯絡。科學館和動農館的大喇叭成為兩樓之間聯絡的唯一手段。

我和但燊與科學館的衛戍司令王永縣通過密碼反復討論解救科學館的問題，討論了科學館突圍的可能性、突圍路線以及我們應該為突圍創造何種條件。

當時大家認為唯一可行的方案是：王永縣先把科學館的

隊伍秘密集中到科學館與“二教”之間的通道裏，在恰當的時刻帶領整個隊伍突然啓動，迅速衝過大草坪，到達清華學堂，然後沿着清華學堂南邊的小道向東前進，衝到萬泉河邊。祇要到了萬泉河邊，突圍就算成功了。因為，淌過萬泉河，就進入到 414 的防區機械設備廠，我們將組織隊伍在萬泉河邊接應突圍人員。在這個方案中，最危險的一段是通過大草坪時，整個隊伍都暴露在團派的火力之下，如果有哪一個瘋狂的極端分子用機槍掃射，那我們就慘了。因此突圍行動一定要出其不意，絕對不能讓老團發現。

突圍的首要障礙是科學館四周的探照燈，一到天黑，團派就打開探照燈，把科學館和周邊地區照得如同白晝。不打掉探照燈，就無法突圍。而打掉探照燈又談何容易？祇有破壞電源系統，才能使探照燈熄滅。有人說，無論我們在清華採取什麼破壞活動，團派都能迅速恢復供電，祇有破壞校外向學校的供電線路，才能爭取足夠的時間。於是，我們決定用土炸藥炸斷校外的高壓線的電線杆，切斷清華的電源。

經過實地勘測，我們弄清了校外向清華供電的高壓輸電線路的情況。但燊主持召開了一個小型會議，請來幾位專家，就破壞供電線路的時間、地點、爆破方案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進行了論證。

7月7日夜裏，我們派人用土炸藥炸斜了通往清華的三萬五千伏高壓線的電線杆，致使清華及中關村地區停電四個小時。派去執行任務的同學不大會爆破，第一次爆破時，沒有炸倒電線杆。又換了一個地方，進行第二次爆破，才把電線杆炸斜。這時已經是早晨四點多鐘了，天色已亮，科學館沒有貿然採取突圍行動。畢竟帶領 100 多人的大隊

伍突圍決非易事，科學館的“衛戍司令”沒有拿這 100 多人的生命去作賭注。

派人炸高壓線的電線杆是我在武鬥中最愚蠢、最缺乏理智的決策，也是一種犯罪行為。這次行動沒有給科學館造成突圍機會，却導致清華園及中關村部分地區停電四個多小時，給國家財產和人民日常生活帶來了損失，還給執行爆破任務的同學帶來了終生的心靈創傷。

7月9日，團派對科學館采用火攻，企圖迫使科學館守軍投降。

上午6時，團派開始向科學館投擲燃燒瓶。7時，科學館頂棚被團派投擲的燃燒瓶打中，引起頂棚燃燒，被414撲滅。8時1刻，科學館樓頂的了望架又被團派投擲的燃燒瓶打中起火。

8時30分，414到樓頂救火，遭到團派的槍擊，414被迫退下樓去，任大火燃燒。

9時，了望架燒塌，大火四處蔓延。科學館的頂樓是木結構，團派不斷投來的燃燒瓶點燃了瓦片下的瀝青、油氈，很快，科學館的頂樓完全燃燒，火光衝天，濃煙滾滾。

團派見時機已到，開始對科學館發動政治攻勢。他們反復廣播414被俘人員的講話和414兩位家長來信，蒯大富也親自跳出來向414喊話，要科學館裏的414投降。

10時，消防車開到清華救火。進校時，消防隊受到團派阻攔；滅火過程中消防隊受到威脅，要他們趕緊撤走，否則就要將他們圍困在裏面。事後，我們看到有關材料記載。黃作珍在當天的市革委會上講：“蒯大富同志，剛才接電話說，井岡山講，我們救火的消防隊不撤出，就把他們圍在裏面。千萬不要這樣做。”[52]

直到晚上 6 時，科學館的大火才被消防隊撲滅，但頂樓已經全部燒光。

團派火攻未能迫使科學館守軍投降，414 被困人員仍然堅守在科學館。

蒯大富居然說這是 414 自己放的火，是“新國會縱火案”。

路上突圍不行，我們又考慮地下。我們用密碼與科學館討論了挖地道問題。我們找了懂行的人，用儀器在動農館北邊的窗戶進行了測量，確定了路線，設計了方案，然後通知了科學館。隨後，科學館組織人從“二教”往動農館方向挖，我們這邊則從動農館的地下室往“二教”方向挖，約定兩支施工隊伍在草坪南端會師。我們動農館這邊晝夜不停的挖，人手多，工具好，進度還挺快。幾天之後，工程負責人對我說，估計已經挖到大草坪了，很快就會與科學館那邊挖的地道連通。我們高興極了。這時有人向我建議：等救出科學館的人，414 一夜之間撤出清華，以後再找機會跟蒯大富鬥。

可是，團派早就估計到我們要挖地道。他們在科學館和動農館之間挖了一道壕溝，用一個水缸來監測我們的情況。7月 16 日，在測準我們的地道方位後，團派用炸藥摧毀了我們的地道，一名正在施工的 414 戰士生死不明。

正當我們為施工的 414 戰士的命運擔憂的時候，海軍宣傳隊的張東昌來到動農館，他告訴我，施工的 414 戰士沒有受傷，被團派抓去了，讓我放心。言談之中，他對 414 地道被炸，深感惋惜。

我們解救科學館的一切手段都失敗了。

盡管如此，科學館裏的情況仍然可以用“糧草充足、軍

心穩定”八個字來形容。科學館裏有 100 多位同學，人人都是鐵杆 414 分子，個個堪稱 414 的精英，他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面對死亡，他們談笑自如，互相鼓勵。科學館“衛戍司令”用密碼向我表示：他們有信心，一定能堅持、再堅持。

## 咬牙堅持

不能解救科學館，我們唯有堅守根據地，嚴防團派進攻。因為沒有了根據地，科學館的人就更沒了希望。我和但桑確定：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我們一定要解救出科學館的戰友，祇要科學館的戰友安全突圍，我們就立刻撤出清華，到校外與團派周旋。目前我們雖然處于被動，但蒯大富也無法取勝，我們的武器雖不足以打敗團派，却完全可以與團派同歸于盡。7 月份的清華，再次形成了僵持的局面。

在主樓這裏，有些同學曾向我們建議採取報復行動，組織“武工隊”和“夜襲隊”，深入敵後，襲擊團派，最不濟也能往老團的據點裏扔幾顆手雷彈，炸死他幾個人，叫老團以血還血，以命抵命。

但是，我們保持了冷靜和克制，我們並沒有喪失理智。我和代總指揮但桑仍然堅持一條原則，不準打死團派的人。我們相信真理、正義、道德和良知，我們相信人民。我們相信真、善、美一定能戰勝假、醜、惡。我們相信陳毅元帥說的那句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但是我們也得採取一點行動，一個既能打擊團派的氣

焰，又不致造成雙方傷亡的行動，以此振奮我們隊伍的精神。恰巧有人向我們報告，他知道團派的汽車隊駐扎在哪裏。經過研究，我們決定偷襲團派的汽車隊。

團派的汽車隊一共有十幾部汽車，駐扎在北京體育學院。北京體育學院的造反派支持蒯大富，反對 414，那裏成了團派的後方基地。經過周密的偵察，我們弄清了團派汽車隊的活動規律、汽車的停放地點、汽車司機睡覺的地方以及周圍的情況，并據此制定了詳細的偷襲方案。

一天深夜，但樂帶領 414 的長矛隊和臨時從 200#調來的幾名司機，從東主樓出發，沿着鐵路向北，長途奔襲到體院。我們的長矛隊首先控制了傳達室，然後包圍了正在熟睡的司機，將他們全部俘虜，逼迫他們將汽車鑰匙交給我們的司機并一一指認相應的汽車。待我們的長矛隊全部上車後，200#的司機們突然發動汽車，迅速衝出了體院大門，還沒等體院的人有任何反應，我們的車隊就開上了凱旋之路。這次行動幹淨利落，無一傷亡，極大地振奮了我們隊伍的精神。繳獲來的汽車停放在主樓防區，我們從來沒有使用過這些汽車。唯一發揮作用的時候是 7.27 工宣隊進校那天用來運送被團派打傷的工人到北醫三院。

一天，我在西主樓一區一樓拐角處門口的水池前彎着腰、低着頭洗臉，從門外進來了一個人，我扭頭一看，是一位姓郭的同學，我們很熟悉，我對他眨了眨眼，算是打了個招呼，繼續洗我的臉。這位同學右手拎了一個黃色的帆布書包，隨手一甩，用書包碰一碰我的腿，也算打了個招呼，就走開了。過了一會，我感覺大腿有點疼，下意識地用手去摸了摸，然後照舊伸手接水，突然我發現滿手是血，而且大腿疼得很厲害。我知道不好，馬上叫人來扶我

上樓到醫務室。醫生撕開我的褲子一看，大腿上被刀子扎了個一寸長的口子，鮮血如注。所幸沒有傷着大的血管，經過止血包扎後就沒事了。

大家問我遇到了什麼事，我把剛才的情形講了。大家立即把這位同學找來，檢查他的書包。他的書包裏有兩顆手榴彈，一把匕首，這把匕首已經把書包刺破，上面還沾着血。這就是我腿上的血。原來，他剛才打招呼的那一甩，匕首刺中了我的腿。

事後了解到，那天這位同學喝多了酒，拎着裝有手榴彈和匕首的書包出去了，說是要刺殺蒯大富，為414死難烈士報仇。他哪裏找得到蒯大富？轉了大半天，祇好怏怏地回來了。

同學們紛紛笑着說他：“你沒本事刺殺蒯大富，倒有本事刺殺沈如槐。你是不是蒯大富派來臥底的奸細？”弄得他尷尬萬分。

眼看清華武鬥結束遙遙無期，更多的人離開了學校，其中有不少人是被他們的父母硬從學校拉走的。離開的人很無奈，留下的人也很理解。但郭仁寬的出走引起了我的特別注意。郭仁寬是我們的總部委員，東方紅戰團的核心人物之一，一直堅守在科學館。有一天，吳忠同志把他叫走了，他這一走，就沒有再回來。吳忠是深得毛主席信任、被譽為“吳忠有忠”的將軍，原來是駐守錦州的某軍軍長，現在調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據郭仁寬說，67年夏天“抓軍內一小撮”時，他在錦州死保吳忠，兩人成了至交。武鬥期間，郭仁寬似乎見過幾次吳忠同志，談了什麼，他沒有告訴我們，我們也不問。郭仁寬原本也是個敢作敢為的東北漢子，但這次他却不辭而別。我想這其中必有隱情。

這件事給我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息，那就是我們面臨着異常嚴峻的形勢。

當然，我們並沒有絕望。我們相信黨，相信人民，相信歷史。我們在堅持，我們在等待，我們在期盼，期盼奇迹再次出現在清華園。

## 文攻戰場

清華園裏，槍聲不斷，武鬥不休；清華園外，唇槍舌戰，硝烟彌漫。團派與 414 開展宣傳大戰，相互指責對方挑起武鬥，并使武鬥逐步升級，相互把對方說成是國民黨匪徒，團派說 414 是“4 匪”，414 則說老團是“崩匪”。大字報、大標語，傳單、小報，貼滿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北京市是清華兩派的“文攻”戰場。兩派圍繞“政治解決方案”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414 的“政治解決方案”是要求中央對清華實行軍管，從根本上制止清華武鬥。

在汲鵬的統一指揮下，那些沒有參加武鬥的 414 積極分子，其中包括許多青年幹部和教師，成天活動在市中心，採取各種手段，揭露清華武鬥真相，要求中央對清華實行軍管。

整個 7 月份，414 每天組織人員到市革委會門前靜坐，給市革委會施加壓力，要求市革委會和衛戍區制止清華武鬥。

無論我們 414 採取什麼樣的手段——奔走呼號、游行示威、靜坐抗議——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採取措施制止清華武鬥，實行軍管，中央和北京市就是不聞不問。偌大的北京，

滿世界都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竟然沒有一個站出來關心一下人民群衆的最基本的權利——生存權！

7月7日，414組織了一次抬尸游行。我們抬着被團派極端分子用穿甲彈打死的楊述立的尸體在天安門廣場、前門大街、北京市革委會、北京市公安局和東交民巷使館區舉行了游行示威活動。我決策、組織並參加了這次抬尸游行。

事前有一些同志反對抬尸游行，認為抬尸游行會造成不良的國際影響，肯定會受到中央的批評。但我們却認為，在首都北京，武鬥是事實，開槍打死人也是事實，不良的國際影響早已存在，蒯大富在清華殺人放火，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會竟然不聞不問。他們置老百姓的死活于不顧，我們還顧得上什麼國際影響？相反，我們正是想通過抬尸游行來擴大國際影響。如果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會顧忌什麼國際影響的話，就應當採取堅決措施，制止蒯大富繼續殺人放火。如果我們的行動能夠引起中央的重視，解救科學館裏100多人的生命，那我們願意承擔任何責任。

團派的“政治解決方案”是要求中央徹底摧毀414的領導核心，確保蒯大富的一統天下。

團派的“撒手鐗”是所謂“沈如槐——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他們給這個集團編造了“十大罪狀”，不遺餘力連篇累牘地大造輿論，甚至在天安門廣場召開“徹底粉碎沈如槐——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大會”，既欺騙世人，也欺騙中央。

他們宣稱：“在414的領導核心中揪出了沈如槐——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時，江青同志又明確指示北京衛戍區，成立這個反革命集團的專案組。”前面我已經介紹過，北京

衛戍區並沒有成立什麼專案組，而是成立了聯合調查組，要求對團派的兩個專案（指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和 12 人反黨集團）進行調查。李副司令員還特別強調說：“結論祇能產生於調查的末尾，而不能產生於調查的先頭。”

蒯大富為中央解決清華問題提供的途徑是：“徹底摧毀清華 414 反革命領導核心沈如槐——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實現以清華井岡山為代表的清華無產階級革命派同廣大 414 群衆在革命原則基礎上的革命大聯合，進而建立以左派為核心的革命三結合——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

“堅決支持左派，不折不扣地執行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首長的指示，站在清華井岡山一邊，向 414 領導核心沈如槐——羅文李饒反革命陰謀集團宣戰並且摧垮他們，團結廣大 414 革命群衆，這就是解決清華問題包括武鬥問題唯一正確的途徑。”

在中央發布了制止武鬥的“七·三”布告後，團派又提出了解決清華問題的具體途徑，那就是：首先，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對沈如槐——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其次，414 方面必須首先交出武器，拆除全部武鬥工事；最後才能收繳井岡山的武器，拆除全校所有武鬥工事。

蒯大富還威脅說：“解決清華問題的途徑就是首先要堅決鎮壓沈羅反革命集團，誰要離開了這個主要矛盾，治末不治本，那他解決清華問題的任何措施都休想使清華運動前進半步。”

## 友邦驚詫

1968 年的夏季，全國各地武鬥成風。我們現在知道林彪、江青打倒楊、餘、傅、反擊所謂“右傾翻案風”，目的是為了煽動極“左”派，繼續瘋狂地打擊老幹部，奪取黨和國家的權力。而毛主席關於文化革命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又給了這些極“左”派理論上的支持，極大地刺激了極“左”派的“革命激情”，他們又揮舞起鐵拳頭，充當中央文革的打手，向廣大的革命幹部和人民群衆反撲過來。可是，極“左”派是一把雙刃劍，他們在被林彪、江青利用的同時，也膨脹了自己的私欲，肆無忌憚地搶權要名，有些人甚至連黨員都不是，就想當中央委員，廣大人民群衆不買他們的帳，于是矛盾激化，局勢動蕩，神州大地，血雨腥風，所謂的大好形勢也被破壞殆盡。

7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就廣西柳州、桂林、南寧地區武鬥、搶槍、搶奪援越物資問題發表了布告，“七·三”布告的精神實質是要求各地各派立即停止武鬥，拆除工事，上繳武器，撤離據點。

7月24日，中央就制止陝西武鬥問題又發表了“七·二四”布告。

7月9日，北京市革委會開會討論貫徹“七·三”布告問題，黃作珍、吳德雖然提出了制止北京武鬥的幾點希望，却祇是泛泛而談，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措施。不過，他們也對挑起武鬥、制造事件，如斷水、斷電、斷路等壓迫上面表態支持的做法發出了警告。黃作珍還特別針對團派威脅包圍正在清華科學館救火的消防隊一事警告了蒯大富。

然而，謝富治却是一味縱容！

7月17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再次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貫徹“七·三”布告問題。會上，謝富治公開鼓吹“七·三”布告不適用於北京，說什麼“七·三”布告是指廣西桂林、柳州等地，北京未發生這個情況，個別單位情況嚴重，還不象廣西。他不講如何貫徹“七·三”布告制止北京武鬥，却大談特談要忠于中央文革，熱愛江青，對他們要“三忠于”、“四無限”，要有“最高的無產階級感情”。不僅如此，為了討好中央文革，竟不惜吹捧聶元梓、蒯大富。

他說道：“對無產階級革命派、紅衛兵小將也不能誹謗，不能損害。……包括那些武鬥嚴重的學校，要看到那裏的紅衛兵過去的偉大功績，不能損害，不能誹謗。有了缺點，可以做自我批評。”

問題很明顯，聶元梓、蒯大富是挑起武鬥的罪魁禍首，制止武鬥首先要制止聶元梓、蒯大富的胡作非為。謝富治却要人們看到他們的“偉大功績”，這豈不是明目張膽地為聶元梓、蒯大富撐腰？

當一位工人代表談到該廠有一汽車司機給被圍困的北大井岡山運菜引發衝突時，謝富治說：“你是不是支持（北大）井岡山的？誰叫你運的菜？為什麼給井岡山運菜？這是運的派菜。”

謝富治在會上多次談到清華，他說：

“清華兩萬多人，雙方參加武鬥的人不到兩千吧？可見90%以上的人不贊成、不參加武鬥。把什麼事都壓到市革委會和衛戍區頭上，我認為是不對頭的。”

“北京市滿街的大字報，什麼‘蒯匪’呀，我是很反感的，蒯大富這個人有缺點、錯誤，但是叫‘蒯匪’是不行的。對工農兵、紅衛兵小將不能誹謗。”

“你說我是國民黨，我說你是國民黨，蒯大富成了‘蒯匪’完全不對！”

“蒯大富有什麼缺點可以自我批評，出那種大字報什麼‘蒯匪’是不對的。”

“蒯司令現在又出名了，這并不是說蒯大富沒有缺點錯誤。” [53]

清華園裏，蒯大富殺人放火，414瀕臨絕境。市革會上，謝富治指責414不該罵“蒯匪”，千方百計呵護他的紅衛兵小將蒯司令。謝富治不是曾經制定了一個什麼“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的“四不方針”嗎？現在我們終於看到這個“四不方針”的本質了。他對人民群衆的死活既不急也不管，我們罵了一聲“蒯匪”，他就氣急敗壞，又急又管又壓，恨不得調來一團解放軍，幫助蒯大富，消滅414。

這次會議，與其說是貫徹“七·三”布告制止武鬥的會議，不如說是反對“七·三”布告，鼓勵聶元梓、蒯大富把武鬥進行到底，把反對派趕盡殺絕的會議。

謝富治講話的第二天，即7月18日，駐守9003大樓的團派極端分子向主樓開槍，打死了剛從蘇州返校的一位414女同學錢萍華。那天，我恰巧站在西主樓的一區與二區過街樓下的通道裏，目睹了錢萍華中彈的全過程。

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錢萍華身着白色短袖衫，下穿漂亮的花裙子，在陽光的照耀下，鮮艷奪目。她進校時，好像沒有經過東校門。當我們看到她時，她正從東主樓走向中央主樓前的大臺階。她沿着臺階下邊的路朝西走。走了不幾步，突然聽到“乒”的一聲。她略微遲疑了一下，繼續往西走。當她走到大臺階正中間的位置時，又聽到“乒”的一聲。大概這聲音離她太近，她停了下來，左右看了看，

沒發現什麼異樣，又繼續往西走。我們也聽到了槍聲，但都沒在意。7月份，清華槍聲不斷，我們早已習以為常了。當她走到大臺階的西邊時，又是“乒”的一聲，錢萍華突然中彈倒下。我們這才如夢初醒，立刻組織幾個人冒險跑去搶救錢萍華。我們把錢萍華抬到屋裏，請醫生進行檢查。子彈從左胸打入，從後背穿出，橫貫心臟，但看不到流血。錢萍華祇對我們說了一聲“好疼”，便永遠地閉上了她那美麗的雙眼。

在錢萍華遇難前半小時，我們有兩個戰士從市區返校，走的是與錢萍華同樣的路徑，在同樣的位置，遭到團派極端分子的槍擊。這兩個人中有一位教工，他是從朝鮮戰場回來的老兵，經驗豐富，聽到聲音後，馬上對同伴說，不好，開槍了，拉起同伴的手就跑，因而幸免于難。

盡管蒯大富公開宣布開槍打死人由總部負責，參加武鬥的團派學生，即便是極端分子對於開槍殺人也還是有所顧忌。蒯大富給他的戰士出了一個主意：“五支步槍，同時瞄準一個目標，一齊開槍。這樣，誰也查不出是哪顆子彈打死了人。”我們不知道究竟有幾支步槍同時瞄準了錢萍華，但祇有一個人扣動了扳機，這個人為此坐了十年大牢。

“五支步槍，同時瞄準一個目標，一齊開槍。”這樣一個壞主意把蒯大富狡詐、陰險、歹毒的嘴臉暴露得淋漓盡致。

團派極端分子又一次槍殺無辜百姓！414群衆忍無可忍了！我們有一位姓周的同學，氣憤不過，寫了一篇雜文《有感——讀〈“友邦驚詫”論〉》，紅尖兵廣播臺廣播了這篇雜文。這是我在文化革命中看到的最有戰鬥力的一篇雜文，我覺得真解恨！現將這篇雜文照錄如下。

## 有 感 ——讀《“友邦驚詫”論》

聽了前幾天某些人不倫不類的講話，很容易使人想起魯迅先生 30 年前的一篇雜文《“友邦驚詫”論》。魯迅先生說：“祇要略有知覺的人就都知道，這回學生的請願，是因為日本占了遼吉，……不道國民黨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電各地軍政當局的文裏，又加上了他們‘搗毀機關，阻斷交通……社會秩序，悉被破壞’的罪名，而且指出結果，說是‘友邦人士，莫名其妙，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

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部隊強占了遼吉，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衆，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願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

好個國民黨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麼東西！

.....

.....‘友邦人士’要我們人民受宰割，寂然無聲，略有‘越軌’，便加殺戮；.....”

今天，國民黨極其友邦人士的上述強盜邏輯却又出自據說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口中，這實在使我們無比的驚詫。蒯大富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據說祇是缺點錯誤，不許 4 匪誹謗，老百姓憤怒不過，罵聲“蒯匪”，友邦人士却很反感了。蒯匪瘋狂開槍打死無辜百姓，據說這是紅衛兵小將的豐功偉績，而老百姓忍無可忍，把他們的豐功偉績展覽一下，却成了醜化文化革命。新聞年年皆有，唯有今年

特殊，說左派們殺人無罪，老百姓吃菜却有派了。友邦人士荒唐的邏輯，卑鄙的用心，我們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開了一個制止武鬥的會，制止了一會兒，第二天反而大打出手，老百姓又死了一個就毫不為怪了。誰能說殺死這個百姓的劊子手不是友邦人士呢？！還是魯迅先生說得好：“‘友邦人士’要我們人民受宰割，寂然無聲”，但是今天的人民不是 30 年前的人民，今天的“友邦人士”却也祇有昔日的七分了。人血不是水，欠債總要還，老百姓是不好欺侮的，友邦人士應該記住這兩句話。

### 血染清華

1968 年 7 月 27 日，又是一個陽光燦爛却又異常悶熱的日子。

上午，我們照例組織部分 414 戰士在市革委會門前靜坐示威，給市革委會施加壓力，要求他們採取措施制止清華武鬥。今天輪到無綫電系的人，他們沒有想到這是他們最後一次靜坐示威了。

我和但桑在西主樓討論問題。忽然哨兵前來報告，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大隊人馬高舉紅旗，手拿“紅寶書”進了東校門，正朝我們這邊走來。但桑說他先出去看看。不一會，他回來告訴我：“來人自稱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好像有成千上萬的人，浩浩蕩蕩，看不到頭。他們說來清華宣傳‘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制止武鬥。”

我們倆立刻意識到這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至少是一個解救科學館裏 100 多人的絕好機會，於是毫不猶豫地決定：開放 414 防區，歡迎工宣隊進校，尋找機會，設法

解救科學館的人。我們立即派人通知各個據點，歡迎工宣隊，拆掉路障，交出部分武器；同時派人到動農館用密碼通知科學館：工宣隊開進清華制止武鬥，做好準備，乘機撤出科學館。由於情況不明，我們還留了一點心眼。我和但桑約定，由我出面接待工宣隊，他不公開露面，暗中掌控全局。另外我們還要求各個據點藏匿一部分武器，以防不測。

布置妥當後，我連忙跑到西主樓過道，指揮我們的人搬開路障，讓宣傳隊進來。

工宣隊很有秩序地開進 414 防區。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帶眼鏡的人，後來知道他是北京第五建築公司的柳一安，進入清華東校門的隊伍共有 6000 多名工人，柳一安似乎是這支隊伍的總指揮。不久，柳一安成為工宣隊與我們兩派談判的首席代表，後來當了清華大學的革委會副主任、黨委副書記。1975 年柳一安受中央指派進駐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即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主要負責人、學部領導小組組長。他和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惠憲君、常委呂方正等四人寫信給毛主席告遲群的狀，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也受到了批判。

走在柳一安旁邊的是海軍宣傳隊的張東昌，他的任務是向導。張東昌和我關係很好，他最同情 414，武鬥那麼嚴重，他還不時來清華了解情況。地道被炸的那天，他特地來到動農館告訴我，414 的施工人員已被團派抓走，沒有生命危險。我雖然不知道工宣隊的來頭，但一見到張東昌，頓時放心了許多。

我和張東昌幾乎同時看到了對方。他一把抓住我，對柳

一安說：“這是 414 的一把手沈如槐，我們就找他談判。”

我帶領柳一安、張東昌進了西主樓，一部分工人也隨着涌進了西主樓，另一部分工人開始拆除門口的掩體，而大批工人隊伍則繼續向西前進。

我把柳一安、張東昌請到一樓的一個小教室，同時進來許多工人，有坐的，有站的，擠滿了整個教室。我和柳一安就着教室中間的乒乓球桌子的一角坐下來開始談判。

柳一安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是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我們開進清華，宣傳落實毛主席批示照辦的‘七·三’、‘七·二四’布告，我們希望你們聽毛主席的話，立即停止武鬥，上繳武器，拆除工事，撤離據點；並要求你們和我們就這幾個問題簽署一個協議。”

我說：“我已經命令 414 各個據點拆除路障、交出武器、歡迎宣傳隊了，簽署協議不成問題，但我們關心的是今後 414 的安全和科學館被困人員的撤離。”我心裏在說：撤離據點？科學館的人早就想撤了，就是撤不出來。

我繼續說：“清華武鬥是團派挑起的，我們是被動挨打的一方。我們很願意停止武鬥，上繳武器，拆除工事，撤離據點。我擔心團派不肯這樣做。如果團派不幹，414 單方面解除武裝，撤離陣地，安全得不到保障。最好的辦法是雙方同時停止武鬥，上繳武器，拆除工事，撤離據點。”

工人們一下子站起來，有的說：“我們現在要求你們停止武鬥，你却去說團派如何如何，這是轉移目標。”有的說：“不管你 414 也好，團派也好，都要貫徹執行‘七·三’、‘七·二四’布告。首先你要自己做到，然後再說別人。”有的說：“忠不忠，看行動，如果你們不停止武鬥，我們工人階級不答應！”

受到衆多工人師傅的一頓搶白，我竟一時語塞，祇好和柳一安討論協議草稿。

協議很快就起草出來了，掐頭去尾，實質性的內容還是那四條，即停止武鬥，上繳武器，拆除工事，撤離據點。

協議起草好了以後，我没有立即簽字，而是話題一轉，問柳一安：“你們準備在清華呆多長時間？我希望你們常駐清華。”我心裏想，如果工宣隊能在清華長期呆下去，414的安全就有保證，科學館的人也能救出來。我想弄清楚，工宣隊的決心有多大，能不能象他們自己說的那樣有效制止清華武鬥。衛戍區和李鐘奇都拿蒯大富沒辦法，他們能行嗎？

柳一安說：“我們根據情況需要在清華呆多長時間就呆多長時間。”

工人們說：“不落實‘七·三’、‘七·二四’布告，我們工人階級就不走了。”

從工人那兒得不到肯定的答復，我又問張東昌：“你們是不是不走了？”

張東昌吱吱唔唔也沒有給我肯定的答復。我確信，工宣隊雖然決心很大，口氣很硬，但並沒有準備在清華長期呆下去，甚至連在清華過夜的準備也沒有。

我對柳一安說：“你們保證不走，我就在協議上簽字。”

工人們立刻反駁說：“你們大搞武鬥，把清華弄得烏烟瘴氣，你們應該無條件貫徹執行‘七·三’、‘七·二四’布告，立即停止武鬥。我們來宣傳毛澤東思想，制止清華武鬥，你却要我們做出保證，真是豈有此理！”

有些工人責問我：“你這樣推三阻四，到底想不想停止武鬥？你對毛主席是什麼態度？”

我向工人們解釋說，我們有 100 多人被圍困在科學館，情況危急，請求工宣隊幫助 414 撤出科學館的 100 多人。我想，工宣隊不在清華呆下去也罷，收不了團派的武器也罷，祇要能幫我救出科學館的人，我們就滿意了，大不了一走了之。

我對柳一安說：“那你保證幫助我們撤出科學館的人，我就簽字。”

工人們大聲嚷嚷：“落實毛主席指示不能有先決條件！”

柳一安說：“你首先要在協議上簽字，用實際行動表明你們是真心真意停止武鬥的。祇要簽了字，其他事情都好辦。我們不能向你做出什麼保證，但我們一定設法幫助你們撤出科學館的 100 多人。”張東昌在一旁說：“你簽字吧，簽好字，我帶工宣隊去科學館。”

我認為我已經爭取到最好的結果了，于是我和柳一安分別代表 414 和工宣隊在協議上簽了字。我感覺談判時間總共不超過一小時。

隨後柳一安和我分別指派各自的代表一起把協議送到了 414 的廣播臺監督廣播。隨後，柳一安走了，張東昌說了聲“我去科學館”，也走了。我自己則走到焊接館的院子裏，聽 414 的人匯報各方面的情況。

這個時候，6000 多名工宣隊已經進入從主樓到動農館的 414 所有據點。對於工宣隊來說，414 的防區已經成了他們的“解放區”。工人們有的在收繳武器，有的在拆除工事。所謂拆除工事，其實就是扒掉大樓門口的掩體，搬掉那些堵住樓梯的桌椅板凳，打開釘死的門窗。

為了落實談判時的承諾，一大批工宣隊員開始有組織地向科學館進發。但桑混在工宣隊的隊伍之中為他們指路。

當這支隊伍到達二校門時，那裏一片平靜。原定從南校門和西校門進入清華的工宣隊還不知道滯留在何處。駐守在“一教”的團派對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的這支隊伍毫無思想準備，無人喊話，無人阻攔，眼看着大批工宣隊員搬掉路障，徑直向大禮堂方向前進。

但桑把工宣隊引到科學館，并敲開大門，告訴裏面的人，迅速撤出科學館。過了好一會，裏面的人才撤出來，集中到了科學館東邊的大草坪上。工宣隊讓這 100 多人都坐在大草坪上不準走動。但桑不知道誰是工宣隊的負責人，工宣隊也不知道但桑是 414 的代總指揮。但桑無法指揮 414 的人向主樓方向撤退，祇好跑回焊接館，向我報告情況。我聽到但桑的匯報後，大發雷霆：科學館的人怎麼能坐在大草坪上？那裏太危險了！一分鐘也不能耽誤！你趕緊回去找工宣隊，請他們帶領隊伍撤過來。但桑又跑回大草坪，却仍無濟于事。

不久又傳來消息說，100 多人雖然還坐在大草坪上，但工宣隊在他們周圍排了幾層“人牆”，嚴密地保護着他們，有團派試圖衝擊他們，都被工宣隊擋住了。我這才鬆了一口氣。

可是，等了好長時間，科學館的人還坐在大草坪上，誰也說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這段時間裏，團派開始衝擊工宣隊，甚至用手榴彈襲擊工宣隊。工宣隊接近大禮堂時，團派還引爆了地雷。大草坪上的 100 多人處境十分危險。圍觀的人很多，其中有不少是團派的人。如果有哪個壞人往 414 人群裏扔手榴彈，後果將不堪設想。我在那兒幹着急：工宣隊怎麼還不趕緊將科學館的人轉移到主樓來？

科學館戰友們的安危始終揪着我的心。我時不時地找到談判時認識的工人師傅，請他催促工宣隊領導快點行動，把科學館的戰友們帶到主樓來。工人師傅對我說：“你就放心吧，我們工人階級說得到做得到。”

可能需要詳細勘察撤離的路線，可能需要進行周密的準備，在滯留了大約兩個多小時後，工宣隊終於帶着這 100 多人撤離大草坪，沿着土建系館即清華學堂南邊的路，撤到萬泉河邊。這條路線正是當初我們為科學館突圍所選擇的路線。因為“一教”、二校門那裏衝突不斷，形勢緊張，為避免遭到團派的襲擊，確保撤離人員的安全，工宣隊決定跨過萬泉河，直接進入 414 的防區，而且顯然為此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人們紛紛跳下萬泉河，站在齊腰深的污水裏，排成兩排，肩膀上搭起木板，架起了一座“人橋”，100 多人踩着工人師傅的肩膀，進入了 414 的防區。整個撤離行動進行得迅速而又井然有序。工宣隊把 100 多人安全地帶到了我們的根據地，先把他們集中到西主樓 3 區 208 階梯教室，對他們講了話，爾後與我們進行了交接。

我懷着喜悅的心情迎接從科學館撤出來的 100 多名戰友。他們被困多日，臉色鐵青，今天死裏逃生，見到戰友，恍如隔世，有人不禁喜極而泣。

我對工宣隊充滿了敬佩之情，因為他們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值得信賴的人。

我對工宣隊充滿了感激之情，因為無論是“人牆”，還是“人橋”，都充分體現了工人階級的偉大胸懷和自我犧牲精神。

我們將工宣隊視為 414 的救命恩人。

科學館的人得救，414 轉危為安，我們已無後顧之憂。

我和但桑立即決定：馬上通知各據點，交出所有藏匿的武器，一件不留；所有人員隨時準備跟着工宣隊一起撤出清華園。在我們的意識裏，工宣隊不會在清華久留。

與此同時，我又發布了 414 文攻武衛指揮部的“七項命令”，命令 414 所有人員停止武鬥，上繳武器，拆除工事，撤離據點等等。這是我簽署的 414 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最後一份“命令”。其實，這份“命令”是多餘的，因為 414 各戰區司令官都已執行了我和工宣隊簽署的協議，414 的武鬥據點已全部成為工宣隊的“解放區”，武鬥工事正在拆除，大部分武器已經收繳。我這樣做祇是想表明 414 無條件服從工宣隊的政治態度。

但桑對我說，他“代總指揮”的任務完成了，要走。我表示同意，晚七時左右，但桑離開了清華。

但桑，一位普普通通的學生，危難時刻，挺身而出，危機過後，隱身而退，他的這種精神，他的這種品德，永遠銘刻在我的心中。

我也一身輕鬆，彷彿以局外人的姿態注視着清華局勢，注視着工宣隊與團派之間激烈的較量，等待着這場較量的結果，我將根據這場較量的結果來決定 414 下一步的行動。

5.30 革委會被迫流產、12.27 陳楚三勝利返校、7.27 工宣隊開進清華，這三件事可以稱為清華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大奇迹。每當 414 面臨絕境的時候，清華就會出現奇迹，414 總會絕處逢生。誰能說得清這是機緣巧合，還是歷史必然？

從 66 年 7 月 29 日到 68 年 7 月 27 日整整二年的時間裏，是周總理奉命“過問”清華問題。因此，我認為清華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大奇迹與周總理密不可分。雖然我們無從了

解周總理在工宣隊進清華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但蒯大富要抓的工宣隊背後的“黑手”肯定是指周總理，因為在當時代替中央書記處行使中央大權的中央文革碰頭會裏祇有一個可以稱得上是楊、餘、傅“黑後臺”的人，那就是周總理。而蒯大富一直都將周總理視為 414 的“黑後臺”、二月逆流的“黑後臺”。

文化大革命十年間的清華大學，劉少奇“過問”了五十天，周總理“過問”了兩年，從 68 年 7 月 27 日以後，毛主席親自“過問”，他老人家這一“過問”就是整整八年。一所高等學校，受到劉少奇、周總理、毛主席的輪番關注，清華大學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真是非同一般。一部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史，無疑是中國文化大革命史的袖珍版本。

關於工宣隊，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撰的《清華大學九十年》中是這樣記載的：

7 月 26 日晚，由 8341 部隊任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主任張榮溫召集，北京 61 個工礦企業的代表在新華印刷廠開會，響應毛主席號令，商議組織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並決定第二天上午開進清華大學，宣傳“七·三”“七·二四”布告（即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制止廣西、陝西等地武鬥的布告）。

7 月 27 日上午，北京新華印刷廠等 61 個工礦企業 3 萬名工人組成的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 8341 部隊、北京衛戍區、海軍等軍代表配合下（總指揮為張榮溫），從四面八方開進清華大學。工人們手持毛主席語錄和“七·三”“七·二四”布告，對兩派喊“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口號。

11 時 30 分，北京市革委會、北京衛戍區三支兩軍辦公

室負責人劉豐電話通知蒯大富：“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要去清華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七·三’布告，請你們大力支持宣傳隊，并積極與宣傳隊合作。”蒯大富在靜齋召集團派總部頭頭開會，指責這一行動是“楊餘傅和黑後臺背着中央搞的陰謀”，“是來支持老四壓老團的”。會議決定：“1、緊急請示中央，問清情況；2、堅守已有據點，不讓工人進樓，如果工人硬攻，就抵抗還擊”。通過電話、廣播以命令方式將第二條向團派各武鬥據點下達。[54]

作為工宣隊指揮者之一的遲群是這樣描述 7.27 的：

7.27 宣傳隊進校時，清華一萬四千多人，真正在學校搞武鬥的祇有幾百人。但是，他們的影響很大，嚴重地破壞和幹擾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所以成了北京市的“老大難”單位，叫做“大螞蜂窩”。這樣引起首都工人階級的強烈不滿，也很痛心。所以在偉大領袖毛主席一聲號令之下，首先由新華印刷廠革命職工去串聯，26 號一天就串聯了 62 個單位，三萬多產業工人。27 日上午就很有組織、很有秩序地開進了清華大學。這組織工作、串聯工作是很快的，這都是在 20 個小時以內辦好的事。

進去以後，我們有個指揮部，找他們兩派來談判。告訴他們，我們工人同志是來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是落實“七·三”“七·二四”《布告》來的，現在找你們兩派來談判。當時他們不談。開始他們拖延時間，並且造謠說，你們（指工宣隊）都是受蒙蔽的，你們的後臺你們知道是誰嗎？就是楊、餘、傅，你們在受一祇大黑手操縱着。他們要揪黑手。後來，我們就跟他們講清楚，我們後面不是黑手，是

一紙大紅手，你揪吧！但是他們造謠還是要造的，後來造謠也不起作用了。工人隊伍一直往裏走，宣傳要文鬥，不要武鬥，要停止武鬥，交出武器，拆除工事，要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他們不聽，有少數人還是煽動，在一小撮階級敵人挑動下，污蔑謾罵工人，說你們都是社會上的殘渣餘孽，你們是牛鬼蛇神。他們還搞了電網，搞了帶刺的鐵絲網，上面挂上牌，寫上“電網，小心觸電”等字樣。後來他們向工人扔石頭，動用長矛、匕首，刺傷了工人。他們把工人抓到屋裏去打，工人手裏祇有兩樣東西，一件是毛主席像，一件是毛主席語錄，別的什麼也沒有。他們對工人、解放軍採取突然襲擊的辦法，把解放軍的帽徽、領章撕下來，把工人打傷。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同志也沒有還手，還是繼續熱情宣傳。後來，他們向工人隊伍開槍，扔手榴彈。有的工人進樓後，他們向樓裏扔手榴彈，所以當時工人是付出了代價的，工人同志和軍隊同志是有傷亡的。但是工人、解放軍堅定不移，犧牲的同志手裏還緊緊握着毛主席語錄。受了傷的同志流血不止，還是不走，繼續在那裏宣傳。他們說，不落實“七·三”“七·二四”《布告》，不落實毛主席的指示堅決不走。當時，天下着大雨，他們來的時候都未帶雨衣，就淋在雨裏。有的同志來的時候很倉促，小孩子鎖在家裏，天晚了還未喂奶，他們也不回去。他們說：這些人這樣不聽毛主席的話，我們不能走，一定要把“七·三”“七·二四”《布告》宣傳落實好。幾萬人就堅持在那裏。那時，連續下了幾天大雨，三萬多人一直沒有撤退、沒有動搖，就是在那裏宣傳毛澤東思想，讀着毛主席語錄，向紅衛兵小將、向學生們宣傳“七·三”“七·二四”《布告》。

一小撮階級敵人，絕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利用資產階級派性，進行挑動，妄圖挑起武鬥。當時我們對這種形勢做了充分的估計，做充分的準備，規定了幾條，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動氣，不動手。即使到那種情況下，沒有一個工人同志用武力還擊他們。

.....

當時他們造謠污蔑，耍兩面派，7月27日晚達成協議，停止武鬥，讓工人同志進去宣傳毛澤東思想。當面說的很好，達成協議以後，工人宣傳隊廣播了，他們回去不廣播，搞兩面派，給工人宣傳隊造成很大困難。就是這樣也沒有難倒工人階級。[55]

工宣隊的領導實際上是8341部隊的軍人。海軍宣傳隊雖然也參加了26號商議組織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會議，但是他們的任務僅僅是給工宣隊當向導。

在414向工宣隊全面開放據點以後，進入清華南校門和西校門的隊伍衝破重重阻攔，包圍了團派的所有據點，并占領了其中部分據點，開始收繳武器，拆除工事。

幾萬工人開進清華徹底粉碎了蒯大富武力打垮414、獨霸清華的如意算盤。下午，蒯大富下令開槍，向工宣隊發起全面反攻，逐一奪回被工宣隊占領的據點，企圖把工宣隊趕出清華園。

紅寶書到底頂不住大刀長矛和真槍實彈的襲擊。我們在焊接館看到從“前線”抬下來的傷員，有的被長矛扎傷，有的被手榴彈炸傷。這些受傷的工人們被安置在焊接館，414的人幫助工宣隊護理傷員。後來，受傷的人越來越多，傷勢也越來越重，有些傷員不得不送醫院搶救。工宣隊的車輛不够用，我們就組織414的車輛和人員幫助工宣隊運

送傷員。受傷的工人真多啊，大卡車在北醫三院和焊接館之間往返不停。從“前線”下來的工人們異常憤怒，他們不停地向我們描述“前線”的情況。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一位受傷的工人悲憤地說，一個懷孕的女工倒在了血泊中，如果她死了那就是兩條人命啊！

接着又傳來團派開槍打死工人的消息。後來工宣隊公布的數字是：死亡 5 人，受傷 731 人，其中重傷 149 人，另外團派還抓捕了 143 人。張東昌也被團派抓住，他和 10 名工人、解放軍一起被扣押在土建基地，28 日凌晨才放出來。我不太相信工宣隊公布的傷亡數字，因為我聽說也有解放軍同志犧牲了。

雖然我們深知蒯大富和團派極端分子的暴戾，深知極“左”派紅衛兵政權的殘忍，但我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蒯大富居然會下令對素不相識、手無寸鐵的工人們開槍，更沒有料到竟會出現如此大規模的血腥場面。7.27 事件是蒯大富的大暴露，它徹底了暴露了蒯大富紅衛兵政權的反動本質。誰阻止他獨霸天下，他就要消滅誰，414 也好，工宣隊也好。

我當時的心情是復雜而又微妙的。我不願意看到工人們遭遇更大的傷亡，但又希望工人們能夠迅速拿下團派的所有據點，從根本上解除對 414 的威脅；我對蒯大富的暴行表示義憤，但面對蒯大富和工宣隊嚴重抵抗的局勢，又不免有些幸災樂禍。我想，過去任憑 414 怎樣批判蒯大富的錯誤，世人總是將信將疑；今天蒯大富的自我暴露抵得上 414 的十萬張大字報。蒯大富反人民的面目暴露得越徹底，清華園裏的是是非非就更容易大白于天下。

現在，414 的防區成了工宣隊真正的“安全區”和“大

後方”。我們不僅組織車輛人員救助受傷的工人，還發動 414 的大師傅為工人們做飯做菜，因為團派極端分子把工人們帶來的飯菜搶走了，工人們既無飯吃，又無水喝。414 的幹部、教師、職工還自發地從家裏拿來許多黃瓜、西紅柿，慰勞工宣隊。414 這樣做完全是出自內心的，因為 414 對工宣隊充滿了感激。414 和工宣隊親密無間，真有點“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味道。

不記得從什麼時候開始下起了大雨。也許因為無辜的工人、解放軍在清華獻出了鮮血和生命，老天為之動容，滂沱大雨，傾盆而下。

蒯大富的行為激怒了工宣隊，尤其激怒了工宣隊中的解放軍。晚上一輛一輛的軍車滿載着全副武裝的解放軍開進了清華園，停在主樓前廣場。解放軍戰士頭戴鋼盔，手握鋼槍，槍上的刺刀在探照燈的照射下閃閃發光。他們下車後把 9003 大樓圍了個水泄不通。工宣隊中的一位解放軍告訴我說：“蒯大富再不投降，我們就要像消滅土匪一樣把他們消滅掉！”

我想，蒯大富這回終於“修成正果”，做了名副其實的“蒯匪”，這真是天數啊！對於危害國家、危害人民、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蒯匪”，就應該徹底消滅！

蒯大富知道自己闖了大禍，也知道繼續與工宣隊對抗祇有死路一條，最終決定將團派隊伍撤至北京航空學院，祇有少數極端分子仍固守着 9003 大樓。

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毛主席拯救了蒯大富。

7 月 28 日凌晨 3 時 30 分到 8 時 30 分，毛主席接見了聶元梓、譚厚蘭、韓愛晶、蒯大富、王大賓五大領袖。

得到毛主席接見蒯大富的消息後，我深感迷惑不解，蒯

大富闖了這麼大的禍，毛主席還接見他？看來，蒯大富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保護。按照當時中國的政治定律，毛主席的接見是至高無上的榮譽，毛主席接見誰，說明毛主席支持和保護誰。

團派似乎得到了鼓舞，固守 9003 大樓的團派極端分子打出大標語：“毛主席接見蒯大富是對井岡山人最大的愛護”，繼續頑抗。

工人們不滿了。他們說，打死人的蒯大富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死了人的工宣隊却没有受到毛主席接見。工人們紛紛提出質問：工人階級到清華制止武鬥到底是不是革命行動？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

憤怒的工人們首先把怨氣發到團派群衆身上。28 日那一天，工人們看見團派就打。祇要從樓裏出來學生，工人們就將他圍住，問是老團還是老四？是老團的就揍他一頓。

29 日，北京第二機床廠、北京光華木材廠、北京起重機廠的工人們自發組織起來前往北京市革委會，揪住蒯大富不放，同蒯大富進行辯論，要跟蒯大富算賬。

當晚，吳德、黃作珍不得不接見這三個廠的代表，再三肯定工宣隊進清華的行動是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的革命行動；耐心勸說工人代表們顧全大局，壓一壓氣。他們對工人代表說，蒯大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殺出來的革命小將，這一次犯了錯誤，要正確對待他；清華井岡山是個比較好的革命群衆組織，但是他們這一次犯了錯誤，工人既要幫助他們，把武鬥徹底解決，又要處理好，不要被階級敵人利用。最後吳德、黃作珍為了平息工人們的憤怒情緒，答應將犧牲的工人按烈士待遇處理。<sup>[56]</sup>

很快，聶元梓、譚厚蘭、韓愛晶、蒯大富、王大賓五人

共同署名的《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正式傳達下來，毛主席明確表示反對武鬥，他說：

“文化革命搞了兩年，一是鬥，二是批，三是改。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你們少數大專院校是在搞武鬥。

“還是要文鬥，不要武鬥。現在提出四個辦法：（一）實行軍管。（二）一分為二。（三）鬥、批、走。（四）繼續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還是照樣轉動。

“我說你們脫離群衆，群衆就是不愛打內戰。有人講，廣西布告祇適用廣西，陝西布告祇適用陝西，在我們這裏不適用。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的布告，誰如果還繼續違反，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57]

毛主席要求五大領袖歡迎和支持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少數有武鬥的大學宣傳“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勸說學生停止武鬥，上交武器，拆除工事，支持、尊重人民解放軍。

沒過幾天，我們得到了 7.28 接見時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講話的記錄稿。毛主席的講話很長很長，看完講話，我沉思良久，但任憑我想破腦袋，也不能把握毛主席講話的精神實質。也許作為一個年輕人，一個凡夫俗子，我永遠不能理解毛主席偉大戰略家的胸懷、他駕馭歷史的領袖本色、他處理重大事件的高超藝術和獨特風格。不過，我也在獨自琢磨：毛主席既支持了工宣隊，又保護了蒯大富，把一場流血衝突化解于談笑之中，莫不是為了確保文化大革命按照他老人家指引的方向繼續前進？

不管如何，我心中有些踏實了：工宣隊是毛主席派來的，不是黑手派來的，工宣隊站住了，蒯大富闖禍了，414 安全了。

毛主席說：

“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麼多工人‘鎮壓’‘紅衛兵’。‘黑手’是什麼？‘黑手’就是我麼。他又不來抓。你們來抓我好了。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團是我派去的。我向軍代表說：大學武鬥如何解決？我說你們去做做工作，看看。結果派去了 3 萬人……你們看大學武鬥怎麼辦？一個是統統搬出去。學生也不要管，誰想打就大打。過去革委會、衛戍區對武鬥的態度是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另一個是幫助解決一下，這看來還是對的。這個問題深得工人贊成，深得農民贊成，深得多數學生贊成。大專院校五十九個，打得凶的也就五六個。試試你們的能力。至于怎麼解決呢？你們提出意見。”

“武鬥有兩個好處：第一是打仗有經驗；第二是戰爭暴露敵人。這種社會現象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不以中央為轉移。現在工人去幹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來，再鬥十年八年，地球照樣轉動，天也不會掉下來。”

對於蒯大富和 414，毛主席的傾向是很明顯的。他說：

“你們這五員大將，包括蒯大富，我們都是保護你們的。這次沒有找你們的對立面來，你們回去講一講，我們有偏向。北大井岡山和清華 414 就會對我有意見。”

“清華 414 說：四一四思潮必勝，我就不高興，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岡山兩個，414 是右的。”

“《四一四思潮必勝》這篇文章，我仔細讀過了。它是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勝的。”

“414 有個理論家叫周泉纓，理論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論家，寫文章抓他幹什麼？” [58]

在談到清華問題時，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把蒯大富看成是自家的好孩子，犯了點錯誤，上帝原諒他們；而 414 則是一群異己分子。在談論 414 時他老人家的用字遣詞、語調神情，跟談論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的用字遣詞、語調神情一模一樣。在他老人家的眼裏 414 完全是一個保守組織、右派組織，他之所以沒有下令搞掉 414，祇不過是想保留 414 作為一個難得的反面教員而已。前不久，在與韓愛晶談到毛主席 7.28 講話時，我把我的看法告訴他，韓愛晶說：“你的感覺對極了”。

我們雖然早就想到毛主席會支持蒯大富，但我們絕沒有想到毛主席竟然會這樣偏袒蒯大富，特別是在蒯大富製造了如此駭人聽聞的血案之後，還會說“我們都是保護你們的”，“我們有偏向”。這種事情如果放在 414 身上，哪還有我們的活路？用不着毛主席發話，謝富治早已把我們打入了十八層地獄。

“蒯大富是偏左的，414 是右的”，毛主席對一個單位的兩個對立的群衆組織的性質做出如此明確的表態，這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畢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個弱小的群衆組織敢于在如此廣泛而又深刻的理論問題上持久而又頑強地與他老人家視為左派的蒯大富和井岡山進行鬥爭，這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因此，“四一四思潮”不能不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視。

不過，我們心裏很不服。說“四一四思潮”主張“造反派祇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我們還能勉強接受。說“四

一四思潮”主張“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我們萬萬不能接受。蒯大富這樣的造反派與無產階級相距何止十萬八千裏？我們認為，四一四思潮，祇不過是一種思潮，不敢妄稱為“理論”。但是如果硬要說四一四思潮是一種“理論”的話，那麼這個“理論”的每一部分都來自毛澤東思想，來自黨的一貫的方針政策，來自當時中央“兩報一刊”的社論，有很多語言甚至就是毛主席的原話，怎麼能說“414是右的”？

不錯，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講話也好，“兩報一刊”的社論也好，不同的時期強調的方面各不相同，414有所取捨。特別是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團派指責我們抽掉了繼續革命的精髓。但是，我們認為，恰恰是414所堅持的那些東西，既符合國情、又符合民意，才是真正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不是414右，而是蒯大富極“左”！

因為不服，所以不怕，414的領導集體象往常一樣沉着而又冷靜。從414成立的那一天起，我們就清楚地知道中央文革隨時都可能把414打成反動組織，對此我們有足够的思想準備。經過兩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我們也逐漸明白了：沒有毛主席的支持，中央文革決不敢這樣咄咄逼人，周總理也不會這樣忍辱退讓，文化革命的局勢也不致這樣反反復復。

我們暗自慶幸，慶幸我們堅持武裝自衛，爭取了寶貴的時間，等到了工宣隊進清華的這一天；慶幸工宣隊終於開進清華，使得蒯大富這些極“左”派的本質在這一天暴露得這麼徹底。

我們也很自信，自信414思潮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是

符合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們堅持的是真理，我們隨時準備為真理而獻身，我們甚至甘願做歷史的犧牲品。也許，我們所堅持的東西算不上什麼真理，但我們確信我們至少也是在堅持正義、道德與良知，我們是在堅持真、善、美。而正義、道德、良知，真、善、美是區別一個人、一個組織的最最基本的標準。7.27 這一天團派與 414 截然不同的表現所形成的強烈反差一定會給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並引起他們進行認真的思考。公道自在人心，是非終有結論，看誰能將我們 414 打成反動組織？！而當那一天真的到來時，我們也一定會拼死一搏！

### 同歸于盡

7月 29 日，北京市革委會和北京衛戍區給中央寫了報告，全文如下：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現將兩個情況報告如下：

一、毛主席接見聶元梓、譚厚蘭、韓愛晶、蒯大富、王大賓以後，即日他們五人研究了如何傳達貫徹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首先整理了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記錄，當晚 8 時，由大專院校紅代會出面召集 44 個大專院校的代表（130 人）進行了傳達。聽了傳達，大家很激動，認為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對紅衛兵小將最及時、最重要的教導，是最大的愛護、最大鼓舞。會議通過了：（一）傳達學習毛主席接見時的最新指示和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二）有武鬥的六個院校，

立即無條件地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收繳武器；（三）沒有實現革命大聯合和革命三結合的學校，在革命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并考慮擬于近日召開萬名師生大會，動員廣大革命師生，立即開展一個聲勢浩大的學習、落實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群衆運動。聶元梓、蒯大富、王大賓等同志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

許多院校連夜召開會議進行了傳達。

二、關於清華問題：二十八日上午我們在工人中做了工作。下午謝富治、溫玉成等同志又同聶元梓等五人一起到清華，又向工人做工作。一方面緩和工人同清華學生的緊張空氣，一方面鼓勵他們繼續幫助清華徹底解決武鬥問題。因為一些工人傷亡，許多工人情緒激憤，同蒯大富一派對立情緒很大。經過工作以後，工人同志姿態很高，雖有意見，但許多人表示要照顧大局，妥善處理這個問題。之後又到“團派”做了工作，富治同志給他們講了話。蒯大富等當時表示，承認工人的行動是革命行動，他們在此問題上犯了錯誤，要向工人同志道歉，并要張貼大字報，歡迎工人宣傳隊宣傳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堅決拆除工事，要交武器。接着（富治同志）又攜同蒯大富到工人那裏，蒯向工人表了態。

我們已注意：“四一四”想利用此事做文章，壞人挑撥工人和團派的關係。

清華整個情況已有很大好轉。

北京市革委會

北京衛戍區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位不知姓名的 414 的同情者看到了這份報告，他用鋼筆把這份文件抄在一張紙上，在“‘四一四’想利用此事做文章”每個字下面都畫了一個圓圈。他托人把這份報告悄悄送給了我。這位 414 的同情者提醒我們，北京市革委會在給中央的報告裏已將 414 與壞人相提並論，要我們做好思想準備。

看到這份報告我很憤怒。你們想為蒯大富塗脂抹粉、開脫罪責盡管去做好了，為什麼還要無中生有地向毛主席、黨中央告我們 414 的黑狀？自從柳一安和我簽署了停止武鬥的協議之後，工宣隊的領導就再也没有和我們接觸過，祇有一位名叫劉德山的五建工人形影不離地跟着我——這位劉師傅後來成了我最尊敬的朋友。在工宣隊的嚴密監視之下，我什麼也沒有說，什麼也沒有做。整個 414 的領導集體默不做聲，靜靜地注視着清華事態的發展。在我們看來，三萬工人喋血清華，已經是驚天大作了，何須 414 再做文章？工人和團派的關係勢如水火，何須別人挑撥？這些戴着有色眼鏡的大人物實在低估了我們的政治智慧了。

仔細一想，我又釋然了，414 是謝富治的眼中釘、肉中刺，既然 7.28 毛主席明確支持蒯大富，批評 414，他何不順勢給我們來個“莫須有”？試想，我們這位副總理中唯一的“左”派，如果不經常幹一些無中生有、落井下石、顛倒黑白、栽贓陷害的勾當，又怎麼能够躋身于“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行列呢？

毛主席 7.28 講話表明：他老人家派工宣隊進清華並沒有想到要“工人階級登上上層建築的歷史舞臺”。他派軍代表去清華，祇不過是想做做工作，看看如何解決大學武鬥而已；他沒有想到竟去了幾萬工人，居然把蒯大富打出了

清華，弄得他老大不高興；他對 7.27 工人、解放軍的巨大傷亡似乎視而不見，却對蒯大富那些被抓被打的戰友們關懷備至；他不願意看到 414 上臺，而要維持和保護蒯大富的紅衛兵政權，甚至連團派和 414 在未來政權席位的分配比例問題上都做了明確指示。

可以推斷，7.27 事件後，維持和保護蒯大富的紅衛兵政權仍然是毛主席處理清華問題的基本方針。

謝富治為落實毛主席的這一方針進行了一系列的努力。他面臨兩個基本矛盾，一是團派與工宣隊之間的矛盾，一是團派與 414 之間的矛盾。對於解決這兩個矛盾，他似乎胸有成竹：

對於第一個矛盾，他的解決辦法是工宣隊撤出清華，團派回到清華。

對於第二個矛盾，他的解決辦法是回到 1967 年 4 月兩派簽署的“四項協議”。

很顯然，要想回到“四項協議”，前提條件是工宣隊撤出清華，團派回到清華。

7 月 30 日，謝富治在北航接見團派時說：

“宣傳隊（進清華）沒有跟你們商量，人數多了一點，制止武鬥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了，收繳武器的任務也大部分都完成了，還有很多的任務沒有最後完成，但他們可以減少一些，他們主動提出減少三分之二。”

謝富治告誡團派：

“你們千萬不能跟工人對立，北京市可有 100 萬工人，那個產業工人包括建築工人有 70 萬。你們千萬不能脫離工人，你們要支持工人！不支持工人，你們大學生就吃不開！你不能夠因為跟別的方面鬥爭，你就脫離了工人，那個不

對的！不要把工人推向你們的對立面去。懂不懂這句話？”

[59]

從謝富治的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工宣隊和蒯大富就工宣隊去留問題進行過激烈的較量。工宣隊甚至受到了責難：進清華沒有跟蒯司令商量，人數又太多。第二天工宣隊雖然宣布將三萬人減少到五千人，但却絲毫沒有撤出清華的迹象。

8月2日，謝富治接見工宣隊和蒯大富時，明確提出用去年的“四項協議”來解決清華兩派問題，他對工宣隊說：

“剛才我不是給你們漏了底嗎？回到老路上來，那個協議（指四項協議）和偉大領袖講的一樣麼！人數配備上差不多。”

他又對工宣隊說：

“對414還是要聯合，要團結，要工作麼！他們那個《四一四思潮必勝》是錯誤的。但不要說414是老保組織，不要那麼說麼！你們找到四項協議。反之，你們聽他們的幫助指揮，他們讓你們怎麼做，就怎麼做，這很有文章的，你們要幫助他們。”

看來不光是團派，宣傳隊在背後也議論414是保守組織。而在謝富治看來，414就是地地道道的老保組織，祇不過不要那麼說而已！謝天謝地，謝富治對我們這個老保組織“還是要聯合，要團結，要工作”，沒有趕盡殺絕，我們真要對他感恩戴德了。

在單獨接見蒯大富時，謝富治說：

“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這些人比較地支持你們。”

他又說：

“我們又回到老路上去，還按那個協議。主席不是講了

嗎，委員比例，團派與 414 是二比一，那個協議是幾？（答：九比四）蒯大富不算是八比四，正好和主席講的一致。”

“你們要守住這個原則麼！我們再回到四項協議，414 幹不幹？他們現在價錢低了吧！到適當時候我要與他們談。不過，他們是反我的，可能也不聽我的。《有感》我看了，寫得很好。”

我實在弄不明白，謝富治過去也是一位戰功赫赫的將軍，怎麼現在竟是滿腦子的市儈哲學？他永遠不會理解我們當時的想法。我們不是價錢高低的問題，我們實在是無價可言。我們對於蒯大富政權裏的席位不感興趣，祇要蒯大富在清華掌權，清華永遠沒有出路。我們的要求是：中央對清華實行軍管，從根本上推翻蒯大富的獨裁政權。

謝富治也不無悲哀地說：

“現在工人都說 414 好，團派不好。因為他們 414 没打工人，交槍快，沒抓工農宣傳隊的黑手。” [60]

“工人都說 414 好”，這是首都工人階級對 414 的評價，這是人民群衆對 414 的評價。在我們看來，這是至高無上的評價。有了這樣的評價，就是作為歷史的犧牲品，我們也心滿意足了。414 作為一個弱小的群衆組織能够在那樣激烈的政治鬥爭中全身而退，沒有慘遭厄運，“工人都說 414 好”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吧。我們永遠感激首都工人階級！

雖然工人們都說 414 好，雖然 7.27 那天我們和工宣隊“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可是現在却没有能够“勝利在一起”。謝富治、工宣隊、蒯大富三方在談判解決清華問題，414 是保守組織，沒有參與資格，毫無置喙餘地。不用說謝富治不把我們放在眼裏，就連工宣隊也不接近我們了。此時的 414 處于“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地位。

不過，我們除了對謝富治繼續表示不滿外，倒也處之泰然。我們認為：工宣隊與團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414 與團派的矛盾是次要矛盾，主要矛盾解決了，其他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了。我們唯一所做的事情是向工宣隊提供那些仍被團派關押的學生、教師和幹部的名單，我們期盼他們能盡早重獲自由，洗刷“反黨集團”、“反革命集團”等等不白之冤。至于清華的前途，我們相信工宣隊，相信工宣隊比 414 更能代表清華廣大師生員工的根本利益。我們認為，工宣隊既然是毛主席派來的，并遭受如此重大傷亡，他們就不會輕易撤出清華，清華的局勢已經不是團派和 414 所能左右的了。

我們也很理解工宣隊的處境。毛主席保了蒯大富，批了 414，蒯大富是革命左派，414 是保守組織，工宣隊把我們擋在一邊是很自然的。他們需要調查研究，他們需要分析思考，他們更需要時間。

謝富治頻繁活動，他自以爲掌握着處理清華問題的主動權，但工宣隊似乎並不買他的帳，工宣隊在走自己的路。最終，工宣隊或者更準確地說 8341 部隊主要負責人改變了毛主席的看法，也徹底改變了中央文革處理清華問題的基本方針。

8月 15 日，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那一天，毛主席終於接見工宣隊代表，工宣隊拿到了“尚方寶劍”。當天夜裏即 8 月 16 日凌晨，工宣隊讓我們兩派簽署協議，要求我們立即取消兩派組織，成立“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革命大聯合委員會”。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工宣隊在清華的地位從臨時的“占領者”變成了合法的“領導者”。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蒯大富的紅衛兵政權已經消亡，414 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414 與團派已經同歸于盡。

從 7.27 到 8.15，20 天的時間，工宣隊對清華情況進行了初步的調查研究，對清華問題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確信，工宣隊最終說服毛主席拋棄了蒯大富。

是工宣隊，是首都工人階級將蒯大富永遠釘在了歷史的耻辱柱上。

8 月 26 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文章公布毛主席的指示：“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門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

7.27 工宣隊血染清華，在清華建立了以 8341 部隊為領導的軍管體制，結束了以蒯大富為代表的極“左”派的紅衛兵政權，宣告了紅衛兵運動的終結，對於穩定北京和全國的局勢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幸的是，在 8341 部隊主要負責人楊德中、張榮溫離開清華後，遲群、謝敬宜把持了清華的大權，并統治清華長達八年之久，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旗號下，把毛主席對解放後教育戰線的極“左”估計和有關教育革命的錯誤思想發揮到了極致，步蒯大富的後塵，繼續推行極“左”路線，變本加厲地迫害清華的幹部、教師、職工、學生，特別是廣大的知識分子，總結出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等一系列所謂“經驗”，在得到毛主席的同意後，推廣到全國，對全國的教育戰線造成了無可估量的破壞，也給全國的知識分子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1969年1月，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我被結合為革委會委員。

1970年1月，中共清華大學委員會成立，我被選舉為黨委委員。

1970年3月，我畢業離校，分配到東北某工廠工作。

1970年12月，我被8341部隊兩名軍官從工廠押回清華隔離審查。在隔離審查一年之後，又被迫勞動改造六個月。當時學校專案組給我做了“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審查結論，我拒絕在結論上簽字。

1983年11月15日，中共清華大學委員會根據中共中央文件中發（82）55號給我送來了“關於沈如槐‘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清華大學的問題記錄材料”，這是清華大學黨委給我重新做的結論，經我簽字後就“記錄在案”了。“記錄材料”記錄了我的主要錯誤，內容如下：

1、關於“414總部”派人到外地串聯，支持當地造反派揪“軍內一小撮”問題。

一九六七年，武漢發生“7.20”事件。同年八月，《紅旗》雜志“八·一”社論發表後，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揪“帶槍的劉、鄧”的煽動下，社會上出現了衝擊軍區的事件。清華大學“414總部”在本派同學的要求下，召開總部負責人會議，做出決定，同意放人，于八月上旬有一些人到外地串聯，群衆有一部分人支持了當地造反派，揪“軍內一小撮”。沈如槐作為414的主要負責人對這一決定負一定責任。

2、關於“414總部”派人炸斷通往清華的三萬五千伏高壓輸電線的電杆問題。

一九六八年七月，清華大學武鬥升級後，“414 總部”的科學館被蒯大富的“井岡山兵團總部”派人圍困，不僅被斷電斷水，并日夜被機槍封鎖。在被圍困的 100 多人中，受重傷的多人，被開槍打死的兩人，尸體放在地下室，已發臭腐爛。為擺脫困境，撤出科學館，根據別人的建議，經沈及總部幾個負責人同意，于七月七日夜間“414 總部”派人用土炸藥斷了通往清華的三萬五千伏高壓輸電線的電杆。這一事件造成了清華園及中關村部分地區停電四個多小時，給國家財產和人民日常生活帶來了損失。

### 3、關於抬尸游行，在社會上和國外造成不良影響問題。

一九六八年四月，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部”主要頭頭蒯大富等人策劃挑起了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并于六月份蒯大富總部派人包圍了“414 總部”大樓科學館，斷電斷水等。七月份武鬥升級，“414 總部”一方連續有 5 人被蒯大富總部一方打死。“414 總部”向北京市革委會呼呼要求制止清華武鬥，嚴懲凶手，但未獲結果。為迫使市革委會表態，經總部負責人會議研究決定搞一次抬尸游行，沈參加了這個會議，同意這個決定並參加了七月七日的抬尸游行，路經天安門及東交民巷使館區。這一行動在社會上和國外都造成不良影響。

沈如槐同志的問題屬一般性錯誤，其審查材料按有關規定處理。

## 參考資料

- 1、李雪峰：《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線錯誤”》，《回首“文革”》，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9頁；第660頁。
- 2、《周總理在清華大學的講話》，《首長講話集》，清華大學衛東兵團，1966年11月，第60頁。
- 3、《周總理八月二十二日在清華大學辯論大會上的講話》，《首長講話集》，第31頁——34頁。
- 4、唐偉：《十二月三十一日與周總理座談（追記）》，1967年1月2日。
- 5、《內部參考》，1967年1月31日，井岡山《131》組編。
- 6、《與中央首長座談紀要》，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紅星社稿，67.1.24。
- 7、穆欣：《關於工作組存廢問題》，《回首“文革”》，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48頁。
- 8、劉冰：《風雨歲月》，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頁。
- 9、劉冰：《風雨歲月》，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頁。
- 10、《井岡山通訊》。
- 11、《內部參考》第20期 井岡山兵團第一動態組編 1967年4月26日。
- 12、《內部參考》第22期 井岡山兵團第一動態組編 1967年5月9日。
- 13、張廣友：《改革風雲中的萬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

- 14、《動態》，第 51 期。
- 15、《大事記》，《憶往昔》戰鬥隊編，第 55 頁。
- 16、《井岡戰報》。
- 17、《大事記》，《憶往昔》戰鬥隊編，第 59 頁。
- 18、《井岡山通訊》。
- 19、《井岡山通訊》。
- 20、《井岡山通訊》。
- 21、《動態》，第 39 期。
- 22、《井岡山通訊》。
- 23、《井岡山通訊》。
- 24、《井岡山通訊》。
- 25、《孺子牛》，牛密字 0106 號。
- 26、《孺子牛》，牛密字 0105 號。
- 27、《孺子牛》，牛密字 0104 號。
- 28、《清華動態》。
- 29、《陳伯達戚本禹與清華兩派負責人座談紀要》。作者收藏資料。
- 30、《中央首長對清華運動的指示匯編》，第 17 頁。
- 31、《大事記》，《憶往昔》戰鬥隊編，第 74 頁。
- 32、《大事記》，《憶往昔》戰鬥隊編，第 79 頁。
- 33、《動態》，第 108 期。
- 34、張聶爾：《中國 1971——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 年 6 月版，第 132 頁，第 133 頁，第 134 頁。
- 35、《中央首長對清華運動的指示匯編》，第 14 頁。
- 36、周泉纓：《我心中的文革》。
- 37、《中央首長對清華運動的指示匯編》，第 12 頁。
- 38、《中央首長對清華運動的指示匯編》，第 13 頁。

- 39、《中央首長對清華運動的指示匯編》，第 14 頁。
- 40、《大事記》，《憶往昔》戰鬥隊編，第 115 頁。
- 41、《戚本禹 12.27 接見 414 代表時的講話記錄》。
- 42、《聯合風暴》，第 76 期。
- 43、《革命到底》，第 2 期。
- 44、《革命到底》，第 6 期。
- 45、《周總理接見工交、財貿、農林口各部委及國務院直屬單位代表時的講話》。
- 46、《聯合風暴》，第 109 期。
- 47、《聯合風暴》，第 129 期。
- 48、《聯合風暴》，第 119 期。
- 49、《學習材料》，遲群報告，1969 年 3 月 23 日。
- 50、《聯合風暴》，第 169 期。
- 51、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增訂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年 5 月 版，第 114 頁。
- 52、《聯合風暴》，第 233 期。
- 53、《聯合風暴》，第 239 期。
- 54、《清華大學九十年》，第 274 頁，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出版社。
- 55、《學習材料》，遲群報告，1969 年 3 月 23 日。
- 56、《吳德七月二十九日接見工人代表談話記錄》。
- 57、《聯合風暴》，第 248 期。
- 58、《1968 年 7 月 28 日毛澤東主席召見首都紅代會負責人時的談話》。
- 59、《謝富治七月三十日在北航接見團派時的講話》。
- 60、《聯合風暴》，第 252 期。

##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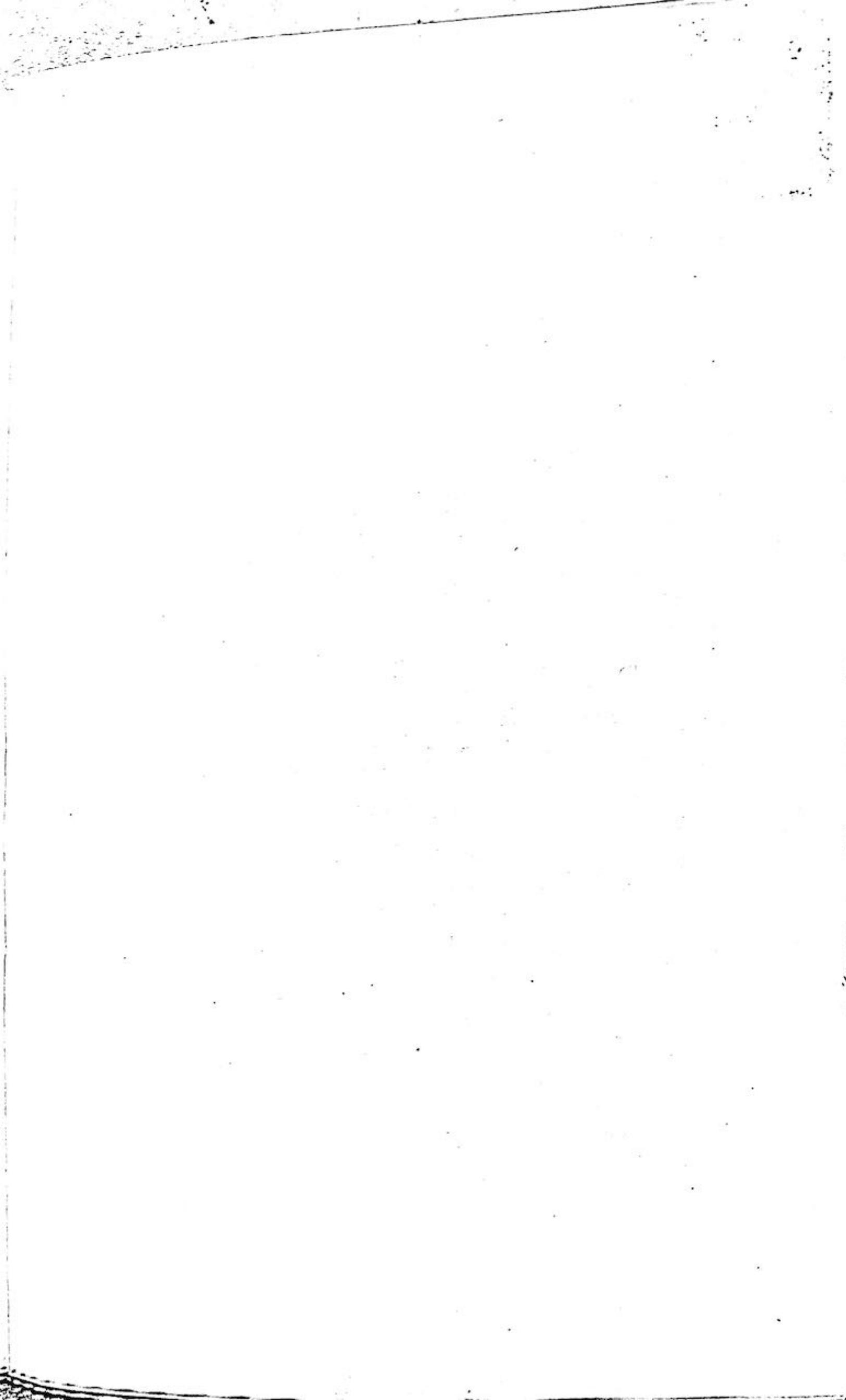
二十世紀末期，中國出現了一股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熱潮。一大批有關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著作、記實文學和回憶文章陸續問世。在閱讀了這些作品後，我產生了一種責任感，并且在這種責任感的驅使下，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親身經歷寫了出來，于是就有了這本書。

衆所周知，清華大學在文化大革命中處于一個特殊的位置，劉少奇、周恩來、毛澤東三位最高領導人輪番關注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清華大學發生的許多重要歷史事件對文化大革命的進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我和我的同伴們，是清華大學那一段歷史的見證人，在一定時期（1967年——1968年間），我們還是清華大學那一段歷史的創造者，或者說是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政治舞臺上的主要演員。我把我們的所思所想，所見所聞，所作所為，把我們的理想信念、真誠執着、幼稚自大、缺點錯誤，忠實地記錄下來并重現在讀者面前，為歷史學家和一切關心文化大革命的人們研究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學生的理想與追求、亢奮與躁動、執着與迷茫；紅衛兵運動的發生、發展和終結；兩派群衆組織的形成、分歧和爭鬥（包括文鬥和武鬥）等等；提供一個真實的、鮮活的具體事例。人們也許會從我們的經歷中找到若幹有益的啓示，以避免我們的祖國再犯類似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

遺憾的是，1974年，我把文化大革命中的25本筆記本和幾乎所有文字資料付之一炬，現在我已無法生動地描述當年的歷史事件，再加上本人政治水平和文學素養不高，提供給讀者的祇能是一本枯燥無味的流水賬，請讀者見諒。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清華大學圖書館有關領導和工作人員的大力支持和幫助，許多當事人向我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并對本書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見，在此我謹向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

沈如槐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四日



1  
I253. 1  
220

17-2-3

## 清華大學文革紀事

作 者：沈如槐

策 劃：孔憲昌

編 輯：胡國強

封 面：潘潔

出 版：時代藝術出版社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94-196號

景鴻商業大廈3樓

電話：2851 1062 傳真：2851 1184

ISBN：988-97331-5-3

承 印：視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4年10月第二版

定 價：HK \$ 68.00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西北师大图书馆



03189582



17-2-3



ISBN 988-97331-5-3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number 988-97331-5-3.

9 789889 733155

ISBN: 988-97331-5-3

HK\$ . 68

行政文书处理 权力争斗 辛酉政变 丙午皇极  
试批

1. 文书 政务流转 政治运作 上下相合 见面 (小朝)
2. 内朝 外朝 接口 过程细 纲领化 动员制度
3. 近代史“范式”
4. 地方文书 家民官 文书 诏令 礼仪

(安东强) 满、蒙、藏文语种文书汇集

政体 形似而实不同 大准予、宣旨  
“专制”、“中央集权”概念 (胡适与周谷诚论)  
诏令文书的重新检讨

(韩策) 同一良 并非望《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史》 古代史对制度重视  
得商院《中古政治》

制度 文书 历史  
辛酉政变 一朝天子一朝臣 历史发生只是提示了

也是文书 政治格局 力量分野  
董元醇上奏 (胡适《热河密札》)

君王与君主

具有政治性质

制度设计政治形态反映 88年光緒皇帝 浩王与太后

围绕一个健康的太后来做制度安排

女: 太后一皇帝 党一国 关系